

0421935

太平洋戦争史

第五卷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太平洋战争史》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1954年7月15日
东洋經濟新报社出版

内 部 讀 物

太 平 洋 战 争 史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金鋒等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书号：11017·146

1963年3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4千字
印张 8— $10/16$	印数 1—3,500册
定价(9) 1.20元	

目 录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間力量对比的变化	3
第一节 两个世界	3
新政权的誕生——人民民主主义革命(3) 大国合作和联合国(6)	
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9) 美国的世界政策(12) 战后的法国、英 国、意大利(15) 两个世界的形成——苏美的对立(17) 战后美国 的亚洲政策(18)	
第二节 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革命	23
殖民統治的危机(23) 印度支那的民族革命(24) 印度尼西亚的动 态(30)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36) 緬甸的“独立”(39) 菲律宾的民 抗軍(42)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45)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进展	48
民族解放力量和国民党政府的对立(48)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51) 馬歇尔的調处和內战的爆发(55)	
第二章 占領和“民主化”	63
第一节 从东久邇內閣到第一次吉田內閣	63
美国在占領初期的对日方針(63) 东久邇內閣和軍隊的瓦解(65) 工农运动的再起(68) 币原內閣(70) 各政党的成立(72) 币原內 閣的垮台和政治上的空白期(73) 第一次吉田內閣(76)	
第二节 統治体制的对美从属化	78
占領体制(78) “民主化”的实质(81) 修改宪法(82) 远东国际軍 事法庭审判战犯和整肅(85) 垄断資本的改組(87) 土地制度的“改 革”(91) “教育改革”(96) 民主力量的壮大(98) 从十月斗争到 二·一总罢工(103) 占領下的文化(108)	
第三章 国际局势的紧张化	114
第一节 冷战的开始	114
杜魯門主义(114) 馬歇尔計劃和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116) “西 欧”陣营的危机(118) 南斯拉夫問題(121) 北大西洋公約(123) “和	

平攻势”(126)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	128
解放军胜利的根本原因(128) 反动派的挣扎(131) 解放军的决定	
性胜利(132) 中国革命的意义(134) 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135)	
第四章 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138
第一节 “中间政权”的任务	133
片山内阁的成立(138) 片山内阁的垮台和芦田内阁(140) “远东的	
兵工厂”化(142) 第二百零一号政令(145) 加强警察(148) 昭和	
电气工业公司事件(150)	
第二节 准备战争体制	151
第二次吉田内阁和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151) 第三次吉田内阁	
(153) 加紧镇压(156) 道奇路线(158) 危机的进一步发展(163)	
反对解雇的斗争(164) 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166) 农村	
中反动势力的进攻(169) 殖民地文化的泛滥(172)	
第五章 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	176
第一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	176
独立运动的高涨和南北分裂(176) 走向统一的趋势(179) 开战前	
夕的国际形势(181) 准备战争(183) 战争的爆发(185) 战局的转	
变(187) 停战谈判的开始(188) 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190)	
第二节 日本的重新武装	192
警察预备队的建立(192) “日美经济合作”(195) 开倒车(198) 整	
肃共产党(202) 通货膨胀和加强劳动强度(205) 文化的反动化	
(207)	
第三节 对日和约的签订	209
准备单独媾和(209) 为全面媾和而斗争(213) 旧金山会议(220)	
“和约”的内容(224) 展望——为了结束战争(226)	
編后記	229
附录(一) 年表	230
附录(二) 資料	254

第五卷 旧金山对日和約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間 力量对比的变化

第一节 两个世界

新政权的誕生——人民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是空前的。根据梵蒂岡教廷所发表的数字,在这次大战中,共有二千二百余万人丧失了生命,受伤的有三千四百余万人。在这次战争中,特别是非軍事方面的被害者,也就是一般平民的死伤及其他損失的数字非常庞大,这是这次战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例如,在整个战争中从未直接成为战場的英国本土,尚且由于空袭伤亡了十五万左右的平民,烧毁了二百万戶以上的房屋。(《朝日年鉴》1947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在被害的惨重方面,就是在战争性质方面,也和从交战双方來說都是属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迥乎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有着西方国家的統治阶级对德、意、日三国統治阶级所进行的反軸心战争的性质,这是事实;而在大战过程中,由于英美等国的阴谋策动,反軸心国家的联合战线也曾不止一次地面临分裂的危险。尽管这样,整个說来,这次战争确实具有强烈的反对法西斯压迫的解放战争的性质;具体地說,假如沒有以苏联人民为首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反法西斯解放斗争,1945年同盟国的胜利是不能想象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也是从这次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在战后应该受到注意的,不仅有美国在資本主

义世界中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还有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

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了以下的概括：“結果并不是苏联被消灭或削弱，而是苏联更加强大了，它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了。結果并不是民主制度被削弱或毁灭，而是中欧和东南欧几个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并确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結果并不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遭受进一步的奴役，而是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新的、强大的高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危机尖锐化了。”^①

首先看看欧洲的形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由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国，都以战争中的抵抗运动为中心相继产生了新的政权。南斯拉夫在 1945 年 11 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取得百分之九十的选票而大获全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 1946 年 5 月的制宪会议的选举中取得了二百六十九万张选票而跃居第一大党。波兰也在 1946 年 6 月举行的人民投票中，民主阵线首先取得胜利；接着，又在 1947 年 1 月的大选中，以社共两党为中心的民主力量获得了百分之八十六的选票，而美英两国所支持的伦敦流亡政权米柯拉契克的农民党，仅仅获得百分之七的选票而遭到惨败。阿尔巴尼亚在 1945 年 12 月的选举中，民主阵线获得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而大胜。保加利亚在 1946 年 10 月的选举中，祖国阵线获得了百分之七十的议席。罗马尼亚在 1946 年 11 月的选举中，民主党派也获得百分之七十二的选票而胜利。情况稍有不同的是匈牙利，在这里，经过 1945 年 5 月的第一次选举，共产党成为第一大党，但在同一年 11 月的第二次选举中，小农党取得胜利，因而产生了社共两党联合政权。

^①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 页。——编者

对于东欧局势的这种变化,丘吉尔早在 1946 年 3 月在美国富尔顿市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就曾叫嚷说:“今天,在北起波罗的海的斯特丁,南达亚德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的这条綫上,已經設下了一道鉄幕”,并攻訐“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左翼力量的增长,并不限于丘吉尔所說的“鉄幕”以內。首先,英国工党在 1946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三百九十三個議席(保守党在全部六百四十個議席中仅占一百九十八席)。其次,在同年 10 月举行的法国制宪議會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一百五十一个席位而跃居第一大党,人民共和党取得一百五十席而成为第二大党,社会党取得一百三十九席而成为第三大党;在意大利,通过 1946 年 6 月的选举,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二百零七席,社会党取得一百一十五席,共产党取得了一百零四席,在这两个国家里成立了有社共两党参加在內的联合政府。唯一例外是英軍占領下的希腊,英国在这里排除了战争期間的抵抗力量——人民陣綫而支持了流亡政权。在 1946 年 3 月由英国外相貝文所一手策划的大选中,人民陣綫进行了抵制,結果由人民党一党攫取了胜利,但选民的弃权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七。由此而成立的查理达利斯內閣,上台后立即开始鎮压人民陣綫派,而經過 9 月的国民投票,竟使格奥尔格奥斯二世的复辟得到成功。对此,丘吉尔曾贊揚說:“独有雅典保持了不朽的光荣和决定其未来的自由”。

然而,社会主义力量在战后的欧洲有了这样显著的发展,是否可以单纯地断定为“苏联的扩张政策”的結果呢? 斯大林在 1946 年五一劳动节发布的命令中說道:“人民群众由于战争教訓的体驗,懂得了国家的命运不能付托給那些追求狹隘阶层与自私的反人民目的的反动統治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那些不再願意按照旧的方式生活的各个民族,便把他們的国家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建立民主秩序,积极地进行反对反动力量,反对新战争挑拨

者的斗争”。^①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欧洲，在亚洲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使西方国家“无可奈何”的情况（拉铁摩尔：《亚洲的形势》）。在近东方面，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外约旦、也门等七个国家也通过 1945 年 2 月的开罗会议，结成了阿拉伯联盟，声明互相援助，共同防御，作为中立的第三种势力而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束缚。

这样，在战后世界的力量对比上，左翼力量有了很大增长，出现了所谓“两个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形成了以摆脱了二十年来“外交上孤立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包括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在内的反资本主义阵营，从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全面危机的第二阶段。

大国合作和联合国

在历史上从未见过，象 1945 年夏季结束的战争那样在有利于建立决定性和平的良好条件下结束的战争。（塞勒：《战争还是和平？》）这种良好条件的基础是以后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称之为“苏美英友谊的高潮”的雅尔塔会议为顶点的三国合作；是在和平时期也和战争时期一样进行合作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战争末期产生了建立和维护和平的国际制度，它的核心组织则是构成三大国协商形式的“外长会议”和“联合国”的二重机构。外长会议，根据 1945 年 12 月的莫斯科协定把法国也包括进来而发展为四国外长会议。经过 1945 年 6 月的旧金山会议而宣告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在同年 12 月在伦敦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决定将其总部设在纽约，并于 1946 年 1 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此外，还有一件事应该和这一维持和平机构的成立相提并论，那就是世界工

^① 《论战后国际形势》，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7 页。——译者

联的成立。世界工联是经过 1945 年 2 月在伦敦和同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包括苏英美法等五十六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共同参加下宣告成立的。

貫串着作为战后“维护和平机构”的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是“大国一致的原则”，因此，在联合国机构中，五大国（苏、中、美、英、法）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占居优越地位一事，已经受到公认。这个否决权，诚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 1946 年 12 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用“否决权的叛乱”一语所讽刺的那样，不久就受到了各小国的集中反对。莫洛托夫对此曾加以反驳，他说：对否决权的否定，将使大国降到和小国同等的地位，而以“单纯的多数表决原则”束缚大国的行动，这是和“大国一致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这是因为，苏联主张大国一致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不仅是为维护旨在保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国际机构所必需的，而且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也得到了美英两国的赞同。（参看本书第 4 卷，第 1 章，第 2 节）因此，战后“和平的危机”，就是由于这种大国一致的原则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尤其是这一原则的核心——“苏美合作”，更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然而，对于“苏美合作”的问题，在从其成立的一开始，美国国内就存在着反对因素。从罗斯福执政的末期起，在掌握对外条约批准权的美国参议院中，共和党领袖范登堡、塔夫脱等人的发言权逐渐加强，对苏协调政策根据杜勒斯的所谓“两党外交”，开始受到修正。这种趋向随着杜鲁门的上台而更加显著，但到 1946 年秋季为止，仍旧保持着对苏协调的基本路线。因此，在整个战后期间外长会议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也只有在这一段时期里，即：1945 年 9 月在伦敦，同年 12 月在莫斯科和 1946 年 4 月在巴黎所召开的各次外长会议，先后讨论了对意大利等五个国家的媾和条约草案，设置了远东委员会、盟国对日委员会和有关朝鲜问题的苏美共同

委員會，以及作出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對五國的和約草案，又經過 1946 年 8 月在巴黎召開的媾和會議中二十一個有關國家的審議以後，於同年 10 月在紐約外長會議上宣告成立，並於 1947 年 2 月在巴黎正式簽字。這是“終於通過了走向和平的漫長旅途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和平後所邁出的第一個重要步驟。”（貝爾納斯：《講老實話》）

然而，對立也已經開始了。在 1946 年 2 月的安理會會議上，因討論伊朗政府就伊朗人民黨在阿塞拜疆進行革命活動問題提出的控告，蘇美兩國之間第一次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接着，又發展到希臘共產黨的游擊戰問題。同年 6 月在巴黎舉行的外長會議上，蘇美兩國又因為對德奧兩國的和約問題發生了全面的對立。而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會議上，主張“原子能國際共管”的巴魯克計劃和主張“立即禁止原子武器”的馬立克建議，也形成了對立。關於美國的所謂“原子彈外交”，曾任國務卿的當時陸軍部長史汀生，經過反復考慮的結果，得出了否定的見解，他在 9 月 11 日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一份備忘錄，預言說：“蘇聯掌握生產這種武器的秘密，快則四年，最遲也不超過二十年”，並且警告說：“由於我們在解決原子武器問題上對蘇聯的態度，很可能使美蘇關係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因為，如果我們不肯立即向蘇聯表示誠意，而只是把這種武器拿在手里，一面炫耀，一面交涉，則將加深蘇聯對我們的動機和目的的疑慮和不信任”，因此，他建議美蘇兩國必須立即開始具有誠意的直接談判。（馬爾札尼：《美蘇可以進行協商》）

但是，杜魯門並未採納他的建議，在原子武器問題上，從一開始就對蘇聯採取了高壓的態度。巴魯克計劃，關於原子武器問題，事實上近乎要求蘇聯無條件投降，炫耀壟斷原子武器的美國，想利用這個計劃來試探蘇聯的反應。他們所以這樣作，也是企圖把問題移交給沒有否決權的國際管理機關，以便為美國造成壟斷原子

弹的有利条件。苏联对此，并未示弱，相反地，它谴责美国是在进行原子讹诈，并在12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先发制人地提出了裁减军备的方案。

然而，在这时期苏美两国的对立尚未进入决定性的阶段。这可以从以下这段插曲得到证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说道：“我们知道，最近一再有人谈论发生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但是这种恐惧，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当杜鲁门将要退出会场时，莫洛托夫上前拥抱他，并赞扬他的演说是“近来最伟大的一次演说”。

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来说，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遭受的一个严重考验。1945年11月，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说：“法西斯德寇占领了我们一千七百一十个城镇，烧毁破坏了七千多个大小村庄，杀伤了大约二千五百余万人……”，仅就士兵来说，苏联就伤亡了七百余万人，比起美国的一百一十三万人、英国的九十八万人、法国的七十八万人来，牺牲之重大可以想见。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舒曼在他所著的《国际政治学》一书中曾经写道：“苏联的损失，相当于西欧盟国全部损失的十倍。”经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严重打击坚持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苏联人民的毅力，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赞扬，并大大提高了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在1946年2月最高苏维埃选举时向选民发表的演说中曾提到：“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有无生命能力的问题，因为有了这次战争的具体教训以后，任何一个怀疑家，都已不敢再对苏维埃社会制度富有生命能力这点表示什么怀疑了。”（《论战后国际形势》，第16页）

苏联在战争中根据周密的、科学的计划，执行了“边战争，边建设”的政策，不但继续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和斯达哈诺夫运动，还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即使在 1943 年战争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苏联工业的生产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到战前 1939 年的百分之一百零四。苏德战争的中期以后，苏联在军事生产方面也超过了德国，并不断上升，在整个战争时期，例如，飞机的产量是十二万架（德国是八万架），大炮的产量是三十六万门（德国是二十六万门）。1943 年 8 月以后，就在曾被德寇占领而获得解放的地区，根据“复兴经济的紧急措施”开始了经济建设。到了 1944 年，又以铁路、钢铁、煤炭、电力为重点，迅速地进行了重工业部门的重建工作。但是，由于从战争经济转向和平经济，致使 1946 年的生产总值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战后的五年计划，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出发的。

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而实行重建，苏联最初曾经期待从美国得到十亿美元贷款和向原来的敌国索取赔款；但由于苏美关系的恶化，这种期待落空，终于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行经济复兴工作。

1946 年 2 月（即从战前的 1937 年算起第九个年头），苏联举行了最高苏维埃选举。这次选举，正如斯大林在选举演说中所说的战胜者也必须受到批评受到裁判那样，采取了由苏联共产党提出五年计划，征询人民对苏共政策是否信任的方式。结果，不出所料，党与非党联盟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一亿六千三百万票），取得了压倒的胜利。

苏联就这样开始了战后的新五年计划。工业的生产总值，到第二年的 1947 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1939 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三，以后逐年都有增加，1948 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1949 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八，1950 年为百分之一百九十六，1951 年为百分之

二百二十九。和苏联从战争破坏中着手恢复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处境尽管远为有利，但其生产的发展速度，从 1950 年以后反而落在苏联的后面了。（美国工业的生产指数，如以战前的 1939 年为一百，1946 年为一百五十六，1947 年为一百七十一，1948 年为一百八十九，1949 年为一百六十二，1950 年为一百八十四，1951 年为二百一十二。）

在国内政治方面，苏联在停战后迅速地开始了军队的复员工作，到 1948 年，已经把常备军裁减到三百万人。1946 年 3 月，又改革了行政机构，废除了以往的人民委员会制，而代之以部长会议制，于 1947 年 5 月，又废除了叛国罪以外的一切死刑，而改为最高刑期为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1947 年 12 月实施的币制改革和撤销粮食定量供应制，也标志着苏联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先和东欧各国，以后又和新中国缔结了通商和友好条约，加强了“东欧圈”的团结。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以斯大林的“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理论”为前提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理论”。这是建立在斯大林在 1946 年 2 月的演说中所说“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信心之上的和平政策，具体的说，这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实行“国际合作”和“反对侵略战争”的政策。

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在富尔顿所发表的演说时曾经指出，过去的东欧经常存在着仇视苏联的政权和东欧经常被利用作为侵略苏联的走廊等事实，并且说：“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要达到使这些国家内存在着对于苏联保持诚恳关系的政府，这有什么奇怪吗？”（《论战后国际形势》）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当前任务而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的苏联最迫切地需要和平，这一点，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的世界政策

“这次战争，归根结底是争夺统治世界霸权的斗争。它也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战争的结果，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征服世界，或者是被人所征服。”这段话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工厂通用电气公司顾问索尼在1942年说的。这也可以说是表达了美国垄断资本对于这次战争的看法。

在大战期间，以“民主国家兵工厂”自任的美国，到1943年已经把生产力提高到战前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与此同时资本也有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垄断化。例如，资本总额在十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在1914年只有七家，到了1943年增加到三十二家，到1951年又增加到五十八家；而在1930年，二百五十家大公司资本总额已占全部美国股票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二，掌握着全部工业生产力的百分之七十。（《今天的垄断资本》）掌握着这些大公司的是摩根（五百五十三亿美元）、洛克菲勒（六百六十七亿美元）、杜邦（六十五亿美元）、梅隆（六十亿美元）、库恩-罗比（一百三十亿美元）、芝加哥（九十三亿美元）、克利夫兰（三十六亿美元）、波士顿（六十亿美元）等大财团。摩根集团和馬歇尔、艾奇逊、克萊等，洛克菲勒集团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罗伊、杜勒斯等政客、军人有着直接間接的联系。不可否认，垄断资本家和軍人們，在战前和战后期间越来越多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军事订货共达二千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落到了这些大财团的手里。同时，他们的企业利润在整个战争期中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在1939年，除掉繳納稅款后的純益是四十亿美元左右，1943年增为九十八亿美元，1946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九亿美元，到1948年竟达到二百零八亿美元之多。尤其是杜邦集团的通用汽车公司、摩根集团的美国钢铁公司、梅隆集团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以及洛克菲勒

集团的美孚油公司等等，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由于垄断资本有了这样的扩张，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南部的保守派的压力有所增大，这可以说是洛克菲勒财团董事、共和党参议院议员杜勒斯在战后很快地就作为两党外交的主持者登上了美国外交舞台的原因之一。杜勒斯的两党外交，无非是上述鲁尼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世界”在战后的翻版，其目的在确立美国对战后世界的“领导权”，即认为：“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负有作为领导者的责任”。（杜勒斯：《战争还是和平？》）由范登堡、康纳利、杜勒斯等所代表的共和党“两党外交”攻击民主党政府的矛头，指向了由罗斯福所制定而被杜鲁门所继承下来的对苏协调政策。他们开始滥用过去斯大林批评西欧国家对纳粹德国的外交时所用的“绥靖政策”一语，来攻击雅尔塔、波茨坦方式，称之为“对苏绥靖政策”。在民主党内部，受到南方保守势力支持的杜鲁门，也陆续地把政府内部拥护新政的人们驱逐出去，1947年使杜勒斯（国务院顾问）、狄龙—李德公司总经理弗莱斯特（国防部长）、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总经理哈里曼（商务部长）、圣路易的银行家斯奈德（财政部长）等实业家以及马歇尔（国务卿）、德莱柏（陆军部长）、佩德·史密斯（驻苏大使）等军人担任政府要职，完成了“美国政府的军事化”。（舒曼：《国际政治》）

但是，美国在杜鲁门执政的初期，因为经济力量占着压倒的优势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在遭到战争破坏的世界里可以毫不费力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对于保持欧亚两洲的商品市场问题，颇抱乐观。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保持国外商品市场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以下这段话中看得出来，这就是：“不扩大国外市场而要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扩大全世界的贸易，美国的经济将不得不收缩”。另外，1945年11月，杜鲁门也曾向美国退伍军人说道：“‘己所欲，施于人’这句

格言不但适用于你们，而且也适合于英国、法国、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是这种意思。美国对于没有支付能力的欧洲国家的商品输出，采取了以经济援助为名的借款和投资的方式。截至1949年为止，美国的对外投资共达三百三十亿美元，其中一百四十六亿美元是通过美国政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贷款的方式。最初，美国实行这种贷款并未区分东西方，但是这种以经济援助为名企图确立其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的所谓“附有条件的援助”，受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谴责；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出乎美国意料之外，国外市场日益缩小，到1946年中期，美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尤其是苏联经济复兴的进度意外地迅速和东欧以及法意等国左翼力量的增长，粉碎了美国的乐观论调，这就使得美国不得不从新改变外交政策，以便回避经济危机和恢复其逐渐丧失的国外市场。于是，凯南的“对苏封锁政策”便取代了“对苏协调政策”。

凯南在美国国务院中以苏联问题专家自命，从战前就被认为“用柏林的眼光观察俄国”的亲德反苏论者。据说在战争期间，他经常对于“美国同苏联合作对付德国感到不满”；而对于当时美国驻苏大使、能够比较直率地反映苏联情况的戴维斯抱有反感。（阿纳贝拉·比尤卡尔：《美国外交的真相》）1944年凯南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顾问，他利用罗斯福死去的机会开始破坏“对苏协调外交”，接二连三地向华盛顿提出了《苏联统治世界》、《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苏联）对美国的侵略野心》等项报告，强调指出：“和俄国的一切协定都将不被履行”，因而，“和苏联政府缔结协定是徒劳的”，“美国在一切问题上，都应该对苏联采取反对的立场”，尤其是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协定更是“严重的失策”，“美国应该不受这些协定的约束而采取自由行动”。（凯南：《美国外交五十年》）凯南从莫斯科寄回的报告，受到了国务卿贝尔纳斯的重视，以后在1947年，他被马歇尔提升为国务院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是，他

的“对苏封锁政策”就成了美国外交的基调和“冷战”的战略理论。

美国的世界政策，在中近东地区为了争夺石油的问题和英国之间发生了对立。伊朗、伊拉克、巴林、沙特阿拉伯等中近东国家油田的开采与经营，一直为英美的几个大石油资本所垄断，美国因为国内石油资源迅速趋于枯竭，以致加紧进行了对中近东地区油田的开采。美国从1941年3月就对中近东各国适用武器租借法并给予经济援助，表明了它对这些国家的关心；而缺乏美元外汇的英国，也削减了由美元地区输入石油的数量，而积极进行开采中近东地区油田。于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问题，英美两国在中近东的对立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化了。同时，和伊朗接壤并在国境附近拥有巴库油田的苏联，对于中近东、尤其是伊朗的局势，也当然不能漠不关心。

战后的法国、英国、意大利

一位历史家在纳粹德国崩溃的时候曾经警告说：“国际天主教组织中的反动集团，毫无疑问将以全副力量利用德国的天主教会为其反进步、反民主、尤其是反苏联的政策服务，对于这种可能性，应该充分加以警惕”。（格哈特·艾斯勒等：《德国的教训》）大战刚一结束，很快地就出现了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它利用民众对于基督教的纯朴感情，并提出“社会主义的”纲领来骗取民众对它的信任。这种现象，不仅德国为然，在法国也有以皮杜尔、舒曼、戴尚三人为首的人民共和党；意大利有以加斯贝里为首的天主教民主党；奥地利有基督教社会党；比利时有天主教社会党，等等。这些政党加上英国的工党，在国际间形成了所谓“第三势力”。

1945年7月，标榜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而取得政权的英国工党内阁的外相贝文，在下议院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宣布了工党的基本外交方针，支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诽谤苏联诬蔑保加利亚为“非

民主”，他說：“我們必須阻止用另一種極權主義來代替以往的極權主義”。這樣，以羅斯福的逝世為轉機開始轉向反蘇的美國外交政策，和英國工黨的外交政策緊密地結合起來，以致被稱為“貝爾納斯—貝文主義”。（舒曼：《國際政治》）在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皮杜爾一直擔任外交部長，據說，這一事實意味着“二百家族牢牢地掌握着外交部”。而且皮杜爾還和與美國國務院關係很深的蘇紀·博勒爾結了婚，這當然不能認為是單純的私人問題。（卡塔拉：《他們在背叛和平》）這時期，英國在希臘支持反動王朝實行武裝干涉，在馬來亞用武力鎮壓民族解放鬥爭，甚至對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寄與同情，這種外交，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外交。

“貝文的對外政策的虧空，由克利浦斯用對內政策來補償。”（杜德：《英國和英帝國危機》）一般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工黨的產業國有化政策，在本質上應該被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一點已經明確了。英國工黨的這種對外對內政策，在貝爾納斯外交受到華萊士批評的大致同一時期即 1946 年 11 月，圍繞着議會開幕式英王詔書修正草案問題，也受到了來自工黨內部的批評，說它是“過於追隨美國的外交”。事實上，這種政策由於造成了煤炭危機和英鎊危機，而不可避免地宣告破產了。

在戰後的法意兩國，共產黨成了第一大黨，這件事直接說明了“西歐的危機”。法意兩國的政局，在共產黨、社會黨和天主教政黨（意大利是天主教民主黨，法國是人民共和黨）三大政黨鼎立的情況下動蕩不穩。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反動勢力不得不一面倚靠美國資本，一面把構成反對力量的共產黨孤立起來。例如，法國社會黨利用 1947 年 4 月雷諾工廠罷工的機會，和人民共和黨攜起手來把共產黨排斥於政府之外（意大利政府也於同月把共產黨排擠出去）。英國工黨也在 1948 年 1 月露骨地顯示了反蘇傾向，為了在國際間孤立共產黨和糾合“第三種勢力”，同年 3 月召開了西歐社

会党會議，討論反共和支持馬歇爾計劃的歐洲統一問題。此外，又召开了不参加世界工联的西欧工会會議。然而，1948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在大选前在羅馬召开的大会确认了和共产党的統一戰綫，因此，預定4月举行的意大利大选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第三种势力”的这种破产，由于英国工党的失敗，在1949年5月意大利社会党大会上罗米塔等中間派的失敗，以及法国社会党的衰落（从1947年年底到1948年年底，黨員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两个世界的形成——苏美的对立

小罗斯福曾說道：“……首先揮动拳头，首先破坏共同决定事項的，是美国和英国。还有一点應該注意的是，在战后動蕩不安的世界中，美国忽視了調解苏英两国关系这一重要任务。这两个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各自安全上的利益发生冲突的仅有的两个大国。先父在日，每逢两国之間发生意見分歧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居中調解；然而今天的美国却不是进行調解，而是偏袒一方了。尤其严重的是，美国不仅站到英国一边，而且还对英国进行煽动。”

后来被評論家李普曼称之为“冷战”的开端，是在紐伦堡国际軍事法庭对納粹战犯作出判决的几天以前，确切地說是在1946年9月3日由美国国务卿貝尔納斯在西德的什图特加特市国立劇場发表的一次演說。当时，正在巴黎召开对德和約會議，貝尔納斯和范登堡、康納利一起从巴黎跑到什图特加特，并采取直接訴諸西德民众的煽动性方式发表了美国对德問題的新政策，其中包括三点值得注意的事項：（一）奧德·尼斯以东的旧德国属地尚未肯定划归波兰；（二）拒絕苏联参加对魯尔地区的国际管理；（三）反对苏联从德国取得实物賠償。这次演說受到苏联的激烈譴責，說它严重地违反了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然而貝尔納斯却夸耀它对德国

产生的結果，他說：“由于这次声明的結果，已迫使苏联企图扩张到柏林的势力范围縮回到波兰境內了。（貝尔納斯：《說老實話》）

但是，由于这一事件引起了貝尔納斯所未曾料到的若干反应。美国商务部长华萊士于9月12日在紐約的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說指責貝尔納斯外交，他說：“貝尔納斯对苏联的态度过于粗暴，他應該采取比較協調的态度”。美国報紙为之大嘩，很快地就出现了“杜魯門总统完全同意华萊士演說”的消息。同时，在巴黎的貝尔納斯也受到了新聞記者的包围，問他这次演說是否意味着美国政策的轉变。范登堡和康納利支持貝尔納斯，丘吉尔也表示完全贊同；但是，法国的一部分人士却表示反对。于是，貝尔納斯从巴黎写信給杜魯門表明辞职，并且說他“不能在商务部长干預外交的政府中繼續停留下去”。其結果，被迫辞职的，并不是貝尔納斯而是华萊士。这样，最后一个拥护新政的人，也被从政府中驅逐出去，再加上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杜魯門政府便完全向右轉了。

当时斯大林在接見訪問莫斯科的小罗斯福时，虽然还強調美苏經濟交流的必要，但是美国已經完全放弃了对苏協調政策，与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會議决裂的同时，美国政府片面地废除了雅尔塔和波茨坦方式，根据大国合作的原則建立起来的战后“維護和平的机构”，仅仅經過一年有余的时间就轉变为“冷战”的論壇了。

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

美国战后的亚洲政策，是华尔街企图統治世界的所謂“世界政策”的一环，因此，在本质上和美国的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政策，毫无不同之处。这个世界政策的基本目的在于：（一）在成为美国扩张对象的一切国家中确立其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二）把这些国家变为美国的卫星国；（三）要在这些国家中建立一种体

制，能够排除由于美国的剥削而引起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所带来的各种障碍。根据这种目的的要求，为了巩固由于两个最大竞争者——德国和日本——的失败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伙伴英法两国的削弱而在各地市场上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垄断地位，推行其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各项措施。（日丹诺夫：《论国际形势》）

但是，在推行这个基本方针时，美国考虑到亚洲各国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情况，以及多年来美国企图插足而未能如愿以偿的属于英、法、荷、日等国势力范围的这些地区在战争中发生的变化——英、法、荷等国曾经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的情况，并为了在战后利用这些旧殖民主义国家（英、法、荷）重返这些地区的机会插足进去，然后再逐步把它们排挤出去，特别需要充分地利用这些地区人民对于美国民主的幻想；同时，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以抗日游击战的形式发展到直接武装斗争的阶段，美国为了维持帝国主义阵营和世界殖民体系，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必要对此实行毫不容情的武力镇压。这样就产生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两个特点：“门户开放”和“世界宪兵”。也就是说：“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力图粉碎在某一点上足以妨碍美国侵入殖民地各国的一切阻碍，另一方面尽量利用和维持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阻止殖民地人民摆脱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控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制度的一切特点”。（乔治·菲利普：《美国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世界》，《政治问题》杂志1947年7月号）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宣称它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但事实上，却把欧洲战场完全交给苏联去独力承担，连它亲自许下的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言，也一直拖延到1944年——当它感到苏联已有可能单独击溃纳粹德国时，才予以实现。相反的，它对于在表面上该是次要的太平洋战线，却倾注全力并独自担当（在这方面惹人注意的是，那些对欧洲战争采取消极态度的所谓

“孤立派”人士，对亚洲的战争表示了积极的关心）。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性质，美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民主高潮尚未退落的时候，巧妙地玩弄其传统的“门户开放”和“给与独立”的政策，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狡猾地利用殖民地人民对独立和解放的热切要求，和有名无实的“独立”政权——土著的买办阶级直接进行交易，来牵制英、法、荷等旧帝国主义国家，借以要求和扩大自己的份额。

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各国中间所产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美国在远东地区造成了它的帝国主义对手们不敢提出异议的牢固地位”。（弗雷德里克·费尔德：《美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政策》，《政治问题》杂志1946年11月号）这里存在着一个美国在战争中和战后时期的亚洲政策的特点。作为美国这种伪装的“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旗号的具体体现，可以举出如下事例：在战争中签订“大西洋宪章”；不亲自出面而使英、印军接受在印度支那（南部）和印度尼西亚的日军投降；调处战后泰、英关系和荷兰同印尼间的武力冲突；派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给与菲律宾以“独立”；等等。

如前所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特殊情况，当西欧帝国主义在战后重返以前的殖民地的时候，它们遇到了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强烈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抵抗。在战后的亚洲，不但印度支那、中国、印度尼西亚，就连马来亚、缅甸、北朝鲜等地区也都进入了建立人民政府的时期。在这里，作为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之基础的殖民地制度本身，已经面临着危机。美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中，破坏了战争期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扶植了右翼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政党所组成的中间政权，使其建立了法西斯的国内体制，以便镇压反抗美国统治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同时，“美帝国主义现在不仅是一个侵略者，而且是一个世界宪兵，它尽力之所能

在各地絞杀自由,并培植法西斯主义”(馬林科夫:《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①),并作为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本营,从事挽救整个殖民地体系的危机。因此,受到美国的支持和扶植的这些国家的所謂“独立”政权,正是为这种“世界宪兵”服务的爪牙和从事鎮压民族运动的組織。

美国在中国曾經怎样地竭尽全力来援助蔣介石以便击潰中国人民解放军,前面已經說过了。此外,它还在菲律宾、越南、馬来亚、緬甸、印度尼西亚,用尽了一切經濟援助、技术援助、軍事援助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支持英、法、荷帝国主义,或者直接鼓励当地的“独立”政权,帮助它們鎮压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例如:为了援助英国鎮压已經发展到武装斗争阶段的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美国竟然提供直接的支援,这就是从1949年起暂时停止了国内合成橡胶的生产,訂购馬来亚的橡胶,使英国得到美元外汇充作鎮压馬来亚人民軍游击队的經費;同时,还派遣軍事顧問团,給予一亿五千万美元(1950年)的援助等等。对于越南,美国曾在1950年3月給予法国二千三百万美元,5、6月間又給予三千万美元的軍事援助和派遣了軍事顧問团。为了挽救緬甸1949年的危机,美国于1950年9月給予英国一亿一千万美元,以后又根据秘密协定給予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的經濟援助。对于菲律宾,美国从1947年8月进入全面內战时期起,通过簽訂軍事协定(1947年6月)和美菲互助协定(1951年8月)并尽其一切可能的努力支持了买办的“独立”政府鎮压民抗軍。

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第三个特点,應該指出构成其遍及全世界的軍事基地网之一环的亚洲軍事基地。如所周知,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經在这个战场上建立了二百五十六处各种軍事基地(克

^①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2頁。——編者

寥諾夫：《美帝国主义——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譯本第 105 頁）。战后，它並沒有根据任何正式的国际协定而在事实上兼并了原来归日本委任統治的馬里亚納、加罗林、馬紹尔等群島，而这些島上，在战争中已經修筑了一些大规模的軍事基地。美国參議院外交委员会以取得太平洋各島嶼为交換条件批准了联合国宪章，并完全歪曲了委任統治的条款。此外，在冲绳島、日本和南朝鮮等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說，美軍从登陆的第二天起便着手修建了规模大得惊人的軍事基地，例如冲绳島被变成了美国轰炸机的“能够控制亚洲一切港口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51年6月22日）；至于在日本“独立”的同时簽訂的“美日安全条約”中已經确认的，在这个狹小的海島上布滿了美国軍事基地七百三十三处的事实，更是众所周知的了。对于菲律宾也是一样，根据在菲律宾 1947 年 3 月“独立”的同时締結的美菲軍事协定^①，美国获得了对十六处陆海軍軍事基地的九十九年的使用权；并且，“在軍事上遇有必要时”，还可以享有形式上属于菲律宾政府的一切軍事基地的使用权和在这些基地以內的治外法权，以及为了执行軍务对菲律宾平民的雇佣权。（最近美国根据它和巴基斯坦締結的軍事援助协定，把这种軍事基地进一步扩展到巴基斯坦境內。）

这些軍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和革命胜利后的人民中国，这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对苏联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設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經有了萌芽，罗斯福逝世杜魯門执政以后，便成了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而表现为“冷战”政策。必須注意，这些軍

^① 美国駐菲律宾的高級專員波尔·麥克納特于 1946 年 7 月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文章說：“我們在菲律宾已經掌握了海空軍基地。这并不仅仅为了保卫菲律宾，甚至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我們期待这些基地将成为美国在远东軍事力量的补充和修理設施。我們已經长期地占領日本，并对亚洲采取强硬政策，所以菲律宾在亚洲处于替美国發揮重要作用的地位。”（《柯里尔》杂志 1946 年 7 月 6 日）麥克納特还写道：“馬尼拉、东京、上海这三个城市构成一个三角形。远东的心脏就在这个三角形之中，远东的将来将决定于这个三角形以內”。

事基地,除了针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还构成把殖民統治强加于設有軍事基地的国家菲律宾、日本等国的强力的杠杆,并以鎮压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目的。在战争刚刚結束后的一个时期,作为这种进攻苏联的軍事基地的战略上最重要地区的,在亚洲方面当然是中国,而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它就轉移到日本和南朝鮮,于是,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日本軍国主义,也就成了美国远东政策在这方面的基础。

最后,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特点之一,还应该举出构成其对亚洲各国帝国主义統治的經濟要素。“美国的生命綫,随着它搜求为了順利地进行工业生产和实现軍事計劃所必需的錫、錳、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資,而延伸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51年5月18日),正如前面叙述亚洲各个国家时已經談过,华尔街向着亚洲的重要原料和資源伸出了貪婪的魔掌。1949年9月,杜魯門在特別諮文中曾大肆宣传“第四点計劃(开发落后地区計劃^①),根据这个計劃的执行机构是以洛克菲勒財团的代表人納尔逊·洛克菲勒为第一任主席的国际开发諮詢會議这一点已經可以看出,这一計劃的实质,无非是为了对付日益棘手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用欺騙亚洲人民的手段夺取亚洲各国的原料和資源,“为美国資本寻求有利的投資場所,进一步扩大其經濟統治”而已。(卡佩克:《美国在亚洲》,《政治問題》杂志1951年10月号)

第二节 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革命

殖民統治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亚洲被压迫民族看来,是反帝国主义的民

^① 这项“开发落后地区計劃”,于1950年6月变成了“1950年国际开发法”,1952年“共同安全法”成立以后,又被納入了共同安全計劃之中。

族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各国的侵略,在客观效果上,暴露了西欧帝国主义的脆弱性。在西欧统治者仓皇逃跑以后,东南亚各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了英雄的抗日游击队,主动地开展了民族解放运动。战争末期,越盟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北越七省的解放区;菲律宾的民抗军也在吕宋岛北部解放了一百万以上的农民,到了1945年8月日本将要投降的时候,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了显著的成长。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摆脱一切帝国主义统治的运动,有了更加巨大的发展,亚洲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高涨,构成了战后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特征。战后,当西欧统治者重新回到亚洲殖民地时迎接它们的,正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殖民地的人民已经不想再过从前那样的生活”,“宗主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和从前一样地进行统治了”。(日丹诺夫:《论国际形势》)

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已在冲击着亚洲的每个角落,使整个殖民统治陷入了危机之中。

印度支那的民族革命

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就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人口二千万)、柬埔寨(人口四百万)、老挝(人口一百万)等印度支那三国,特别是越南,在历史上,是东南亚各国之中受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影响最深的国家。这一点具体地表现在,远在法国帝国主义侵入越南(1847—1884)期间,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中国农民就曾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法军;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孙中山曾经在越南的东京地方进行革命活动。这种历史传统一直继续到现在,今天的越南,最先吸取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經驗教训,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亚洲各国之中,是仅次于中国的一个最先

進的国家。

在太平洋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的侵入印度支那和法国維希政府同日本締結的叛卖性的“协定”，印度支那曾經一度淪于日、法法西斯統治之下，和緬甸、菲律宾比較，情况略有不同。由于上述原因，1930年2月安沛起义失敗以后失掉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印度支那民族資產階級之中沒有和日法法西斯势力进行勾結的一部分人，轉而投靠了中国国民党，并企图在它的庇护之下勾結美国帝国主义(越南国民党和同盟会)。另一方面，在1930年成立并从30年代初期起就从民族資產階級手中夺得革命领导权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在北越的宜安地区內曾經建立过短期的苏維埃政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曾經領導了北越的巴宋(1940年9月)、南圻(南越，1940年11月)和土伦(中越，1941年1月)等地方的起义，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些起义都失敗了。于是，在胡志明領導之下，于1941年5月在中国广西省的柳州召集了一切革命組織的代表五十人举行會議，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簡称“越盟”)，建立了有劳动党(共产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組織)、农民(包括农民联盟、宗教团体及其他)、中小資產階級(包括社会党、民主党——1944年加入)等各阶层广泛参加的民族統一战綫。这样，越南人民就在太平洋战争中，以越盟为中心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首先在北部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到战争末期已經扩展到东京地区的南部，到了1944年年底，已經在北越七省建立了解放区。在无产階級領導之下的这些解放区，从一开始就把反帝斗争和民主改革密切地結合起来。1945年年初越盟所发表的綱領中，諸如农业改革、工业化、沒收卖国賊财产等等最重要的項目，都是采取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及其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蓬勃展开感到惊惧的日本軍，于1945年3月9日发动政变封閉了法国的殖民机关，建立了以保大

等封建分子为首的傀儡政权。对此，越盟于3月12日向全体越南人民发出号召：不要中了伪装越南人民之友的日本軍的阴谋詭計，而要进一步加強抵抗运动。从1945年3月到8月之間，可以說是“相当于一般平稳年份数十年的革命的五个月”（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第4頁），民族解放运动在群众中間象燎原之火一样向前发展，两个系統的游击队，即人民軍和救国軍合并起来成立了越南人民軍。由于8月9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越南的形势也急轉直下，越南革命临近了决定性阶段，8月15日在北越的新潮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的母体，并委托共产党草拟武装起义計劃。在这次大会閉幕的同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越盟立即发布了实行总起义的命令，各地人民响应号召，紛紛起义，夺取敌人武器，伪組織的保安队也轉到了人民方面。8月19日，起义的人民占领了河內的各个机关，政权归于人民了（八月革命）。8月25日，日本軍的傀儡保大发表声明，願将政权交給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己担任共和国顧問的职位。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发表独立宣言，并决定于1945年年底实行大选，成立国会。与此同时，老撾和柬埔寨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如怒潮一般地发展开来。这样，在旧殖民国家法兰西帝国主义返回印度支那以前，越南已經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政权。在老撾，由苏发努馮亲王所领导的“老撾人民委员会”，通过武装起义掌握了政权，并于1945年10月12日宣布成立寮国临时抗战政府，废除了国王西薩旺馮的王位。同样，柬埔寨也在越南八月革命的影响之下，群众紛紛起义，組織了民族解放委员会。

但是，年輕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前途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同年9月23日，就以解除日軍武装为名，中国国民党軍侵入这个国家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区；英印軍侵入十六度以南地区。格萊西將軍指揮的英印軍，为了援助法国帝国主义者，使用日軍开始对西貢及

南部其它地方的人民委员会实行武装进攻，并逮捕了它们的领导人。接着，魯克列尔克将军所率领的法军也于9月30日侵入了越南，于是，南越的二十个人民委员会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北越方面情况稍有不同。原来，美国帝国主义企图趁此机会驱除法国帝国主义，而把印度支那掌握在自己手里，即根据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意图，中国国民党军在这里想使他们的好朋友越南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越南国民党掌握政权，虽然没有公开地对民主共和国实行攻击，却指使他们带来的许多无赖之徒进行挑衅，以便制造事件。

面对这种极其困难的局势，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战术，11月11日，宣布印度支那共产党停止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而改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①。从1945年12月23日到1946年1月6日举行了国民大会的总选举，包括南部人口在内，约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为了展开对法国帝国主义广泛而全面的抵抗，于1946年5月又结成了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团结了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爱国地主和宗教人士。同时，越南临时政府还拿出全部力量从事建军和救济1944、1945连续两年的灾害工作。

法国帝国主义在这期间完成了和柬埔寨、老挝的封建势力上层的勾结，而这两国受到血腥镇压的真正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都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根据中法两国1946年2月28日的协定，法国帝国主义获得了中国军队的撤出越南和法国军队通过中国领土由北方侵入越南的有利条件。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6年3月2日召开了第一届国会，成立了包括国民党、同盟会在内的统一战线

^① 这是“为了避免遭受帝国主义者的致命打击和有利于实现民族的团结而暂时转入地下的”，党虽然“宣布了自动解散”，但实际上并未解散。（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第10页）

綫政府，同年3月6日又和法国之間締結了初步協定(河內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法国承認越南共和國“有它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議會、自己的軍隊、自己的財政權，是構成印度支那聯邦和法蘭西共同體成員之一的自由國家”；同時，雙方一致同意關於法国占領下的共和國南部重新併入共和國的問題，將來由人民投票來決定；另外，越南政府同意“在法軍遵照國際協定和中國軍換防時，越南將以友好的態度迎接他們”。越南政府雖然忠實地履行了這個協定，但是法国方面根本沒有誠意，它所以締結這項協定，不過是為了爭取時間，以便作好準備對民主越南實行大舉進攻而已。因此，在1946年7月6日，當胡志明正在法国的豐坦布洛進行談判中，法国又在交趾支那製造傀儡組織來分裂這個國家，因而使這一交涉陷於破裂。越南方面雖然識破了法国的這種意圖，但為了盡量避免殖民戰爭的擴大和維持和平，它只好又於1946年9月14日和法国締結了巴黎臨時協定，確認3月6日的協定和約定繼續豐坦布洛會談。

在這種困難條件下，越南於1946年11月召開了第二屆國會，通過了越南共和國憲法。同時，它在實行減低地租一半、禁止高利貸、廢除人頭稅、分配農村共有地、促進工業建設等國內經濟政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從而鞏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對此，受到美國帝國主義支持的越南國民黨和同盟會的反動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竟從“左的”方面攻擊“胡志明的妥協”，同盟會且於10月在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支持之下，陰謀策劃反政府暴動，在這個計劃遭到失敗後，他們脫離了共和國政府，逃往中國。（阿·古貝爾：《越南人民的獨立鬥爭》）

法国帝國主義者於1946年12月19日撕毀了一切協定，公然對越南共和國發動了殖民戰爭，從此，法国的“骯髒戰爭”，越南人民的英雄的“抗戰”開始了。作了充分準備並在軍事上占有優勢的

法軍，自以為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粉碎越南人民的抵抗，但是八年來的歷史證明，他們的這種如意算盤是完全打錯了。

由中國人民吸取了經驗教訓的越南人民的鬥爭，一面通過民主改革，增加生產以鞏固後方（截至 1951 年年初為止，把二十五萬三千八百八十二公頃的土地分給了無地農民和貧農，把地租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適當地利用共有地，政府還發放了一百五十億元的貸款），一面進行戰鬥，於 1947 年秋季，即由游擊戰階段轉入了運動戰階段，到 1950 年秋，共總解放了北部國境地帶的六個省，並於 1951 年夏季衝進了紅河三角洲地帶，至此，在軍事上已達到勢均力敵和準備總反攻的階段了。（武元甲：《越南人民軍》）在這個意義上，1954 年 5 月的奠邊府的勝利，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法國雖然擁有總兵力三十八萬七千人，並在 1945 年到 1951 年期間耗費了總額達十一億英鎊，每年平均約合十億美元（超過美國給予法國的援助）的戰費，而法國軍隊卻被壓縮在為數不多的幾個城市里，現在，就連這些據點也都朝不保夕，而法軍戰死和失蹤者的人數，也已經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三分之一。

老撾方面，在“寮國解放委員會”的領導之下，於 1948 年建立了統一寮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人民的愛國組織，並於 1950 年 8 月召開了寮國第一屆國會，結成了寮國民族統一戰綫，成立了民族抗戰政府。柬埔寨也在 1948 年建立了許多抗戰根據地，1950 年 4 月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山玉明）的領導下，結成了高棉民族統一戰綫。寮國解放軍在 1954 年初期已經解放了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高棉解放軍也解放了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的地區。由於中國革命的成功而受到嚴重打擊的美國帝國主義，對於越南的局勢表示異常的關心。它於 1947 年年底派遣特使普利德到越南進行活動，由於它的導演，於 1948 年 5 月建立了以阮·克西文為首的法國傀儡“中央政府”，又於 1949

年3月8日締結“法越協定”，抬出了由中國逃往法國的“夜總會皇帝”保大。

另一方面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於1951年2月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越南勞動黨；越盟和越聯實行合併，成立了單一的越聯戰綫。同時，為了對抗帝國主義者製造分裂的策動，同年3月越南、寮國、高棉三國建立了聯合統一戰綫。現在，越南民主共和國已經控制了全部國土的百分之九十五，1950年1月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同年1月18日又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另一方面，美國帝國主義從1950年年初起就加強了對於侵越法軍的援助，侵朝戰爭爆發以後，杜魯門竟發表聲明，以“世界憲兵”的口吻公然宣布要扼殺越南民主共和國。朝鮮停戰以後，美國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欲火更加熾烈，企圖代替法國進行全面的干涉。但是，全世界爭取和平的人民的呼聲和美法兩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阻礙了這種企圖的實現，同時，法國人民要求停止“骯髒戰爭”的呼聲，也從根本上震撼了法國政局，並形成了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越南共和國真正獨立與和平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印度尼西亞的動態

占居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並且富有橡膠、石油、錫、奎寧等資源的印度尼西亞，擁有七千萬人口，它在亞洲的重要性，僅次於中國和印度。所以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革命的進展，對於戰後整個亞洲的局勢發生着不容忽視的影響。

已經淪為荷蘭殖民地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印度尼西亞，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也曾有過個別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所領導的抵抗運動，並且發生過運輸機關的怠工和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地的五次大規模的反帝鬥爭等等，但是沒有發展為象越南、緬甸、菲律賓和馬來亞等地那樣強有力的抗日游擊戰。其主要

原因是，1922 年建立起来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 1926 年到 1927 年之間几次人民起义失敗以后，一直处在非法的地位并遭到分裂，以致未能成为强有力的政党，并且也缺乏团結在它周围的群众团体。另一方面，苏加諾、哈达等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持有不依靠革命而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間的对立来达到独立的想法，从而在战争中还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合作。日本投降后，他們就在 8 月 17 日发表独立宣言，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也就是說，日本帝国主义在其統治末期所建立的全印度尼西亚的“独立筹备委员会”正在雅加达举行會議的时候，传来日軍投降的消息。于是，参加會議的这些委員便立即召开了一个制宪會議，并于 8 月 19 日正式选举苏加諾和哈达为正副总统，成立了政府。1945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重又建立起来，同时，被关在獄中的抗日运动领导人沙里佛丁組織了社会党；沙蒂亚地組織了劳动党。这些左翼政党在 1946 年結成了左翼陣綫，并致力于建立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印尼农民陣綫、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另一方面，韦洛坡、苏基曼等人也于 1945 年年底合并九个回教团体組織了大地主、买办等資產階級的政党——馬斯友美党；苏加諾、加尼、西狄等人于 1946 年組織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党——国民党。

然而，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未滿一月的 10 月 6 日，英国軍隊即以接受日軍投降的名义开始登陆，占領沿岸的重要城市，并驅使日軍对共和国軍隊展开了攻击。同时，又有荷兰軍随同盟軍一道侵入泗水、三寶壟等地，以致在这些地方引起了武力冲突。在 1946 年 2 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會議上，曾經由烏克蘭代表提議对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进行調查，但当时的印尼总理社会党右派的沙里尔采取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而拒絕了这一建議。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虽然对于这种妥协表示反对，但由于丹·馬六甲等托洛茨基分子于 7 月間发动政变綁架沙里尔总理，犯了

“极左”的偏向而遭到镇压，致使左翼势力蒙受了重大打击。在这期间，荷兰帝国主义阴谋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小巽他等东印度尼西亚地区和爪哇、苏門答腊分开，造成两个印度尼西亚。它还于1946年11月15日通过英帝国主义的“斡旋”和印尼共和国政府订立了林牙椰蒂协定。这个协定，虽然在实质上承认共和国对爪哇、苏門答腊、馬都拉的主权，然而规定这些地区必須和主权属于荷兰的东印度尼西亚共同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这个联邦与荷兰王国一同組成荷兰-印尼联合邦，它的外交、財政和軍事大权，应由荷兰印尼共同掌握。非常明显，这一措施只是荷兰帝国主义为了爭取时间，向重要地点調遣兵力以便进行镇压而采取的暂时让步而已。馬斯友美党和国民党的一部分人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陣綫为了使共和国得到休息时间支持了这个协定，彼此在1947年3月举行了正式签字（据说阿里明等共产党领导在这个問題上未能正确估計战后帝国主义政策的变化，以致犯了右傾的偏向）。荷兰帝国主义在签字的第二天就撕毀了这个协定。它把足够的軍隊和武器集結到爪哇、苏門答腊等重要据点以后，就利用这批軍隊于1947年7月21日开始了第一次“警察行动”——规模空前的殖民战争。荷兰軍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在海空軍的援助之下侵入了共和国内地，8月3日就把爪哇、苏門答腊的重要地点全部占领了。当共和国面临着危机的1947年7月，苏加諾总统命令社会党（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沙里佛丁組織代表广泛阶层的联合內閣。在这个內閣中，左翼陣綫的人士占居重要职位，也有共产党员参加。印尼人民在荷兰軍的背后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斗。但是这个沙里佛丁內閣也未能实行真正革命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政策。其原因在于“共产党坚持要維持在共和国宣布独立以后所建立的反帝統一战綫，而未能充分地利用各种客观条件来彻底夺取它在这个反帝战綫中的领导地位”（古貝尔：《印度

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殖民地体系的危机》），同时，也是由于在当时的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前者更为强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草案》）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1日通过了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但否决了苏联所提出的勒令荷兰军队撤退到开始攻击的地点的建议，而任命了以美国代表格雷姆为主席的“调解委员会”。美帝国主义所以出面干预这个问题，是恐怕荷兰这样露骨地实行武力镇压的结果，反而会促使共和国内左派势力壮大，同时也是为了排挤荷兰而在共和国内确保自己的驯服走狗。1948年11月11日在“调解委员会”的压力之下，双方缔结了伦维尔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共和国进一步失去了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许多重要地区。但是这个协定的重要意义是，在这期间美国帝国主义完成了它和共和国内右派势力的勾结。这就是说，在伦维尔协定签订以后不久，沙里佛丁内阁就被马斯友美党和国民党的反动联合势力所推翻，而于1月31日成立了宣布忠实于伦维尔协定的哈达内阁。实际上，左派势力是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利用作为转移人民反抗目标的工具了。

1948年春季以前，左派各党也纠正了自己对于伦维尔协定的错误，共产党、社会党、劳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了人民民主战线(FDR)，于同年5月向国民党、马斯友美党以及其他右派团体发出呼吁，共同建立维护印度尼西亚独立的真正的民族阵线，并建议在10月初旬召开会议。人民民主战线的纲领在人民中间得到了很大响应，这个运动有了广泛的开展。美国帝国主义立即在这上面看到了危险，于是命令哈达内阁对左派组织实行大规模镇压^①。

^① 据说哈达和苏加诺于1948年7月12日在爪哇的一个名叫沙冷岸的小村里，会见了联合国“调解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代理奥格本，就镇压左派组织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件事，他们接受了美国所供给的六千五百万美元。（斯提克罗夫：《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新时代》杂志1949年11月16日）

9月上旬，共产党、社会党（沙里尔一派分裂出去組織了另外一个社会党）、劳动党合并起来成立了統一共产党。在华尔街指使下，哈达政府于9月初释放了以前因为綁架沙里尔而被下獄的托洛茨基分子丹·馬六甲，并利用这批托派分子制造大规模騷扰事件，然后对反帝斗争的核心共产党进行了大镇压。这就是9月18日的所謂茉莉芬“暴动”的真相。^①

这次大镇压，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統一战綫，給予了重大打击。荷兰帝国主义抓住了这次人民抵抗力削弱的机会，开始了第二次“警察行动”。荷兰帝国主义从1948年12月18日开始的这次武力进攻，把共和国內其余的所有重要据点全部占領，对于哈达等人所未能完全镇压下去的左派势力，进行了更加彻底的镇压，把关在獄中的左派领导人加以屠杀，把苏加諾、哈达等人也逮捕起来，囚禁于邦加島上。美国帝国主义为了使荷兰帝国主义充当絞杀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劊子手，使哈达、苏加諾等人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眼里儼然成为“民族英雄”，对这些行动加以默認。但同时，美国帝国主义因为已經完成了和共和国國內的叛卖分子的勾結，并深深地打入了印度尼西亚的内部，所以不願使荷兰再来独占地統治印度尼西亚。由于以上原因，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停战”的決議，并派遣“联合国印度尼西亚調查团”，和斡旋了在海牙举行圓桌會議。根据海牙协定，領土被进一步削減了的印度尼西亚，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和荷兰-印度尼西亚的联邦組織，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949年12月27日

① 在梭罗，由于镇压进步的軍队，9月13日革命的軍队和托洛茨基派以及反革命軍队之間发生了冲突。因为反动的中心人物茉莉芬省长在这种紧张形势之下弃职逃走，人民一致公推进步的市长代理省长职务。这件事被誣为共产党以暴力“夺取政权”，而于次日19日对他们实行了血腥的镇压。（《世界知識》杂志1951年11月10日）

完成了它的“独立”。但是这种独立完全是形式上的独立，荷兰帝国主义依旧掌握着制定外交政策、进行对外贸易以及締結条約的权力；除德、日两国人以外的其它外国人的财产如数返还，并繼續保留他們的特权，荷兰人的官吏和軍事代表团繼續用共和国的經費掌管着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机构和軍隊，因此，印度尼西亚依然停留在半殖民地状态。

除荷兰以外，美国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也有很大的势力。现在外国在印尼的投資共有二十五亿美元，其中美国占十亿美元，在石油(洛克菲勒)、橡胶(固特异)、錫、金融(弗克斯金融协定)等方面，华尔街所占比重是很大的。

經過整頓陣容重新站立起来的左派所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綫，逐漸排除荷美两帝国主义的壓力，正在向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地主、买办資本家、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等反动势力(它的代理人是馬斯友美党、社会党)进行着强有力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共产党——在茉莉芬事件以后重整了陣容并在工人群众中間扩大了影响的共产党——和属于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組織系統的工会的领导下，自 1950 年 8 月到 1951 年 8 月之間，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独立”后首届的納席尔內閣和苏基曼內閣，曾經公布禁止罢工的反动法令，苏基曼內閣又于 1951 年 8 月 5 日抓住丹絨不碌港工人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的机会，实行全面镇压，逮捕了工会干部及其他左派领导者二千余人。这个政府又于同年 9 月参加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单独和約，1952 年年初，該政府的外交部长苏巴佐曾經秘密策划和美国締結“共同安全条約”。这种露骨的卖国政策，由于遭到以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組織为中心的人民的反对終於宣告破产，而于 1952 年 4 月成立了国民党的韦洛坡內閣。新內閣虽然正式宣布取消前任內閣的反动政策，但是随后又趋于右倾，要把已經由东苏門答腊农民所耕种的原属荷兰人所

有的农場，重新还给外国資本。这一措施遭到了人民方面的巨大反击，引起了十万人以上的大示威游行，其結果韦洛坡內閣宣告垮台，而于 1953 年 7 月底成立了国民党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內閣。这个內閣的特点在于：它在成立以前正式宣布坚决实施这些大示威运动和集会所提出的綱領；以及排除反动的、买办的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并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这样，由于哈达、沙里尔等买办分子的出卖似乎已經落到美荷两帝国主义手中的印度尼西亚，又逐漸翻过身来，使西方帝国主义感到“辣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在这以前曾經受过左傾和右傾的危害，现在虽然有了工人群众的支持，但是还未能密切联系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1953 年 10 月，印尼共产党发表了新綱領草案，尤其是放弃了 1947 年以来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錯誤方針，提出了“土地归于农民”的正确农业綱領。在这个綱領的指引下，以新任总書記艾地为首的印尼共产党，正在为爭取农民群众和完成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

馬來亞約有五百三十万居民(其中中国人占百分之四十，馬來人占百分之四十三，印度人占百分之十)，拥有橡胶、錫等丰富的天然資源，对于英国帝国主义來說，确实是名符其实的“搖錢树”。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馬來亞人民为了抗拒日本帝国主义的統治而立即展开了强有力的游击战争。这支抗日人民軍是在馬來亞共产党領導之下主要由中国工人所組成的。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末期，它的势力已經扩展到馬來亞中部和北部的許多地区，在日本投降后，在一个极短暫的时期內，人民委员会掌握了各城市、各村鎮的实权。

然而，在同年9月5日英国军队赶忙地进入马来亚以后，这些人民委员会和抗日人民军全被英军所解散，英国的势力又复活了。于1931年7月成立、经过了长时期非法斗争的马来亚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它竭尽一切力量和马来亚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同盟、马来亚妇女同盟等群众团体以及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南亚各殖民地中无产阶级的比重比较高(百分之十至十二)的马来亚发生了一桩值得特别提到的事件，那就是1945年年底把四十五万工人组织起来的全马来亚总工会的成立。

英国帝国主义对于这个名符其实的“摇钱树”马来亚，甚至不肯给予象印度、缅甸那样“形式上的独立”，而于1946年1月强迫马来亚接受一项把以往分权的政治机构改为中央集权的权力机构的单一的马来亚同盟方案。

这一方案的目的，是剥夺苏丹的统治权并使中国人与马来人互相对立，其结果招致了以马来亚共产党为首的人民群众以及封建苏丹的反对。于是，英帝国主义又改变方向和封建苏丹勾结，恢复了苏丹的权利，然后于1948年2月建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并将新宪法强加于马来亚人民。另一方面，被承认合法存在的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象浪潮一样地在人民中间发展起来，1946年11月由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团体等结成了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又发展为包括农民团体在内的马来亚人民联合阵线。1946年7月和1947年2—3月间，曾发生两次为反对粮食供应情况恶化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帝国主义者指使拿督翁所率领的反动法西斯团体“全国统一马来亚人团”制造恐怖事件，又在工会内部设置英国人顾问，使其进行分裂活动，但这些阴谋均未能取得多大效果。于是，英帝国主义便在马来亚联合邦宣告成立并建立了镇压机构以后，对民主运动开始了大规模镇压。它在1948年4月首先向

新加坡工会組織开刀，6月又对全国的共产党和工会开始了大量逮捕。这样一来，旧日的抗日游击队便不得不重新操起武器向地主武装和英国军队展开战斗了。6月末全国公布戒严令，游击战发展到马来亚全境，7月間，在所有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和这种游击战相配合，橡胶园工人也掀起了大罢工。1948年1月，一切民主团体和工会发表共同宣言，号召人民群众：既然帝国主义公然发动战争，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只有进行武装斗争。就这样，马来亚的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从英帝国主义方面来说，是为了对付“马来亚的一小撮共匪”的、如同陷在泥潭里一样的无边际的扫荡战；而从马来亚人民方面来说，是继抗日战争之后的光荣的民族解放战争。

五年来的历史证明，英国东南亚总督麦克唐纳在1948年11月所说的“不出数月即可解决”的预言已经完全破产；尽管动员了十四万军队、三十八万警察部队，并使用了一切近代武器，也还是无法消灭所谓“五千人”的游击队。英国虽然一年消耗了一亿英镑以上的军费和用尽一切可能使用的镇压手段——诸如用巨额悬赏收买游击队领导人的首级；使用加里曼丹的凶猛的猎取人头的种族达雅加族、印度的廓尔喀兵和纳粹集中营用过的警犬等等，都不能摧毁由于受到人民的坚决拥护而具有无限力量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帝国主义又派遣曾任巴勒斯坦警察委员大显身手的特务头子格雷到马来亚，制造了一批假的游击队员，使其进行间谍和土匪活动，企图分裂民族解放运动，但也未能取得多大成效。建立在各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抵抗组织，在非法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根并广泛地发展开来，到了1949年2月已经拥有十二个支队的武装力量，建立了马来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使分散的游击活动得到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马来亚共产党于1949年6月制定了为马来亚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斗争的纲领。

英国殖民当局，为了斩断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军的坚强的支持，从1950年6月开始实施了臭名远扬的“布里格斯计划”——迫使所有村民迁移，烧光房舍造成无人区的计划，迫使五十万人迁往“移民区”——集中营里，并残杀了五千余名爱国者，尽管这样，仍然未能取得较大的效果。1951年8月，马来亚人民军已经解放了马来亚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同年年底，英帝国主义已经面临危机。1952年年初，英国派遣殖民地大臣李特尔顿和新任联合邦高级专员田普勒到马来亚以后，由于华盛顿方面的全面支持，局势才向有利于帝国主义方面稍见好转。但是任何恐怖手段和屠杀，恐怕都无法摧毁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并发现了争取自由的道路的马来亚人民的解放运动。

缅甸的“独立”

拥有大约一千七百万人口，六十年来一直是英国殖民地的缅甸，也在太平洋战争中，以农村为基地展开了广泛而坚强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领导这一斗争的是1943年才由左派民族主义政党德钦党分离出来成立的缅甸共产党(反法西斯同盟)和昂山、德钦·努等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人民解放同盟)。1944年7月日军在英普哈尔作战失败以后，这些抗日游击队汇合起来，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1945年3月，昂山所率领的伪军在勃固附近举行起义，加入了缅甸人民解放军，因此，到了战争末期，游击军已在缅甸北部和西部各地大显活跃，武装力量也达到了大约五万人。日本投降后回到缅甸的英国帝国主义，在新任总督道尔曼·史密斯统治下于1945年发表了《白皮书》，允许缅甸“自治”，企图把对日协助者臭名远扬的吴梭(苗其特党)、巴莫(马哈巴马党)等极右势力作为土著的支柱，来重新建立殖民体制，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瓦解抗日的人民武装组织(这种武装部队当时已

改称为人民义勇队)。对此，緬甸人民在同盟的领导下实行总罢工、罢市、抗拒納稅和繳粮等等，掀起了全国性的反英运动。于是，英帝国主义改变方針，任命哈伯特·兰斯为总督，拉攏昂山等右派干部对同盟采取怀柔措施，企图給予緬甸以形式上的“独立”，而在实质上保全自己的地位。因此，共产党政治局委員德欽梭等人于1946年3月提出了反对参加中間政府，立即举行反英武装起义的主张，而与主张合法斗争的主流派德欽丹东等人分离，另組所謂“紅旗共产党”，在卑謬开始了武装斗争。

1946年9月，在首都仰光，由于二千名警察举行罢工而引起了全面的总罢工。同盟的右派干部昂山等人于1946年11月把共产党(所謂“白旗共产党”——一度参加了中間政府，因为反对这个政府于1946年10月镇压碼頭工人的罢工而撤出了他們的閣員)开除以后，于1947年年初前往伦敦，締結了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举行了緬甸制宪議会的选举。这次选举后成立了昂山內閣，因為他們逐漸表现出反英的傾向，英帝国主义和它的爪牙緬甸爱国党的吳·梭等人于1947年7月19日发动政变，暗杀了昂山。接着，社会党的吳努上台，并于1947年10月签署了吳努—艾德礼协定，1948年1月緬甸宣布了“独立”。但是这种“独立”，由于維持英国的权益^①，允許英国派駐軍事代表团，对英国提供軍事基地等等，显然是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各国的“独立”大致相同，完全沒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

1948年3月，为了反对这种对英妥协和形式上的“独立”，仰光地区英国經營的企业职工、铁路职工、国家机关的職員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这时仍旧主张和同盟合作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登佩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因为吳努政府针对

^① 获得“独立”的新国家緬甸，負有相当于一亿二千万英鎊的沉重債務，而掌握緬甸經濟命脉的英国垄断資本的各种权利，仍然受到保护。

这次罢工制定了“維持治安法”，大肆镇压共产党、劳工团体、人民义勇軍等，使斗争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緬甸共产党在以亚梅丁·平馬納为中心的铁路两侧和东瓜、勃固以东的山岳地带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仰光东南地区，一齐展开了游击战。1948年7月末接到解散命令的人民义勇队也大部分举行起义，8月間，緬甸国軍的一部分也参加了起义。同时，在北部，克伦族的分裂运动也发展成为暴动。

1949年3月，紅旗共产党、人民义勇軍白色团、工人、农民的各种組織、青年学生团、脱逃的政府軍的一部分，在緬甸共产党倡导之下，在卑謬組成了人民民主陣綫。据說同年8月解放区已发展到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1950年3月28日以德欽丹东为主席，在卑謬成立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对于局势的这种发展大吃一惊的英国（还有美国）帝国主义，加紧援助吳努政府，于1950年3月攻占了东瓜，同年4月攻占了卑謬，但是緬甸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仍以坚强的步調繼續前进。据說到1951年年底，全緬甸一万六千个农村之中，已經有四千个农村选出了“人民行政委员会”，农民协会吸收了六十二万八千人，民兵人数达到十万人。（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务机关指揮下的李弥部国民党軍侵入了緬甸北部，阴谋挑起大规模的战争。1952年夏，緬甸共产党、紅旗共产党、人民同志党（人民义勇軍白色团的后身），终于克服了长期以来的左、右倾偏向，重新合并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共产党。根据綱領，該党采取了主要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斗争方式，而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完成人民民主主义革命为其行动的目标。就这样，緬甸民族解放运动的統一领导核心终于建立起来了。可以說，緬甸人民正在脚踏实地地沿着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所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

菲律宾的民抗軍

自从美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紀末期把西班牙所統治的菲律宾“解放”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以来，这个拥有二千一百万居民的群島，对于华尔街來說，不仅是攫取巨額利益的对象，同时也是美帝国主义在战后炫耀其贈送“民主”和“形式上的独立”的場所。然而，在这里，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同样把这种“民主”和“独立”的本质暴露无遺了。

在太平洋战争期間，过去一向給美帝国主义充当土著支柱的地主和大资产階級，正如它們的代表罗慕洛、罗哈斯等所表现的，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而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合作了。另一方面，菲律宾的人民，于 1942 年 3 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組織了人民抗日軍，为爭取民族独立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抵抗。人民抗日軍在日本占領期間进行了大約一千二百次游击战，杀死了二万五千名以上的日軍和卖国賊，到 1945 年 1 月末，在中部呂宋的邦板岸省、新怡詩夏省的全境，打拉、布拉干、巴丹省的一部分地区的約一百余万农民群众之中坚实地扎下了根，建立了解放区。他們在这些地区成立了統一的农民防卫队和地方人民所选出的人民議會，实行了极其民主的政策，1 月 28 日在邦板岸省成立了临时政府。

但是，受到民抗軍提供的大量情报的帮助而在菲律宾登陆的麦克阿瑟指揮下的美国軍队，在登陆后立即对民抗軍进行攻击，解除他們的武装，逮捕他們的领导者路易斯·塔魯克和卡斯特·亚里罕特里諾等人，并屠杀了英勇地进行抗日游击战的民抗軍第七十七中队队员一百零九人(馬奥罗斯的屠杀)；另一方面，却从獄中把对日合作者罗哈斯释放出来，从而暴露了美軍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解放軍”。(路易斯·塔魯克：《菲律宾民族解放斗争史》)由于菲律宾人民的暴风雨般的憤怒和五万工人和农民举行了抗議示

威运动，結果經過七个月以后，塔魯克等人終於获释。

麦克阿瑟和高級专员波耳·麦克納德，最初曾对亡命美国的菲律宾总统阿斯敏納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对日合作者罗哈斯进行撮合，要他們进行合作；在这样做失敗以后，又使罗哈斯組織自由党，給他以最大限度的援助，使他把卖国賊——封建地主和买办資本家——糾集在自己的周围（麦克阿瑟这种利用对日合作者的政策，甚至遭到当时的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的反对）。7月間，工会會議等群众团体复活了，同时，这些群众团体和共产党、民抗軍、青鷺团及其他游击組織、进步的知識分子等也联合起来組成了民主同盟，提出了爭取“政治上民主、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自由独立的菲律宾”的綱領。1946年4月选举总统时，民主同盟为了打倒罗哈斯，曾經支持阿斯敏納；美軍和罗哈斯派則想尽方法对民主的集会进行血腥鎮压，并叫嚷什么“紅色威胁”，“民抗軍暴动”等等，这才使罗哈斯当选了总统。但是由于在議會中沒有得到为通过事先預备好的“美菲貿易协定”和修改宪法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他們又公然违反宪法，制造民主力量“用恐怖手段获得非法当选”的口实，非法地取消了包括已經当选的塔魯克·亚里罕特里諾在內的民主同盟的六名众議院議員、国民党的一名众議院議員和三名參議院議員的議員資格。

就这样，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忠实的买办罗哈斯政府的配合下于1946年7月4日給与了菲律宾以“独立”。这个“独立”，从1946年4月締結的“美菲貿易协定”^①和为使这项协定中的平等权利条款生效而修改宪法（1947年3月），美国以实施这个协定为交換条

① 关于这项协定，美国經濟专家歇利·詹金斯曾經写道：“美国人在菲律宾群島的特权和美元同比索的紐帶，将保証对新資本和产业的支配权屬於美国。……美菲貿易协定給予美国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拥有一个殖民地性的附屬国的一切便利条件，而且使美国摆脱了統治上和对国内福利方面的責任。”（《美国对菲律宾經濟政策》，1947年版，第22頁）

件而支付战争损失补偿费等事实，以及1947年3月所签订的“美菲军事基地协定”来看，它的本质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在罗哈斯政府支持之下的吕宋岛中部的封建地主开始了血腥的进攻，民抗军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进行自卫。罗哈斯提出的和平谈判(1946年6月)和罗哈斯死后由继任总统季里诺颁布的大赦(1947年3月)，在本质上都和帝国主义者们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所签订的各种协定一样，只是要求人民缴出武器的一种诡计而已。在和谈期间，尽管民抗军照例为了争取和平而尽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努力，但是政府方面还是破坏了和谈而挑起了战争。就这样，从1947年8月起，在菲律宾也开始了对所谓一小撮“共匪”的无穷无尽的扫荡战。民抗军更名为菲律宾人民解放军，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继续，对美帝国主义和它在国内的走狗展开了斗争。季里诺政府奉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在议会内设置“非菲活动委员会”，根据法西斯式的法令，宣布以共产党为首的一切民主团体为非法。这样一来，“为了解决粮食、土地、自由与和平等人民的基本问题，除了用武力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大地主及其走狗的统治以外，已经没有办法了。”(菲律宾共产党1950年5月的声明)

但是，尽管美国当局和季里诺买办政府付出了一切努力，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还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了。1953年前半年，即使根据政府公布的材料，也承认发生了六百二十六次战斗，据说解放军不仅限于吕宋岛，并且扩展到伊洛伊罗岛和苏禄群岛，他们活跃在菲律宾全部五十二省中的三十一省，并且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解放区。1953年年底，美帝国主义丢弃了在镇压解放军中屡遭失败并腐败已达极点的自由党的季里诺，支持国民党的麦格赛赛担任总统，企图利用他来彻底消灭解放军，据说其后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来说稍许有了好转；但是未来的事实将证明，菲律宾人民争取真正

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和东南亚其它各国人民的斗争一样地不断取得进展。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

拥有三亿五千万庞大人口的印度，在亚洲具有仅次于中国的决定的重要性。数世纪来作为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被看成是“大英帝国国王王冠上的一颗最光辉灿烂的钻石”的印度，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地主的政治组织——国民大会党手里。在1933年年底，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才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立即被宣布为非法，而且在和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尽管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之中，仍然未能从国大党手里夺得对运动的领导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苏联参战以后，印度共产党因为采取了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方针，才于1942年7月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在战争中力量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5年9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以审判参加印度“国民军”（日本傀儡鲍斯的军队）而被俘的将兵一事为导火线，爆发了汹涌澎湃的群众反英运动。1945年11月在加尔各答展开了巷战，1946年2月21日停泊在孟买港内的军舰上的印度水兵掀起了反英斗争，三十万工人和学生举行罢工和罢课支持了这一斗争（这是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的起源）。此后，于1946年7月有邮电职工，10月有南部铁路工人，先后举行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大罢工，从1946年年底到1947年年初，殖民统治的危机到达了顶点。当时的情况是：“1947年3月的印度，如同一只满载火药的船只驶到大海当中发生了火灾”。（蒙巴顿的参谋长伊斯梅爵士语）正是为了把人民大众的这种革命高潮压下去，为了“在火焰尚未燃着

火药之前将其扑灭”(同上),英帝国主义同印度的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进行了勾结,把他们拉拢到自己一边,而给了他们以“独立”。

根据艾德礼 1946 年 6 月和 1947 年 2 月的声明和 1946 年 5 月蒙巴顿代表团的决定,印度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宣布“独立”,同时被分成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在这里也贯穿着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原则,而从保护英国在经济上的特权,印度行政机关及军队内部保留为数甚多的英国人顾问,以及“独立”后的印度依然留在英联邦以内等情况来看,显然这种“独立”和缅甸、菲律宾的“独立”相同,在本质上仍然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继续。由于“舍虚名、取实利”而退后一步的英帝国主义,向已经“变成美、英帝国主义的小伙伴而进行活动的印度新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 163 页)——国大党政府,提出要求,要他们对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行毫不容情的镇压。就这样,这个国家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对印度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团体(全印工会大会、全印农民协会等)开始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地方的共产党被禁止活动,截至 1949 年为止,有工农团体的领导者二万五千余人被关进了监狱。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从 1947 年 8 月 15 日到 1950 年 8 月 1 日的三年中间,政府对人民开枪次数有一千九百八十二次,死亡人数是三千七百八十四人,负伤者约有一万人,另外有八十二人在狱中被枪杀了。(杜德著同上书,第 159 页)但是,虽然遭到这种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仍在坚持进行,在提连加纳地方的二千个村庄里,农民通过要求土地的斗争成立了人民行政委员会,没收了封建地主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并用自己的武力防御土邦和政府军队的侵入。

印度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政党,因为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犯

了右傾机会主义的偏向,而在 1948 年 3 月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又犯了左傾宗派主义的偏向,所以未能建立起十分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而逐漸脫离了群众。印度共产党从 1950 年 1 月的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所作的批判 (1 月 27 日的社論:《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發展》)中吸取了教訓;克服了宗派主义的偏向;但是对于机械地搬运中国革命的經驗,專門进行农民游击战的錯誤作法,尚未能加以糾正。这种偏向,在 1951 年 10 月通过的新綱領和中央委员会发表的政策中得到了彻底糾正。在这里,印度共产党制訂了反封建、反帝斗争和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正确的战略方針;而在策略方面,也不再单纯地抄袭苏联革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农民游击战)的經驗,而提出了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印度正确具体运用为基础的路綫,并把建立真正的民主統一战綫和爭取群众当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51 年年底实行的大选,正是正确反映已經恢复了正确路綫的无产阶级先鋒政党和民族統一战綫飞跃發展的試金石。这次选举的結果,国大党虽然是第一党,但它所得票数只有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二(1946 年的期中选举中的得票比率是百分之八十一九十),民主統一战綫共得六百万张选票,在中央議會中获得了三十七个議席,在省議會中获得了二百三十六个議席,共产党远远超过了社会党而跃居第二大党,并作为在野党中的第一大党而和国大党相对立着。尤其在馬德拉斯、海得拉巴、柯欽、孟加拉、特里波拉等地,民主統一战綫的胜利更为显著。就这样,民族解放运动的巨浪,在印度也开始要冲毀这个“形式上的独立”了。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的华尔街,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印度的“援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51 年 3 月 20 日的报纸上曾經坦白地承认,他对印度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所显示的力量感到“惊惧”,他并且警告說:“亚洲全境是否被卷入共产党的进攻之中,将决定于今后的四年。”可以

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尼赫鲁政府之所以采取了引起世界瞩目的“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未尝不是人民群众这种日益高涨的反帝国主义情绪的反映。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印度也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向着真正的独立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目标奋勇前进。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进展

民族解放力量和国民党政府的对立

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对于中国民族的解放来说，意味着去掉了一个最强暴的障碍。同时，另外一个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已经失掉了对中国的控制力量，无力干涉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了。由于这种缘故，再加上民主力量在全世界范围的壮大，中国民族解放的国际条件变得有利了。

以战争中站在抗战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在抗战过程中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在1937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部队（以下总称人民军）不过十万人，及至1945年3月，已经发展到正规军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万了。他们在八年抗战当中付出了宝贵的牺牲：负伤者二十八万五千人，阵亡者十六万一千人，共计四十四万六千人，而给予日军的损失是：死伤总数为五十一万一千人，被俘者三千八百八十人，逃亡者二百二十二，伪军死伤四十五万八千人，被俘者二十八万二千人，逃亡者十万零四千人，两项合计共达一百三十六万名之多。同时，还夺回了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北起东北南至海南岛、相当于全国面积百分之三十一的五十万平方公里、拥有九千五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解放区，团结了包括农民、工人、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爱国的开明地主等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建立了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

“新中国”走向了日新月异的道路。在这里，一向被人称为“一盘散沙”、便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人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1944年年底到1945年年初为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积极地参加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对抗帝国主义的万里长城。抗战末期访问解放区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的许多观察家，在这个受着日军的严密包围、几乎完全没有近代工业的地区里发现了以下情况而大吃一惊，这就是“在中国其它地区的任何一个农村中都能看到的尽是补丁的衣服、营养不良的身体和乞丐，已完全绝迹，并且毫无例外地看到了最能说明国家繁荣的情况——儿童们穿着鞋子。”（《纽约先锋论坛报》1944年8月）还有一个观察家毫无保留地赞美说：“在陕北的深山中找到了中国最近代的地方。”（菲利浦·贾菲：《亚洲的新边界》，第193页）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可以说是奇迹的原因，诚如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秘书远东问题专家之一的约翰·戴维森所坦率承认的，“这是单纯的和根本的，也就是，广大群众对于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和参加。”（1944年11月7日向国务院所提出的报告，引自1951年9月在第八十一届国会麦卡锡委员会上的证词，全文载于《太平洋学会》杂志第三编）

在解放区的这种进步的基础上，中共一贯要求建立一切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国家的总力进行抗日战争。1945年4月反法西斯同盟军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中国人民即将开始总反攻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指出了战后建设的基本方向，就是：“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选集》，第1029—1030页）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该论文中所警

告的，国民党政府統治阶层的想法却完全不同。早在1944年9月，在华美軍司令官兼蔣介石顧問史迪威將軍就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如下的报告：“蔣介石沒有繼續努力把抗日戰爭进行到底的意願。……他絲毫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者和共产党建立共同战綫的意願。……根据我的估計，他是一面攫取借款和軍事援助，一面繼續他的延长戰爭的战术。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保持他建立在一党专政和实行反动政策以及依靠秘密警察的积极帮助来鎮压民主思想的基础上的现在的地位。”（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国民党政府坚持这种政策一直到日本投降，因而，它在抗战初期所得到的人民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无余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方軍將領等中間勢力的叛离，尤为显著。1944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充蔣介石經濟顧問的納尔逊博士，就国民党統治下的产业情况作了如下的报告：“生产能力仅仅开动着百分之三十至七十，其原因是党内官僚的腐敗、各个派系之間的斗争，尤其是因为利用原料的投机可以攫取更大的利潤。”（菲利普·賈菲著前书）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以其从美国取得的援助和政治权力作資本，利用从人民强制征购的廉价原料进行大规模的投机，制造通貨膨脹，使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陷于破产，因而加深了和他們之間的矛盾。此外，在1944年在抵抗日軍的进攻中作了中央軍的牺牲品的地方軍领导人，尤其是李济深等西南派軍事領袖們中間，公然表现了脫离中央的傾向；而知識分子和学生也对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用法西斯方式鎮压思想，开始了尖銳的批評。反映着中間阶层的这种要求，民主政团同盟进而联合了更多的著名学者、艺术家、实业家等于1944年改組为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立即建立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民主同盟虽然組織力薄弱，又不掌握軍隊，但因为成員的大多数都是

著名的知識分子和實業家，所以，雖在國民黨的鎮壓之下，它的影響還是有了迅速的擴大。據說當時有一個外國人對這種情況評價說：“如果在中國實行自由選舉，恐怕最少要有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的選票要投到反政府的方面。”（菲利普·賈菲著前書）這樣，到了抗戰末期，國民黨政府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已面臨崩潰的邊緣了。雖然如此，蔣介石仍然不願接受民主力量的要求，拒絕改變政策以便恢復中間階層對他的支持。相反的，他越是陷於孤立，就越發加強他的恐怖獨裁，並抱定了決心：在“必要時，寧肯訴諸武力，也要除掉政治上的一切反對派。”（《太平洋學會》雜誌1954年2月號所載路登·塞維斯的報告）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特別政治報告，其中說：“與中共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的體系，即創造鬥爭的優勢條件與環境”。（廖蓋隆：《新中國是怎樣誕生和成長的》）

在過去十年（1927—1937）中間，以其遠為優勢的力量尚不能戰勝紅軍的蔣介石，今天所以作出了這樣冒險的決意，並想把它付諸實行，正是由於美國統治階級從戰爭末期直到戰後，急遽加強了對於國民黨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的結果。

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

美國的对華政策，以1944年年底撤換史迪威將軍、高斯大使和另行派遣魏德邁將軍、赫爾利大使為轉折點，開始有了轉變的徵兆。撤換史迪威的直接原因，是由於他和蔣介石不睦，以及他所主張的動員中、美兩國軍隊及緬甸游擊隊，重建滇緬公路的戰略計劃，遭到了英國方面的東南亞盟軍最高指揮官蒙巴頓的強硬反對——後者“主張：第一，用海空軍迫使日本投降，然後對日軍占領地區，除非絕對必要即不改變其政治狀態地加以收復。”（菲利普·賈菲著前書，1949年9月，德魯·皮爾遜注解）這就是說，他們害

怕解放区的扩大。但是，撤換的真正理由，还不止于此。

史迪威等的方向，是以迅速击潰日軍为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动員全部力量投入抗日战争，而迫使退縮不前的蔣介石，实现国共的和解与統一。当然，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們也决沒有放弃为美国垄断資本利益服务的观点。史迪威—高斯政策的推行者副总统亨利·华萊士于1944年春季在他写的小册子《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中发表过如下的主张：“对我们來說，即从健全的投资和促进世界貿易的观点来看，向世界上人口众多、正在着手开发新资源的地区寻求投资的机会，也比较仅仅向世界上各个古老地区投资，更为明智。……美国在东亚的投资，无疑地会导致占全世界人口一半的十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結果，将使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的力量获得解放。战后的亚洲，将需要資本和技术的援助。而美国也将需要，我們异常扩大了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战前，美国对东亚的貿易和投资，在美国对外貿易和投资总额中，只占很低的比重（单就中国來說，在1931—1935年之間美国对华貿易仅占对外貿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对华投资，只比对人口一千四百万的菲律宾的投资略高一些，也不过二亿五千万美元）。而这个地区被看作可以解决“异常扩大了的美国的生产能力”及其狹窄的市場之間矛盾的救星。为此，排除企图独霸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牵制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就必然成为美国当务之急了。史迪威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可以說，正是这种以排除帝国主义竞争者为主要目的的。然而，同时由于美国人民的积极参加和批評，他們的主张上面，还没有表露出对苏联和亚洲民族解放力量的敌对态度，以及以“援助”为交换条件而强迫对方接受政治条件并干涉对方內政的意图。从战略方面，他們为了尽可能减少美軍进攻日本本土时的损失（被估計“至少为一百万人”），“一面要求苏联尽早地参加对日

作战，以便阻止在中国东北的日軍一旦美軍登陆时馳援本国”(上述《白皮书》序言，第7頁)，一面与站在抗日最前綫的华北八路軍协同作战，以便击潰大陆上日軍的主力。他們的这种方向虽然是沒有越出帝国主义的立場，但总的說来，还算是保持着反法西斯联合战綫的方向，同时，他們的“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是有利于民族解放力量的領導地位的加强。

不过，即使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最反动的势力也在主张：“对于重庆的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方面应该給予支援，而且在国内問題上，也应该积极地加以援助”(洛伦斯·K·罗辛格尔：《新亚洲的展望》，第26頁)，并对史迪威、高斯二人施加了压力。由于这种原故，当时主要的政策始終是“对国民党，虽然拒絕給予无限制的支持，但給予經濟上和軍事上相当程度援助的政策。”(同上书)因此，蔣介石在这一时期就能够对史迪威等人的严厉批評充耳不聞，并独占和保存了美国“援助”的絕大部分。而美国的垄断資本也通过这种“援助”逐步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統治集团的影响。与此同时，鉴于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国人民力量的壮大和与之并肩前进的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的飞跃发展，以及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潰的危机，美国垄断資本越来越加重它对于罗斯福政策的压力，要求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在这种变化当中，新政拥护者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动向。1944年11月，曾被认为最急进的分子、并被列为“捉妖运动”的第一个对象的約翰·戴維斯(见前文)，也向国务院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我們现在不应该放弃蔣介石。如果那样作，我們所受到的損失将比所得到的好处更多。……但是我們必須是现实的。我們不能明确地对于一个在政治上已經破产的政府加以保險。如果苏联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与其由于我們的怠慢而把中共完全推到苏联方面，不如作一番决定性的努力，以便从政治上把它拉到我們这方面

来。我們在决定應該支持国共的哪一方面时，必須对以下的基本問題作一番慎重考虑，这就是：中国的权力现在正在由蔣介石手中轉移到共产党方面去。如果苏联进入了华北和东北地区，我們要想把中共全面地拉到我們方面，显然是不可期待的。然而，我們可以通过适当地运用軍需器材的补給和战后的援助，給予(中共)以有利的影响，使其走向民族主义，摆脱苏联的支配而独立的道路。”（《太平洋学会》杂志，第3編，第806—807頁）

一方面認識到民族解放力量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又想共产党內部“制造”“民族主义”，以期切断和苏联的联系——所謂“鉄托化”——并把他們拉到美国垄断資本方面，这是一种方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拉鉄摩爾等人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放弃封建势力，轉而支持民族資产階級（尤其是它的上层），培植保护他們所固有的民族主义傾向，以便篡夺民族解放力量的領導权。（拉鉄摩爾：《亚洲的形势》，第163頁）新政拥护者本身所表现的这种傾向，給最反动势力的要求——露骨的干涉政策——开辟了道路。“經過复杂的幕后工作”（罗辛格著前书）而任命的赫尔利、魏德迈二人，就是这种政策的执行人，这一点已經越来越明显了。

赫尔利在接任不久的1944年11月飞往延安，和毛澤东举行会談，并簽訂了他亲手起草的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統帥部的五項协定。但是，这个协定的基本点遭到蔣介石的拒絕以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个协定了。这一点，正如菲利浦·賈菲所指出的，意味着：“他对蔣介石的主张表示了屈服和同意。蔣的主张是，对整个亚洲的主要威胁是共产党的威胁，对中共进行让步，不但无益而且危險，所以美国的軍事經濟援助，應該严格地仅限于供給重庆政府。”（前书）关于繼續进行到日本投降为止的无益的“調处”活动的目标，赫尔利曾經亲自对蔣介石說：“通过政治上的让步，可以縮

短获得对共产军的支配权的过程。”(《白皮书》，第108页)因此，美国在进行调处的同时，拒绝对人民军给予一切援助，并且片面地和无条件地加强了对国民党方面的援助。而在战略方面，也把大陆反攻作战推到后面，而把麦克阿瑟的越岛进攻和与之相配合的空军司令陈纳德所指挥的由大陆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提到首位上来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使蒋介石确信美国将无条件地援助他维持和加强“独裁”，使他打内战的决心受到了鼓励。

馬歇尔的調处和內战的爆发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拿出全部力量来夺取饱经苦难的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各地的人民军、游击队，在8月9日苏联参战的同时，即以收复沦陷区为目标一齐开始了行动。人民军在战争结束当时正和百分之六十九的日军及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相对峙，所以在日军投降前后，得以迅速地扩大了解放区。蒋介石为了保存中央军的实力曾把它撤到大后方。面对这种形势，并为了争取时间，他提出国共会谈的建议，同时又于8月11日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就地驻防待令”的命令，禁止他们由驻扎地移动和对日军实行缴械。人民军拒绝了这项命令。接着，蒋又命令伪军和日军在国军到达以前确保占领地并抗拒人民军的接收。23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了如下的命令：“甲、……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收缴武器，在……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乙、现股匪攻开封、天津、郑州等地，……关于此事，目前应特别注意，……迅即将指定之日军，集中于上述股匪进攻之地方及其他各地，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这样，人民军和国民党军(包括一部分日、伪军在内)到处发生了激烈

冲突，特别是閻錫山、傅作义、高树勋等部向山西省上党地区、张家口、平汉路沿线解放区大举进攻，使人感到全面内战即将爆发。

经过八年抗战，遭受巨大牺牲而疲弊不堪的中国人民，绝大部分都高呼反对内战。人民军把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完全击退后，为了回答人民的这种呼声，只是保持有利的地位，并未对国民党军加以反击。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并提出了作为和平建设基础的七项紧急措施：“（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28日，毛泽东出乎赫尔利和国民党当局的预料之外（《白皮书》）地亲往重庆，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历时约一个月的会谈。及至10月10日，除了关于人民军的改编和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问题未获解决而保留下来以外，关于防止内战以及在各党派参加之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共同声明。但是，内战并未由于这项协定而宣告停止。在会谈进行中，国民党军不仅继续进攻解放区，蒋介石又于10月23日对各将领发出了如下的密电，命令发动内战：“如不迅速击灭奸匪（指中共），不但抗战无功，中华民族亦将永无复兴之望，其各督飭部属竭

尽全力‘剿匪’，切切此令。”

美国当局也为了确保国民党军的优越地位而竭尽了全部力量。例如，美国在华军事代表魏德迈就在8月間还曾说过：“美军不能违反传统政策来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将与日军投降同时，停止向国民政府交付租借武器”，但到了9月，却又说：“在拥有世界人口一半的地区局势的激变，将不可避免地经济上、心理上，而且很可能在军事上对我国发生巨大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约瑟夫·诺斯：《我们在中国作了什么？》）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利用魏德迈自夸为拥有“历史上最大的海空运输力”的美国海空军输送国民党军十四个军五十万人到沿海各地；“为了协助解除日军武装”，特派美国海空军六万人在华北沿海各地登陆；杜鲁门政府发表“为了援助对日防御”，把价值七亿七千七百六十三万美元的武器继续租借给国民党政府的声明；把美军的武器，以等于“白送”的廉价卖给国民党政府，等等。特别是，美国统治集团为了使东北、华北归于国民党军控制之下，竭尽了一切努力。不消说，这是因为上述各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反苏基地。1月，魏德迈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报告说：“关于保全在东北中部的国民党军的重要性，蒋介石和他的参谋部都没有足够的认识。除此以外，还缺乏适当的兵力和运输力。因此，我对蒋介石提出了建议：应倾注全力收复华北（作者按：当时华北的大部分是在人民解放军控制下），在进占东北以前，必须先巩固在华北的军事和政治地位。”（《白皮书》，第167页）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才在中国的心脏部华北——不是华中地区——登陆，这与其说是“为了协助解除日军武装”，勿宁说是在国民党军到达以前，全力以赴地“确保这个地区的陆上交通线”（《白皮书》），并且把大部分海空运输力用于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

然而，由于上述蒋介石的挑起内战和美国的公开干涉中国内

政,虽然使国民党軍在軍事上获得了一些优势,但同时又使它在政治上遭受了重大損失,使它从絕大多数人民孤立开来了。从日軍手里接收了淪陷地区和庞大財產(总額虽然不詳,但是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和台湾收归国有的主要資產之外,日本人在中国大陆所經營的、几乎等于中国全部棉紡織設備的一半的紡織厂——二百万紗錠,以及日本人所有的工业設備的大部分,也完全落在国民党手里)的国民党統治者們,以准备內战为理由用空前的掠夺(通貨膨胀、苛捐杂稅、强派公債)和抓兵、拉伕,回答了渴望和平与安居乐业的人民群众。杰克·貝耳登关于国民党接收撫順煤矿的情况报道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的撫順,日本人在它的周围建設了油母頁岩炼油厂、煤气厂……等附属工业及拥有各种小工业的小型匹茲堡。日本人时期产量最高时达到日产原煤二万吨。中国人曾經一度恢复到日产五千吨的水平,但因軍隊对煤矿的干涉,使产量又降到日产二千吨以下。国民党征集了一万名矿工和八千名市民一同修筑防御工事。軍隊对于这些矿工,既不供給伙食,也不付給工資,矿工們对此还能忍受。然而使他們痛恨的是,軍隊借口防御工事需要,从煤矿拆走結構鋼材、圓鋼、价值昂貴的釩、不銹鋼、木材等物資,而这些物資几乎完全未送往陣地,径自运往沈阳变卖了。”(《中国震撼世界》)

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外现象。四大家族利用战后的这种混乱局面竟然攫取了二百亿美元的財富。(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因此,中国人民以充滿憤怒和失望的心情高呼反对內战、反对美国干涉內政,11月在重庆成立了包括人民中几乎所有阶层代表的反內战联合会,从10月到1月之間,以昆明的大、中、小学的学生和教授为先导,排除血腥的鎮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罢課和示威游行。这种情况打击了美国当局。11月底,魏德迈不得不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說:“国民党政府的濫用职权和貪污,已經在接收地区

的居民中間引起了深刻的不滿，虽然抗日戰爭終結未久，但国民党政府已經大部分地丧失了人民对它的同情。”同时，在美国国内，人民要求将士归国的不滿情緒也在滋长，11 月間，有六名众議員指責赫尔利、魏德迈、杜魯門說：“我們的武装干涉妨碍中国的发展，并为第三次大战創造条件”(約瑟夫：《我們在中国作什么？》)，并提出了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国的決議案。

在这种内外形势之下，美国总统杜魯門免去赫尔利的大使职务，于 12 月任命馬歇尔为駐华特使，同时发表了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战争”，“早日举行有重要政治力量参加的会談”，“通过其他党派的公正而有效的代表的参加，扩大政府的基础”，并且表明：“美国的支持，将不至为了影响中国内部斗争的方向，而扩大到武装干涉。”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三国外长會議，也确认了“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使人感到中国的危机，似乎有了一些緩和。但是，在杜魯門上述声明的后半段中，并没有忘記加上这样一段話：“自主的軍隊，例如共产党軍的存在，是和中国的政治統一不協調的。这些軍隊，必須統一于单一的中國国民軍以內”。这一点足以說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利用政治上的让步、“民主化”和“和平統一”等姿态，来松懈反帝力量的警惕性，以便解除他們的武装。这一点，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証明，这就是：馬歇尔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最理想的政治形式，是实现“把非（作者按：應該說是“反”）共产势力与共产势力軍事力量对比的重心放在非共产势力方面的联合。”（拉鉄摩尔：《亚洲的局势》）因此，馬歇尔不得不一面对不自量力硬要蛮干的蔣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后退一步——“民主化”——以便整顿自己的陣容，一面为了迅速提高已經衰弱了的国民党軍的力量，而一刻不停地繼續給予軍事和經濟援助。这样，美国第一步就向东北輸送了二十万国民党軍，及至 1946 年 7 月大规模內战开始的时候，国

国民党軍可以配备在內战前綫的兵力，已經由馬歇尔来华以前的一百万人(占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增加到二百万人(占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兵力，由三十九个师增加到五十个师。自此以后，直到1947年8月“調处”停止时为止，即使在国共两軍已經公然发生冲突期間，除掉由于中共提出强硬抗議和为了表示“客观的立場”，而在“国民党政府现有軍需物資相当丰富”，“停止供应不致发生多大影响”(《白皮书》，第222頁)的一个短时期停止向国民党政府輸送武器以外，美国从未間断过对国民党政府提供大量武器支援。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年中間，美国所給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总值达四十四亿四千六百万美元，“每月平均給予国民党政府的武器相当于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間所供給武器的八倍半。”(亨利·华萊士于1948年5月25日的演說)作为以上援助的代价，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約”(1946年11月)、“中美航空协定”(1946年12月)、“青島海軍基地秘密协定”(1947年1月)、“美軍駐华秘密协定”(1947年10月)、“中美海軍协定”(1947年12月)(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确立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支配权。因此，尽管馬歇尔特使和杜魯門总统声明，只要国民党政府不致力于“和平、統一和民主化”就停止“援助”，但蔣介石却“坚信，鉴于美国政策的一般倾向，国民党沒有作任何让步的必要；而一旦陷入困境，美国就不能不出来援助”。(拉鉄摩尔：《亚洲的局势》)这是美国对华新政策——馬歇尔調处的唯一的必然結果。所以，馬歇尔蒞任后不久的1946年1至2月間，从表面上看来局势虽然有了好轉，即簽定了除东北地区以外所有地区的停战协定；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处执行部的停战令的实施；有各党各派参加的政协会議的召开及其作出的关于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召集制宪会議和通过民主的宪法草案等的決議，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改变蔣介石打內

战的决心。蔣本人事后也曾說過：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完成有利的战略部署而运用的政治策略而已。

正因为这个緣故，在国民党統治区内加强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代表們于3月末公然主张撕毁政协会議的決議；4月，又圍繞着苏軍撤退后的接收問題，在东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抛弃了东北人民的国民党政府，在日軍向苏軍投降时，在这个地区内，并无一兵一卒。因此，它把伪滿軍隊改編为国民党軍，同时又要求苏軍延期撤退，企图阻止迅速壮大起来的抗日义勇軍和北上的八路軍东北野战軍收复据点城市。苏軍坚持“不干涉中国內政”的原則，虽未干涉人民解放軍在地方上行使自己的权利，但也决沒有給予“象美国对国民党政府那样的援助”。关于这一点，馬歇尔本人曾于1947年肯定地說：“我并未掌握关于中共公然受到苏联支持的任何証据(《白皮书》)；同时，貝耳登也报道：許多城市被苏軍移交給国民党軍了。在苏軍撤退的同时，国民党軍倚靠美軍的輸送把主力集中于东北，到处对人民軍进行攻击，5月間，战火終于燃烧到长春等主要城市，6月初，虽然由于中共的让步达成了为期一星期的停战，然而同月月底，国民党軍又动員五十万大軍，对中原解放区开始了大举进攻。这样，战争结束后未及一年，中国重又陷入全面內战的火坑中了。当时国民党軍总兵力，包括地方部队在內，共有四百三十万人(中央軍約二百五十万人)，其統治地区的人口是三亿四千万人；人民解放軍的正规軍是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万人，統治地区的人口是一亿三千六百万人，不論在数量上或装备上，国民党軍都占绝对优势。但是，国民党軍不但士气非常低落，而且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也完全陷于孤立状态。所以，宋庆龄在当时发表的对美国人民的声明中，已經就蔣介石的冒险企图作了如下的警告：“內战将使我们看到城市与农村相脫节。农民将拥护共产党，因为它分土

地給他們，并且減了稅。那時，國民黨所佔據的城市究竟向那里獲得原料、出口貨物、甚至于糧食呢？……國民黨是不能在這種戰爭中獲得勝利的。這些都已經是清楚的了，那末為什麼反動派還要挑起一個無法取勝的戰爭呢？這是因為他們企圖以中國內部的沖突來挑起美蘇戰爭，這樣最後消滅中共。”^①

^① 《為新中國奮鬥》，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50 頁。——譯者

第二章 占領和“民主化”

第一节 从东久邇內閣到第一次吉田內閣

美国在占領初期的对日方針

由苏、中、美、英四国所組成的担当占領日本的联合国軍，是由美国太平洋軍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由他指揮占領日本的軍隊，所以盟軍占領日本，实质上是美軍的单独占領。占領日本的基本方針是由美国国务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共同拟就，于1945年9月6日經美国总统批准后送到日本，于同月22日以“对盟国占領管制日本最高統帥部受降的基本指示”的名义公布出来，在这里，已經明显地提出了不符合波茨坦公告的方針。比如：在这一文件的第一部分中指出，占領日本的最終目的是保證“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关于即将建立的日本政府，“要最后建立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的和平而負責的政府”。其次，在第二部分(甲)关于軍事占領一章中明确规定由美軍掌握最高統帥权，关于美軍的地位规定：“占領軍应由美国任命的最高統帥指揮”，“如果主要盟国之間发生意见分歧，美国的政策应居主导地位。”同时还指出：“考虑到日本社会的现状和美国希望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来达到上述目的的願望，最高統帥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和制度（包括日本天皇在內）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支持天皇和日本政府机关，而是利用日本现有的統治形式”。也就是說，为了改变日本的“封建的和集权主义傾向的統治形式”（明确說来就是天皇制），“考虑到”“日本社会的现状”，而利用天皇制。这种矛盾的方式无非表明“在言外承认天皇的地位”（指国防部长史汀生，见外务省：

《終战史录》),并且为了建立軍事統治而对天皇制加以重新改組而已;而对于日本人民,則仅仅承认其在美軍的武力統治之下,“在不违反占領目的和不侵犯美軍安全的限度內,有改变日本政治形式的自由”而已。

美国的这种对日方針,对于在投降时把天皇制的存續作为唯一保障的日本統治階級來說,是最有力的后盾。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发出了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复文后,于翌日15日,天皇广播了“停战詔书”,內称:“朕得以保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誠,經常与尔臣民共在”。这里所謂“国体”一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具有各种不同內容的伸縮性很大的字眼。当然,它的核心,就是天皇的“神格”权威。这一点,并不因为1946年1月1日天皇自己发表了否定神格的宣言——一个人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普通人这样一个稀奇的宣言——而有所改变。现在,由于战敗的結果,这个核心面临危机了。日本統治階級中間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追究天皇的責任而使其退位,一派則持反对意见,但在維持天皇的神格权威的問題上,两派都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在主张天皇退位的人們中間,存在着对于“国体”更加强烈的信仰。8月15日以后日本統治階級所提出的战略目的,和那时以来直到今天指导着日本的政治并貫串在这段历史之中的一条粗大的绳索,就是建立天皇的神格权威。

威胁着統治階层的这种战略目的的力量,在国内外两方面都存在着。来自外部的威胁在于下面这一点上:正如盟国的复文中规定“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国家之权利,即須听从盟国軍最高統帥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由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确定之”等情况所表明,占領統治将如何变更天皇的地位,尙属不明。来自內部的威胁,是人民革命力量的抬头。日本的統治階級对于来自以上两方面的威胁,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久邇內閣和軍隊的瓦解

8月15日，鈴木內閣因为实现停战的目的已經达到而实行总辞职，17日，东久邇內閣宣告成立。停战时规定的解散軍隊的工作，只要发生一步失誤，就可能由于軍人的狂热行为而引起不測的混乱。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这种混乱，才“第一次請求皇族出馬”。近卫文麿以副首相的身分参加了內閣。参加这次內閣的还有后来担任首相的吉田茂和殖田俊吉（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法务总裁）等人，他們作为近卫的参謀輔助他进行工作。东久邇內閣的直接目的，是利用皇族的权威来解除軍隊的武装，而从根本上說，这个內閣的上台，是为实现近卫奏折（见第4卷附录）中提出的統治阶层的战略目的的一个步驟。

8月14日，鈴木內閣在实行无条件投降的同时，又决定了“关于紧急处理軍部及其他方面所拥有的軍用物資器材措施”，并发布了抛售軍需品的命令。陆海两軍也配合这一措施，以“保守机密”为理由，命令所属銷毀有关軍需物資的文件和帳簿。这样，就把用“支援战争”的口号搜集的和耗用国家資金所制造的按当时官价計算約值一千亿日元的物資投放出去了。投放的条件是这样：“投放物資，原則上有代价，但价款并不限定即時全部付清”。軍需企业把政府委托保管的軍需原材料都原封不动地隱匿起来，統制公司和統制組合所保管的物資，也是同样情况。及至8月28日，东久邇內閣又下令停止抛售和进行回收，并向議會报告，已經收回了大約百分之三十，但因为証据文件已被銷毀，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此外，东久邇內閣还以偿付价款和賠償損失的名义，又向已經接受政府訂貨而未交納成品、甚至尚未着手生产的軍需企业发放了大量的紙币。8月15日当时的日本銀行券发行額是三百亿日元，然而到同月月底，已經超过了四百亿日元。这样大量投放軍需

物資和大量濫用臨時軍事費，對於保持舊的統治勢力的財政基礎，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他們利用戰爭，也利用戰敗，攫取了巨大的財富。

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前往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軍艦在降表上簽字的外相重光葵，在臨行時曾謁見天皇表示如下的信心，他說：“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君萬民的国家，接近陛下的人都深深知道，陛下是以萬民之心為心的。這種情況，過去往往為掌權者所歪曲，致使日本陷入了今天的悲慘境地。我想，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民主，不但和我國國情無任何矛盾，而且將因此愈益顯示出日本國的本來面目。”（重光葵：《昭和的動亂》下）

降表簽字後，外交界的元老芳澤謙吉在樞密院的會議上說：“蘇聯向東亞擴展，足以加深對我國的威脅。在這個問題上使人感到多少還對我國有利的一點，就是，由此形成了蘇美兩國在東亞展開鬥爭和互相牽制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我國應該採取爭取美國好意的方針”。對此，重光表示同感。（深井英五：《樞密院重要議程備忘錄》）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日本的統治階級為了解決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是要盡量利用蘇美對立的國際條件的。

不料，在9月2日的傍晚降表簽字以後，外務省突然接到了麥克阿瑟司令部關於對日本全國施行軍政的命令。這使得日本的統治階級大吃一驚。9月3日清晨，重光外相往訪麥克阿瑟，請求取消施行軍政。他說：如果盟軍打算實現波茨坦公告，並以此為滿足的話，則通過日本政府來實行占領政策，是最明智的。相反，如果占領軍施行軍政，直接承擔行政責任，那就是要求超出波茨坦公告的範圍以外，是出乎日本預料之外，其結果，反而解除了日本政府執行占領政策的責任，可能招致混亂。重光的這種主張，恰巧符合於當時美軍總司令部方面正在考慮的占領方式之一，當即受到採納。為了通過日本政府施行占領統治即間接統治成功地執行波茨

坦公告中所规定的日本的民主化条款，这就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直接担当行政责任的日本政府具有对于实行民主化的诚意。但是，日本政府并不具有这个条件。其结果，间接统治的方式竟然发挥了作为保存统治力量的护身符的显著作用。取得了间接统治的日本统治阶级，便汲汲于保持这种统治方式了。

9月17日，外相重光因为建议内阁实行更迭未蒙采纳，而被首相东久邇授意辞职，另由近卫推荐吉田茂继任外相。这番人事更动，固然也是由于为吉田的女儿和子作媒的白洲次郎向近卫建议的结果，同时，吉田本来就是和近卫在一起，作为战败后宫廷派的中心人物之一，从事策划恢复天皇权威的工作，所以，他迟早是要在保守政权中担任负责职位的。果然在他出任外相后根据他的建议，天皇于9月27日第一次访问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自从占领日本以来，一直采取了无视日皇的态度，使得宫廷派人士深感不安。同时，国内外又出现了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当天皇辞去的时候，麦克阿瑟向他说道：“不论任何问题，都可以拿来商谈”，这句话，使得宫廷派完全安下心了。

前文已经说过，东久邇内阁最大的一项任务是遣散七百万人以上的庞大军队。对于如何来平安无事地完成这批曾经叫嚣本土决战的庞大军队的复员工作，无论是盟军方面或者日本政府方面，都不能不抱有很大的不安。东久邇内阁想利用皇族的权威来秩序井然地完成复员工作，以便向国内外证明它的存在意义。然而在实际上，这个内阁是竭尽全力来迅速完成形式上遣散军队的工作，以便把这件事对于天皇制的影响局限在最低限度和尽量保全旧的势力。为达到这个目的，主要需要作到以下两点。第一，军队在接受占领军解除武装以前，主动地完成复员工作，以便隐匿它的组织。为此，这个内阁把近卫师团改编为禁卫府，企图以此作为重整

軍备的核心;把陆海軍的干部安插在复員机关及其他官署、軍需企业中充当工作人員。第二,統治階級最怕的是,遣散軍隊工作拖长,以致由占領軍动手来解除日軍的武装,以及对日本实行軍政——直接統治。于是,它在占領軍动手以前就把遣散軍隊这一势在必行的工作形式上加以完成,以表现間接統治的实效,并借此收到保全天皇制的效果。

統治階級的这种利害一致,首先使复員工作得以迅速进行。日本本土的四百万部队的复員工作,仅在两月以內即接近完成,进度之快可想而知。但是,这项复員工作,并不是秩序井然进行的,在这期間干部們紛紛地私吞和盜卖軍需品,士兵們急于奔回家乡,完全呈现了一片自然崩潰的景象。投降以后,全国的交通机关,由于这种大量的逃兵而出现了非常混乱的状态。内部早已孕育着崩潰的危机、仅靠“坚持进行战争”这根支柱的維持幸免于瓦解的軍隊組織,由于战敗而一下子崩潰了。

工农运动的再起

波茨坦公告的第十条规定:“必須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而 1945 年 9 月 22 日公布的占領初期管理日本方針也在其第四部分第二段里规定:“鼓励根据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成立有关劳工及工农业方面的各种組織”,表明了占領軍的意图。接着在 9 月 30 日,产业报国会解散。10 月 4 日,麦克阿瑟司令部发出了一项指令,命令日本政府撤銷对于政治、信教以及人民自由的各种限制,内容有释放包括共产党人在內的全部政治犯;完全废除治安維持法、軍机保护法及其他限制思想、信教、集会、言論之自由的一切法令和制度;立即罢免特务警察有关人員;等等。当时还对占領軍当局的方針缺乏理解的东久邇內閣,深恐天皇制因为这项指令而受到重大打击,沒有遵

照执行。于是，占领军立即下令罢免内相山崎，内閣也因此而总辞职了。

这项指令，为日本工农运动真正的重兴开辟了道路。根据这项指令，在监狱中坚持斗争了十八年之久的德田球一及其他许多共产党员出狱了。第一次得到公开活动自由的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天皇制、废除寄生地主所有制、惩办战争罪犯和扩大工人权利等政策，并立即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共产党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在10月20日创刊的机关报《赤旗报》出到第五号时，发行数已经达到九万份。共产党不论在城市或在农村，都站在人民的前列，成了工人农民有组织活动的核心。

在发布上述指令的第二天——10月5日，就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事件，预示着以后工人运动的困难重重。其一是全日本海员工会的成立，其二是在北海道的朝鲜工人的罢工。

在产业报国会解散的前一天，仓促之间举行了劳动总同盟筹备会，提出了以留在各企业中的旧总同盟人员为中心组织工会的方针。10月5日成立的全日本海员工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根据上述方针，以三井物产公司总经理前日本海员工会会长小泉秀吉为会长，并通过海运报国团理事、前全日本海运工会会长堀内长荣和海运报国团关西支局事务局长蔭山寿等人的活动而产生的。对于权力最为敏感的这些人最先着手成立工会一事说明，他们已经暗中取得了占领军和资本家的同意。占领军认为，这种组织只能是削弱旧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不致于代替帝国主义势力的“民主的”和应当受到“鼓励”的力量；而资本家则欢迎这种符合己意的工会组织在势必产生的工会组织成立以前宣告成立。国营铁路方面，把战争期中的“现业委员会”改组成为铁路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北九州煤矿方面“由一部分工会领导者和公司的勤劳科组织的”工会（北炭联的评语）的成立，纤维工业方面“由科长任主席、

職員作干部、監工當婦女部長”的工會的成立，這一切都說明了這種自上而下的“穩健”工會的成立過程。戰前曾經進行過英勇鬥爭的東京交通工會不用要求的方式而是用“請願”的方式向當局提出了改善待遇的問題，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和這些情況形成對照的是，戰爭中在北海道煤礦被迫從事奴隸式勞動的朝鮮籍礦工的一部分——夕張煤礦的朝鮮籍礦工，於10月5日舉行了罷工。他們除要求工資食糧之外，並要求享有組織工會的自由和追究了戰爭中壓迫工人的責任。總同盟籌備會方面連作為口號都未敢提出的懲辦戰爭責任者和經營民主化的問題，在這裡已經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被提出來了。這一運動很快地波及到北海道各煤礦，同月月底，住友系統的奔別煤礦的日本籍礦工也實行了罷工。10月27日，司法內務兩相發表了同共聲明，清楚地表明了統治者對於這些事件的態度，這項聲明說：“如果集會和群眾運動越出常軌，以致發生侵入私宅和暴行傷害等犯罪行為時，即應迅速將犯人加以逮捕……”。同時，當日本共產黨為使這種可說是自發的運動走向組織化而加以指導時，便立即遭到了占領軍的阻撓。比如，當10月29日常盤煤礦朝鮮籍礦工舉行罷工時，馳往支援的共產黨員在演說中剛要涉及到懲辦戰犯、廢除天皇制、撤銷戰時統制等問題時，占領軍司令部軍政部的辛柏中校便下令禁止了這次集會。他說：“現在正是要爭取尽可能多生產煤炭的時候”。不錯，誠然是這樣。但是，他清楚地知道，為了恢復生產，而由工人自己來追究戰爭責任，破壞那些使資本家的生產怠工成為合法的戰時統制法規，工人在生產中成為主人翁的話，就要動搖占領政策的基础了。

幣 原 內 閣

如前所述，東久邇內閣因違抗占領軍關於廢除治安維持法、特

务警察、释放政治犯的指令而于10月6日垮了台。接着于10月9日，三菱財閥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組成了內閣。但是，这个新內閣在本质上是和东久邇內閣毫无不同之处。陆、海、外务、司法、文部各相和情报局总裁都留用了前內閣的旧人；另有澀澤敬三、小林一三等人作为財閥的代言人参加了內閣。这个內閣在以保全天皇制和保全統治階級势力这一基本目的上，和它的前任并没有两样，唯一不同之点在于，这个內閣“了解美国情况，能够积极地、毫不迟疑地实行美軍总部所要求的政策”，从而是更加从属于美国的买办性的內閣。他們看穿了美国的对日方針，所以选择了通过对美協調来謀求生存的道路。

实际上，这个內閣对于执行占領政策大体上是忠实的。但是，他們对占領軍表示的“恭順”态度之中所包括的内容却是这样：对于占領政策中民主的部分，則尽量推拖，而对于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則积极地加以执行。

10月11日，占領軍总部发布了关于保障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的指令，其中包括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促使工人的团結和組織、教育的民主化、由专制政治下解放人民、經濟的民主化（包括解散財閥和土地改革）等五项内容。在发布这项一般性的指令以后，于11月2日又发布了关于冻结主要財閥公司的资产和继此的有关解散財閥的指令，于11月9日发布了关于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指令。接着，又在12月15日发布了使国家和神道分离的指令，在同月31日发布了关于禁止修身、地理、日本历史等教科书的指令。

但是，这些指令，如上所述，都是为了蒙混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的批評和責难而作的官样文章，实质上都是极端欺騙性的。例如，有关天皇制的各项指令，并非要改变这种制度的本质，而是通过允許天皇参拜伊势神宮的规定（11月3日），以及第二年1946年年初使天皇发表“人格宣言”等措施，把天皇制保存下

来,仅仅使它更加从属于美国,并玩弄一些欺騙性的“民主化”花招而已。至于解散財閥(詳见后文),也是为了削弱財閥家族的統治力和与美国垄断資本竞争的部門,并未触动构成財閥本性的資本主义垄断本身。同时,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它虽然給予了天皇制的强有力基础——寄生的土地所有制以某种程度的打击,但其真正目的却在于避免由农民自己实行土地改革,尽可能地保存地主阶级的实力,以及重新安排农村中半封建的統治关系,加强富农和富裕中农,以便分裂农民战綫。比如,根据 12 月 9 日的指令于同月 27 日公布的土地調整法和根据这项法令实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规定地主保有的土地面积为五町步(約合九点九一八平方米),成为改革对象的土地仅占全部租地的百分之三十九,其保守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币原內閣通过这种情况立即嗅到了这种占領政策的本质,并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力图保存統治阶级的利益;而对于逐日高涨的国内人民的民主要求,則用欺騙、造謠和鎮压来对付。內閣根据指令而实行的各项措施,諸如修改选举法、拟定解散財閥方案、修改土地調整法、制定工会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非常不彻底的,就連指令上的“民主化”,也都最大限度上予以推拖。并且,在这期間,生产的崩潰、通貨膨胀和粮荒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內閣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它对于人民的穷困化,不仅置之不理,反而使之加剧了。

各政党的成立

由于共产党积极地活动起来、工农运动日益活跃起来,与此相对抗的保守党派,也开始了重建的工作。战前的民政党、政友会等保守党派和社会民主主义各党派,虽然利用私人关系多方进行了拉攏,但以头目的爭权夺利,很难拼凑起来,只因受到共产党的积极活动的刺激,这才开始成立政党。但是,这些政党并不是建立在

政策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头目同嚙囉的私人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它们的政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对于共党政策的反对情绪出发而被动地提出来的。

11月9日，日本自由党以鳩山一郎为总裁而宣告成立了。它的社会基础是资本家、地主和官僚，而以“维护天皇制”为最主要的口号。11月16日日本进步党成立了，它的成员都是由旧民政党的一部分和旧政友会中島派的一部分组成的旧大日本政治会的分子。它的建党宣言里说：“维护神圣的国体，当然是我国国民万古不渝的信念。尤其在这过激言论泛滥的今天，吾人更当勇敢地遵循君主立宪的大道，断然排斥共产主义。”进步党的社会基础，也和自由党相同；同时，这两个党，正如外国报刊所介绍的，都是“极右”的党。

11月2日，由战前的社会大众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联合组成了社会党。这个党的成员虽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其中的右派（如西尾末广之流）实质上却和以上两个保守政党的成员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它在建党上既无一定的理论，也无一定的政策，只是标榜了“把天皇的统治权限定为礼仪性职能的、天皇制下的社会主义”而已。它的社会基础，虽然口头上也包括工人和农民，但实际上是以小资产阶级和已经成了资方代理人的上层工人为主。

币原内阁的垮台和政治上的空白期

到了1946年以后，通货膨胀、黑市交易、粮荒更加严重，虽然政府在2月16日施行了食粮紧急措施令，但是人民还是陷入了穷困的深渊。于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要求以社会党、共产党为中心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呼声，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浪潮。

美国占领军当局认为，必须在这种民主统一战线建成以前，赶紧举行大选，以便巩固保守势力的基础。确实，美军总部对于“一向习惯于接受权力统治的臣民”，“迅速而积极地利用新的机会开展了民主活动”一事感到了震惊。（比森：《日本民主主义的展望》）因此，尽管在4月5日的第一次盟国对日委员会上苏联代表德勒维扬哥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是在4月10日举行了大选。这次选举是根据上年年底修改的选举法举行的，根据新选举法的规定，妇女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采取大选区制和同时填写二到三名候选人的方式。

在选举进行期间，全国各地工农市民团体召开了打倒币原内阁的人民大会。其中尤以东京最为热烈，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另一方面，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等保守党派，对于以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政府为口号的共产党，自然展开了集中攻击；而社会党也拒绝和共产党进行共同斗争。因为如上所述民主力量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组织工作，而且内部分裂也还没有解决就迎接了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自然要和占领军所期待的那样，由保守党派获得了胜利。这次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取得了一百三十九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进步党取得了九十三个议席，社会党取得了九十二席，共产党取得了五席。

应该在新选出的议会的基础上成立新的内阁。但是，币原内阁借口它有义务完成通过后述程序拟制的新宪法草案，发表声名它将继续执政。其实，这是由于它已看到这时国际舆论已经明白指责第一大党自由党总裁鳩山一郎是个战犯，并且掌握了占领军当局要求保守派执政的事实。此外，它还利用明治宪法的观点为自己辩护，说什么“它是由天皇大权所任命的，非有天皇的命令，不能辞职”。总之，它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狡赖不肯交出政权。

对此，工农运动方面打倒内阁的呼声逐日高涨，并在这个基础

上成立了社会党、共产党、协同党和自由党四党共同倒閣委员会，由于这种議會内外互相配合的斗争，终于迫使以美軍总部和天皇大权为后盾的币原内閣于4月22日实行了总辞职。

币原内閣垮台后，出现了日本宪政史上从未有过的为期整整一个月的空白期。这件事说明了統治阶级及其靠山——占領軍当局統治的危机是多么严重；可以说，这段期間时局的演变将决定太平洋战争的結果。

在有五十万人参加的第十七届庆祝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在5月8日和17日的工人示威游行中、在5月19日举行的人民大众爭取粮食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中，社会党都要求出来組閣。共产党以四个在野党就粮食、通货膨胀及失业問題制定一項共同綱領并交由社会党内閣执行为条件，支持了社会党的主张。对此，自由党要求由它出来組閣，并借口它不能就当前的重要問題——修改宪法問題和共产党制定出共同綱領而破坏了共同斗争。当此时机，使民主力量遭到致命打击的是社会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以西尾末广为首的右派主张，組織由自由党人担任总理，并排除共产党的“举国”联合内閣，这和主张完全保持在野党地位的左派形成了对立。这样，由于西尾一派勾結自由党狼狽为奸，致使四党共同委员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存在。

在社会党右派和自由党的背后，存在着美軍总部的意图。4月7日举行人民倒閣大会时，占領軍就曾出动了坦克，并派宪兵駕駛吉普車对示威游行进行了阻挠。另外，在5月15日的盟国对日委员会會議上，美方代表艾奇逊还发表声明說“不欢迎共产主义”。

这样，就明目张胆地为保守政权的出现鋪平了道路。在此以前，被认为下届内閣总理最有力的候补者的自由党总裁鳩山，于5月4日經最高統帥以其备忘录宣布为战犯而受到整肃。鳩山曾任田中軍閥内閣的書記官长，并在1933年文部大臣任内就瀧川事件

镇压过进步力量，当时，内外舆论正在责难当局不应纵容鳩山从事政治活动。正在策划压制民主力量的要求和建立保守政权的美军总部，一方面，不得不对上述舆论作形式上的让步，同时又必须更换保守派的首领，以代替“臭名昭彰”的鳩山。这次被选中的人物，就是币原内阁的外相吉田茂。吉田担任驻沈阳总领事时期曾经是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中心人物，但是由于他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曾经和近卫等一同为了对抗苏联主张和英美两国实现停战，而取得了“和平主义者”的头衔，因而得到美军总部的好感。因此，吉田就继鳩山之后，成为自由党总裁并开始了组阁工作。

为促使吉田内阁的诞生而直接给予了支援的是，麦克阿瑟在5月19日举行突破粮食危机人民大会的次日所发表的“对于多数暴民进行示威游行和骚扰的警告声明”。声明指出：示威游行是“对于占领本身的基本目的和安全的威胁”，并且宣称：“为了纠正这种遗憾的状态，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

由于这个声明和资产阶级报纸就此大肆宣传的结果，5月21日就成立了以自由、进步两党为基础的第一次吉田内阁。这是反革命势力胜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伪装改革者——占领军暴露原形的第一步。

第一次吉田内阁

在人民争取粮食的斗争浪潮中上了台的吉田内阁，上台后首先发表声明不准工人在劳资纠纷中实行的生产管理，并且坚决“维护社会秩序”(5月24日、28日)。它要维护怎样的“社会秩序”呢？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武装警察于6月21日袭击坚持斗争中的读卖新闻社职工的事件上。这家报社的职工于战后的1945年10月间成立了职工会，要求社内民主化和社长法西斯的急先锋正力松太郎——警察出身、东京市的恶棍之一——及其他董监事全体辞

职。正力以后因被列入战犯而受到了整肃，由于他的保荐，馬場恒吾继任了社长。6月12日，馬場在美軍总部和政府的支持之下，想要开除六名編輯干部，职工們为此展开了斗争。但斗争并未立即采取罢工和怠工的形式，报纸仍照常发行。不料，至6月21日，突然有武装警察約五百人袭击报社，肆意殴打工人，并且沒有拘票就逮捕了五名編輯。于是，职工們终于从7月13日起开始了罢工斗争。16日，又有数百名警察偕同流氓組織暴力团分子数百人袭击工厂，用暴力把罢工者赶出厂外。这样，吉田內閣成立后的第一招，就是协同美軍总部建立“反人民的秩序”。（住本利男：《占领秘录》下）

这个政府积极地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日本銀行券的发行总额，在1947年1月已經突破了一千亿日元。由于通货膨胀造成货币价值的跌落，使工人的实际工資降低，用这种方法从人民大众掠夺来的資金，全部用于垄断資本的重建工作。1946年10月，政府公布了复兴金融金庫法，用国民交納的稅款一千亿日元国家資金作为該金庫的資本，而于1947年1月开始营业。复兴金融金庫的大部分資金都用于援助三井矿山、三菱矿业、昭和电工等財閥系統的垄断資本。政府把这种以鋼鐵和煤炭等基本物資为重点开始增加生产的作法，叫作“傾斜生产方式”。复兴金庫的貸款，越来越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了。

吉田內閣上台以后，对于統治階級的支柱——垄断資本的保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工人階級的压迫也逐漸加剧了。

1947年4月，政府公布了禁止垄断法，从7月开始实行；同年年底又公布实行了“排除經濟力过度集中法”。关于解散財閥政策，在美軍总部內部也有人认为日本財閥的經濟統治力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支点必須加以保存而表示反对，因此，这一政策实质

上并未认真执行,只是徒有其名,敷衍了事而已。或许因为吉田早已了解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他从担任币原内阁的外相时期就公然表示反对解散财阀的政策,并且也没有受到美军总部方面的指责。解散财阀政策不仅未被执行,而且财阀垄断资本还以改了名称的财阀银行为据点,把资金投入了各该系统的企业。政府利用其经济政策对银行加以保护。对于保存和加强财阀垄断资本的这种实际情况,1947年公布的两项法令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实效,而且也没有被认真地执行。根据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最初曾规定三百二十五家大公司必须分劈,但后来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位被免除了进行分劈。1946年8月,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宣告成立,它成了资本家有组织地对抗工人斗争的核心。经团联在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压力的同时,越来越和政权打成一片了。

第二节 统治体制的对美从属化

占领体制

对于日本的占领,由于本书第四卷和本章第一节所叙述的情况,成了美军单独占领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同盟国来说,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具有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特别在亚洲,以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主的各国人民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显著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的基础,因此,美国的占领政策,不得不迅速地扶植日本,使其成为美国推行亚洲政策的据点。因此,在占领初期,美国所考虑的是,极力避免采取根据四大国一致的原则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而实际上采取建立美国单独占领体制的方针。但是,美国的这种方针当然要在同盟国间引起了反对,形成了美国所提出的目的在于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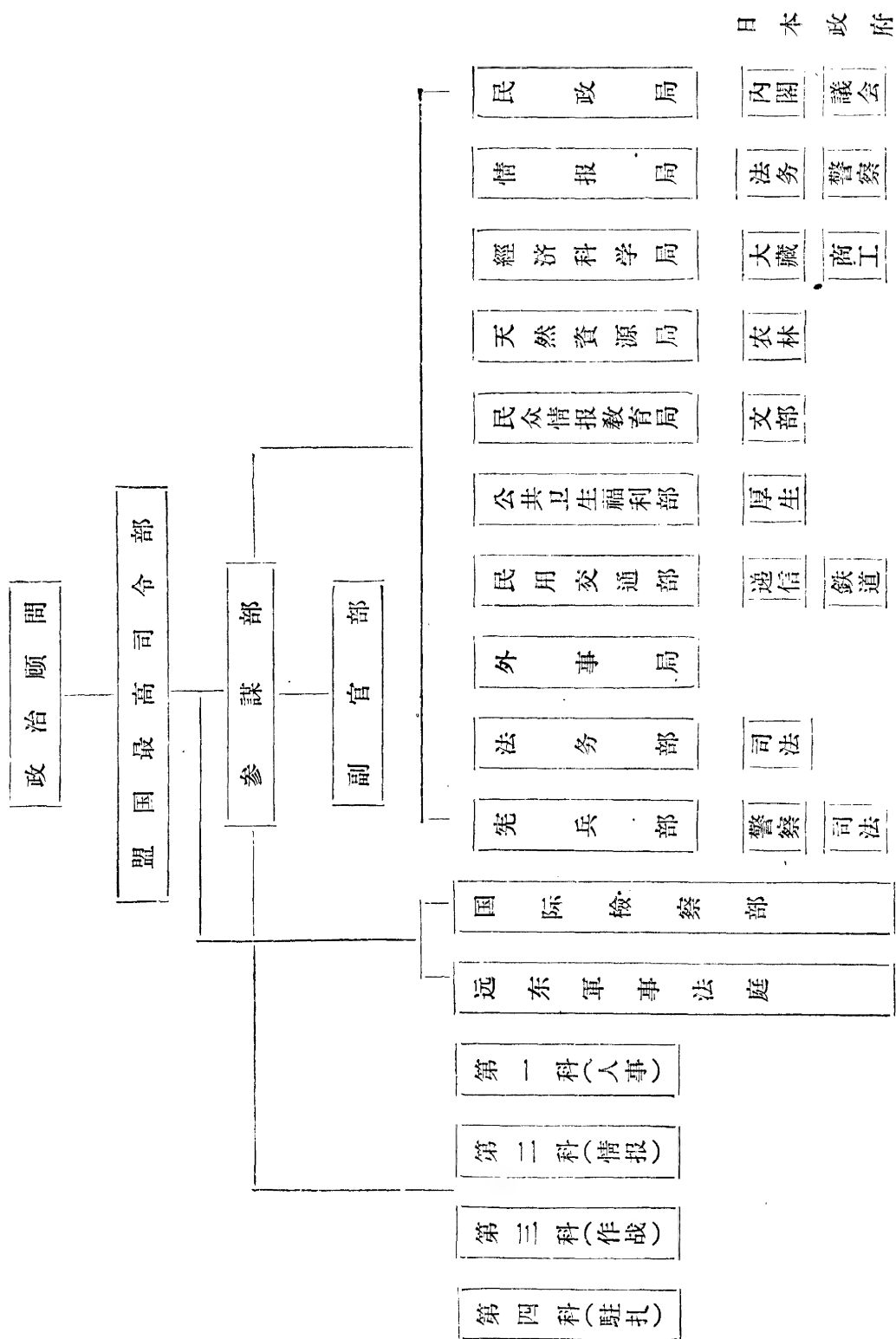
用其他盟国为美国单独統治服务的苏中美英四国远东諮詢委员会方案和苏联所提出的委任四大国成立管制日本委员会来决定和执行占領政策方案相互对立的局面。

1945年10月，美国在华盛顿单独設立了远东諮詢委员会，但因这种措施引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对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不滿，結果在同年12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會議上达成了協議，规定由十一个国家共同成立远东委员会設在华盛顿，并在形式上把它作为决策机关位于盟軍最高統帥之上；另外，作为最高統帥的諮詢机关，在东京設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

这样，虽然形式上完成了由盟国管理日本的体制，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妨碍由美国单独占領日本。这就是說，远东委员会是“制定日本于完全履行投降条件所规定的义务时应恪遵之政策原則及标准的最高决策机关”，事实上四大国是享有否决权的。但是，委员会的决定，不仅是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領軍总部来执行的間接性的，而且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以前，美国政府还可以向最高統帥发布“临时訓令”，所以，远东委员会不可能制定出任何违反美国意图的政策。另一方面，“管制日本委员会”虽然可以“和最高統帥进行协商并提出建議”，但由于“最高統帥的决定高于一切”，（附則一及二）所以它只能是麦克阿瑟的一个諮詢机关，而由管制日本委员会提出的重要建議，只有关于土地改革的一项而已。因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4月3日，当时由美国单独占領日本的政策已經基本上形成了既成事实，所以，在那以后，仍然是由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在其单独軍事控制之下进行了片面的統治。（对于軍事行动，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都完全无权过問。）

执行对日占領的美軍是美国的第八軍和第六軍。第八軍是由第九軍团（駐札幌），第十四軍团（駐仙台）和第十一軍团（駐日吉）組成；第六軍（駐京都）拥有第五两栖軍团（駐佐世保），第一軍团

占領軍總司令部組織系統表



(駐大阪)和第十軍團(駐吳港)。這些軍團把日本的軍事战略地區和政治中心點全部置于自己的監督之下(1946年11月1日美國政府對麥克阿瑟的基本訓令第一部分的四之(3))。同時，配合日本的行政組織，在第九軍團軍政部之下，分設北海道(札幌)、東北(仙台)、關東(板橋)三個地方軍政部；在第一軍團的軍政部之下，分設東海北陸(名古屋)、近畿(京都)、九州(福岡)三個地方軍政部。此外，還在北海道、東京、神奈川等二府四十一縣設立了軍政部(《日本資本主義講座》第1卷)。這些軍政機關，按照規定是執行最高統帥的指令，監督和調查地方行政，但在實質上是操縱日本地方行政機關的。這些地方軍政機構的最高峰就是美軍總部，總部通過停戰聯絡事務局來發號施令，而日本的官僚機構則分別隸屬於總部的各個部門，成為它們的組成部分。

“民主化”的實質

美國從占領日本的一開始就採取了這樣的方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予以一定程度的打擊，使日本從屬於自己並成為自己对亞洲政策的據點。至於怎樣才能使日本成為最有利的據點的問題，不論在美國國內，或是在占領軍總部內，都有分歧意見。美國所關心的是，如何避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亞洲掀起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鋒芒，並割斷蘇聯對於這種解放運動的影響；但是，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卻發生了分歧。以拉鐵摩爾為代表的所謂中國派(包括許多擁護新政者在內)，主張扶植民族主義的第三勢力來達到這種目的，並借此動搖同美國對立的其他帝國主義的基礎；在對日政策方面，則主張打擊日本的壟斷資本使其從屬於自己，然後再用“民主化”政策來轉移人民革命的高漲。反之，以戰前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為中心的所謂日本派則主張維持日本天皇、重臣、財閥等“穩健派”作為日本的穩定勢力，使日本完全成為反革命

的据点。从占领政策的实际执行来看,在整个“民主化”时期,前一主张得到实现,而从 1947 年前后,后一主张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两种主张本质上并无差别。

美国的方针是首先采用“间接统治”的政策把由于战败而面临天皇制的危机和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感到极端恐惧的日本统治阶级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并使其成为美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所有“民主化”政策,无非是给战败以后陷于瘫痪状态的日本统治组织装上一副美国式的钢骨,把它改造成为合乎美国需要的东西;同时,利用“民主化”的伪装来避开国际和国内人民力量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是美国想要利用原来的权力组织为它的殖民统治服务,虽然披上“民主化”的外衣,而在本质上仍然是旧日的天皇制政府的延续,并没有堵塞日后走向复活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化”政策,只要它有助于使人民相信大体上还具有自主独立性(虽然在根本上是从属于占领军的),那么,也就起到了排除人民反抗占领统治的作用。

修 改 宪 法

麦克阿瑟深知,天皇制对于实行占领统治可能成为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就是他在 1946 年 1 月制定了一项计划指使天皇发表“否定神格宣言”的理由。美国认为天皇是“日本国民所知道的唯一政府”;而麦克阿瑟也认为“他具有相当于二十个师兵力的力量”,“个别的日本国民反对共产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在于维护天皇制的愿望”,而想用它作为推行占领政策的主要工具。(《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第 2 卷,第 247 页)。因此,“天皇经常是最强有力者的战利品。获得胜利的将军或摄政,一旦在实际上建立起对国内的统治以后,便利用这个在日本社会中依然最接近于道德上的绝对价值的存在——‘天之元子’天皇的名义发号施令,以使自己

的权力不断地得到肯定。”而“战胜者也就变成官軍”。(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的五位紳士》，第170頁)。麦克阿瑟决定了这样一种对天皇的政策，这对于战敗以来一心一意地希望維持天皇制的日本統治階級來說，簡直是正中下怀。关于新宪法的討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麦克阿瑟不但向近卫文麿表示他要指导把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加以自由民主化，甚至还命令他的政治顧問草拟了允許天皇制和貴族院繼續存在的宪法草案。但是他的这个方向遭到了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各方面的强烈指責。苏联和澳大利亚等国坚决主张废除天皇制；中国的主张也与此接近。就是在美国，拉鉄摩尔等也认为天皇制是侵略政策的基础，主张把它废除；美国輿論界要求处分日皇裕仁的占百分之三十三，主张废除天皇制的竟达百分之七十一。在日本国内，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天皇制的政策。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家园被焚毀、战后又为通货膨胀所苦的人民群众，內心里也未必还对天皇抱有好感。甚至想在将来为天皇建立神格权威的宮廷派如近卫文麿和高松宮(裕仁的三弟)等，由于这种情况也带头主张现天皇應該退位。因此，总司令部于1946年2月初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象征天皇制的方案，并且指出：“不依照这个方案制定宪法，就不能保証天皇的地位”。对于宪法問題，币原首相最初主张无須大事修改，不久又提出了一个对天皇的統治大权保持原封不动、只是对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限制稍微放宽的方案。

自由党和进步党的主张也与此大同小异。社会党則主张把主权赋与包括天皇在內的国民协同体的国家，使議會和天皇分掌統治权。但后来，政府和这些党派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总司令部的最后方案。3月6日天皇頒布了詔书，表示采納这项根据总司令部最后方案所拟定的宪法草案。美国为了迅速地按照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建立起天皇的权威，又拟定了“民主的天皇”历訪全国的計劃。于是，天皇从2月19日以神奈川为起点开始了对地方的訪問。因为这次訪問正是在4月举行选举之前，所以又为保守势力巩固了地盘。规定天皇为国家的“象征”和放弃战争的新宪法，于1946年10月通过两院，次年2月8日正式公布，自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这个宪法，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平息上述那种激烈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一种欺騙；但同时，假如沒有人民群众的斗争，这种以放弃战争和尊重基本人权为内容的宪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的。不容忽视，在国际方面，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强大力量形成了对美国的占领当局的巨大压力，促进了新宪法的产生。麦克阿瑟曾經在1946年2月对当时的首相币原說了如下的一段話：“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这乃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則。只因规定了这两个原則，才排除了苏联的反对而維持了天皇制。”（总司令部民政局对占领軍总部的报告）这就是說麦克阿瑟自己已經供认，美帝国主义統治者并非贊成放弃战争，也不贊成削弱天皇的地位，只是因为苏联要求和平，反对天皇制，而日本人民也和苏联一道要求和平，为了进行欺騙，才不得不制定了这部新宪法。就連麦克阿瑟也承认，日本要实现民主化和和平，是不能依靠美国占领軍的，而只能依靠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

在国会里审查宪法时，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成了爭論的中心問題之一。反对这个条款的，只有共产党。該党議員野坂参三在討論时主张：一个完全的独立国是不應該放弃自卫权的。这种主张是和該党宪法草案中的各項要求——废除天皇制和确立人民主权；彻底地保証人民享有政治、經濟和社会自由以及建立民主議會，即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吉田首相反对野坂的意见，他說：因为以往竟用自卫之名进行侵略之实，所以“承认正当防卫权这件事本身就是有害的”。那么，吉田主张放弃自卫权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只是表现了要使日本对美国帝国主义附庸化而已。美国帝国主义命令日本放弃其自卫权，就是上文所说的对于世界和平力量的一个詭計。今天的事实証明：吉田首相等人，也只是否定了日本人民对于要把日本变为殖民地的美国帝国主义的防卫权罢了；他們并不反对动员日本国民去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共雇佣軍。

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审判战犯和整肃

美国占领軍为了利用“民主化”政策在人民群众中間为“美国民主”建立威信，为了把統治机构中的人事配备改变成为符合于自己的需要，有必要在不破坏統治机构，不使其驟然丧失职能的情况下，清洗战争期間的軍国主义领导人物。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远东国际軍事法庭的审判战犯，另外一个就是整肃一批人，不准其担任公职或教职。

· 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对东条以下甲級战犯二十六名提起公诉，并于 1946 年 3 月 5 日开庭审讯。但是，这些战犯之中不仅没有一个經濟界人物；同时，对于天皇，也沒有适用远东軍事法庭审判条例中“不得因元首之故而免除責任”的规定，尽管沒有掌握不应起诉的明确証据，但是，檢察官季楠竟宣布“对天皇不予起诉”，以致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美国并不是把这次审判当作民主主义对于法西斯主义实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刑，而不过是借此来显示其帝国主义战胜者的軍事威力而已。1948 年 12 月宣布了判决，判决的結果是：东条、广田、土肥原、板垣、松井、武藤、木村等七名被判处絞刑；木戶、平沼、荒木、小磯、島田、畑、白鳥、梅津等十六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二十年徒刑，重光葵被判处七年徒刑（后来被释放）。与此相反，日皇裕仁竟于 12 月 2 日通过檢察官季楠对“美国的宽大处理”表示了感謝。

1945年10月开始的的特务警察和教职员的整肃，至1946年1月4日公布“整肃令”而达到了最高潮。根据这项整肃令的规定，一切好战的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必须解散，一切利用地位和观点积极从事于军国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的实践与宣传并对这方面发生了影响的分子，必须受到整肃，不准担任公职（相当于简任官以上职位）。

进步党及其他所有右翼政党无非是战争中和军部合作的各个政党的死灰复燃，所以它们也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其中尤以进步党所受到的打击为最大。在建党当时一共拥有議員二百七十四名，其中被整肃者自总裁町田以下共計二百六十名；自由党四十三名議員中被整肃了三十名；社会党十七名議員中被整肃了十名。因为符合整肃令规定的分子还包括內閣閣員，所以币原首相曾經一度决心要实行总辞职；但由于被整肃者的鼓励又打消了辞意。同时，被整肃者还找来替身热中地策划应付大选。虽然如此，但日本政界中根深蒂固的保守风气，几乎没有因为整肃而受到影响，右翼各党派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性质。

到了一年以后的1947年1月4日，整肃的范围被扩大，包括了地方自治机构的负责人、实业界和出版界。但在此以后，经过“中央公职资格甄别委员会”为期五个月审查的结果，肯定被整肃者，还不到全部被审查者的百分之二点五。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的这次审查，不仅极尽敷衍怠工之能事，尤其官僚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整肃（在全部受到审查的六十六万余名中还不到七千名）；至于地方自治体中与翼賛壮年团有关分子、在乡軍人会会长等，则根据“为数过多”的理由，一律受到整肃，使这次整肃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因此，保尔曾經警告不要把整肃的结果评价过高，他指出：“整肃只能剥夺他们名义上的权力。但是，最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内部’的会合和家庭会议作出的，所以单靠解除领导人的职务，是

不可能剝奪他們的权势的。”

这样，这次整肃，为了使日本的权力机构从属于美国，只是把以往的帝国主义者的具有代表性的分子多少换上了几个新的买办分子而已。由于这两种分子在实质上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所以，统治体系本身并没有受到任何改变，反而作为占领体制的基础被进一步加强了。

垄断资本的改组

日本的经济，由于战争而遭到了半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发动战争的元凶垄断资本，当全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灾难和贫困的时候，却获得了莫大的利润，这一点，在前卷中已经说过。在战败和与之俱来的经济混乱以及战后的占领统治的过程中，垄断资本从战败的打击下面得到了恢复，完成了改组，并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国内统治势力之间的地位。它的改组过程，也就是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削弱国内产业，并使其附庸化和军事化的过程。

由于战败而首先引起的通货膨胀，把战败的重担强加到勤劳大众的肩上，垄断资本则借此大发其财，减缓了它的矛盾，取得了进行恢复的时间。垄断资本不仅在战败当时已经攫取了大批军需物资，以及“收购”了政府拍卖的数目庞大的军需品，而且还以补助金和预付款等形式得到了国家的巨额补偿。然而，拥有庞大数量的资金、设备和器材的垄断资本，即使把军事生产改为和平生产，因为人民大众经过战争已经陷于绝对贫困状态，也不能保证高额利润，所以在基本生产方面实行怠工，把多数工人抛到街头，而把其所隐匿的原材料投入黑市，以攫取非法的利润。此外，政府在战败后的三个月中，从临时军事费的余额中发放了一百二十八亿日元，日本银行也滥发纸币来承担赤字公债，致使通货发行额从1945年7月起仅仅半年之间即由二百八十四亿日元增加到五百

五十四亿日元，零售物价从1945年9月至12月的三个月中間暴漲了百分之九十。

加之，占領軍于1945年11月16日发布指令，撤消了对生鮮食品价格的統制，助长了黑市和投机，致使零售物价暴漲，提取銀行存款现象急剧增加。其結果，城市銀行的放款和提款逐月递增，使銀行資本面临着严重危机。占領軍和日本政府为了挽救銀行的危机和維護垄断資本的利益，于1946年2月发布“金融紧急措施令”，冻结存款，把群众的生活費降低到“五百元限度”以內。这和征收个人財產稅相配合，是把战后銀行危机的負担强加在中产阶級和下层群众身上以便回避垄断金融資本危机的一种手段。

因此，尽管政府进行欺騙宣传說这些措施是克服通貨膨脹的对策，但是通貨膨脹仍然有增无已，在实施金融紧急措施令后仅仅半年之間，通貨发行額就超过了实施延期偿付令以前的最高发行額而达到六百四十四亿日元，到了一年后的1947年3月，竟达到了将近两倍的一千一百五十七亿日元。

另外，銀行还利用由于延期偿付而掌握的巨額冻结資金，不但还清了对日本銀行的积欠，而且买进了公債，并且从6月起通过冻结法人存款使事业資金仰賴于城市銀行貸款的办法，建立了对于产业的控制。这一点也足以說明，这次延期偿付令的发布完全是为了救济銀行資本。同时，这次金融資本用以控制經濟的机构的建立，也意味着为使美元資本更易于控制日本經濟而进行的一次改組。

美帝国主义这种統治日本的方式——保护并改組日本的垄断資本使其从属于自己的这套办法，在所謂“解散財閥”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解散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財閥，是国际民主力量占領日本的基本方針之一。但是，由单独占領日本的美帝国所实行的“解散財閥”，虽然表面上也采取了改革的姿态，但

实际上却是目的在于剥夺和掌握日本的經濟主权，使日本經濟从属于美国經濟，使日本垄断資本从属于美国垄断資本而进行的次改組。資本統治資本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掌握股票，因此对美国垄断資本來說最簡捷有效的办法是，把日本垄断資本排外的股票保有方式改为互相保有的方式。于是，根据占领軍的指令，“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从 1946 年 8 月开始，从同年 9 月起先后五次把二十八家“同族公司性质”的持股公司分成八十三家，把三井、三菱、安田、住友、日产、大仓、古河、浅野、中島、野村等十大財閥分成五十六个家族并对它們的財產进行了核定和处理。这次处理的資產总额共計两亿股以上，实繳股金为九十一亿日元以上。

但是，日本的財閥，并未因此而被解散。它們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而进行了一切努力。占领軍对于“解散財閥”的真实意图，也并不是把它們破坏，而是迫使它們从属于美国垄断資本然后加以保存。占领軍的实际指导情况是这样：“另外一次主要的改革——解散財閥的工作，正在排除企业集中科手中艰难地进行着。这个科的任务当然是推进解散財閥的工作，但一般人却刻薄地送它一个綽号叫作‘保存財閥科’。而該科也一再地說：‘我們不能破坏我們最好的盟友’”。（馬克·格恩：《旅日日記》，1946 年 5 月 27 日）

1947 年 7 月，政府公布了“禁止垄断法”，对卡特尔、托拉斯加以限制；同年 12 月又施行了“排除經濟力过度集中法”，把財閥企业分成三百二十五家公司，至此，关于“解散財閥”的法令大致完备了。但是，在实际上“禁止垄断法”只是禁止了中小資本的同业公会式的統制，对于大資本并无影响，根据“排除經濟力过度集中法”而分劈的公司中有百分之九以后又被取消了分劈，結果，这项法令只是起了淘汰大企业中能率較低的部分而已。并且，就連这些法令所收到的这一点点效果，从 1948 年夏季中国的局势发生根本变

化以后,也都很快地名存实亡了。

本来“解散財閥”的目的,并不在于肢解日本的垄断資本,而是削弱其中和美国垄断資本进行直接竞争的部門,使日本的垄断資本从属于美国的垄断資本,然后把它加以改組。而由于中国局势的发展,把日本工业变为亚洲的兵工厂、把日本的垄断資本恢复起来使之成为其核心的方向,迅速加强了。陆军部长罗亚尔曾說过:“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对付侵略的、不民主的极权主义威胁的防御堡垒,应该通过使日本的经济趋于稳定坚强的办法来促使和援助它的自立”。这段話和同年3月公布的斯特賴克报告,都表明了美日垄断資本的利害一致。

对于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的閹割工作,通过4月間德萊柏代表团宣布放弃远东委员会第二百三十号文件(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的基础文件)和9月間排除集中审查五人小組发表等于閹割該法的四項原則,而有了进展:而于1948年3月和7月,又相继宣布撤銷对工矿业企业和銀行有关改組的指令。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王子造纸公司等十八家公司和日本发电送电公司以及九家配电公司共計二十八家公司被认为经济力过度集中而受到改組的指令。而且,这二十八家公司的分劈,也只是按照产品种类和工厂进行的,只是把特大托拉斯降为几个大托拉斯而已,并没有排除任何生产上的集中垄断;相反的,由于这一分劈使团結在单一的特大托拉斯內的工人斗争力量遭到削弱,反而产生了加强垄断資本的副作用。

这样,美国实行“解散”日本財閥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使美国的垄断資本能够支配和控制(特别是在資本輸出、对日本来說是吸收外資方面)日本垄断資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不仅不削弱日本垄断資本統治日本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而且还可以驅使他們来进行扩軍备战。因此,这一措施并不是拆散构成垄断資本的基本因素,如

生产的积累、集中、垄断及其同集中起来的銀行資本的結合，而仅仅是把財閥家族排外的集中掌握股份的形式改为垄断資本間相互开放允許共同持有股份的形式；便于美国垄断資本的資本輸出。同时，战后企业經營的一个特点是，依靠借款的情况比利用自家資本要多得多，作为放款者的銀行对于产业的控制力逐漸加强，于是就通过銀行来改組財閥公司的企业体系。

这样，“解散財閥”，并不是把財閥肢解了，而是使它們改头换面来保存和加强了它們的統治。这中間的变化是，实现了財閥对美国垄断資本的附庸化和为了扩軍备战的軍事化。

土地制度的“改革”

寄生地主制是絕對主义天皇制的固有基础，是日本社会的半封建性、軍国主义和反动統治的支柱。世界民主力量为了防止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首先要求改革寄生地主制度，也是理所当然的。《曼彻斯特卫报》曾經要求日本实行土地改革时說道：“农业改革是改革日本的第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即将断絕对日本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源泉，并削弱日本軍隊的征兵力量。同时，农民购买力的增长，将使国内的需要增加，并进而緩和其对外輸出和对外侵略”（1945年9月26日）；而这种要求也是反映了上述国际輿論的动向。

但是，美国的对日占領政策，最初并未把土地問題列入日程。因为单独占領的本质，就是对日本实行帝国主义統治，所以就不能不利用一切反动要素来充当其奴化日本的工具。尤其是，如果从日本农业中清除了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农民阶层势将迅速分化，使階級斗争尖銳化，并将解除对城市工人（在劳动市場、劳动条件、工人运动上的）封建压迫（低工資、过度劳动、把头統治）而加强工人階級的斗争力量；同时，还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使日本不再成为

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垄断市场。美国在其初期对日方针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仅仅含糊地规定“奖励、支持在农业方面发展组织”，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在战争期间，由于佃农的斗争，统治的基础已被动摇，并且为了向垄断资本提供廉价稻米，地主阶级被迫实行让步。而到了战败以后，他们猛烈地转入攻势，以致在战争期间由于地主强行收回土地每年平均发生九百余起的纠纷件数，至 1945 年，竟一跃而激增为五千一百七十一件。对此，农民们反对地主收回土地，揭发农会和村公所的不法行为，提出了村政民主化、发还军用地的要求而奋起斗争。这是农民群众用自己的力量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斗争的萌芽。

日本政府为了避开来自国内外各方面要求土改的攻势，并趁在美国占领军暧昧不明的有关土地改革的指令发布以前伪装要实行土地改革。日本政府于 1945 年年底向战时原封未动的国会提出了第一次“农地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承袭了战前的建立自耕农的方针，其中规定：准许地主保留五町步土地并向地主家属分散土地；土地买卖经过农会由地主与佃农之间直接进行；准许地主为了自种而收回土地，显然具有保存地主制度的企图。只是对地主的占有土地面积加以限制（通过强制出让）和改用现款缴纳地租，以致遭到了地主的反对，而这种反对，在国会中几乎使得这一法案被列为未议决议案而获得成功。

然而，美国已经预料到，苏联将在联合国的对日共同管理机构（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中提出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同时，农民对于地主收回土地的反击也日益激烈，以致占领制度在农村的基础发生动摇了。美国占领军企图回避日本及全世界民主力量的反对，并抢先地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不是由日本及全世界民主力量，也不是由日本政府，而是由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封建

农业实行民主化，并借此隐蔽其单独占领的本质。因此，在第一次土地改革方案审议中的 12 月 9 日，美国占领军发出了“解放农民”的指令。这是因为，麦克阿瑟已经了解到“即使是表面的也好，为了把“民主主义”引入日本，并消灭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依据，改善农民的处境是首要的先决条件”的缘故（拉德任斯基：《日本的土地改革》），这项指令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挠农民通过革命的方式并且用自己的力量来取得土地。因此，美军在发布“解放农民”的指令以后，既没有就实行改革作出具体的表示，也没有显示出迫使日本政府执行指令的诚意，于是日本政府就坚持了第一次改革方案的基本点。（地主保留土地面积为五町步）

当美军和日本政府正在这样就土地改革问题进行敷衍蒙混的时候，工人和农民的斗争象暴风雨一般高涨起来，同时，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也开始了活动。正如美国所预料的，苏联代表在 4 月 30 日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土地改革问题，接着在 5 月 29 日提出了改革方案。这是一项代表农民利益的改革方案，内容是：政府强制收买不在地主的所有土地、自耕农超过三町步（北海道十町步）以上的土地以及 1945 年 9 月 2 日当时的地主出租地和未开垦地，分配给佃农和少地的农民；同年 12 月 1 日以后的一切土地转移，一概不予承认，并将其全部纳入土地改革范围之内；收买价格是，三町步以下按官价（水田每反^①平均不超过四百四十日元）全数照付，三町步至六町步付给半价，六町步以上不给代价，由佃农自付官价的一半；不承认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直接买卖；这一改革限于 1948 年 1 月以前完成。与此对抗，英国于 6 月 20 日也提出了一项方案。它的内容是：不从事耕种的地主的出租土地面积定为一町步；保留土地面积不得超过三町步（北海道地

① 日本面积单位，为“町步”的十分之一。——译者

区为十二町步);佃农购买土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町步;由中央机关掌管强制出让,而由当地的农地委员会负责执行;禁止地主和佃农之间直接买卖;宣布1945年12月以后的土地移转全部无效;这一改革限三年内完成。这一方案由于美国的支持而获得通过,根据这一方案在6月30日发布了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命令。日本政府根据这项命令制订了第二次农地改革法(建立维持自耕农特别法、农地调整改革法),于9月间提交议会审议,而于10月11日获得原案通过并宣告成立。议会和地主阶级曾经那样强烈地反对了第一次农民改革方案,而竟然同意了不得不作出更大让步的第二次方案,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生产管理、粮食斗争),以及以日农为中心开展了广泛的农民运动,用实际行动驳斥了第二次改革方案建立自耕农的方针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感到:“拥有土地并且掌握政权的上层阶级”(拉德任斯基:《地主、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如果不自上而下地抓住改革的领导权,“共产党即将取而代之……那时,地主可能在土地以外还要遭到更多的损失”。(同上书)这种情况,从麦克阿瑟在第二次农地改革法成立时所发表的声明中,也可以知其梗概,他说:“为了建立健全而稳健的民主,不可能再有比这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抵抗过激思想的压力,也不可能再有比这更为可靠的防卫了。”这样,就在排斥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民主力量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农民群众的土改路线,而实行了欺骗性的“农民解放”——“麦克阿瑟土地改革”,而这个改革的内容实质是:美国加强了占领制度在农村中的支柱——地主和富农的地位;日本垄断资本改组了强制征购廉价粮米的机构;地主拒绝无代价没收土地的原则而高价出售土地和保留了租地六十万町步(合全部租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由农地委员会保全了地主的统治地位。表明这一次改革的欺骗性的一个证据是:从好不容易才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的1947年起,地主的回收土地的风气越来越

盛行了。继任的片山内閣又实行了对小麦的强制征购，以及和战时一样的强制摊派稻米耕种面积的办法，即使根据农林省的調查，仅在 1947 年最后四个月期間，地主回收土地的事件就达到一万三

按照經營規模区分的农家数

(单位: 千戶)

	不滿 3 反	3—5 反	5反— 1 町	1 — 1.5 町	1.5— 2 町	2—3 町	3—5 町	5 — 10町	10町 以上	总数
1941年	1,733		1,622	1,461		333	117	49	20	5,335
8月1日 %	32.9		30.0	27.0		6.2	2.2	0.9	0.4	100
1944年	—		—	—		—	—	—	—	—
8月1日	—		—	—		—	—	—	—	—
1946年	2,233		1,785	1,333		211	77	33	12	5,692
4月26日 %	39.2		31.3	23.5		3.7	1.3	0.7	0.2	100
1947年	1,414	1,036	1,834	925	334	210	73	37	11	5,904
8月1日 %	23.9	17.5	31.0	15.7	6.2	3.6	1.3	0.6	0.2	100
1950年	1,471	1,050	1,972	960	378	207	76	33	10	6,176
2月1日 %	23.8	17.0	32.0	16.0	6.1	3.4	1.2	0.6	0.2	100

自耕农及佃农户数

	自耕农及佃农户数(单位: 千户)					按照专业、副业区分的 农家数 (单位: 千户)			
	自耕农	自耕农 兼佃农	佃农兼 自耕农	佃农	其他	专 业	副 业		
		总数	* 第一种	* 第二种					
1944年	1,520	1,114	1,102	1,573	17	2,038	3,468	2,118	1,350
8月 1 日	%27.6	20.1	19.6	28.5	0.3	37.3	62.7	38.3	24.4
1946年	1,655	1,127	1,061	1,637	3	3,056	2,641	1,667	974
4月26日	%29.0	19.8	18.6	28.7	0.1	5.36	46.4	29.3	17.1
1947年	2,153	1,183	996	1,573	1	3,274	2,634	1,684	950
8月 1 日	%33.5	20.0	16.9	26.6	0.0	55.4	44.6	28.5	16.1
1950年	3,821	1,590	410	312	41	3,036	3,090		
2月 1 日	%61.8	25.8	6.7	5.0	0.7	49.9	50.1		

* 第一种以农业为主；第二种以农业为副。

千五百七十起。(《日本农业年报》第二集)暴露这次土地改革的欺骗性的另一个例子是：担任首相的民主党总裁芦田均甚至作了这样的规定，即对不在地主也以“暂时离村”的名义而当作在村的地主，可以免缴土地。这就是说，这次“改革”把反动的社会基础保存下来，以便随时可以复活地主势力。

“教育 改革”

战败后的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贯串着军国主义和封建思想的日本教育是维护国体的最好工具，企图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政府在战败后不久的9月就发布了以“今后的教育将更加致力于维护国体”为基本内容的“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并且考虑仍旧以“教育敕语”(1890年颁发的有关教育的诏书)为依据，或者适应新的时势对旧的教育敕语作某种程度的修改而制定一个新的敕语。他们强调维护天皇制，并主张封建的伦理道德为“道义国家”的基本理念。

美国对于以上这样的日本教育所采取的“民主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用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代替日本教育的极端军国主义性质，并使日本教育在从属化政策中起到一种润滑油的作用。占领军司令部在1945年10月颁布的关于教育民主化的指令和12月发布的两项指令规定：全面取消军事训练；废除军国主义性质的体育；改订教育课程的内容；撤免职业军人、军国主义者和反对占领政策者；停止讲授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和极端国家主义的修身、地理、日本历史等课程；恢复自由主义教育工作者的职务；整肃反动的教育工作者等。此外，1946年年初，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到日本，经过参观考察以后，于5月间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提出了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的重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和教育的分离；为了清除教育制度上中央集权式的

統治而把教育权移交給地方；实施九年制的免費义务教育；等等。但是不言而喻，所有这些指令或指示虽然也体现了排斥极端崇拜天皇和軍国主义的近代化的方向，但是，它們的本质却是使日本教育脱离其历史的社会的基本課題，而起到促进对美从属化的作用，并成为鼓吹反共思想和世界主义思想的工具。因此，从这种殖民地化和从属化的教育政策走上軌道以后的 1946 年 5 月起，日本政府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明显地采取了反动的鎮压方針。

对此，以学生运动和組織教員工会运动等形式掀起了要求根据正确的民主化路綫实行教育改革的自下而上的斗争。战敗后不久随着要求学校民主化的斗争而兴起的学生运动，由于学生生活的貧困化而进一步发展成为猛烈的反对教育殖民地化的斗争。

1945 年 12 月，以全日本教員工会(簡称全教)的成立为开端的教职員的斗争，也出乎美国意料之外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吉田內閣的教育政策，正如文部相田中主张“教育权独立”、“教育对政治的中立性”及其关于“維護教育敕語”的談話所表现的那样，是和上述工会运动完全針鋒相对，因此，教职員的斗争經過 10 月斗争到二·一总罢工时达到了最高潮。在这次斗争中，人們迫切地感到必須把陷于陣綫分裂的教員工組織統一起来，而于 1946 年 6 月成立了教职員的統一組織——日本教职員工会。

在对教員学生的这种民主运动进行鎮压的同时，政府遵照占領軍的指令而实行的“教育改革”越来越暴露和发挥了殖民地教育的本质。1947 年 3 月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从同年 4 月起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因为在預算方面沒有任何准备就实行了这种需要庞大經費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以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至少缺欠二万四千間教室，設施的不完备，教員不足，教員的待遇恶劣，从而使教育完全陷于荒废状态的严重后果。而教育的内容，正如文部省所頒发的“学习指导綱要”(course of stu-

dy)、“教育課程”(curriculum)和“学习指导”(guidance)等美国式教育内容或教育方法所表明,是要把日本教育完全殖民地化。

至于“教育基本法”中所提出的教育改革,还是具有批判旧日的軍国主义教育,并为教育的近代化开辟道路的一面,这是由于内外民主力量施加压力的結果。但是,要想实现“基本法”里所說的“培养尊重人的尊严、爱好真理与和平的思想”的理念,而不致使其成为一紙空文,就不能依靠美国占领軍和日本反动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必須通过教員們自己的斗争来爭取真正的民主改革。

民主力量的壮大

被迫肩負了一切战争的重担,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群众,到了战败以后,又面临了更加严重的饥饿和失业的危机。由于可怕的粮荒和通货膨胀,垄断資本的生产怠工,因大批解雇而造成的数百万人的失业者,使工人阶级面临餓死的危险。而使他們有了进行抵抗的組織和斗争的武器的,是世界民主力量提出的民主自由,特别是自从10月4日获得自由以后得以公开活动的共产党的领导。

1945年10月以后,一贯遭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如决堤一般地掀起了斗争的怒潮,劳资爭議犹如燎原之火不断扩大,工会組織迅速地发展了。针对資本家的生产怠工,工人們采取了管理业务的战术来恢复生产,进入1946年以后,在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斗争更发展成为要求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以摆脱危机的統一行动,这一斗争在1945年5月的政治危机中达到了最高潮。这种革命高潮,比任何其他問題都更加严重地震撼了統治阶级,尤其是它的后台老板美国占领軍。于是,占领軍便采取了公开的干涉、镇压和分裂政策,以致5月以后工人运动不得不暂时后退一步。但是,工人阶级一面对占领軍的干涉、镇压以及社会党、总

同盟的分裂政策进行斗争，一面陆续地完成了产业别工会的组织工作，以属于产业别工会系统的私营企业工会为核心掀起了 10 月斗争；及至以国营企业工会为核心的二百万工人准备发动空前规模的二·一总罢工的时候，这种统一行动已经达到了最高峰。这时，占领军露出本相，撕掉假面具，向日本国内外正式宣布了禁止总罢工的命令。于是，经历了战败后初期的暂时混乱、爆发式的高涨、暂时后退以至于再一次空前高涨等各个阶段的工人运动，重又不得不作“退一步，进两步”的准备了。

战败后劳动群众的生活完全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由于垄断资本实行生产怠工，数百万工人失去职业流浪街头。严重的粮荒和通货膨胀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城市或乡村，都充满着无衣无家的战争受难者和无业可就、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如上所述，由于共产党的重建和组织工会工作的开展，第一次向处在战败后悲惨境地中的人民群众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并使他们有了进行斗争的组织。出狱后立即开始了斗争的共产党，在 1 月 8 日召开全国协议会，发表了行动纲领和党章草案，并于 12 月 1 日召开了第四次（由战前算起）党代表大会，确定了打倒天皇制和实行人民民主革命的方针。共产党根据这一方针曾经前后三次向社会党提出了成立人民战线的建议。这一建议虽然遭到社会党的拒绝，但统一战线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工人群众中间有了广泛的发展。工会组成以后第一个斗争，就是针对资本家的生产怠工，并且为了从荒废与贫困的情况下维护工人的生活而进行的管理业务和管理生产的斗争。工会的要求并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同时还提出了关于追究战争责任和实行企业民主化的要求，这种情况在上述 10 月 23 日开始的《读卖新闻》社职工的斗争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在这次斗争中，当社长正力表示拒绝辞职时，工会立即采取了管理业务这一新的斗争方式。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把握城市工业企业

工会的这种管理生产的办法规定为对抗资本家实行生产怠工的一种斗争方式(在 11 月 7 日举行的革命运动牺牲者追悼会上的演说)。这种被称为管理生产的战术受到了工人阶级广泛的采用,以进行斗争的工会为轴心组织工厂代表会议的组 织方法,促进了组织工会的工作,扩大了斗争的规模。读卖新闻社职工进行的管理业务的斗争又进而发展为成立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广播协会等工会的共同斗争委员会,不仅迫使以上各单位的首脑“自动地”实行辞职,而且这个斗争本身也取得了胜利:京成电车公司工会的免费服务战术(12 月 11 日)的成功,促进了各私营铁路工会的建成和奋起。在这种情况下,于 12 月 21 日成立了模仿华格纳法的工会法,承认了工会的团结权、交涉权以及罢工权,使组织工会的工作有了飞跃的发展。

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生产的荒废、失业的威胁,粮食的缺乏等等恶劣条件的影响,工会的数量在 1945 年 11 月月底尚不到八十一个,而到了 1946 年 1 月月底,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个,工会会员共达九十万人,相当于战前最高人数的两倍。其中,国营铁路工人排除了由上级一手组织的铁道委员会而成立了中央省电(铁道省直营电车)工会新桥管理部工会。另外,递信、农林两省及其他中央机关职工也成立了工会;而从三菱公司的美唄煤矿开始,北海道各煤矿、东芝(东京芝浦电机厂)、关东配电公司和其他许多企业的工会都实行了管理生产斗争。

管理生产的斗争,在政府统制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下进行时,即使工会本身是按企业类别组织起来的,但仍然使工人关心政治问题,尤其因为政府采取了按行业类别进行统制的方式,这就使工人们深深感到有必要按行业类别组织起来。工厂代表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关东地方工会协议会,工会运动一方面朝着按行业类别进行组织的方向向前发展,同时由于粮荒的严重化,使

它的政治性迅速地加强了。2月1日，内务、司法、商工、厚生四相发表联合声明说什么：“对于暴行、威胁和侵犯所有权等事实的不断发生，深感遗憾”，还说什么“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此后，于2月12日虽然又由内务省发表了一项公告说“上述声明是否适用于管理生产问题，暂予保留”，然而，上述声明仍然对促使工会走向打倒政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1946年以后，资本家的生产怠工、通货膨胀和粮荒越发严重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人、农民和市民结成共同战线，已成必然之势了。

到了1946年，组织工会的工作急速地向前发展，到4月底，工会组织数目达到七千三百个，参加工会的人数达到了二百七十九万人。所有产业部门都有了工会组织；而在战术方面，各工会组织普遍采用了对于政府、资本家给予重大打击的管理生产和管理业务的方式。工人的这些斗争和解决粮食问题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和城市居民的共同斗争。由于1月21日揭发板桥兵工厂隐匿物资的事件，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统一行动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东粮食民主协议会，此后在全国各城市陆续成立了粮食管理委员会。

农民的組織工作也迅速地开展起来，2月9日，由二十四万农民組織起来，成立了日本农民协会，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反对强迫征购粮食的斗争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地主预料到将要课征重税和实行土地改革而收回土地的斗争。

工农运动的这种高潮，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于从延安归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1月12日的倡议，共产党重又再三向社会党建议成立民主战线，进行共同斗争，但继续遭到了社会党的拒绝。

但是，工人、农民和市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超越了社会党的

主张而走向了共同斗争。全国范围内的这种革命高潮，震撼了一心一意要保全旧势力的统治阶级的基础。币原内阁不仅于2月1日发表四相声明，硬说工人管理生产和管理业务为违法，而且还反复地玩弄造谣中伤等无耻手段来离间工人、农民和市民的关系；而自由党也提倡建立反共国民战线(2月20日)等等，拚命地试图进行反扑，然而这些尝试都未能阻止人民力量的高涨。人民的民主化斗争远远超过了占领军伪装的“民主化”而胜利前进。日本全国出现了一派革命前夕的景象。4月7日举行的打倒币原内阁人民大会上，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市民和农民的代表赶来参加，他们显示了站立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并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要求。上文已经说过，在从4月举行的选举起到第一次吉田内阁成立为止的这段政治危机中，工人阶级的斗争达到了空前的高潮。

在5月1日——为了庆祝恢复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三百万人以上的组织起来的工人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表现了巨大的威力，粉碎了币原内阁不肯交出政权和社会党右派的背信行为。自由党、协同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四党联合组织的倒阁委员会，也是这种压力所促成的。

根据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粮荒而采取的管理生产的斗争经验，工人、市民进而提出了由人民管理粮食的要求，在12日举行的要求粮食大会以后，东京都内的各地区组织了要求粮食的示威集会，而于5月19日在皇宫前广场举行了要求粮食大会，把这一运动推向了最高潮。“粮食是政治武器”(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英联邦代表鲍尔语)，如果政府放弃了这一武器，政府的统治将被推翻。同时，还有一支游行队伍深入皇宫内部，明确地对天皇制表示了反对。于是，美军总部便第一次公然作为干涉者出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

对于打倒币原内阁的人民大会，美军曾出动坦克队和宪兵来

妨碍示威游行。18日晚間，美国第八軍軍长艾克巴克曾經下令禁止国营鉄路工会所拟定的免費載运参加粮食大会的群众的计划；而麦克阿瑟也发表声明說：目前的形势“对日本将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且也威胁着作为占领政策根本目的的安全”，这种状态如果繼續下去，“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糾正。”占领軍冒充解放軍的假面具被剝掉了。第一次吉田內閣就是以这种压力为背景而成立的。

从十月斗争到二·一总罢工

对于在币原內閣到第一次吉田內閣这段政治危机中出现的工人运动的高潮采取鎮压方針的美国占领軍，以后就愈来愈露骨地暴露了它的本质。吉田內閣以美国占领軍为背景，公然推行了鎮压政策。由于这种压力鼓励了社会党的右派，而使左派发生了动摇。社共两党統一战綫的难以結成已經十分明显。但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却并没有被鎮压所屈服，而是突破了敌人的分裂政策，坚强有力地向前发展了。

政府根据劳动关系調整法限制了国营企业工人和公用事业工人的斗争权，不准提高工資，并且要强制施行在战敗初期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而未能办到的解雇人員。对此，在6月底，有三百七十五万名已經組織起来的工人为了按产业类别調整工会組織以便加强他們的斗争力量，于8月19日成立了全日本产业別工会會議，并且提出了最低工資制和打倒吉田內閣的方針。

在这两种势力的尖銳对立当中，新聞、广播两工会的动向特別受到重視。美軍总部和日本政府唯恐人民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新聞、广播两工会。其中，他們对于前些时候在管理业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以来坚强有力地主持正論的讀卖新聞工会尤为痛恨。恰巧在6月4日，該报在一条关于繳售麦薯奖励

金的消息的末尾指摘：“政府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维护地主利益的”。于是，美軍情报教育局局长紐京特便认为这是把报导和評論混在一起，违反了新聞条例，并假借确立編輯权的名义，勒令該报社开除工会领导人鈴木东民等人。但是这个工会并未屈服，他們在遭受恐怖和分裂破坏之中坚持了长期斗争。产业別工会會議認識到讀卖新聞社工会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以这一斗争为中心，結合国营铁路工会、海員工会反对解雇的斗争和一般产业工会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并且为了打倒吉田內閣，組織了所謂十月攻势。这次斗争的經過如下。

国鉄、海員两工会的内部，在实行反对解雇的罢工問題上发生了对立，国营铁路工会中名古屋以西各单位的代表退出了大会，海員工会主席小泉违反全国代表會議的决定擅自解散了中央斗争委员会，并給全国組織拍发了“暫緩总罢工”的电报。但是被政府的残暴压迫所激怒了的群众，拒絕了干部的这种阻止，海員工会从9月9日开始罢工，尽管最初步調不够一致，但斗争的范围仍然扩大到大型船只的一半以上和机帆船的大部分；而国营铁路工会也从15日起举行了罢工，虽然只限于东部日本各工会組織。政府深恐这一斗争和十月攻势汇合起来，因而撤回了关于解雇的决定，而工会方面也因为上述的内部情况，未能把斗争繼續坚持下去，于是，斗争的中心就轉移到預定由10月5日开始的新聞、广播两工会系統的总罢工方面了。美軍总部为了制止这次罢工，間接地施加了压力，散布了“有关方面的意图”：哪个工会敢于举行政治性罢工，即停止对它的紙張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朝日新聞社工会等組織的成員发生了动摇，并相继放弃了罢工，按照原定計劃于5日投入罢工的，只有广播工会和一部分小报的工会而已。政府看到总罢工已經失敗，就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到广播工会上面，并且不顾全递信从业員工会为反对破坏罢工而斗争的声明，在7日傍晚强行接收

了广播电台。在私营企业的工会方面，以9月1日的东京芝浦工会罢工为开端，印刷、出版、电产、全煤炭和其他钢铁、机器等行业的一部分工会投入了罢工斗争，但由于构成核心力量的新闻、广播工会的罢工已经失败，所以这些工作提出的经济要求一旦被接受，便相继妥协复工，而陷于孤立无援的读卖新闻社和广播协会两工会的斗争也终于失败。但是，电气产业工会利用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质而顽强地把斗争坚持到12月，胜利地争取到了被称为电产式工资制，即打破身分上的差别而按照工龄的工资制和根据生产和生活指数的工资制（虽然这些和根据生活费用水平的最低工资制的要求尚有距离）。

为了说明1946年的工人运动对日本的民主化起了哪些作用，兹根据官方统计，就劳资纠纷中工人提出的要求条件作如下分析。

按要求条件对劳资纠纷的分析（1946年）

条 件	件 数	百分比	条 件	件 数	百分比
		%			%
确认团体交涉权	43		停工津贴	155	
订立劳资合同	282		（小 计）	(338)	12.0
承认工会	17		参加经营管理	178	
（小 计）	(342)	10.6	反对监工	168	
增加工资			参与人事	98	
关于付给临时津贴和			改革机构	63	
其他有关工资的要求	315		撤销工人和职员的身		
（小 计）	(990)	30.6	分差别	31	
缩短劳动时间	203		要求公平分配物资	130	
增加工资照发假日	217		要求改善工厂设施和		
（小 计）	(420)	13.0	福利设施	110	
反对解雇和关闭工厂	233		（小 计）	(778)	24.0
要求发给解雇津贴和			共 他	322	9.8
			共 计	3,240	100.00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工会对于企图继续以往的人身依附式的统

治，甚至八小时工作制尚不肯承认的资本家，是怎样痛恨，怎样进行斗争以及向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了。许多工会，经过斗争的结果，胜利地订立了劳资合同，规定着保证工会的活动自由、特别是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的活动自由，和保证资方不得片面地解雇或调动工人，大大地削弱了对工人的监督压迫；资方只是想在有关工资的要求上面保持以往按身分的工资差额，力图保留最低层的对工人的监督网，以及镇压职工的管理生产斗争，来勉强地阻止事态进一步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也可以说，以后的工会活动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此外，一些臭名昭著的劳资协调论者，都被迫离开了工会的领导地位，工人们根据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了解决当前的困难问题，必须采取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行动。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占领军为了阻止工人们的活动，对于具有政治意义的罢工，极尽谩骂和诬蔑的能事：政府和资本家被迫作了一些让步：撤回解雇的原议，提高工资，允许工会参加企业的经营等等。但是，许多工人对于军事占领的最基本的性质，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业服务的日本共产党，也未能成功地使群众了解这个问题。

和美国占领军及日本政府相反，远东委员会于12月6日发表的有关工会的十六项原则，附带规定工会有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一项，并且明确指出：只有在罢工造成了直接不利于占领目标时，才能予以禁止。这个文件使工人、尤其是工会领导者获得了为打倒内阁而展开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工人们为了摆脱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重税所带来的穷困生活，开始为举行二·一总罢工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1947年2月1日，以中央、地方机关职工为中心有四百万人参加的二·一总罢工，标志着战后日本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意义极为重大。当时，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情况非常恶劣，属于全日本递信(邮电事业)工会的一个年富力强的三十一岁的男职工，月薪只有七百四十一日元。加之政府所公布裁并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方针，越发刺激了国营企业的职工，他们成立了全国官公厅(中央地方机关)工会共同斗争委员会，提出了反对解雇、十六岁职工的最低基本工资定为六百五十日元(大约提高为三倍)和取消所得税的要求。但政府根本未加理睬。国家官公厅工会终于在1月18日作出决定，以2月1日为期实行总罢工。对于吉田政府的暴政——它一方面不顾人民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证，甚至有的地方一连一百四十多天根本就没有供应，另一方面却从人民缴纳的赋税之中拨出数十亿日元的巨款交给大公司——人民、特别是人民的先进队伍工人阶级一致感到无比的愤怒而站起来了。

在私营企业的工人方面，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系统的工会、中立工会和日本工会会议所属工会都相继作出决定，要和官公厅工会采取同一步调。在10月攻势时曾经声明“不采取罢工方式，而作为政府机关或议会的问题来谋求解决”，并一度拒绝了产业别所提出有关合作的建议的劳动总同盟，也终于决定参加这次罢工，成立了全国工会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全斗”)，在28日召开了有三十万群众踊跃参加的打倒内阁突破危机大会，全日本的工人怀着无比的愤怒心情准备举行总罢工。美军总部对于这次运动，也和十月攻势时相同，从幕后伸出了镇压的魔手，但日本工人并未示弱。至31日夜間，美军总部终于以麦克阿瑟元帅的名义发出了禁止罢工的命令。他的长篇声明的要旨是：“接受美国援助的日本，不准举行、总罢工”。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人，即使遭到饿死的命运，只要美国占领军存在一天，就不准‘狂妄地’向政府提出要求或抗议。在占领军当局的强迫之下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停止二·一总罢工的共同斗争委员会主席伊井，曾经声泪俱下地说了如下的结束语：“最

后，我要高呼日本工人、农民万岁。日本工人和农民万岁！我們必須團結起来！”

由于占領軍公然干涉二·一总罢工，使日本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預定从2月1日开始实行罢工的工会，除日本通商運輸公司工人及其他一两个例子以外，都逐一按照对麦克阿瑟声明的扩大解释而被迫停止了罢工。鉴于占領軍的这样态度，政府和資本家又恢复了信心。社会党的水谷长三郎在2月2日該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說：“联合的目标，是建立反共政治战綫，为了防止工农陣綫的左翼化，有必要使其分裂。政府和我党之間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现在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总同盟也与此相配合，对参加“全斗”解散后的統一战綫組織——全国工会聯絡協議会时，曾經一度采取了保留的态度，直到行使否决权的問題获得同意以后，才加入了这个組織。广大工会成員們遭到强权的干涉以后，認識到誰是自己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反动統治者們，从这时起企图集中主要力量来分裂日本工人階級和日本人民。

占領下的文化

波茨坦公告第十条规定中說道：“日本政府必須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尊重必須成立。”以这个规定为招牌而进行的占領統治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改革，也明显地暴露了上述“民主化”政策的本质。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把美国装扮成“自由女神”，以便避免日本民主力量的高潮指向美国的占領制度。占領軍最初的文化政策，是根据波茨坦公告的方向废除日本战时的文化統制。战争期間勾結軍部和情报局窒息了一切文化活动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和大日本言論报国会，未等到美軍开始占領就自行解散，

以备东山再起；而占领军也对文化、思想、教育、宗教各个部门进行了撤销战时统制和清除军国主义的工作。第一步是废除在战争期间使所有报刊一律沦为军事公报的对报刊的统制（《关于言论及新闻报道自由的备忘录》，9月10日；《关于报刊脱离政府控制的备忘录》，9月24日；《关于新闻报道及言论自由追加措施的备忘录》，9月26日）；接着，在10月24日发布了《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实行：释放共产主义者及其他一切政治犯；废除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及其他限制思想、信教、集会、言论自由的一切法令和制度；取消特务警察。美国占领军以这些指令为开场锣鼓，高喊打倒封建制度，侈谈自由、民主，并对各个部门实行了改革，通过这些，在日本人民中间广泛地制造了一种幻想：似乎它就是“解放军”。而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也未能例外。

但是，占领军所给予的自由，只是为了便于它本身实行占领统治而玩弄的手段而已，所以这种自由毕竟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占领军所讲的民主自由也是如此，只要涉及到占领军的问题，就不准进行任何批评（《关于新闻报道的备忘录》，9月10日；《出版条例》，9月19日，《广播条例》，9月22日），广播、出版当然要事先受到检查，甚至所有私人书信也要受到检查。占领军一方面从军事占领的前提出发，经常以违反占领政策为借口施用强力措施来威胁人民的言论，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作为“解放军”的外表而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措施。例如，在出版物的检查方面，它不但完全不许象战前日本所实行的那样，以××符号或留下空白来标志被删除部分，有时甚至还窜改原文，把指摘土地改革的局限性的文章改成承认土地改革的进步性，并强迫作者同意发表。另外，占领军还利用大量宣传的手段，特别是在战争中普及全国的无线电广播作为为占领统治进行宣传的工具，特别对于广播原稿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检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布满了以美军总部情报局为核心的

諜报网，对人民思想的調查进行得非常彻底。这些限制或禁止言論的措施，虽然都是以防止軍国主义复活的名义来进行的，但实际上，則是为了鎮压以共产主义为首的左翼思想。这一点，后来竟表现为把违反出版条例案件交由軍事法庭处理，和美軍情报局偵訊从西伯利亚被遣回者等公开的事实。

但尽管如此，由于战时文化統制的撤銷，在軍国主义下完全处于窒息状态的文化，总算得到了更生。但是，这种从軍国主义下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恢复，与其說是由于內部人民的力量爭得的，毋宁說是“来自外部的解放”和“被給与的自由”。这一点，給新文化的健全发展带来了許多混乱。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的，是一些因反对战争而被关进監獄里，或者被禁止写作、或者在难以形容的鎮压之下不得不忍受屈辱和保持緘默的进步的知識分子。他們在 1945 年年底到 1946 年的通貨膨胀和粮荒之中，以毅然奋起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高潮为背景，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在 1945 年 11 月，首先成立了日本文化人联盟，紧接着在 12 月又以无产阶级文学家为中心組成了新日本文学会，在該会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的筹备号上，宮本百合子发表了一篇文章，題为《响起吧，歌声！》。在这里，她号召說：“刚开始时显得微弱，或者为数不多的这种歌声，必須在不久的将来引出更多的、而且是完全新的社会各角落人們的发自内心的声音，并使这些各式各样的声音經過一番磨练，正确地运用各个音律表达思想感情，而汇集成为新日本的丰富而雄伟的人民大合唱。”这种民主的文化創作的气氛，广泛地扩展到学术界和报刊广播界，从 1945 年年底到 1946 年之間，民主科学工作者协会、日本报刊广播工作者联盟、青年文化会議、妇女民主俱乐部等民主的文化团体相继成立；自从 1944 年 1 月以后被迫停止活动的历史学研究会，也从 1945 年 11 月重新开始活动了。1946 年 2 月，許多这类民主团体

聚攏起来組成了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在新聞界，朝日、每日、讀卖三大报社的职工們提出彻底追究战争責任，并且为了把报社从服务于軍部的战争宣传机关改变成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报导机关，組成了工会，这种趋势也扩展到了中小报社。另外，继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宣告复刊之后，《民报》、《妇女民主新聞》等报也創刊了。同时，出版界也出现了整肃运动。

这些情况并没有局限于文化人之間，而在工农和市民中間，也掀起了文化运动。工人由于工会活动的自由和与专业文化工作者取得联系，組成了許許多多的文化小組，在演剧、音乐、美术、文学、舞蹈、体育各方面开始了活动，并与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結合起来获得了迅速的成長。在业余乐团的活动中，除产生了新的劳动歌《讓我們把全世界結成一个花环！》和作为庆祝五一节时唱的新歌《从城市，从乡村，从工厂》以外，还有业余剧团、业余美术協議会、工会电影協議会等进行了活动。此外，知識分子、学生和教师們一起在全国各地創办了启蒙性的自由大学、农村讲座、公开讲座等等。

这样，建立新文化的运动，結合着人民群众为了日本民主化而进行的斗争向前发展。但是，他們所要实现的文化革命并没有得到光明的、令人乐观的发展，为时不久，便不免碰上了一面巨大的黑色牆壁。

統治階級从决定投降的时候开始，就为了維護其統治体制的核心——天皇制（維護国体）而陸續不断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然而人民群众却不得不在一种茫然自失的状态之下迎接战敗。从1945年年底到1946年年初这一期間，陸續复刊和創刊了許多杂志，在这些杂志上最初出现的作家有，永井荷风、正宗白鳥、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等老作家，这一点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上述新的民主主义文化的代表者們也未能摆脱于一种幻想，即认

为占领军是“解放军”，或者最多也不过认为，只要把占领军所带来的解放再自主地加以推进也就够了。宫本百合子在“解放”后不久写的《播州平野》和《风草》以及德永直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妻呀，安息吧！》，都是用抒情的笔调回忆了战时的抵抗生活和在那个环境中人的成长过程的作品。由此可见，即使这些民主的人民作家也有“把太平洋战争看成是往事和依靠占领军的解放”的那种弱点。

当然，这个时期的启蒙性文化运动，并没有甘心停留在占领军“解放”政策的范围以内。对于曾经拥护战争的人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把占领下的“解放”嘲笑为“恩赐的自由”的情况，启蒙运动的代表者们曾经进行努力，以便把这种“恩赐的自由”变成“争取来的自由”，并且使人民主动地前进。特别是战后对于成为全体国民辩论课题的天皇制问题，学术界和言论界曾以空前自由的精神进行了讨论和批判，并提出了打倒封建制度的主张。但是，这种努力也是不敢从本质上批判占领军所带来的“解放”，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解放，所以，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日本的民主化运动，毕竟不能使这个运动真正地渗透到人民中间，因而没有多久便陷于停滞状态了。

这种启蒙性的文化运动陷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表现了对“解放”的依赖，并且依然保持了自己内部的封建性，以致未能向日本社会中各种半封建的关系——虽然统治体制已经动摇，而这些关系却仍然根深蒂固，并且在占领制度之下，经过改组而进一步加强了——进行冲锋并予以克服。战败后盛极一时的哲学的流行——一个具体例子是人们为了购买《西田几多郎全集》，竟不惜彻夜排队——，以及在思想、文学、历史等领域之中近代主义思潮的抬头，都是由于这种民主力量的幼稚性和对这种幼稚性在群众感情中造成的矛盾进行批评而引起的。哲学及思想上的“主

“主观性論”、“存在主义”，文学上的“近代文学”，历史学上的“大塚史学”等主张：在思想上、人的关系上以及社会关系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近代的自我意識和社会关系。它們攻击日本社会的封建性，特別对于作为它的反映并潜在于民主力量内部的封建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对于民主力量内部的封建性所进行的批判，并没有朝着加强民主力量的斗争力的方向进行；相反，因为指摘了民主力量的斗争力和他們在私生活方面的封建性之間的一些矛盾，結果反而削弱了他們的斗争力量。同时，关于建立近代的自我意識和近代的社会关系的主张，往往流于生搬西欧的近代思潮，而忽略了日本社会的半封建性由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垄断資本主义和为其撑腰的占领势力的出现而被进一步加强了的事实，这就使得民主力量失去了斗争目标，并越发加强了对占领軍“解放”政策的倚靠。1947—1948年間，在全国报刊上风行一时的有关“主观性”的論战，并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告終，这也是上述情况的一种必然結果。这个任务，后来被另一个运动继承过去了，这就是一面对于占领势力及其“民主化”政策进行批判，一面建立民族文化和国民文学的斗争。

第三章 国际局势的紧张化

第一节 冷战的开始

杜魯門主义

1947年11月，日本制定了新宪法，麦克阿瑟元帅对于日本国民“放弃战争”的决心表示了赞赏。恰好就在这个时期，在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使美国的政策不得不由“经济援助”转向了“军事援助”。

从1946年秋到1947年春，欧洲农业歉收所引起的饥饿和通货膨胀，使得美国商品的销售市场有了缩小，加上左派势力的显著进展，企图掌握资本主义世界领导权的美国所采取的乐观的“复兴援助”政策宣告破产了。在美国国内，战后第一次危机已经开始，1946年11月发生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总罢工。这一时期，对于“西欧阵营”来说，确实是战后最大的危机。

1946年7月，参加匈牙利政府的小地主党被驱逐出去；接着，保加利亚在10月，罗马尼亚在12月，波兰在次年1月，相继举行大选。其结果，在东欧，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为核心的民主力量取得了压倒的胜利；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国以外，几乎彻底形成了被称为“卫星国”的体系。于是，“在自由世界中，‘下次谁将遭到牺牲’的忧虑”（杜勒斯语）发生了。这种忧虑逐步变成了事实，这就是：1946年10月意大利建立了社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11月的大选中，法国共产党成了第一大党；次年1月英国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另外，英国由于粮食和英镑的危机已经不得不放弃占领希腊和对于土耳其的援助。面临着被丘吉尔夸耀为“雅典自由的荣誉”的西欧在巴尔干的最后据点——希腊脱离的危险，美国的忧虑达

到了頂点。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魯門在上下两院联席會議上发表演說，要求給予希腊和土耳其以四亿美元的援助。他說：“我們必須率直地承认，利用直接或間接的侵略行动强加于自由世界人民身上的集权主义制度不仅威胁着国际和平，并将进而危及美国的安全。……我們的政策必須是支持自由国家为反抗武装的少数派和外来势力的奴役而进行的斗争。”

这就是有名的杜魯門主义，在这里，虽然慎重地回避了使用“苏联”和共产主义等字样，但其矛头所指向的目标却是非常明显的。果然，在次日——13日苏联《消息报》即对此进行反駁說：在希腊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态的責任”，应归之于反动政府和占領軍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身；指出：“現在已經十分明显，这种政策一定要导向失敗的結局”，然后駁斥說：把責任轉嫁到苏联身上是錯誤的，“集权主义”云云不过是美国用以“干涉內政的口实”而已。

这样，杜魯門主义就等于宣布了“冷战”的开始。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軍事上“扼住地中海的咽喉，控制针对苏联心脏部的战略上的門戶”（李普曼語）。因此，杜魯門主义在美国統治階級內部也引起了认为过火的反对意见，并且有人提出警告說：“对于希腊、土耳其的軍事援助，势将引起对世界其他部分的軍事干涉”（参議員約翰遜），“杜魯門无視了联合国的措施，威胁着联合国机构和世界和平，美国将因此而担負意想不到的責任”（参議員佩珀）。（《国际問題文件》，1947—1948年）

在杜魯門发表演說几天以后，美国政府就发布了旨在从政府机关中清除“共产主义分子”的“忠誠調查令”，同时，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活动也猖獗起来了。这样，在美国国内，也以反共为招牌，迈出了法西斯主义化的第一步。

4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参議員史塔生时，曾对史

塔生提出的关于两种社会制度是否可能共存的問題答复說：“既然在战时可以合作，为什么在平时就不能合作呢？”主要的是“善意”的問題。但是，这番話并未受到美国的理睬。

然而，单靠杜魯門主义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經濟萧条。由4月到5月間，美国国内的物价一直在跌落，于是，以“援助欧洲复兴”的名义用稍微緩和的形式“推行杜魯門主义的馬歇尔計劃”，就成为必要的了。

馬歇尔計劃和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馬歇尔在哈佛大学校友会主办的演說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說向“西欧”提出建議。他在演說中指出：“美国在今后三年至五年之間，必須对欧洲各国給予真正的援助。……然而，在美国实行援助以前，欧洲各国必須就其需要的程度与用途达成協議。欧洲本身应当采取主动”；他又說：“但为了取得政治上和其他性质的利益而企图延长人类的痛苦的政府、政党及其他团体，今后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这段話后一句的用意何在，成了問題。因此，馬歇尔在几天以后接見記者时补充說：“我呼吁的对象是整个欧洲，当然也包括苏联在內”，另外美国国务院当局也出来辯解說：“馬歇尔計劃和杜魯門主义並沒有直接关系。”

对于馬歇尔的这项建議，首先表示极大欢迎的是英国工党内閣。外交大臣貝文在6月中和法国外长皮杜尔会见，根据美国建議草拟了方案，并邀請苏联也来参加。預料可能要拒絕的苏联也表示参加，于是从6月27日起，在巴黎召开了苏英法三国外长會議，就英法方案进行了討論。7月2日，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认为提案內容不明确，并将导致美国干涉欧洲各国的內政而加以拒絕。馬歇尔事后曾誹謗苏联的拒絕是“恶意的歪曲”。7月12日，召开了討論接受馬歇尔計劃問題的欧洲复兴會議。参加这次會議的只有

西欧十六个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拒绝参加，当时还被认为是“东西方的桥梁”的捷克斯洛伐克曾经一度同意参加，但后来又取消了这项同意。

就这样，将苏联和东欧除外的西欧各国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经过7月末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英会谈，于8月间决定将西德也包括在内，于9月间完成了欧洲方面的最后方案。这个方案，又经过美国的修改，受到大大的削减以后，于1948年4月以经济合作法的名义得到通过，并从6月起付诸实行了。

对此，苏联和东欧国家于1947年9月在华沙召开了包括法意两国共产党在内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对策，会议通过了日丹诺夫的报告。该报告指出：“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政治扩张计划中有关欧洲的一部分”，并且号召“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其实现”。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设立情报局。这就是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西欧方面曾大肆宣传说什么“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是“共产国际”的复活，但情报局的特点在于它是以交换情报为主要任务的统一战线的协商机关，而不是从前的以各国共产党为支部的“共产国际”那样中央集权的执行机关。

继情报局成立之后，从1947年年底到1948年春，苏联和东欧各国相互之间缔结了许多友好通商条约，形成了和以马歇尔计划为中心的“西欧集团”相对立的“东欧集团”，及至接受马歇尔计划各国同美国之间缔结了限制东西方贸易的双边协定以后，便更加促进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发展。在世界工联内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首先提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动议，英国职工大会也采取同一步调，于是，围绕着马歇尔计划，在工联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949年1月在洛斯召开的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否决了英国职工大会提出的主张“在共产主义者控制下的世界工联，今

后一年中应停止活动”的动議。但是，对此不滿的美国产联、英国职工大会以及荷兰工会組織的代表当即声明退出世界工联，并从同年6月同美国劳工联合会一起，在反共的口号下，开始組織“国际自由工联”，这就使得世界工联的分裂成为定局了。

馬歇尔計劃于1951年底宣告結束，尔后即为美国“共同安全法”的軍事援助所代替。在这三年半期間，美国一共向西欧各国提供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据說西欧的工业按战前水平計算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七，但是美援的内容特別着重了軍需工业部門，尤以西德的魯尔地区为最大的重点。其結果，欧洲各国的軍費支出空前增大：英国接受了二十七亿美元，而軍費开支为一百一十亿美元；法国接受美援五千亿法郎，而軍費开支为二万亿法郎。另外，在这期間，这些国家的国債也大大增加：英国增至战前(1938)的三点五倍，法国达到十一点三倍，意大利竟达到了二十三倍，各国在經濟上更加依賴美国了。

对于美国經濟來說，馬歇尔計劃也未能达到預期的目的，在这期間，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也銳减了：1947年为一百五十三亿美元，1949年为一百二十亿美元，1950年为一百零三亿美元，再一次发生了危机。朝鮮战争的爆发是和这一时期的情况有关联，对于美国資本主义而言，这场战争等于一付起死回生的妙药。

“西欧”陣营的危机

就在对馬歇尔計劃进行討論期間，西欧的經濟情况也在急遽地恶化。苦于灾荒和美元荒的西欧各国，由于削減进口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粮荒，劳动人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反对馬歇尔計劃的斗争，攻势越来越猛，1947年11月在羅馬爆发的总罢工扩大到了意大利各地，法国政府机关职工举行的罢工从巴黎向南部扩展而达到馬賽，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出现了革命前夕的景象，以致

政府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杜鲁门在 12 月间向国会提出一项咨文,要求国会同意不等马歇尔计划生效,即向法国和意大利实行紧急的经济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948 年 2 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变,被认为是“希特勒侵入布拉格以后最大的一次事件”,使“西欧”大为震惊。后来被杜勒斯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利用残忍方法所取得的可怕的胜利”的这一事件,实际上,既非“由于苏联的压力造成的”,也不是多么“残忍的”。

政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以共产党的哥特瓦尔德为首的联合内阁,在阁员中间有共产党人六人,社会民主党人三人,其他各党成员十五人。政变的原因是:天主教人民党、国家社会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等十二名阁员拒绝在 2 月 20 日的内阁会议上讨论新土地改革法案,并提出辞职,企图借此迫使内阁总辞职。次日 21 日,为了抗议这些阁员的以上行动,总工会宣布将实行总罢工,并在布拉格举行了战后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同时在各地方也组成了“行动委员会”。到 25 日,贝奈斯总统接受了十二阁僚的辞职,同意哥特瓦尔德总理对内阁实行改组。经过这次改组,在阁员中共产党人增加五人,社会党人增加一人,而其他党派也并没有从内阁中完全被清除出去。总之,这次政变是得到群众支持的和平的民主革命。接着,在三个月以后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二百一十四个席位,和其他各党派的四十席相比,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被认为“东西方的桥梁”的捷克明显地和“西欧”分道扬镳了。

失掉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西欧”,接着又注意了 4 月的意大利大选。为了使天主教民主党获得胜利,美英法三国竟于 3 月 20 日片面地发表声明,把的里雅斯特归还意大利。马歇尔也提出警告说,如果在选举中共产党取得胜利,美国即停止经济援助(3 月 15 日)。同时,梵蒂冈也非常积极地出面支援反动势力,结果,天主教

民主党以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八的选票而胜利了。但人民民主战线也获得百分之三十二(八百万票)的选票,成为第二大党,使得总理加斯贝里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仍然是强大的”。

接着,“冷战”的焦点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转移到了德国。在这里,美国采取了首先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这就是从1947年1月起无视了盟国管制委员会,一意推行其建立美英联合占领区即所谓双占区的政策;在8月举行的美英会谈中,决定将鲁尔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中心;9月,根据美英财政协定,美国进而掌握了经营鲁尔的领导权。因此,在11月伦敦四国外长会议中美国和苏联的决裂,毋宁说是美国很久以来所期待的。《纽约先锋论坛报》的下述评论恰恰表明了美国的真意,这就是:“我们已到达了应该到达的地点。雅尔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德国的分裂,我们将随心所欲地把西德拉进西欧国家体系内”(1947年12月12日)

从1948年2月,美英法三国在伦敦举行会谈,把并不是对德管制国的三个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也强行拉来,经过会谈决定:将西德的美英法三个占领区加以合并成立三联占区;对于鲁尔的钢铁和煤炭的分配,实行将苏联除外的国际管理;片面地改革西德的币制等,并于6月3日签订了伦敦协定。

对于西欧的这种一意孤行的片面作法,在3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索克洛夫斯基元帅严正地指责这是“对于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粗暴的破坏”,并退出了会场。6月18日,西欧方面悍然实行西德的币制改革,并决定从21日起,在西柏林使用西德的新币,使得苏联不得已于次日22日封锁了柏林。从这时起一直到1949年5月封锁解除为止,出现了“冷战”的最高潮。

在此以前的5月间,华莱士和斯大林之间曾以公开信的形式

进行了关于“和平的辯論”，斯大林同意通过首脑会談来緩和國際紧张局势；但美国方面表示拒絕，通往和解的道路被堵塞了。美国在这时期又宣传发动“对苏預防性战争”。1948 年年終，陆军部长罗亚尔、空军部长薛明頓、駐苏大使史密斯曾在柏林举行會議，接着，美国众議院軍事委员会委員謝佛就說：“已經到了实行的时候了，如果再等待下去，則将愈来愈不利”；而美国众議院軍事委员会主席萧特在法兰克福接見新聞記者时叫囂說：“要想解除柏林的封鎖，只要派遣裝載原子彈的 B-29 型飞机两个中队，把原子彈投向俄国軍隊的头上使他們清醒过来就可以了。”（伯契特：《冷战在德国》）

美国駐德占領軍司令克萊上将本人，“为了把柏林的封鎖打开一个缺口”也曾要求英法两国派机动部队前往支援，但是他的这个要求最后还是被拒絕了。尽管这样，美国軍人仍然认为在 11 月的总統选举中共和党的杜威将要当选，而期待着“立即开战”。

南斯拉夫問題

由于封鎖柏林問題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将要达到頂点的时候，突然于 6 月 28 日，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了。西欧陣营认为这件事是“苏維埃共产主义最大的失敗”（杜勒斯：《战争与和平》）而欣喜若狂。这件事是铁托对于苏联的“叛变”，这件事的萌芽在很早就发生了。1950 年 3 月，南斯拉夫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和铁托之間来往的书信。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两人的见解就有分歧。斯大林主张“和美英紧密合作”以結成广泛的統一战綫，而铁托則从本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主义立場”出发，主张根据“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是爱国者”的观点实行狹隘的游击战争，并且再三向斯大林要求軍事援助。当时苏联正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高潮，因而通知他說“不幸，现在

无此余力”，于是他便轉向“反苏”，向西欧請求援助，到了战争末期，他还招聘了由丘吉尔派遣的軍事顧問团。自从开辟第二戰場的問題发生以后，丘吉尔就开始重視了巴尔干、特别是南斯拉夫，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以麦克累恩为首的这个顧問团中，包括有伦道夫·丘吉尔(丘吉尔之子)和美軍上校汉密尔顿。可以說从这时期起，南斯拉夫和西欧之間已經建立了秘密联系。另外，在大战中駐在瑞士的由艾伦·杜勒斯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准备战后工作，曾經于 1944 年“援助”匈牙利流亡者的“瑞士小組”归国，并指示它和鉄托的情报局取得联络。(卡东：《鉄托反对欧洲的阴谋》)。其次，在匈牙利对拉伊克的审判中也揭露了：早在西班牙內战时期，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托洛茨基集团之間，及以后它們和西欧的情报机关之間，建立了联系。

总之，在大战末期，莫斯科已經把鉄托当作“对抵抗运动的削弱者”而加以注意。战后，鉄托和莫斯科的对立繼續在暗中发展，至 1948 年 3 月，苏联全部撤回了派往南斯拉夫的軍事顧問团。

在这期間，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共产党之間有过多次的文件往来，这些文件在以后的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會議上都发表了。在这些文件中，苏联指責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拥护富农的布哈林式的偏向”，缺乏“党内民主”，“压制批評”，和“公开地”将苏联“捧到天上”而背地里又散布不信任苏联的“阴险而不誠实”的态度。

1948 年 6 月，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召开會議討論“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問題”。由于南斯拉夫拒絕参加，會議认为这是“自行放弃了主张自己立場的权利”，而于 6 月 28 日把它开除了。

这时，苏联还和南斯拉夫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在三个月以后，苏联向南斯拉夫送去一份备忘录，通告說：根据公审拉伊克的结果，已經揭露了南斯拉夫对于苏联的敌对政策，并废弃苏南友好条

約。在对拉伊克的公审中，暴露了鉄托策划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中心，勾結西欧組織反苏的“巴尔干联盟”的阴谋。

被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开除以后，鉄托暂时保持了沉默。然而，当南斯拉夫被参加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各国完全断絕关系以致陷于孤立以后，它便开始了反苏宣传，向世界宣传苏联“侵略南斯拉夫”的威胁，鼓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人数，到了战后，据说只剩下三千人左右，其中大部分又遭到内务部长兰科維奇的清洗，旧有的党员赫布兰(輕工业部长)和杜約維奇等人因为批評鉄托的政策，被扣上“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派”的帽子而遭到了逮捕。

北大西洋公約

在柏林問題和南斯拉夫問題上进行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宣传，在西欧各国掀起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气氛。不可否认，这种宣传，对于制造美国所希望的欧洲重整軍备的輿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苏联并不存在战争歇斯底里，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由柏林飞往莫斯科的美联社記者吉尔摩的一篇报道中得到証明。他在报道中说：“(我)到了莫斯科。在这里，虽然也同其他国家一样报道着关于‘柏林紧张局势’的消息，然而看不到一点点战争的影子。”(《朝日消息》1948年4月17日)

早在1947年12月由于伦敦外长會議的决裂而使东西方的对立成为定局的时候，英国外务相貝文就在众議院发表的演說中闡明了他的新外交方針，指出了結成西欧联盟，以对抗“苏联的威胁”的必要。这种情况进而发展为1948年3月由英法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共同召开的布魯塞尔五国会議，并締結了西欧共同防御条約(布魯塞尔条約)。杜魯門对于西欧的这种“自主的”集体防御表示欢迎，并且宣称：“对于欧洲的‘自由国家’自主地实行防

御的決心，在我們方面也將報以進行援助的決心。”西歐五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以後，於7月間召開了聯合軍事會議，於10月間召開了西歐聯盟軍事委員會會議，發表了聯合公報，接着在10月末，又在巴黎召開了西歐五國聯盟外長會議。另一方面，美國已於1947年2月締結了美加軍事協定，同年8月，又在里約熱內盧舉行泛美會議，締結了有美洲二十個國家參加的美洲互助條約（里約熱內盧條約），向區域性的集體“安全保障”踏出了第一步。根據杜勒斯的解釋，簽訂上述條約是因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由於否決權的緣故，已經陷於癱瘓狀態”。對於蘇聯所提出的關於這個條約“違反聯合國原則”的指責，他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① 進行狡辯說這是為了行使集體自衛權。

現在，美國已不再以保持以傳統的門羅主義為基礎的美洲內部區域性的集體安全為滿足，而要進一步越過北大西洋向歐洲方面擴大勢力範圍。從這種意義上說，1948年6月美國參議院所通過的“范登堡決議”，可說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文件；而這件事實意味著，美國國會已經同意，美國可以超出門羅主義而向全世界範圍擴張其區域性的保障“集體安全”體系。

這樣，美國就在12月同根據布魯塞爾條約結成聯盟的西歐五國和加拿大舉行了預備會議，至1949年4月4日，就同包括意大利、葡萄牙和挪威在內的十二個國家之間簽訂了北大西洋公約。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和芬蘭兩國沒有參加這個公約。

這個公約在同年7月間，在美國參議院里，不顧華萊士等人的反對，以八十二票對十三票的多數獲得通過。然而，對於這個條約

① 《國際條約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頁。——編者

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向各成员国给予军事援助费用的问题，参众两院之间发生了分歧（众议院主张减半；参议院决定增加到十亿美元）。但由于9月23日杜鲁门宣布“苏联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于是两院的分歧立即消除，一下子通过了给予十三亿美元的援助。

北大西洋公约规定，成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实行“共同防御”；而根据艾奇逊在3月8日的广播中所作的补充说明，“武力攻击”中应包括“共产党的革命”。这就明显地意味着，这一条约的目的就是针对苏联，以及干涉各成员国内部的革命。参议院议员维利并曾公开宣称这一条约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线”。

1948年10月，斯大林在回答真理报记者的问题时指出：“力图掀起新战争的战争贩子，最害怕与苏联达成协议和合作。因为与苏联协议的政策，有损于战争贩子的地位，并使这些先生的侵略政策成为无的放矢。”^① 1949年1月，苏联外交部也指责北大西洋公约是“破坏联合国的基础”，并于3月间向它的各成员国送致备忘录，强调指出：“既然不存在对于（上述条约）成员国的侵略威胁，那么这个条约就不可能是自卫性的”，而是“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侵略性的”条约。1949年1月25日，苏联和东欧各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对抗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采取了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的措施，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莫洛托夫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自1949年8月24日开始生效，9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1950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北大西洋公约武装部队的建议，这一决议在同年1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任命艾森豪威尔

①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编者

元帅为第一任总司令官。就这样，美国利用北大西洋公約，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周围建設軍事基地网，采取了战略上的包围陣势。

在这期間，于 1949 年 5 月，柏林的封鎖解除了，經過一年有半，苏美英法四国重又在巴黎举行了外长會議。然而，这次會議，未能解决德国統一的問題。5 月，西德首先发表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宣言，决定以波恩为首都，9 月，联邦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与此相对抗，10 月，在东德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至此，东西德的分裂遂成定局。在这同时，美国就把重新武装西德，并将其拉进对抗苏联的西欧陣营列入日程表了。对此，法国由于惧怕德国軍国主义的复活曾經表示反对，但在 1950 年 10 月，根据法国总理普利文提出的妥协方案，决定采取了建立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欧軍的方針。

“和平攻勢”

1948 年 11 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引起了全世界的 异常注意。因为一般认为共和党的胜利已无問題，并預料杜威-杜勒斯的新外交政策将加强对苏干涉，从而大大加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10 月間，在选举的前夕，杜魯門曾表示有意派遣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前往莫斯科，以便緩和苏美間的紧张局势，但由于国务卿馬歇尔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然而杜魯門想要消除“美苏危机”的这种恣态，誠如《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周刊在“如果杜魯門为和平而作出显著的成績，无疑地将对他的竞选有所帮助”这段話中所指出的，受到了一般人的欢迎，而成了使“杜魯門再次当选”这种意外結局的一个因素。

1949 年 1 月 30 日，斯大林在回答美国国际新聞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利·史密斯的問題时曾經表示：苏联政府願意和美国达成協議，并就裁減軍备，德国問題等和杜魯門总统举行会談，但

是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于2月2日竟把以上建議說成是“政治謀略”而加以拒絕了。

然而，在斯大林发表这次声明的前后，在欧洲掀起了一連串声势浩大的所謂“和平攻势”。

首先，在1月底，意大利共产党总書記陶里亚蒂在博洛尼亚和羅馬发表声明說：“东西方的对立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法国共产党的元老加香也在羅馬发表了同样的談話。2月，法国共产党总書記多列士指出：“苏联不会侵略別的国家”，并宣称：“法国人民决不¹与苏联作战”。接着，陶里亚蒂也宣称：“意大利人民将把苏联軍隊当作解放軍而予以支持”；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皮克也声明說：“站在苏联一边的人，都是反对战争，并为和平而斗争的。”与此相呼应，各国共产党也都分別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接着，从3月到4月之間，欧洲各地反对北大西洋公約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而在美国国内，也从3月25日起开始，由世界各国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二千人汇集到紐約，召开了“保卫世界和平文化科学會議”，并在麦迪逊广场举行了有一万八千群众参加的示威大会；另外，华萊士领导的进步党也倡議开展反对北大西洋公約的运动。

法国和意大利的反对战争运动展开得最为热烈。尤其在法国，在“达尼埃耳·加桑諾瓦的国家决不²和卓婭·科斯莫捷米揚斯卡婭的国家作战”的口号下，掀起了由法国总工会领导的反战罢工和“和平与自由战士”运动，以后还不断发展，8月間，举行了“反对布萊德雷（美国参謀长联席會議主席——譯者注）的示威游行”，至11月間，竟然发生了阿尔及尔港和馬賽港的碼頭工人拒絕装卸軍火的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召开大会的呼吁书是在2月15日，以代表十七个国家文化界的“文

化人士保卫和平国际联络委员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共同发出的。发起人有：法国的约里奥·居里、阿拉贡、毕加索、韦科尔等；美国的黑沃德·法斯特、艾伯特·卡恩；德国的安娜·西格斯；以及苏联的萧洛霍夫、法捷耶夫等人。呼吁书指出“对国际和平的威胁日益增大”，并要求“各国人民为保卫和平而采取统一行动”。从4月20日至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的这次大会，有世界四十七个国家的二千零六名代表赶来参加，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七百一十九人，工人六百六十四人，实业家四十九人，农民三十七人。

由于北大西洋公约而激起的和平攻势这种波澜壮阔的展开，完全是战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

解放军胜利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中国内战，从1947年夏季起发生了巨大的进展。1947年7月，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解放军，突然由以往的战略防御转入攻势，渡过黄河，转瞬之间攻陷了开封、济南、烟台、临邑等重要城市，1949年4月，象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强大的解放大军，终于到达了长江北岸。

、蒋介石二十年来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统治，在中国人民的怒吼之下，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经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和充满了艰苦的长期斗争以后，中国人民所寻求的解放的道路，已经出现在眼前了。解救人民苦难的道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采取何种方法——就是实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对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来说，就是实行土地改革。

在內战时期偶尔到中国訪問的一个澳大利亚新聞記者曾經作了如下的报道：“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問过中国的青年人为什么参加了中共軍，他們的回答是：首先因为，如果政府軍来了，他們就会把中共軍好不容易給了我們的土地又还给地主。”（迈克尔·凱恩：《赤色中国的现状》）就这样，农民源源不絕地投向了中共方面。农民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深奥理論；馬克思的《資本論》里讲些什么，对于他們來說并不成为問題。对于农民，只有土地問題才是有关死活的問題。中共軍来了就分給土地，国民党来了土地就被夺回，还给原来的地主，这就是农民的头等重要問題。因此，他們把中共軍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把国民党軍的胜利当成地主的胜利。这条简单的、然而根本的道理，正是导致中共的胜利，国民党軍慘敗的最大原因。这条道理，不仅成了中共軍維持后方秩序的力量，同时也是促使农民出身的国民党軍士兵发生动摇和走向“叛变”的原因。

然而，土地改革，这只有真正站在农民立場上的政权才可能实行，国民党是絕對做不到的。因为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正是地主階級，正是封建的土地关系。以往，地主階級从农民身上剝削了甚至包括一部分必要劳动在內的地租，他們把这种剝削所得，不是用在发展生产上，而是用在奢侈享受、放高利貸和各种投机活动上。由于这种寄生的消耗长期持續的結果，才招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农业技术陷于停滯状态，并造成了农村的人口过剩。毛澤东在其《論联合政府》一文中曾就这一点作了如下的闡述：“……把土地从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轉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①

① 《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1075頁。——編者

中共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是极其慎重的。每当解放一个地方，首先是用全部力量保证其军事上的稳定，其次是建立党的领导权，对群众进行教育来提高其政治觉悟，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考虑土地改革的问题。并且，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还要精确地划分阶级成分，注意不使敌我界线混淆，对于可以不当作敌人的人，坚决不当作敌人。中共还把地主制度和地主个人加以明确的区别，对于地主，也给以和农民同样多的土地，并通过人的改造，努力使他们这部分生产力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但是，坚持不肯放弃封建剥削的恶霸地主，却到处利用流氓施展恐怖手段，利用女色诱惑革命干部，策划种种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然而所有这些，在觉醒了的农民面前，都完全失败了。

和解放区的这种健全发展比起来，国民党统治区则是一个混乱和没落的世界。美国物资的大量倾销和四大家族的投机倒把，造成了农业的雕弊，运输的混乱和通货膨胀。国民党地区的中小资本家，因竞争不过国内外的垄断资本而纷纷破产，南京、天津、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停工现象。因此，失业人数与日俱增，各阶层人民都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国民党地区，除四大家族以外，一般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不仅在工人、农民中间，而在中小资本家和学生中间，也滋长了不满情绪。他们梦想的“第三条道路”已经幻灭，各民主组织之间出现了统一的趋向，他们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而逐渐团结起来了。已经发生动摇的反动派，解散了一向被认为中立的“中国民主同盟”。另一方面，在1948年元旦，由国民党内部的正义派和中小资本家所组成的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成员，聚集到香港，共同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为中央委员，并发表了联合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宣言。同时，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也于1月5日在香港召开民主同盟三中全会。

会,通过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蒋介石集团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决议。此外,由蒋介石统治下的民族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所组成的民主建国会,也积极地起来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官僚垄断了。

在蒋介石集团越来越陷于孤立的同时,民主爱国力量以中共为中心团结起来了。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在迎接国际劳动节的口号里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这个倡议,受到了各地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拥护,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建立统一战线迈出了坚强有力的一步。

反动派的挣扎

军事上的失利使蒋介石集团越发狂暴起来,他们对外则接受美国直接间接的援助,对内则于1947年7月发布“总动员法”,企图继续进行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然而,这只是统治者的垂死挣扎而已。在“总动员法”实施以后,各地工人、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愈来愈熾烈了。对此,曾经暗杀了闻一多、李公朴的刽子手们,向继续进行和平请愿的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和正在举行罢工的申新纱厂的工人,用刺刀和棍棒肆行残杀和镇压。当时,国民党内的一个特务头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竟向各大学学生宿舍里派遣特务,监视学生,和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逮捕、下狱和迫害学生。

华北学院的一个学生,曾向《中国评论周报》写信揭露这种情况,他写道:“特务学生,衣兜里携带着手枪,钻进同学宿舍里进行搜查。如果不恭维他们,或者被他们所怀恨,任何人都可能遭受逮捕。我们为了讨论技术问题而召开的集会,也要受到特务学生的严密监视。只要说出一句类似批评的话来,就要被告密,他的名字

就要被列入黑名单。”(杰克·貝耳登:《中国震撼世界》)国民党的暴行,也沒有放过远离內战前綫的昆明市。1948年7月15日,国民党派出二千多名警察、宪兵闖进云南大学,用机关枪、刺刀和水龙头杀害了五个学生,逮捕了一千数百名学生并施行了拷問。

另一方面,买办性的官僚垄断統治,带来了所謂“国有化”和惊人的通貨膨胀。例如,在1948年8月币制改革当时,工人的工資是三、四十元金元券,大米一担的价格是十七元金元券;到了1949年1月,工資上升为二、三百元金元券,而物价則暴涨了百倍以上。在蔣介石統治之下,人民連飯都吃不上。因此,工人和学生們掀起了罢工罢課和示威游行。蔣介石統治区內部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抵抗,越来越有利于解放軍的进攻。

解放軍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軍的兵力不断增强,他們利用从敌人手里繳获的美制武器装备了自己。这时候,人民解放軍各个部队已經发展成为大兵团,在进攻敌人的主要障地时,他們使用了由敌人那里夺来的大批重武器,粉碎了蔣介石的地区防御体系。

从1948年9月1日到1949年1月这段期間,人民解放軍在东北的辽西和沈阳地区、华东的徐州和蚌埠地区、华北的北平和天津地区进行了三次大会战。这几次会战是人民解放軍和蔣介石軍隊主力之間的决定性战斗。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軍被歼灭了一百五十四万以上,使蔣介石丧失了主力部队。

軍事上的失利,使国民党反动集团和美国侵略者陷于周章狼狽。1948年12月,蔣介石根据美国的指示,下决心要进行爭取喘息時間的和平談判。次年元旦,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和平文告”。这次文告,誠如美国人貝耳登所指出,是“近代战争中的一个最奇妙的記錄。总之,这是一种为了爭取時間而事前計劃好的、既非和

平又非战争的方式。”

针对这个文告，人民革命方面于同年1月1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揭穿了蒋介石建议的虚伪，指出其为继续战争的手段，并向蒋介石集团提示了投降条件。内容只有八项，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法统；三，废除伪宪法；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实行土地改革；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是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蒋介石集团的条件。蒋介石撤回了旨在争取喘息时间的“和平谈判”的阴谋，竭尽全力加强长江南岸的最后防御体系。毛泽东命令解放军作好准备，以便渡过长江，解放华南地区。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在西起九江东迄江阴的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登陆作战。长江江面异常广阔，江水也深，可使航行海洋的军舰和轮船通行无阻。人民解放军只有木船、木帆船和木排；而蒋介石则拥有海军和空军。从表面上看来，蒋军方面占优势，甚至有人估计长江将变为人民解放军付出重大牺牲的场所。然而，这种估计完全落空了。在革命的高潮面前，长江天险也算不了一回事。渡江迅速成功，人民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在渡江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天平均占领三座城市，不出四天，人民解放军就在陈毅和刘伯承的指挥下，解放了南京。

南京的解放，在政治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上的意义。1929年，蒋介石在这里建都，同时还在这里建立了司令部来对付当时孤立于南方组织农民游击战的共产党。如今，就在同一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扩大到了三百万人，他们攻下了蒋军的首都南京，在这里竖起了红旗。南京解放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敲响了丧钟，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解放軍由南京繼續向前推進，又解放了西歐帝國主義多少年來的根據地上海。這時候，英國海軍的“紫石英”號和“伙伴”號兩艘侵入長江向解放軍挑釁。人民解放軍用美制大炮進行轰擊，給予它們很大損失，將其打退了。百年以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憤怒隨著炮彈一起爆炸了。在三十年前，傲慢的英國海軍，只要出現在長江上，就足以鎮壓中國人的抵抗；在二十年前，如果發生類似事件，所有的外國軍艦都要集結到長江上，要求中國人鄭重地賠償道歉，借以加強它們統治中國的地位。然而，1949年既不同於三十年以前，也不同於二十年以前，它是中國歷史發生了決定性變革的年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了。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時代。

中國革命的意義

1950年4月到5月之間，人民解放軍渡過海洋，解放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至此，除台灣以外，中國本土已經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一方面使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同時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外關係。

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之後，又發生了給予國民黨以巨大軍事援助的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失敗和表現在炮擊“紫石英”號軍艦事件上的英國帝國主義的失敗，這些事件意味著中國革命對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勝利。關於炮擊“紫石英”號軍艦的問題，美國報紙也不得不承認說：“這一天，將作為這樣的一個日子寫在歷史上，即：中國共產軍的炮手們學會了使用美國裝備的方法，蠻橫地但是乾淨利落地把英帝國的海軍擊潰了。中國的已經破了產的舊政權終於

暴露了它自己的无能为力；把自己政策的基础建立在这个政权继续存在的希望上面的西欧国家，被迫承认并不能挽救这个政权，而由另外一个新的力量来统治千百万中国人民。这确实是一个证据，说明旧有的秩序已经完蛋了。中国的富有阶级、英国帝国主义以及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都未能为中国人开辟一条解决错综复杂的时代问题的道路。”（《纽约先驱论坛报》）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营发生破裂，统一的世界市场完全瓦解了。解放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国革命，对于尚在苦难中的亚洲各殖民地、附属国的十亿人民，给予了极大的鼓舞。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怒潮，这些民族开始走上了争取解放的道路。这种情况说明，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并且使得全世界的和平力量更加强大起来了。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的胜利，鼓舞了欧洲和亚洲的全体人民，加强了各国之间的争取和平的共同愿望，和以中国为和平堡垒团结起来的信心。

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48 年中期，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大致已成定局时期为止，美国是以中国为其远东政策的重点。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远东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估计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战后，中国将成为远东坚强的领导力量，并且，它将在一个和美国友好的政府（一旦在这个地区发生纠纷，它将站在美国一边，采取共同行动）之下获得统一和安定。”（维纳克：《美国与远东，1945—51 年》）因此，在这一时期，日本不论其对美国是否友好，在美国看来，它是曾经向华尔街挑起战争的危险的敌人，首先应该受到“削弱”（副国务卿艾奇逊 9 月 19 日的

声明，維納克著同上书第 77 頁），在远东方面，它只被賦与了消极的任务。美国在国务院内部格魯等“亲日派”下台和卡特·文森特等“亲华派”上台的情况下，大吹大擂地宣传了它的“反殖民主义”和“民主主义。”

然而，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础被彻底地推翻了。1948 年 11 月 6 日，南京的美国大使館作为在华美軍首脑部一致的意见，向华盛顿拍了一封电报說：如果不是实际出动美国軍隊，那么不論是給予国民党以多少軍事援助，也无法挽救当时的局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894 頁）而麦克阿瑟也在其《美国对华战略結果》的报告中，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它的亚洲政策。于是，日本就代替中国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并作为“对抗俄国影响的平衡力量”而受到了重視。同时，作为日本的补充力量，南朝鮮也在李承晚的买办統治之下获得了“独立”。

当中国已經明显地摆脱了华尔街的魔掌以后，美国政府于 1949 年夏季发表了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把責任推到蔣介石身上，并且和在野的共和党一部分成員就对华問題展开了論战。但是，对于亚洲地区，华尔街的眼睛紧紧地注視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已經进入了武装斗争的阶段（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个时期，美国的亚洲政策的重点是，决不重复在中国大陆的失敗；无论如何必須制止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民族革命运动的进展；另一方面，还要扶植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和“亚洲的堡垒”。1949 年夏为了对东南亚的形势进行綜合調查，美国任命了以菲利普·杰塞普为首的特別委员会；1949 年 10 月在国务院主持之下召开了对亚洲政策全面检查的秘密會議；1949 年 11 月和 1950 年 2 月在杰塞普的主持下在曼谷召开了美国駐远东各国使节會議等等，所有这些，都主要討論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美国远东政策——如何制止东南亚的民族革命，如何在亚

洲实现“封鎖”政策。在 1949 年 6 月，美国又大吹大擂地发表了馬歇尔計劃的亚洲版——“第四点計劃”(援助落后地区計劃)。根据以上的检查，美国在对亚洲政策上作了一些后退(勿宁說，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縮短战綫)。这表现在艾奇逊于 1950 年 1 月 11 日在国家出版俱乐部、3 月 10 日在旧金山两次发表的有关新的亚洲政策的声明(艾奇逊路綫)，和 1950 年 1 月 5 日发表的不干預台湾問題的声明上面。然而，由于根据美軍首脑部在东京召开的會議和弗萊斯特尔、杜勒斯等“采花外交官”(馬立克在 1950 年 8 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會議上的发言中对他們这样称呼)的命令发动了朝鮮战争，这些后退化归烏有了。处于垂死掙扎状态的蔣介石政权和李承晚政权暂时获得了挽救。华尔街要把 1948 年末在欧洲的柏林遭到失敗的“冷战”变为“热战”的企图，终于在亚洲实现了。

第四章 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第一节 “中間政权”的任务

片山内閣的成立

麦克阿瑟发布了禁止二·一总罢工的命令以后，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举行大选的命令。依照这道命令，在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月，日本根据新宪法举行了地方选举和参議院、众議院的选举。3月25日，美軍总部就选举問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美国曾經对于納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东京的日本主义进行过斗争。同样，它还要在世界各个角落同反民主的、純政治的、并且进行残酷侵略的共产主义进行斗争。这一点对于现在的日本具有严重的意义。在这次选举中必須辨明这种是非善恶。”（见3月26日的各报）

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关于正在日本訪問的世界工联代表路易·賽揚及其他一切国际上的真实情况，都不让日本人民知道；每天强迫日本人民看的，只有杜魯門宣言和反苏反共的消息而已。吉田内閣在镇压了日本通运公司十万职工的斗争和日本制鉄公司八幡厂职工、京都島津制作所等企业职工的罢工以后，又在国会解散之前，强行通过了对保守势力有利的經過恶劣修改的以中等选区单一記名制为内容的选举法。（3月30日）在竞选期間，自由党的院外組織新銳大众党分子袭击了产业別工会會議主席听涛克己；新宿地区的暴力团头目尾津喜之助竟被自由党提名为候选人；在枋木县，共产党候选人松本三益遭到毆打；在銚子和山形两地，工会和民主战綫的候选人遭到了暴力团的袭击，而所有这些，实际上

都受到了当局的纵容。并且,在二·一罢工以后,社会党和劳动总同盟公然提出了反产别、反共的方针,总同盟的领导人竟宣称:“总同盟从一开始就是遵照美军总部的指示进行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相继出现了“第二工会”和农民战线的分裂。

选举的结果,各党派所获得的席位是:社会党一百四十三席;自由党一百三十一席;民主党一百二十四席;国民协同党三十一席;共产党四席。“社会主义政党”头一次在日本国会中成了第一大党。然而,麦克阿瑟却满意地说:“日本人民断然排斥了共产主义的领导而以压倒多数选择了中庸之道……”。麦克阿瑟是讨厌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为什么对社会党表示赞赏呢?

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在选举的第二天曾经宣称社会党“要坚持同保守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通过议会进行革命”。(《朝日新闻》4月26日)然而,不出数日,他不仅不去斗争,反而和“保守反动势力”谈判组织联合政府了。社会党从5月6日起同自由党、民主党、国协党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于5月12日签订了四党政策协定。令人惊奇的是,这项协定里不仅社会党的竞选纲领一项也没有包括在内,而且还包括了“不采取足以引起社会不安的危险行动”这样一条。此外,社会党左派的铃木茂三郎和加藤勘十等人还在5月14日发表谈话说,“要和共产党划清界线”;“以往表现了和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是为了使工会离开共产党。”5月23日,在麦克阿瑟的祝贺和称赞中,片山内阁宣告成立了。

在日本首次成立的社会党内阁实际上作了些什么呢?片山内阁的第一项措施“新物价体系”,是对煤炭、铁、硫酸等垄断企业的商品,由政府付给价格差额补助金,从而提高消费价格(相当于战前的二百倍),使资本家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却把劳动人民的基本工资降低到一千八百日元(相当于战前的二十七倍),强迫人民过“勒紧裤带生活”。此外,在“重点生产”的名义下,通过补助金、复

兴拨款、优先分配物资等方式，把来自人民的税收集集中地拨给了垄断资本。（参看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合著：《危机下日本资本主义的构成》）因此，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石川一郎称赞说“这确实是很好的对策”（《日本经济新闻》6月24日）；而自由党也居然“对政府的态度表示敬意”，这些都是十分自然的。（参看《朝日新闻》6月12日）

黑市价格每月平均上涨百分之二十，官价也随着不断提高；然而，工资却被固定下来了。主食的配售情况不是延迟，就是短缺。7月20日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平均主食的配售延迟二十天，北海道是九十天，所谓主食包括大豆粉和玉米，而且总是延迟。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鸟儿也活不下去。政府还把黑市米和配售的延迟、短缺的责任转嫁到农民身上，在吉普车的支援下，对农民实行了“强制征购”。1947年度的国家预算增加到了前一年的两倍，其中半数以上用于献给美军的“终战处理费”和拨给资本家的补助金。为此，税收增加到了前一年的四点五倍，农民和中小企业者申报所得税的纳税人数创造了战后的最高记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捐税灾害”。

片山内阁的垮台和芦田内阁

在以劳动科长纪廉为代表的美军总部和片山内阁的强力压制之下，一度进入低潮的工人运动，以中央地方机关工会的斗争为开端，经过7月6日的激励社会党国民大会、7月的五印刷厂罢工、全日本递信从业员工会、全日本中央机关工会的工作半日斗争，以及10月到11月间的全日本中央机关工会、保土谷化学公司和日本矿业公司等企业的工人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又逐渐走向了高潮。全递信、全财务工会系统的“山猫斗争”（各别工会组织不根据上级工会的指令自动发起的罢工或地区性的联合斗争——译者），全农林系统的“请假战术”也在各个地区发生了。民同（“民主化同盟”）

的成立，就是为了分裂和破坏这些斗争。

在 10 月攻势前后，国铁的斋藤、星加，全国煤炭工会协议会的武藤等人，首先在其各自的工会内部组成了所谓“民主化同盟”。他们在各该工会组织的大会上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自己一派的主张不能通过，即强行退场制造分裂，从而有效地削弱了进攻的浪潮。同时，在产别系统各工会里也出现了退出产别的活动，引起了工会内部纠纷。因为这种分裂活动的结果，从 10 月到 12 月之间，虽有累计人数六百七十万人次参加了斗争，超过了二·一罢工的规模，然而，在同年内并没有能够形成决定性的斗争。片山内阁就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要于 1948 年 1 月提高运费，恶劣地修改劳动法规和解雇二万三千名职工。工人反对这些措施的斗争，克服了内部分裂的不利条件重又高涨起来，他们同向“捐税灾害”作斗争的市民和反对把学费提高三倍的学生联合起来，把斗争扩大到全国范围。在工人的这种斗争浪潮的推动下，社会党的基层党员普遍对政府的措施表示不满，这就造成了社会党的危机。从 1948 年 1 月 16 日起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上，通过了废除四党协定的决议，至 2 月 10 日，片山内阁宣告垮台了。充当了统治阶级的走狗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第一个机会就遭到了悲惨的失败。这件事表明，统治阶级政治危机已经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怎样来挽救这次危机呢？各执政党派企图实行所谓轮流执政，进行了以民主党为中心组织同社会党的联合内阁的工作，同时战胜了由自由党和民主党脱党派（币原等人）组织联合政权的策谋，以民主党总裁芦田均为总理，以社会党的西尾末广为副总理，并包括国民协同党的成员，于 1948 年 3 月 10 日成立了联合内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加藤勘十、野沟胜等社会党左派人物也参加了内阁。另一方面，对劳动战线的分裂工作也加强了，继国营铁路工会内出现了“民同”派之后，于 1948 年 1、2 月间，细谷松太等人又

在产別內建立了“民同”派，以便把 3 月間斗争的高潮压下去。

民同的特点是剥夺工人的战斗力。上述国营铁路工会內的民同派所提出的基本方針內，完全不提如何展开斗争的問題，只是強調“排斥共产党，防止以共产党员充当工会的干部”。他們在宣言中說什么，使大会不欢而散的“这一英明措施，成功地防止了国家的危机，完全粉碎了共产党的阴谋。然而，对于共产党的斗争并没有完結，现在，只是开始而已。”反共联盟还伪造了一份据說是二·一罢工时共产党的指令，并把它說成是“共产党阴谋”的証据而大肆宣传（参看劳动省：《資料工人运动史》，1948 年版）。芦田內閣和片山社会党內閣完全一样，在上台的同时即发表了一篇反共反人民的声明。1948 年 1 月，片山曾經发表談話說：“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武器”（1 月 1 日各报）。在这之前，民主党总裁芦田也曾极口称赞片山內閣說：“不管怎样，片山內閣总算是把工人的攻势制止在这种程度上，这是他的功劳。”这就等于不打自招了，他的內閣也将要同样地压制工人运动。

“远东的兵工厂”化

美国从 1947 年下半年起根据馬歇尔計劃实行的对外援助虽然是以欧洲为中心，但是，对它說来，已經有必要对于迅速发展的亚洲民族运动进行镇压了。同时，再加上对日“媾和”問題陷于僵局，于是，美国就放弃了破坏日本軍需工业的方針，而明目张胆地采取了扶植日本“自立”，使其充当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經濟基地的政策。1948 年初，美国陆軍部长罗亚尔曾經說道：“当初使日本在广闊范围上非軍事化的方針，和把日本建設成为自立国家的新方針之間发生了矛盾。”因此，新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我們不仅要使日本能够自立，还必须把它培养成为坚强而安定的民主主义国家，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可

能发生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1948年1月6日在旧金山国家俱乐部的演说)美国就这样有意识地开始采取了把日本扶植成为“远东的兵工厂”的政策。

芦田内阁在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说要吸收外资以谋求经济稳定。新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栗栖赳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吸收外资的前提，必须完成调整企业工作和劳资协调。”(3月10日各报)所谓经济稳定是指停止通货膨胀而言，政府对于1948年年初以来货币流通额的减少自鸣得意，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是由于上年年终急剧掀起的征税风暴，即每月强征捐税三百亿日元(1947年度半年为四百亿日元)硬将货币回笼的结果；是由于重税和贫困降低了人民购买力的结果。芦田内阁就是企图用重税、解雇、使人民贫困等办法为吸收外资创造条件。这个内阁得到了“野鸡内阁”的绰号，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陆军次长德莱柏访问日本时，芦田首相曾恳求美国给予十亿美元的贷款，并为了满足德莱柏所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增产重要物资，恢复对外贸易和实现预算平衡”(3月24日美军总部特别公报)，日本的“修正资本主义”付出了全部力量。

第一，民主党内阁把片山内阁所实行的“重点生产”加以粉饰称之为“集中生产”，并在“集中生产”的名义下，把1948年度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五作为价格调整金装进了钢铁业的荷包。此外，钢铁业还以远远低于一般产业的官价接受了进口原料和煤炭的配售。政府通过这种办法所给予钢铁业的利益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集中到五大企业的手里。(井上、宇佐美所著同上书)。第二，关于发展对外贸易，美军总部和政府共同创造一切条件，以便于输出由于低工资而可能售价低廉的日本商品，并大量输入必须用高价购买的美国商品(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并且，把纳税人缴的税款作为进口价格差额补助金付给高价外国商品的购买者。而在出

口方面，則牺牲了人民的消費而大搞其飢餓輸出。北村大藏相认为低工資是发展对外貿易的基础，他說：“尽管这样，日本生产的东西还是成本低廉，因为人事費总是便宜的。”（《东洋經濟新报》4月3日）最后，这个政府在“平衡預算”的名义下，把賦稅增加到前一年的将近二倍，新設一項与广大群众有关的交易稅，把鐵路運費提高三倍半，郵費提高四倍，学生的學費提高到三倍半，总之，这个政府的方針是，从人民身上可能搜刮到的錢統統予以搜刮。但是另一方面，它却以加速資本积累为理由大幅度地減低了向垄断資本征收的法人稅。此外，还由于价格調整費、占領費、复兴費、交付公債^①、預算中的价格补助等特別补助費等的开支和发行，通貨膨脹越来越厉害了。政府一方面用通貨膨脹来搜刮人民，另一方面又用征稅和对中小企业的延期付款的办法来阻止通貨膨脹，这种双重的搜刮政策就是“平衡預算”的实质。就这样，日本的垄断資本迅速地进行了重新編組，1948年4月成立了日本經營者团体联盟（日經联）。重稅、通貨膨脹和低工資，使1947年秋季經過斗争使生活得到某些改善的工人階級重又陷入了更加穷苦的境地。即使根据官方的統計，工人的家庭經濟到1948年4月为止发生了百分之七至八的赤字，伙食費占去家庭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日本劳动年鉴》第23集）。失业人口，即使根据經濟安定本部的估計数字也超过了四百万人（1948年5月，經濟复兴計劃第一次草案）。

这个政府不仅对农民强制实行“扫数征购”，同时，还采取了推迟对农村的主食供应的办法来对城市实行包括豆餅、食糖等在內的主食的足量供应，其結果，山梨县的主食配售延迟了五十天，而秋田县竟延迟了六十六天。地主的攻进加强了，到处发生收回土地的现象。这样，农民只好放弃耕种了。根据农林省的調查，同年

① 一种变相的强迫性国債，政府作为履行債務的一种手段而付給的公債。——編者

夏季有三万以上的农户放弃了二万五千余町步的水田和旱田。(《日本农业年报》第2、3集)。

没有象工人和农民那样进行斗争的中小企业主受到了更大的压迫。集中生产、平衡预算和贸易第一的方针，给中小企业造成了资金、器材分配额的减少，重税和政府付款的迟延，这就招致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助长了垄断资本统治的复活。这样，当芦田内阁暴露了它的全部政策都是在破坏人民生活 and 破坏民族产业以后，首先由工人阶级起来向它斗争了。

第二百零一号政令

由于产别(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民主化同盟的出现而引起的混乱，使整个产别的斗争力量削弱了；但是全递信工会、全财务工会则按照预定计划于1948年3月掀起了包括坚强有力的罢工运动在内的三月斗争。占领军的幕后干涉毫无效果，全递信工会在各地举行的地区性罢工逐渐统一起来，尽管占领军总司令部于29日发表了禁止全国性罢工的声明和劳动相(社会党加藤勘十)发表了关于麦克阿瑟发布的二·一禁令同样适用于地区性罢工的谈话，但在30、31两日里，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地区性罢工。4月1日地区性罢工停止以后，个别的罢工仍未停止，仅仅从3月25日算起，参加罢工的累计人数就有九十五万人次。

三月斗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尽管占领军进行了镇压，但参加斗争的工会会员始终斗志昂扬，进攻和退却都进行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分裂活动虽然使得全递信工会陷于孤军奋斗，阻止了三月斗争的扩大；然而，在国营铁路工会方面，关东以北地区的工人群众对于不参加斗争的干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由煤矿工会协议会分裂出去的煤矿工会内部也在有关工资的要求上产生了群众的不满，而把各企业单位的“民主化”同盟派纠合起来成立的民主化

聯絡會議也未能順利地擴大勢力。于是，占領軍又企圖修改勞動法規，以便約束工會的活動自由，但考慮到可能遇到強烈的反對，因而採取了比較間接的方法來達到目的。這種辦法就是設置處理紛爭的機關和制定就業規則。

進入4月以後，占領軍總司令部勞動科把預定舉行罷工的工會領導幹部找去，然後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放棄罷工並將勞資爭端移交中央勞動委員會去調解的事例日漸增多（爭端的銳減說明了當時的情況）。此後，為了阻止共同鬥爭的發展，還進而設立了調處紛爭的機關，並規定一切紛爭只要在這裡進行交涉就不要舉行罷工，並以在工資問題上作某些讓步為交換條件，使煤礦工會和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接受了這種辦法。這種辦法首先抑制了由工會領導的工作場所的鬥爭，特別是對於正在成立初期管理上還不夠民主的工會組織，構成了嚴重的障礙，束縛了工會的活動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發生過有人因為在工作場所散發打倒御用干部的傳單而被加以違反就業規則的罪名從而遭到解雇的事例。這種情況說明，訂立就業規則對於資本家是如何的有利。

另一方面，還利用民主化同盟派搞脫離產別運動，並採取象東寶解雇職工之類的狠狠打擊核心工會的办法，向產別系統的工會組織進行了攻擊，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經營者聯盟成了對付工會組織的司令部大肆活躍起來了。然而，產別系各工會，從3月鬥爭中吸取了教訓，根據來自工作場所的具體要求而開展了工作場所鬥爭，抵禦了民同派的陰謀策動，因而，直到6月，民同派也僅僅掌握了產別系統工會組織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在國營鐵路工會的大會上，反而被左派重新掌握了領導權，並決定8月7日再次掀起大罷工。於是，麥克阿瑟於7月31日致函日本政府，命令它剝奪國家機關企業職工的罷工權和集體交涉權。芦田內閣接到這一函件以後，作了“麥克阿瑟的信件高於一切法律”的解釋，並於7月31

日作为第二百零一号政令加以公布实施。这样，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政权竟以“公益优先”为理由把宪法所保证的工人的团结权加以剥夺了。这一措施构成了占领军总司令部劳动政策的一大转变和促使日本法西斯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以“工人代表”为招牌的属于社会党的劳动相加藤，如果抱有反对意见的话，就应当辞职，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甚至使民主化同盟各派和总同盟的公务员法对策委员会作出拥护麦克阿瑟信件的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美国占领军的忠实奴仆。就连总司令部的劳动科长纪廉也发表声明反对这封信件，并立即实行辞职，可见日本的社会党和总同盟的行径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为了反对麦克阿瑟信件和据此发布的波茨坦政令，国营企业职工实行了离开工作场所的斗争。在此以前，北海道铁路新得机务段的工人为了改善机车乘务员在通过狩胜隧道时遭受高温和煤烟折磨的非人道的劳动条件，而猛烈地展开了要求削减货车牵引辆数的斗争。该机务段柚原分会主席处在当局与工会会员之间，陷于左右两难，为了促使当局的反省，他竟然实行自杀了。虽然如此，情况并未好转。8月7日，新得机务段工人掀起了罢工，并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机会，但是当这次罢工遭到禁止时，他们就一齐离开了工作场所。以这件事为开端，他们高举“柚原民族独立行动队”的旗帜向北海道全体工人呼吁起来斗争，并把离开工作场所的浪潮扩大开来。8月中，有以国营铁路职工为中心的一千九百六十三名国营企业职工离开了工作场所，其中四百名遭到逮捕，另有五百五十名接到了拘票。美国占领军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以局长凯吉斯的名义发表声明说：教唆者也要加以逮捕。同时，工人方面也认为离开工作场所的战术有些过火，而停止采用，把主力投在更加容易被群众接受的全递信工会的重点斗争上面了（清水邮局利用地区性共同斗争的方式甚至在波茨坦政令实施的情况下举行

了第一次真正的罢工)。

在对国营企业工会进行镇压的同时，于8月19日还对以“保卫日本文化会”的名义坚持斗争的东宝职工，派出了武装警察和美軍坦克加以包围，迫使职工們离开了制片厂，在他們悲憤流泣中，斗争宣告失败了。然而，离开工作場所的斗争和东宝职工的罢工斗争对于工人发生了巨大影响，9月以后，又以粉碎行业別平均工资制为目标，重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尤其是煤矿工会、私营铁路工会、全日本纺织工会、海员工会、五金工会、矿山工会等属于总同盟系統的私营企业工会組織也和全日本煤矿工会、电产工会等属于产別系統的工会組織同时投入了斗争。至此，芦田—西尾內閣甚至不能对工人运动的浪潮起到防波堤的作用了。

加 强 警 察

面对着上述工人的斗争，政府也加强了它的镇压机构。根据1948年3月实行的新警察制度，国家警察虽然减少到三万人，但所有人口超过五千人的地方自治体都要添設自治体警察，同时，这两种警察分別听从国会和自治体所承认的公安委員的命令进行活动。不料，国家警察本部长斋藤在国会上发表一項計劃：要从1948年3月23日起，在全国各警察管区(和战争末期的軍管区完全一致)各設一万名武装警察队，事实上，是把警察的佩刀换上了手枪，并改善了装备。1948年4月，又成立了海上保安厅，下設海上保安队，拥有海防舰只二十八艘。

不仅日本的統治者建立了以上的体制，而且美国占領軍当局也开始对工人运动进行了镇压，这就是1948年1月揭发了大阪久保田鉄工厂把煤炭拿到黑市出售的四十六名工人，被交由美軍軍事法庭审判。另外，在3月斗争中，全递信工会东京搬运工程局支部、国际电气通信設施部福岡收信所、全递信工会北海道札幌地区

机构等处的负责人，以割断与占领军有关电线的“罪名”，被判处罚款五万到七万日元和一年到五年的徒刑。其中一人，在公审庭上举出证据，申诉自己的口供是经过刑讯逼出来的，结果被认为他的申诉和检查官的证言不符，当场又被追加了一条伪证罪（重劳动二年，罚款六万七千五百日元）。这种无法无天的审判是世界司法史上前所未闻的。（递信省劳务局：《递信工人运动史》）针对以上的军事审判，全国各地掀起了要求无罪释放的签名运动，仅就东京搬运工人的一个案件，在判决后一个月内在全国各地就有六十二万人签了名。就这样，美国占领军开始了军事镇压。日本警察也不落后，为了镇压从4月21日起日本打字机公司所属各厂工人实行管理生产，当局在战后首次出动了武装警察队。其中，三田工厂的情况尤其严重，当局派出一批身上刺了青的流氓领先闯进工厂，打伤了许多工人不算，还逮捕了二百数十人。在4月镇压神户朝鲜人学校事件中，美军艾克巴格中将亲临现场进行指挥，逮捕了一千多名主张自主教育的朝鲜人。对进行抗议的群众，警察使用消防水龙喷射，其中一人竟被警察枪杀，另有数十人负了重伤。（参看产别：《官宪的暴行》；另据递信省编《递信工人运动史》也可以看出，在这一事件中占领军和“民主化”了的警察是如何不人道和无法无天。）

7月7日福井市公布了治安条例以后，各地都相继制定了显然违反宪法的公安条例，加上在此以前政府为了镇压抗税运动而制定的“轻犯罪法”，它已完成了全面压制人民的体制。而上述麦克阿瑟于7月22日给芦田的信件和第二百零一号政令，正是这些法西斯措施的基础。不附带争议权的团结权是毫无意义的。何况连团体交涉权也被剥夺了的工会组织，更是一种单纯的请愿机关罢了。全国政府机关的职工共有二百六十万人，占日本已经组织起来的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战后工人运动的核心。剥

夺政府机关工会組織的集体交涉权和爭議权，首先就是表明要彻底鎮压日本的工人运动，其次是表明露骨地法西斯化的意图，即加强統治机构的中枢——官僚制度，以便建立法西斯統治。在芦田內閣执政期間，日本的殖民地化和法西斯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事件

利用国家权力橫暴地重建垄断資本主义的工作，是在极端腐朽墮落的情况下进行的。1947年3月就任垄断日本肥料生产的企业昭和电气工业公司總經理的日野原节三，从就任到1948年8月为止，仅仅根据公布的数字，就拿出了七千万日元的巨款用来贈賄和請客，从而得到了三十亿日元以上的复兴拨款。根据檢察当局的揭发，和这一案件有关的主要人物，有兴业銀行總裁二宮、經濟安定本部长官栗栖、副首相西尾、首相芦田等人；在政党方面，除共产党外，其它各党都有成員和这个案件有牽連。到10月6日，如此卑鄙无耻的芦田內閣也終於被迫下台了。然而，出现在政权的經濟基础上的这种腐敗现象，决不限于芦田內閣任內发生的昭和电气工业公司案件。战敗以后的几届內閣也不例外，它們在处理軍需物資、处理武器、土木建筑工程、国家接管煤矿問題、五井产业事件等等問題上，都明显地存在着很难分清是行賄还是向政党捐款的丑恶关系，虽然这些都沒有构成刑事案件。就中，隶属于占領体制的日本統治者們，在同美軍总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公然行賄的事实，是造成上述貪污案件的原因。

芦田—西尾中間內閣，並沒有实行所謂中間政策，它只是担当了統治階級整个战略上的一个环节而已。首先，这个內閣通过执行第二百零一号政令出卖了劳动人民。其次，它把从人民大众身上搜刮来的資金毫不吝惜地为垄断資本的利益而使用，并在这样作的过程中竟然貪图私利而对人民大众犯下了不可寬恕的罪行。

第二节 准备战争体制

第二次吉田内阁和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

芦田内阁的总辞职，不仅是由于人民攻势的压力所造成的，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因此，在产生下届内阁的问题上，就允许了保守势力中间进行政治交易。民主自由党的干部会推举出该党总裁吉田茂担任继任首相，并向麦克阿瑟总部征求同意，因而大势趋向于由吉田出来组织第二次内阁。另一方面，对于政权仍旧抱有留恋的民主党和社会党右派，也在支持中间内阁的美军总部民政局的谅解之下，企图抬出民主党的山崎猛担任首相。他们的计划是组成民主自由党、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四党联合内阁，在形势没有好转以前暂缓解散国会。然而，社会舆论却猛烈地反对中间内阁。稍微透露了一点意思的山崎，一旦了解到美军总部并不支持他的时候，就辞掉了国会议员。民主党的计划成为泡影，10月14日吉田被提名为首相，19日，成立了以佐藤荣作为官房长官、泉山三六为大藏大臣的第二次吉田内阁。吉田内阁因为与党民主自由党是国会中的少数派，原拟在国会开幕的初期，如其可能，在一开始就解散国会，但由于中间派在野党反对解散国会的活动和为了解决成为悬案的第二百零一号政令的法制化问题，出席了第三届临时国会和第四届通常国会而不发表施政演说，并利用美军总部的压力迫使国会在11月30日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的修正案，然后在12月22日解散了国会。

美军总部所以排斥了举国联合内阁运动，固然是因为中间派各党已为人民所唾弃，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形势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略体系面临到深刻的危机，从而必须加强其对日政策，而中间政治已经成为无用之物了。由于马歇尔计划的

破产而表面化了的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西欧各国的财政危机、通货危机，与此相反，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反攻的进展，这一切，使美国感到必须把日本作为对苏包围圈的一个环节，使其成为远东的战略基地和兵工厂。为了在日本建立起执行这种政策的体制，就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保守内阁。

由于经过修改的国家公务员法的成立，成功地剥夺了公务人员的集体交涉权、争议权以后，美军总部紧接着又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2月11日，美军总部劳动科长赫普勒发表了工资三原则。它的内容是：（一）禁止影响物价的增加工资；（二）企业因为支付工资而出现赤字时，禁止予以财政援助；（三）政府不发给同样性质的补助金。这三项原则，被认为是为了制止散漫的经营管理、割断物价和工资的恶性循环关系和一切企业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其目的是要以“占领军的一致意见”的名义，镇压当时正处在高潮的电产、煤矿、海员、私营铁路、全金属等工会组织的年终攻势，并阻止增加工资。罢工工人并没有理睬赫普勒的关于劳资纠纷的严重警告而坚持斗争。到了20日，赫普勒再次提出警告勒令工人停止斗争，因此，工人们终于不得已而放弃了斗争。电产工会被迫放弃了在1946年经过斗争而取得的按照生活指数的工资制，而煤矿工会对于赫普勒的警告和要求，经过四次表决才勉强通过了。

12月18日，美军总部公布了由美国政府下达的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次日，麦克阿瑟寄给吉田首相一封信并附带一项严格的命令，内称“任何推迟或妨碍这些原则实现的企图，必须被认为是公共福利的威胁而加以镇压。”（《朝日新闻》1948年12月20日）这九项原则据说是“为了尽快地谋求财政、金融、物价和工资的稳定，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输出工业的生产量”的一个“有效的稳定经济计划”（前言），内容包括：（一）实现全部预算的真正平衡；（二）加强并推行税收计划；（三）严格限制贷放资金；（四）“稳定”工资；

(五)加强物价統制;(六)改进对外貿易和加强外汇管理;(七)改善資材分配制度以便增加出口;(八)增产重要国产原料和成品;(九)改善粮食征购办法;等等。另外,在这个文件的結尾部分还強調說,为了“早日实现单一汇率,必須把这些計劃付諸实施。”

稳定日本經濟九原則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成功(1949年1月北平解放)感到必須使日本成为軍事基地并置于牢固的控制之下的美国帝国主义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其目的在于把自己国内已經表面化了的經濟危机“輸出”給日本,建立起严格約束日本垄断資本不得絲毫放肆的体制,并规定出統一的汇率标准以便全面掌握日本的經濟情况。这一措施,将以“超平衡預算”的名义实行的彻底的財政掠夺和根据“工資三原則”的低薪制强加于日本人民,也就是无限度地加强了对于日本人民的剝削和掠夺。

第三次吉田內閣

在美日統治者期待出現“穩定政權”中于1949年1月舉行的大選,使人們估計保守勢力將要獲得壓倒的優勢。因為在解散國會以前,政府以整頓選舉為口實,對選舉法作了修改,增添了一些特殊規定,這就是強調所謂“公營選舉”,而限制個人舉行競選演說的次數,並禁止在競選中利用文件和圖畫。因此,傳單、標語、宣傳畫等等已不能利用,使主要利用這些東西進行競選的民主勢力陷於不利。與此相反,保守勢力、特別是政府與黨的民主自由黨則利用土豪劣紳及地方上有勢力分子進行挨戶訪問及運動拉攏等等手段取得了顯著有利地位。在這次選舉以前,官僚們看透了美軍總部的政策而大批地加入了民主自由黨,壟斷資本也都專門支持民自黨。1月23日揭曉的大選的結果,果然不出所料,民主自由黨獲得了二百六十四個席位,占絕對多數,民主黨則恰恰相反,只取得了六十八席,社會黨情況更慘,由上次的第一大黨降為僅占

四十九席的少数党了。但是也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这就是:共产党由四个議席一跃而增加到三十五个議席,声势大大加强了。

大选的結果(上次是 1947 年 4 月)

	当选人数	(上次)	得票率	(上次)
民主自由党	264	(131)	43.8%	(26.9%)
民主党	68	(124)	15.3%	(25.0%)
社会党	49	(143)	13.5%	(26.3%)
共产党	35	(4)	9.6%	(3.7%)
国民协同党	14	(31)	3.4%	(7.0%)

中間內閣的与党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的失敗,反映了人民对于从中間政治直到昭和电气工业公司案件等等事实的严重不滿。尤其是社会党,从党首片山哲算起,包括西尾末广、加藤勘十、野沟胜、島上善五郎等领导人物的一齐落选,更是說明了人民对社会民主主义下的判决是如何严厉。

以上三党所失掉的选票,分別投給民主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候选人了。民自党所以获得了多数选票的原因是:(一)内外垄断資本的大力支持与援助;(二)使用了被称为“五当三落”(当选者花了五百万日元,落选者花了三百万日元)那样充足的竞选費;(三)特别是民主自由党在农村的支柱——地主、富农势力的影响有了增强。此外,与片山对美国的唯唯諾諾、芦田的阿諛逢迎相比吉田还算是个“硬汉”这一点,似乎也多少赢得了人們的支持。

共产党的跃进是它在工会和农会中的活动的結果,是其一貫为維護人民生活而进行斗争例如领导人民反抗重稅等等的結果。共产党的候选人在各大城市里,在几乎所有的选区,都成了得票最多的当选者。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中势力也有了增长,这是由于它不仅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同时也受到了中下层农民、中小企业主、市民和学生的广泛支持。这一点有着重大的意义。另外,还可

以认为，当时已经解放了中国东北、北平、天津的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也大大地影响了日本人民，从而也增加了共产党的选票。同时，共产党不仅是和昭和电气工业公司案件等许许多多政界上的贪污案件毫无关系的唯一的廉洁政党，而且一贯勇于揭发这类贪污腐败现象同时，它对于美国的压迫不屈不挠这种种情况，当然也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大选以后，共产党总书记德田曾说：“共产党不能因为获得了三十五个席位而乐观起来。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是民主自由党”。尽管这样，此后，这个党对占领军和统治阶级的镇压，未能彻底克服党内的和平革命论，以致造成了民主势力衰落的一个因素。

这样，经过 1949 年 1 月的大选，使右翼的民主自由党和左翼的共产党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特别突出，清楚地表明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尽管民主自由党获得了大大超过半数的席位，但在共产党的大跃进面前，保守势力还是表现了动摇不安。民主自由党在组阁以前曾经要和民主党（总裁：犬养健）进行合作，就是它缺乏自信的表现。2 月 10 日吉田和犬养一道访问麦克阿瑟以后发表声明说：“鉴于国内外的形势，两党将进行合作，以谋稳定政局”，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支持保守势力的联合。民主党内的反犬养派由于害怕吉田的反动政策将遭到国内外的反对，而不赞成犬养同吉田合作以及保守党派的联合。2 月 16 日，当民主自由党拉来两名民主党犬养派分子参加而成立了第三次吉田内阁时，民主党竟分裂为联合派和在野派两个派别。在这种情况下，犬养由于责任关系，不得已而退了党，吉田联合保守势力的工作也终于失败了。

虽然如此，执政党在国会中占有压倒多数的内阁的出现，还是造成了一种“稳定”局面，有助于美国利用占领军的大力支持来推行其对日政策。内阁成立后，首相吉田第一次发表谈话时就說：

“政府誓与国民打成一片，大力地而且忠实地执行經濟九原則，在这同时，他还表示要坚决排斥共产党的活动（《朝日新聞》2月17日）。

吉田民主自由党内閣完全背弃了它在竞选时向人民所作的有关撤銷統制、打开銀根吃紧的局面、振兴中小企业、完成征购后剩余米麦可以自由販卖等項諾言，并且恬不知耻地公开宣布要执行与其諾言完全相反的九項原則和道奇路綫。

加 紧 鎮 压

吉田內閣在成立后的第一次声明中就表明了要向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进行挑衅。由于执行“道奇路綫”，它不得不完全背弃民主自由党的竞选綱領——撤銷統制；打开銀根吃紧的局面；振兴中小企业；完成征购后剩余米麦可以自由販卖等等，并且以“在被占領状态下”为借口，依靠在众議院的压倒多数，接二連三地实行了露骨的反动政策。而日本銀行总裁一万田也建議內閣背弃它的竞选綱領，他說：“民主自由党不必拘泥于以往的政策（竞选綱領），應該完全按照九原則办事。”

組閣前的2月12日，吉田对新聞記者說，他要仿照美国的非美活动委員會的形式，在日本設立一个非日活动委員會，但由于各党派、工会組織以及文化界人士表示坚决反对，因而不声不响地又把這個計劃撤銷了。然而，这个計劃經過改头換面，以設置特別考查委員會的形式，在3月19日复会的第五屆国会上得到通过了。这就是說，第三次吉田內閣上台后第一項工作就是废止非法财产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而另行設立以調查“妨碍重建日本的行为”为名，以鎮压反对吉田內閣卖国政策的民主力量为目的的特別考查委員會。提起非法财产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来，人民記憶犹新，它是以共产党議員为中心一貫从事于調查政治上的貪污违法事件

并抨击其反人民性质的一个組織。现在，吉田內閣竟然废止了这种对人民有利的政治活动，反过来把这一組織改成了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民主运动的反动机关。

接着于4月4日，政府不經提請国会批准(尽管在国会开幕期中)竟以波茨坦政令的形式公布实行了“团体等规正令”。这个法令是对1946年发布的旨在取締右派团体和軍国主义者的第一百零一号敕令加以恶劣修改而成，其中规定“对于助长和肯定贊成暴力主义方法的傾向的”团体及个人，可加以处罚，以便对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势力施行镇压。而在此以前的2月24日，松本治一郎即由于“螃蟹横行事件”等理由——实际上是由于他是部落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也就是由于政治目的而被褫夺了公权。另外，在3月1日，国家警察本部又下令处罚抗稅运动的领导人，企图镇压給共产党的竞选带来良好結果的由該党领导的抗稅斗争。“团体等规正令”的第一次援用是在9月8日解散旅日朝鮮侨民联盟。这项团体等规正令，在旧金山条約生效，因而波茨坦政令被取消以后，又变成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防止破坏活动法”。

此外，政府于2月14日又宣布修改劳动法规，企图禁止未經預告的罢工。美軍总部劳动教育組长艾米斯于3月24日宣称，禁止举行反对修改劳动法规的罢工，至5月22日，經過修改的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調整法宣告成立了。經過这次修改，以“确立民主性和自主性”为理由，规定工会組織必須取得政府的認可；使政府拥有决定“公共事业”的范围的权限；政府可以“为了公共福利”为理由，镇压工人运动；同时代表資本家利益的調停委員會的权限也有了加强。此外，从4月到5月之間，全国各城市相继公布了限制集体示威运动即示威游行的公安条例；6月3日又公布施行了包括禁止墙报等在內的室外广告法。

为了反对恶劣修改劳动法规、实行公安条例、裁减人员(定员法)和“整顿”企业,全政府机关工会所属的国营企业工人和以产别会议为中心的私营企业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这使政府陷于被动,接二连三地采取了镇压手段(后述)。5月30日,示威群众队伍高呼反对公安条例而拥到东京都政厅,这时,一队警察冲进示威队伍,并杀死了东京交通工会的工人。次日,工人们举行了抗议集会,再次遭到了警察的镇压。领导东京交通工会为抗议这次虐杀事件而举行罢工的东交工会支部领导人,不仅被东交工会撤销了职务,还受到了免职处分。接着,在国营铁路工人的罢工中(6月8日),国营铁路工会中的民主化同盟派的中央斗争委员会竟叫嚷立即停止罢工,而美军总部也发布了停止罢工的命令,结果把这次罢工加以阻止了。6月16日,参加斗争的广岛的日本钢铁公司工人遭受了大批手持机关枪的警察的残酷镇压,在这座和平城市里制造了血肉横飞的惨剧。

统治阶级鉴于用尽一切镇压手段仍然不能打退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攻势而夺取主导权,便开始通过报纸、杂志、广播进行“恐怖”宣传。另外,他们还为了阻止国营铁路工人掀起反对裁减人员的斗争,竟然抢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这就是:6月30日的平事件;7月5日的下山国铁总裁怪死事件;7月15日的三鹰车站无人电车疾走事件;8月17日的松川车站列车颠覆事件。关于这些事件,详见后文。

道 奇 路 綫

疯狂地向民主力量进行挑战的吉田内阁的目标,是使日本资本主义成为美国的一个经济基地。为此目的,它接二连三地实施了贯彻稳定经济九原则的各种具体的经济措施——财政方面的道奇计划、税制方面的休普建议、贸易方面的娄甘方案,以及关于单

一汇率的规定等等。通常被統称为“道奇路綫”的这一系列的經濟措施，清楚地說明了在“自主”和“稳定”等动听的詞句掩盖下美国占领体制的新的开展。

就任美軍总部最高財政顧問的底特律銀行總經理道奇和美国陸軍部长罗亚尔、代理陸軍參謀长魏德迈，在日本大选过后不久的2月1日訪問了日本。他們的使命是推行华盛顿政府所拟定的九項原則。这些陸軍首脑人物是和美軍总部的首脑进行洽商以后又視察了日本和“韩国”的軍备状况，然后才回国的。从这种情况显然可以看出，为了应付国内經濟危机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得美国政府必須赶紧推行这九項原則。

在3月7日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道奇发表了大意如下的談話：日本的經濟象踩高蹺一样，一只脚是美国的援助，另一只脚是日本政府的補貼；如果把脚步迈得太高太大，就有跌掉牙齿的危險，现在必須立即把脚步縮小。他在这里发表的有关日本經濟的“自立”和“稳定”的“重大声明”的具体表现，就是他在不久以后的3月24日作为内部方案向日本政府提出的1949年度預算案。这个預算案，和上一年度預算在特別會計方面尚有赤字的情况不同，是一个沒有赤字的“平衡”預算——黑字預算。日本政府根据道奇声明的精神編制的預算案被美国完全推翻，并在美国的压力下，以道奇的内部方案作为日本政府的預算案而在国会上原案通过了。

在这份由道奇編制的1949年度預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設立了一項总额为一千七百五十亿日元的美“援”物資处理資金特別會計。这就是說，规定日本政府必須負責积累处理“美援物資”的价款（处理价格低于进口价格时，差額由稅收中补足）；而且要在最高統帅的管理之下，将这笔資金主要用来偿还公債和实行重要投資。以往的美国占领地“經濟复兴”資金和美国占领地“救济”資金等美“援”資金，都是在对外貿易特別會計里和从一般會計中

轉入部分混在一起，作为进口补助金使日本垄断資本随心所欲地加以利用并大发其財。而道奇这次把它們分开，从新建立了美援物資处理資金特別會計，并且利用复兴金融金庫提供长期設備資金的作法造成了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事件因而受到指責这个絕好的例子，规定从 1949 年起停止从新提供这项貸款，而由美援物資处理資金會計（一千七百五十亿日元）中提供設備資金，并由总司令部掌管这项資金的运用。采取这种办法，不仅能够使美国的对日債权一目了然，并且可以将資金投入私营企业（1950 年度的大企业是电力企业和造船业），以便实现对日本大企业的直接控制。然而，根据这项預算案的规定，为了設立这项特別會計，要将一千零八十三亿日元的拨款和进口补助金由一般會計方面轉到对外貿易特別會計，所以这笔款实际上并非什么“美援”，主要是人民繳納的稅款。由这项資金中，除用于上述对企业的投資以外，又偿还了巨額的國債（1949 年度为一千四百四十亿日元；1950 年度为一千二百八十五亿日元），金融机关将这笔資金貸給垄断資本，以利垄断資本的重建。

美国为了能够持續不断地对日本进行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絕對需要确保对日債权的价值。为此，将上述稳定日本經濟計劃的一个目标——单一汇率规定为一块美元等于三百六十日元，經美軍总部于 4 月 23 日公布，并决定从 25 日实行。那时以前的汇率，随着商品而各不相同，即：一块美元折合一百五十日元左右直到六百日元左右；而对于进口貨則为一块美元折合三百三十日元。规定单一外汇率，一方面使日元完全依附于美元，使日本經濟分担美国經濟危机的負擔，同时又迫使中小企业破产和实行企业的“合理化”，把負擔轉嫁到人民的头上。道奇早已預料及此，所以在預算中編入了一项一千亿日元以上的进口补助金。

根据美軍总部所发布的关于統一和加强征稅机构的指令，于

1949年6月1日成立了国稅厅。但是，作为道奇路綫之一环的賦稅制度的具体改革，是根据休普稅制調查团关于稅制的建議而着手进行的。休普稅制調查团是于5月10日到达日本，它化了三个月時間就国稅和地方稅进行調查研究的結果，于9月15日发表了关于改革稅制的建議。这一改革的要点是：（一）負擔的公平化，使各种行业負擔平衡；（二）积累資本，糾正由于通貨膨脹在經營上造成的不健康傾向；（三）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特別是充实市鎮村財政；（四）精簡征稅机构和加强納稅申报制度；等等。

这项改革方案为了便于积累資本，对所得稅的累进率作了修改，规定三十万日元以上所得的稅率一律为百分之五十五，并且废除了法人（公司）的超額所得稅，准許根据通貨膨脹引起物价上涨时可以相应地对資產进行重新估价。于是，来自高額所得者（大資本家）和外国法人的稅收减少了，而作为弥补的办法，降低了勤勞所得的免稅基数（由百分之二十五降为百分之十）和加重对大众的課稅（入場稅除外）。这就是“負擔的公平化”。在地方稅方面，把居民稅增加一倍，課稅方法也废止了以資產为依据，而采取按人数和所得的双重依据計算的办法。此外，又新設了固定資產稅（将土地稅和房產稅合并）等地方稅。这些措施虽說是为了加强地方財政，但由于废除以往的拨交地方稅而新設了平衡交付金制的結果，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自治体的控制力量。改革方案所強調的精簡稅制机构則表现为征收易于征收的对广大群众的課稅和征收勤勞大众的血汗金錢。

为了使美国的商品和資本能够源源不絕地对日輸出，就必须发展日本的出口。具体办法是扩大美国的过剩商品和資本的对日輸出，日本再扩大向东南亚輸出这一資本循环，并加速其周轉率。因此，必須“限制国内消費，把重点从国内消費轉移到出口上面”，“在出口需要的面前，国内的經濟复兴和发展都不能不居于次要地

位。”(道奇声明)就这样,美国迫使日本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企业“合理化”和降低成本,以便进行“饥饿出口”。

然而在道奇路线实施以后半年左右期间,出口贸易情况并不算好,5月份的出口额为五千四百万美元,而10月份则减为三千万美元;6月份的进口额为九千五百万美元,而12月份则减至四千七百万美元。这是因为新规定的汇率——一块美元折合三百六十日元造成了出口困难和受到英国实行英镑贬值的影响。为改变这种情况而采取的对策就是12月来到日本的娄甘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日本对外贸易的建议,也就是所谓娄甘方案。这个方案主张,用增加进口来提高国外的购买力,从而争取增加出口这样一种进口优先论,作为前提条件,首先应该缓和政府的统制和促进民间贸易。12月1日公布施行的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法,就是根据这份娄甘方案而制定的。

这样,道奇路线所标榜的“自立”和“稳定”,是给日本垄断资本保证高额利润的“稳定”,是在逐渐减少“美援”的情况下使日本经济依附于美国的“自立”。其结果,把美国经济危机的负担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并在日本建立起配合反苏军事基地网的军事体制等等,对于整个日本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物价跌落、贸易缩减、中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增多等现象,给日本带来了经济危机,使日本人民趋于贫困,从而整个社会陷于严重的不安之中。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垄断资本的措施:5月12日(1949年)停止了赔偿拆迁;6月间公布了日本银行法,密切了日本银行和私营银行以及私营企业的联系。另外,继1月14日和4月14日两次撤消根据“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所作处理之后,于6月18日公布实施了经过修改的禁止垄断法,把这项法令的精神实质完全阉割了。8月3日,麦克阿瑟又发表了一项有关排除经

济力过度集中审查委员会任务已经结束的声明，这是正式宣告了这项阉割工作已经完成。

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在 1949 至 1950 年間袭击了日本經濟界的危机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經濟危机的一个环节，而不单纯是道奇路綫和超平衡預算等一系列措施的产物，而这些措施倒是美国垄断資本针对着危机的发展而采取的对策。这就是說，通过这些措施，把危机带来的負担轉嫁給工人、农民、中小企业主，使生产集中到垄断資本手里，并强行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經營合理化（在日本是解雇、加强劳动强度和降低工資），以便加强日本垄断資本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力量。

从物价跌落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几年来利用通貨膨胀和增稅对群众进行掠夺所造成的消費减退。首先是自由价格和黑市价格一起开始暴跌，其中，消費資料的跌价（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5 月下降百分之四十二）比生产資料的跌价（在同时期內下降百分之三十三）尤其剧烈；而官价的跌落也从 11 月起由消費資料开始逐漸扩及生产資料。这样，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看到，黑市价格和官价几乎趋于一致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于强行增产和世界市場上竞争尖銳化而引起的出口萎縮有了加剧，所謂道奇平衡預算也更加发挥了作用。从战争时期一直对金融市場的动向起着决定性作用（确切地說来，这是信用危机的一种对策）的政府資金，在 1948 年度超額发放了七百二十四亿日元，而在 1949 年度，却超額回收了六百五十二亿日元。于是，通貨紧縮，銀根吃紧情况加剧了。但是，垄断資本却利用这种“銀根吃紧”情况来积累資本，由日本銀行带头，各銀行以存貨为抵押集中地向垄断資本及一些“优秀”企业进行放款和超額

放款。

但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主、工人和农民，則被轉嫁了危机带来的負担，成了积累資本和企业“合理化”的牺牲品。中小企业不仅遭到訂貨断絕延迟付款或不付貨款，还遭到金融机关停止貸款。他們所收到的到期不能兌現的期票，从 1949 年 1 月到 11 月，仅仅十个月中間，张数和金額都激增到十倍。中小企业的倒閉从 1949 年 2 月起一年之間就有一万零五百四十六家，被解雇的职工超过了五十万人。这样，在 1949 年一年間，雇用人員减少了百分之十，失业者增加到了六倍以上。即使根据官方的統計，完全失业者，1948 年为十九万人，1949 年，激增为三十八万人，至 1950 年 3 月更增加到四十六万人。失业保险机关办理的离职登記件数，1948 年度为十二万四千件，1949 年激增到将近六倍的七十二万六千件。領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1952 年 2 月是三十六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人，比一年以前激增了八倍有余。

反对解雇的斗争

作为这种經營合理化政策的一个环节，由 1949 年 2 月开始，裁減了大批人員。这次裁減人員以 7 月的三鷹事件为頂点，规模极大，据政府統計，1949 年內私营企业方面是四十三万五千人；国家机关及国营企业方面，最多是国营鉄路的十二万人，其次是全递信工会成員三万人，还有其他方面的十二万人，以上合計有六十三万人以上。尤其是在国家公務員法施行以后成为“产別”之核心力量的金属工业方面，“东芝”是四千人（裁減率为百分之十八）；大同制鋼三千五百人（百分之四十四）；日本电气三千五百人（百分之三十五）；冲电气二千八百人（百分之四十二），日本制鋼广島分厂六百二十三人（百分之三十）；日立（1950 年裁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百分之十七）。以上情况表明，政府和垄断資本对工人阶级展开

了疯狂的进攻。

作为裁减人员的准备工作，政府首先强行修改了工会法，并借此剥夺了劳资合同上规定的既得权利。从 1945 年到 1946 年中间所签订的大部分劳资合同，至少采取了企业单位雇用职工限期参加工会制，其内容包括：工会对于人事有发言权、特别是禁止片面解雇并认可工会在工厂内进行活动的自由；在企业内部可以设立工会办事机构以及作为在使工人阶级彻底贫困化的通货膨胀下的一种正当要求——对担任工会工作者照发工资；等等。美军总司令部劳动科借口受到公司物质援助的工会有成为御用工会的危险，而通过日本经营者联盟指使资本家制订了推翻上述一切工会既得权利的新的合同草案，并向工人采取强硬态度，如果这项合同不被接受即拒绝签订任何合同。工会方面当然表示反对，但仅仅由于合同问题而举行长期罢工也有困难，同时，如果强硬地提出片面的经济要求，又将受制于赫普勒“劝告”中提出的关于罢工的禁令。因此，几乎全部工会组织都被迫进入了无合同状态。而且根据新的规定，无合同的工会组织（更确切地说，即不听从占领军任意摆布的工会组织）即使将劳资纠纷问题提交到中央劳动委员会，也不被受理。由于工会法的修改造成了以上这种情况，这就使得工人阶级除了进行实力斗争以外，再也没有防止大量解雇的途径了。

当局为了阻止工人用实力反对解雇的斗争而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东京及其他各城市制定了以镇压群众运动为目的的公安条例，剥夺示威游行和集会的自由。如上所述，5 月 30 日，反对公安条例的工人和学生曾经结队到东京都政厅进行抗议，而遭到警察强迫解散和残暴镇压。情绪愤激的参加者，就在当天夜里结队前往禁止一切示威游行的美军总司令部门前举行了示威。如前所述，东京交通工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产别会议也号召工人举行罢工。然而，东交工会本部内总同盟系干部为阻止这一斗争的扩大，

反而对行动起来的支部加以压制，使斗争陷入孤立状态。6月，为反对当局作为解雇的前提而强制推行的新的勤务分配制，国营铁路工人、东京地区国营电车工人由东神奈川电车区工人带头于9日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占领军的禁止而被迫停止了，但在罢工期间，在各该地区工人的支援之下，排除镇压，一度实行了工人管理，运转了所谓“人民电车”，为即将到来的全体国营铁路工人反对解雇的斗争增强了信心。接着于6月15日，日钢广岛工厂的工人为反对解雇而在工作场所实行静坐斗争，占领军和警察队以该厂被指定为赔偿工厂为理由命令他们走开，但是遭到了拒绝，占领军不肯罢休，强迫他们解散，因此双方之间终于发生了冲突。为了对这次斗争表示支持，全递信工会和广岛市电车公司工会等这个地区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长期化了的“东芝”工人反对解雇的斗争，不断扩大，逐渐发展为地区的乃至全国性的共同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各地区人民斗争的具体表现，以对占领军的公然反抗为背景而扩大开来。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6月26日，国营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不顾星加、斋藤等民主化同盟干部的反对，以六十六票对四十五票决定为反对解雇而举行罢工。以国营铁路工人为核心的工人阶级同占领军及政府进行决战的时刻临近了。

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

当时，很多人都设想事态的发展将是国营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占领军出面干涉，然后国营和私营企业工人掀起总罢工；然而，这种设想完全落空了。从6月末开始，报纸上关于各地发生列车事故的消息越来越多了。在往常，可能由于小孩子淘气而在铁轨上放块石头一类情况，根本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材料，但在这时候却煞有介事地以大字标题刊登出来，造成了紧张不安的空气，而且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于7月4日政府发表了第一批解雇名单。7月6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突然在白天失踪，次日发现了他的尸体，是被火车压死的。于是，各报纸便毫无根据地断定这是左翼分子干的。接着于15日在三鹰车站又发生了无人电车的急驶事件，因此，国营铁路工会三鹰电车区支部的饭田七三等共产党员和名叫竹内景助的工人被看作嫌疑犯而遭到逮捕。资产阶级报纸拿出最激烈的词句叫嚷共产党使用暴力，这就动摇了反对解雇的舆论。国营铁路工会委员会长加藤不仅不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举行罢工，反而擅自撤消了接到解雇通知的属于左派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委员十七人的资格，解散了中央斗争委员会，并于18日发出零号指令，要求另选不包括被解雇者在内的新的中央斗争委员会，使国营铁路工会的战綫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正当零号指令下达后，在国营铁路工会各级组织中间引起了动摇的时候，即在8月17日，在东北綫松川车站附近又发生了列车颠覆事件。次日（18日）上午，内阁官房长官增田宣称：“这次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凶恶的罪行。它是和三鹰事件及其他历次事件，思想根源是相同的。”9月10日，前国营铁路工人赤间被捕，根据他的所谓供词，接着又逮捕了当时正在紧密团结地进行共同斗争的“东芝”松川工厂工人和国营铁路工会福岛支部的积极分子。

当人民群众的抵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统治者即制造事件，用以镇压人民的力量，这是自古以来各国统治者惯常采用的手段。在日本，自从幸德秋水事件以来，卑劣的天皇制也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但以上这些事件却有其特点，这就是其残暴程度达到极点以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事件。这些都是仿自美国以Frame up（捏造）一语而为举世所周知的利用捏造进行镇压的手法（如撒奇·樊齐蒂事件等）。根据对审讯记录进行检查的结果，已经证明，下山事件、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都是彻头彻尾

的捏造。(关于三鷹事件，經過审判已經断定为“空中楼阁”。不过，松川事件的被告們在第二审中仍然被判为有罪；然而，在当时的气氛中发生这样的“事件”，完全对工会方面不利，而仅仅对当局有利，因此，不能认为，被称为政治水平极高的属于东芝工会共产党核心小組的成員——佐藤一被告会领导这样的“事件”。)

这一連串的“事件”，在报道机关大肆宣传“暴力主义”配合下，破坏了国营铁路工人的斗争。零号指令实际上被接受了，各級工会組織的民主化同盟派分子成功地使群众逐渐认为解雇是“不得已”的，而农民和市民对于反对解雇斗争的同情已經淡漠下去了。国营铁路工人的失敗影响了在它以后起来斗争的各个工会。全递信工会在9月13日召开了大会，但由于分裂为左右两派沒有取得成果，以致未能展开坚决的斗争。“东芝”工人的斗争，虽然保持住了繼續由工人管理川岸工厂，但是整个斗争还是失敗了。10月15日国营铁路工会召开大会，决定結束反对解雇的斗争。至此，1949年工人运动的高潮过去了。工人运动已經明显地轉入低潮，工人运动的主导权已經从国营企业工会的手里轉到私营企业工会的手里去了。

战后的工人运动以二·一总罢工为第一个轉折点。在片山內閣和芦田內閣时期，由于統治者加强了镇压及其走狗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叛卖行为，使工人战綫发生了分裂，运动的困难条件进一步增加，开始轉入停滯状态。然而，經過这二年对“中間政治”的體驗，人民逐渐認識了阻挡他們前进的美国占領制度，同时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幻想也逐漸消失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吉田內閣时期工人运动的特点是針對正式的軍事化政策展开了斗争，实际上运动是被迫后退了一步；但另一方面，为了挽救日本民族的危机而要求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統一战綫的呼声却越来越响亮了。1949

年秋，工人运动一面孕育着前进的动向，一面又被迫退却，这是第二个轉折点。战后，組織起来的工人人数，以 1949 年 3 月的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頂点，而从 1949 年 7 月到 1950 年 6 月之間急速下降到五百七十七万三千九百另八人。这种减少的趋势进入 1951 年以后重又回升了。

农村中反动势力的进攻

由于战时和战敗后的生活必需品不足而引起的下乡采购和购买黑市物資，使农林业产品和水产品的价格猛涨，一时出现了“农漁业景气”，这件事从 1946 年 5 月的統計：新日元的百分之五十一·八掌握在农村和漁村居民手里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証明。但是这种景气，由于这些原始生产的购入品（农业机械、肥料、漁具、石油等生产資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暴涨（垄断資本利用垄断价格进行掠夺，即所謂剪刀差的增大），而立即消失了。以 1947 年 6 月末新日元分布状况为例，前一年占居首位的农村和漁村已降为第二位（百分之二十八·五），黑市經紀商人則掌握了百分之三十七（1946 年 5 月为百分之十二·一，占第四位）而占居了第一位。在短短一年中間，城市商人就从农村和漁村居民手中把新鈔票夺过去了。这种趋向在 1948 年以后有了进一步发展，散在农村和漁村中的新鈔到 1948 年 6 月末和 12 月末分別减到百分之二十·一和百分之二十二·三，以后还繼續下降，至 1949 年 6 月末为百分之十七·二，12 月为百分之十九·二，1950 年年底为百分之十五·五，至 1951 年 6 月末及 1952 年 6 月末竟下降到百分之十二·四了。

結合这种情况，为了使地主的进攻合法化，政府于 1948 年 11 月向国会提出了修改土地調整法草案。通过这次修改，政府掌握了提高地租的权力，剝夺了佃农和农民家屬在土地委员会中的选

举权。1950年8月，地租被一下子增加到了七倍。1951年3月，土地委员会与掌管征购粮食和订立农业生产计划的农业调整委员会以及掌握技术的农业改良委员会合并起来组成农业委员会，这就使它完全变质了。另一方面，政府又于1947年12月制订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农民十五人以上可以自主地组成协同组合，但不许联合体(协同组合联合会)兼营金融事业及其他事业，使它和农林中央金库直接挂钩而纯粹成为吸收农村资金机关的基层组织。这样一来，农业协同组合的数目就由1948年度的一般组合二万九千三百个、联合会九百二十七个的最高峰，急剧减少到1949年度的一般组合三千三百个、联合会二千二百^①个。而由于1949年下半年农业危机的发展，农业协同组合的经营陷于不振，各地曾先后出现了停止或限制提取存款的情况。

1951年6月末“土地改革”的结果是这样：政府收买土地的面积计有耕地一百七十八万七千町步，牧地三十七万七千町步，开垦地六十一万四千町步，向地主偿付金额为一百一十五亿日元以上(现金二十八亿日元，有价证券八十七亿日元以上)。政府卖出的土地面积，有耕地一百九十四万七千町步，牧地三十四万八千町步，开垦地四十七万六千町步，农民一次偿付的金额为九十亿一千二百万日元，包括在分年偿付合同以内的金额为三十一亿二千七百万日元，另有一百二十万七千个地主把五十四万八千町步的土地租给了三百零一万四千个佃农。(《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第5卷)

“土地改革”给日本农业所带来的结果是这样：就自耕农和佃农的户数来说，确实使自耕农增加了一倍，佃农户数锐减了，但广大的山林区仍然归地主所有未获解放，加上耕地面积的减少，使农

^① 这个数字疑有错误。——译者

业經營的規模更加分散。关于农村中的阶级构成，就稻米的产量而言，耕种面积达二町以上的富农仅占种稻农户的百分之一·五，每户平均有耕畜一点三到二·五头，发动机零点七到零点五台，脱谷机零点九到一台，交售稻米占全部交售量的百分之十四·一。其次，耕种面积为六反到二町的中农占种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九·六，每户平均有耕畜零点八至一点一头，发动机零点二台以下，脱谷机零点三至零点一台，交售稻米为总交售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以上二个阶级即占到全部稻米交售量的百分之八十三·二。耕种面积在六反以下的贫农占种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八·九，每户平均有耕畜零点六头，发动机零点二台以下，脱谷机零点三至零点一台，但其稻米交售量仅占全部交售量的百分之十六·八。此外，还有二百二十二万农户完全无力交售稻米（粮食厅1952年度调查）。这样，稻米的生产大体集中在耕种面积六反以上的农户，特别是富农的手里，大部分贫农则以副业贴补家庭生活。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贫农的负担轻微，相反的，掌握着分派交售权的地主和富农阶层把沉重的交售量转嫁给少地的贫农，迫使他们把自己口粮也拿出来，实行不折不扣的“饥饿交售”，因此，向他们“还原配售”的数量超过了八百万石。并且，农业所得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轻，贫农重，山村最重，纯农村次之，城市近郊最轻。捐税对于农业收入的比重，在战争时期是百分之十以下，战后则急剧上升，1947年竟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三，为交售米价的一半。即使中农，如果把黑市交易的收入除外，家庭经济也是入不敷出。此外，无机肥料和生活用品逐年猛涨，尽管农产物价格总的说来比农业用品价格上涨的多，农家经济情况仍然走向下坡路，以致放弃耕种的现象日渐增加了。根据农林省的调查，在1948年夏季约有三万户以上的农民放弃了二万五千町步以上的土地。（《日本农业年报》第2、3辑）

1949 年道奇路線施行以后，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暴跌，在官方开出吉普車强行征购粮食和杂捐苛稅的沉重压榨下，农民的穷困达到了极点，自杀、卖身和放弃耕种的现象遍及全国。岡山县的貧农为要求口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們表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不回去。4 月，由所有农村团体共同发起召开的全国农民代表会议，不顾民主自由党自主派发起人的反对而向吉田內閣进行了譴責，在继续召开的日本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自主派和統一派宣告分裂，拥有多数代表的統一派将以野沟胜为首的自主派干部正式开除出去。另外，一些日本农民协会組織內的社会党员和劳农党员集体参加了共产党(茨城县常东农民协会等)。

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转变。中农势力较强的农民协会在騙人的“土地改革”結束以后就宣称“农村里已經沒有斗争对象”而逐渐倾向于放弃斗争和解散組織。在上述第三次全国大会召开前夕的 4 月 21 日日农內部发生了严重分裂，就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

造成农民运动的这种停滞倾向的原因是：“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中农在农会的领导机构中占了优势，致使保卫日农革命传统的統一派变成了少数派。其結果，就在美国修改占领政策的同时，日本反动派对于已經是有名无实的“土地改革”，开始了恶劣的修改。

殖民地文化的泛滥

战敗以后統治阶级一贯采用通货膨胀政策掠夺人民，激起了工人、市民、农民的暴风雨般的反抗斗争。对此，从芦田內閣以来，特别是开始实施道奇路線的吉田內閣，以美軍总部的势力为背景，实行了毫无人性的、极端残酷的镇压，关于这些，前面已經說过了。与此同时，他們还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日本人民抵抗的精神，把日本人民淪于殖民地式的懦弱虛怯的状态。日本文化的殖民地化的风

气就是这样产生的。正常的精神生活和健全的人类希望受到极端压抑的战时人民生活，战败以后又被投入通货膨胀和“黑市”的混乱之中，由于军国主义道学的破产，人民失去了可以遵循的伦理规范。同时，人民群众的激烈斗争还处于幼稚阶段，远远不能够在全国人民中间树立起大无畏的、革命的道德。于是，就象经济生活中产生了“黑市”一样，在文化生活方面也产生了“肉体文化”。田村泰次郎的作品《肉体之门》所以能够流行一时，就是因为它把被天皇制道学完全隐藏在暗室之中的“性”生活公开出来，并且谈论和描写其最露骨的形式——施虐淫和受虐淫，试图对于以往灭绝人性的道德进行机械式的反抗。因而，这种倾向虽然以人民的解放感为基础，但是它妨害了这种解放感向斗争的方向发展，而使斗争的精力在个体生活之中趋于分散和消失。电影和体育活动被当成了促使民众生活的消费化的手段，利用它们制造的“美梦和憧憬”，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赖以逃避眼前充满苦恼的现实生活的精神场所，从而使日本人民陷于毫无气力的状态。这种情况在流行歌里表现得尤其突出。

无线电广播的性质在战后也有了改变，娱乐节目占居了主要地位，“二十扇门”、“三支歌”等等难题对答比赛获得了好评。在广播中又安排了妇女时间、农村时间、学生时间等各种各样时间，通过这些办法建立了一种明星制，使广播员变成明星，甚至还出现了集会主持者（如托尼·谷等）一类的专门职业。这样，广播便直接和民众生活发生联系，导致生活的享乐化，另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时事解说强行制造了僵硬的政治概念。最初的对于军国主义的机械式的反抗和对于“肉体”的极端关心状态，主要是通过这些广播、报纸、电影、体育活动而导向了群众生活的享乐化和反共思想并逐渐凝固下来了。和以上这些具有同样作用并把享乐和道德价值统一起来的，还有新兴宗教。这种宗教把不能够自主地一身兼

备享乐思想和反动思想的中年以上的人们吸收了。主张忘掉现实，疯狂地进行舞蹈

战后宗教团体增加状况

文部大臣办公厅宗教科(1950年12月31日调查)

年 月 日	1945 • 12 • 31	1946 • 12 • 31	1947 • 12 • 31	1948 • 12 • 31	1949 • 12 • 31	1950 • 12 • 31
神道 系統	13	62 (49)	95 (33)	125 (30)	160 (35)	225 (65)
佛教 系統	28	72 (44)	98 (26)	121 (23)	153 (35)	251 (95)
基督 教系統	2	9 (7)	13 (4)	20 (7)	32 (12)	39 (7)
其他	0	8 (8)	11 (3)	35 (24)	58 (23)	114 (53)
合計	43	151 (103)	217 (66)	301 (84)	405 (105)	629 (223)

(括弧内表示增加数)

就可以接近宇宙最高价值的“舞蹈教”就是典型的例子。在1948至1949年間，芦田、吉田两内阁的彻底剥削政策使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的深渊，这时候，反动势力是怎样利用宗教吸引了民群，可以从下表中窥见一斑。

占领势力和吉田内阁不仅使人民陷于贫困，并且为了阻止人民从穷困中摆脱出来，曾经想尽一切办法使人民走向腐化和堕落。在这方面，他们不择手段地奖励了赛马、弹球盘、广播中的有奖难题对答比赛等等各种各样的赌博。于是，日本就变成了和从前的上海租界一模一样的殖民地式的颓唐境界。

1948年8月自行车竞赛法公布以后，全国自治体经营的赛车场就有五十多处，登记选手有二千九百八十人，另有女选手一百六十人，二年之间向国库上缴了十三亿日元，地方财政增加收入达二十七亿日元，在二百七十次比赛中发生了四十八次大规模骚扰事件。“观众在顷刻之间就变成暴徒恶棍这一事实说明，自行车竞

賽并不是体育活动或者單純的娱乐，它是为生活所迫而一筹莫展的群众发泄其焦虑和苦悶的手段。”(大河内一男：《国民生活与大众娱乐》，见《思想》杂志 1951 年 8 月号)并且，絕望和焦虑的結果不顾傾家蕩产进行的投机遭到失敗以后，剩下来的只有全家自杀或者犯罪这条路了。然而，通商产业大臣横尾却胡说什么：“自行車竞赛法是由議員提出，經過政府同意的一项正式的法律。因为是議員提出来的，这就表明国民的大多数希望搞自行車竞赛因而通过了这项法律。”就这样，政府亲自动手来剝夺日本人民在这件事进行反省和批評，以便把日本人民变成沒有骨气的殖民地奴隶。

統治者在推行这种愚民的文化政策的同时，还加强了对民主的文化的鎮压。对《讀卖新聞》社职工和东宝砧制片厂职工爭議的无耻鎮压，前面已經說过了。这些都是加紧走向法西斯和战争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为了鎮压人民群众的批評精神而采取的措施。与此相反，1948 年 8 月在波兰召开了“世界知識分子和平會議”，次年 1949 年 3 月又在紐約召开了“世界文化界科学工作者和平會議”，世界文化界人士的和平运动高潮起来了。同时，在日本各地也出現了“保卫日本文化会”，許多文化界人士积极地投入了和平运动。然而，渗透到文学和娱乐中的“消費的”傾向不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逐步加强了。托尼·谷要用他的一套語言风靡全日本，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任务是“当事人的外人”。这句话意味着娱乐的組織者和指导者，其目的大約在于甚至剝夺群众对娱乐的一切积极的关心，而使群众只能对娱乐采取被动的态度。甚至在知識分子中間还有这样一种相当强的傾向，即：不关心大的政治、社会状况，而在狹小的个人之間的心理交流中寻求“趣味”和安慰。

第五章 朝鮮战争和旧金山和約

第一节 朝鮮战争的爆发

独立运动的高涨和南北分裂

1950年朝鮮战争的爆发,次年1951年旧金山和約的签订,是美帝国主义想把太平洋战争的结果用一种对于日本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說来最为不幸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事件,因此,也就构成了国内外各方面反对它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的一个轉折点。

几十年間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朝鮮,也从1945年8月起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独立运动。首先,8月17日在汉城組成了建国筹备委员会,不出一月時間,在朝鮮所有的地方都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建立了委员会的支部。人民委员会在許多地方接收了日本的統治机关,并作为朝鮮人民的唯一权力机关而开始了活动。根据朝鮮人民的要求,在8月15日以后从全国各地監獄中释放出来的人們,也顾不得休养就参加了独立运动,投入了各地人民委员会締造新国家的运动。

8月20日,苏联軍队进驻北朝鮮,接着在9月11日美国軍队在仁川登陆,进驻三八綫以南地区。在战争期間,由开罗宣言已經保证了朝鮮的独立,当初,苏美两軍的进驻三八綫南北,被了解为暂时性的。然而,这两个国家对于朝鮮人民独立运动所采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这对于以后情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駐在北朝鮮的苏軍承认人民委员会是朝鮮人民的合法权力机关,并給予了援助;南朝鮮的美軍司令霍奇中将則宣称“朝鮮人必須絕對服从我所签发的一切命令”,而把南朝鮮完全置于美国的軍事統治之下。他并且完全不承认人民委员会,1945年秋竟宣布該委员会为非

法，而代之以长期逃亡在美国的李承晚为中心所组成的“大韓独立促成中央協議会”。

自此以后，南朝鮮的情况即与朝鮮人民的期待背道而驰了。和战后的德国一样，朝鮮也沒有实现独立和統一。1948年6月，美国强行制造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韓民国”。对于李承晚政权的成立，不分南北，大多数的朝鮮人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例如，1948年1月，以印度代表梅农为主席的联合国朝鮮委员会，实际上是为了制造南朝鮮的单独选举条件并管理选举的目的到达南朝鮮时，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二百多万南朝鮮人民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抗議斗争，使美国軍政統治下的南朝鮮的一切机关事实上陷入了癱瘓状态。其次，在1948年4月，根据北朝鮮民主主义民族統一战綫的建議，在平壤召开了反对南朝鮮单独选举的“南北政党和社会团体联席會議”，这个會議得到了除李承晚、金性洙一派极右势力以外的各党派的广泛参加，一向和李承晚采取同一步調的极右翼的金九、金奎植等也不顾李承晚一派的种种阻挠而参加了會議。全体朝鮮人民所以这样反对李承晚政权的成立，是因为他們清楚地看到：在南朝鮮成立这样一个毫不代表朝鮮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分裂政权，势将造成南北朝鮮分裂局面的半永久化，并推迟独立統一的国家的建立。

“韓國”政府“独立”以后，紧接着就在1948年8月24日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項“至美軍撤退为止有效”的“韓美軍事协定”，同年9月11日签订了“韓美財政及财产协定”，同年12月10日又签订了“韓美經濟援助协定”。这些意味着，根据所謂韓國的“自主”的意志同意了把南朝鮮正式納入美国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体系之中。南朝鮮当局为了推行这些对美从属化政策，必須对内实行一系列的法西斯措施，因而制定并实施了1948年11月19日公布的“国家保安法”和1949年1月公布的“新聞法”等許多镇压法規。

例如,在 1949 年中,根据“国家保安法”而被捕的人数竟达到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一名。只要对于政府多少采取了批評的态度,就要毫不容情地遭到逮捕,南朝鮮到处公然实行白色恐怖,就連右翼領袖金九那样的头面人物,也因为对李承晚进行了批評而在 1949 年 6 月为伪政府所暗杀了。并且,“韓國”政府公然敌視于 1948 年 9 月建立的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就使得三八綫变成了朝鮮两部分的国境綫。

但是,在这种分裂动向到达极限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促使了它的对立物——即走向統一的諸因素的显著增长和产生。根据 1948 年 8 月朝鮮人民會議的选举,于 9 月 9 日在平壤成立的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韓國”政府是根据美国、李承晚的公开分裂朝鮮政策而成立的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在由朝鮮人民自己解决朝鮮問題即实现朝鮮的和平統一的原則指导下宣告成立的。这一点从下列事实上也可以得到証明,这就是:第一,在北朝鮮劳动党和北朝鮮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北朝鮮人民以及大多数的南朝鮮人民,直到 1948 年 5 月 10 日南朝鮮强行单独选举的最后一秒钟,还是尽其全力为阻止南朝鮮分裂政权的出现和建立統一政府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第二,成立平壤政府的工作只是为了应付李承晚政权出现这一新的形势才登上了日程。

美国政府正式宣称:由于苏联的阻挠,苏美联合委员会陷于停頓,用协商的办法已經不可能求得朝鮮的統一,这才不得已而建立了李承晚政权。然而,首先制造了南朝鮮分裂政权而在事实上划三八綫为国境的正是美国政府;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如事实所証明,是为了消除朝鮮分裂永久化的危險,保証和平統一的条件而建立起来的。

走向統一的趨勢

統一的口號的確受到了大多數朝鮮人民的擁護，恰當地表達了他們的願望，關於這一點，在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向第五屆聯合國大會提出的報告中也作了如下的肯定：“具有單一民族、單一語言和單一文化的朝鮮人民都渴望着生活在獨立、統一的朝鮮國家里。關於朝鮮的問題，唯一的目的就是統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朝鮮，統一就意味着民族的解放。

然而，滿足這種全民族的渴望的基本條件，並不是在李承晚政權的政策之中，而是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和這一政權領導下的北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建設過程中逐漸成熟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其建立的同時，就提出了爭取自主統一和獨立的各項方針。其中之一就是實現由朝鮮撤退全部外國軍隊。1948年9月召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作出了要求蘇美兩國軍隊撤出朝鮮的決議，并向蘇美兩國提出了照會。對此，蘇聯立即表示完全同意，並在1948年年底以前把駐在北朝鮮的蘇聯軍隊全部撤出了。然而，美國政府卻無視了這一要求，在蘇聯軍隊撤離北朝鮮以後，仍將其軍隊繼續駐扎在南朝鮮。另外，李承晚政權還在1948年11月22日的內閣會議上作出決定要求美國軍隊繼續駐扎，力圖使美軍的駐扎成為永久性的。但由於朝鮮內外反對的呼聲愈來愈高，美軍終於不得不在1949年6月留下五百名軍事顧問團而由南朝鮮撤退了。

為了朝鮮的統一和獨立而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就是主要通過人民經濟的迅速發展來謀求北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加強和發展。根據1949年3月17日簽訂的“朝蘇經濟文化合作協定”，蘇聯對北朝鮮給予了巨大援助，在這種援助的鼓舞之下，北朝鮮人民的經濟建設，1949年度國營工業部門的生產增長到1946年度的

百分之三百七十七点一；而以往曾是粮食不足的北朝鲜地区的农业，到 1948 年已经达到了可以自足的程度；同时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相反的，在李承晚政权统治下的南朝鲜，由于工业生产的破坏，农业生产的锐减，通货无止境的膨胀和掠夺性财政所带来的漫无止境的横征暴敛，使人民生活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

由于上述这些情况，使大多数朝鲜人民确信：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朝鲜的分裂；为了除掉这种苦难的根源必须争取国家的统一；由于国家的分裂而得到利益的只是李承晚一派的极少数分子，阻挠统一强行继续分裂的只有这一派和美国；所以，如果渴望统一的全朝鲜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避免南北朝鲜发生武力冲突而由朝鲜人民自己来实现国家的统一。1949 年 6 月，分为南北两个党的劳动党合并起来成立了单一的朝鲜劳动党，在它的领导下，从同年 6 月 25 日到 27 日召开了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成立大会。这个祖国战线，除了在以往的南北民主主义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群众以外，更进一步广泛地团结了希望朝鲜统一的一切阶层。祖国战线在其宣言中指出：只有美国和李承晚才希望给朝鲜人民带来空前苦难的这种分裂；必须反对分裂，保卫在和平统一的旗帜下一贯坚持奋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并为了根据这一宪法实现统一政府而进行战斗。这篇宣言中规定在 1949 年 9 月实行统一选举，但是这个和平统一的建议遭到了韩国政府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祖国战线的结成及其关于和平统一的建议把要求统一的全体朝鲜人民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以前，即从“韩国”政府成立以后，在南朝鲜，所有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活动都一概受到了毫不容情的镇压，因此这些斗争被迫于 1948 年 4 月发展为济州岛武装起义和同年 10 月的丽水事件、顺天事件等，并从此采取了全

面的武装斗争的形式。游击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智异山、太白山等各个根据地也日益巩固了。为了使南北两个政权不致发生公开的武力冲突的惨剧而达到朝鲜的和平统一，需要南朝鲜人民的斗争取得飞跃的发展，把李承晚政权就地加以消灭。祖国战线的结成及其发出的号召，使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有了迅速发展。游击队的出动人数，在1949年5月是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人次，同年7月是三万余人次，9月是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六人次，10月，竟增加为八万九千九百二十四人次；并且从1949年秋季到1950年春季期间，由以往的游击战阶段发展到可以展开运动战从正面进攻大城市和以师为单位的伪军的程度了。同时，与游击战相呼应，在各地农村也相继发生了农民的武装暴动。南朝鲜当局在1950年5月30日举行的第二次单独选举中，虽然对选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干涉，但是李承晚一派仅仅取得了二百一十个议席中的四十六席，惨遭失败了。

这样，由于南朝鲜人民的斗争日趋猛烈，至1950年上半年，李承晚政权已经面临土崩瓦解的边缘。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立的加深，以及向美国一面倒政策所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发展等因素，致使李承晚政权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

开战前夕的国际形势

不用说，李承晚政权的危机就意味着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危机。对于美国，正如俗语所说的，真是“祸不单行”。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到处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美国在欧洲的战时体制，通过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结和同年9月西德阿登纳政权的建立而显然采取了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欧洲统一军的方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还在1949年11月动员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组成

国际自由工联，对于工人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世界工联展开了破坏活动。然而，为了正式决定建立欧洲军的问题，还必须等待 1950 年 5 月的伦敦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决定。而且，在 1950 年 5 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会议上，虽然就原则性的问题作出了决定，但关于重新武装的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应占多大比重等具体问题，美国和西欧各国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而未能作出决定。另外，在统一欧洲方案中成为核心的统一经济计划，由于遭到英国的强硬反对而陷入了僵局。

亚洲的形势，如上所述，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美国更加不利了。1949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刘少奇在开幕辞中指出，“中国人民打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诚然，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对于其他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无限的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胜利的信心。

在越南，越南人民军经过 1950 年 3 月末的湄公河三角洲茶荣地区的激战以后，由以往的游击战进入了真正的运动战的阶段。在缅甸，以勃路为首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在五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开辟了解放区，至 1950 年春，全部国土的百分之七十进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势力的影响之下了。在菲律宾，从 1950 年 3 月下旬开始，民抗军展开了大举进攻，使首都马尼拉已直接感到威胁，因此，在这以前由于对内的关系不同意美国出兵的菲律宾政府，也不得不要求美国政府急速派遣军队了。出席了 1950 年 2 月在盘谷召开的美国驻远东外交官员会议的杰塞普无任所大使归国以后曾经宣称：东南亚的形势，除掉若干例外，可以说是绝望的。及至 1950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其结果，国民党军完全撤出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于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年

夏季解放台湾已被认为势在必行了。亚洲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于以南朝鲜、台湾、菲律宾作为直接战略基地，企图控制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美国远东政策，给与了极其重大的打击。

同时，1949年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又紧紧地抓住了美国经济，这样一来，美国只有走向经济军事化和战争的道路了。

准备战争

1952年1月，当时的美国第八军司令范弗里特上将曾向往访的菲律宾代表团说了一句极其“精采的”话：“朝鲜是一个绝好的地方。不但对于美国来说，而且对于世界上某一地方，没有一个朝鲜是不行的。”在这里也贯彻了克劳泽维茨所说的“战争是采取其他手段的政治的继续”这一原则，这就是说，上述各种情况驱使美国和李承晚选择了发动朝鲜战争的道路。美国之所以把朝鲜当作了由“冷战”转为“热战”的转折点，除上述各种原因以外，还可以举出朝鲜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李承晚政权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等原因。同时，朝鲜和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屯兵地日本的距离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

排除造成朝鲜分裂的责任者李承晚一派来实现统一的运动，在朝鲜全境积极展开，从李承晚政权的基础已在严重动摇的1949年中期起，李承晚公然叫嚣要举行“北伐”和“北进统一”。同时，在1949年7月25日，根据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罗伯茨少将的指示，在金锡源的指挥下的“韩国”军队向北朝鲜举行了相当大规模的进攻。据“韩国”政府原任内务部长官金孝锡称，当时美韩当局计划是：如果这一进攻获得成功即继续向北朝鲜深入推进。然而这一进攻计划，由于遭到人民共和国警备部队的强烈反击和上述南朝鲜各地游击队的猛烈进攻而宣告失败。因此，从同年11月开始，伪韩国军为确保后方安全而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游击队的

作战。由韩国軍和警察联合进行的这次作战一直繼續到 1950 年 2 月,其間,老百姓的房屋被破坏了四到五万栋,許多平民被迫成了流浪者或者被残杀了。但是游击队本身并未受到損失,他們的声势越来越壮大了。

和对后方的这种备战活动相配合,伪韩国軍曾在三八綫上繼續不断地进行挑衅。据金孝錫說,他从当时的伪韩国軍參謀总长蔡秉德那里直接听到,由 1949 年 1 月到战争爆发这段期間內“韩国”軍向北朝鮮进行的挑衅将近一千次之多。李承晚在 1949 年 12 月 30 日接見新聞記者时曾发表如下的好战言詞,他說:“我們必須在新的一年中获得統一。……我們到现在为止,为了保持和联合国的合作,曾力求通过談判来爭取国家的統一。但是到不得已的时候,我們將不辞流血和国内战争。万一不幸在今年中不能实现統一,我們將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来統一全国。”李承晚又在同年 10 月 17 日的記者招待会上指出,“韩国”軍的訓練正不断地取得成就,并且断言“韩国”軍可以在三天內占領平壤。

李承晚所自鳴得意的、并对其实力大肆吹噓的“韩国”軍,实际上是处在美国駐韓軍事顧問团团长罗伯茨少将指揮之下,它的装备和弹药完全仰賴美国供应。因此,李承晚大肆叫囂要用“韩国”軍征服北朝鮮,不用說,这决不是和美国的意图沒有关联的。1950 年 5 月 9 日在美国众議院拨款委员会會議上,美国經濟合作总署朝鮮分署署长約翰遜曾經作証說:用美国的装备武装起来、并由美国軍事顧問团訓練的十万韩国軍隊,随时都可以开始战争。同年 6 月視察三八綫的美国国务卿顧問杜勒斯也曾对“韩国”軍官兵說道:“你們能够大显身手的日子已經为期不远了”。从这些事实可以了解,李承晚确是极其忠实地反映了美国的意图。从 1949 年到 1950 年 6 月期間美国和李承晚在美国、日本和南朝鮮各地加紧进行了备战活动。

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朝鲜祖国战线在6月7日提出了第二次和平统一的呼吁，建议在8月5日到8日之间实行统一选举，被选出来的最高立法机关于8月15日在汉城召开会议。为了传达这项建议，6月10日特派代表二人和新闻记者一人前往南朝鲜。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了“韩国”政府的阻挠，三名代表全被逮捕。于是，6月19日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又提出了第三次和平统一的建议。这次努力也完全没有受到理睬。

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25日拂晓，南朝鲜军在三八线全线向北朝鲜开始了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最初是用警备部队进行反击，接着就由人民军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南朝鲜军把所有的八个师之中的五个师配置在三八线全线上，其余几个师也配置在汉城和三八线附近，并且把大部分物资和装备也都集中在三八线附近。这种情况证明南朝鲜军纯粹采取了进攻的阵势，同时，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南朝鲜军在三八线附近最初的激战中遭到失败以后，转瞬间就损失了大半兵员、装备和物资，以至于一败涂地。

当南朝鲜军在实际上已经崩溃的时候，美国就公然开始了武装干涉。本来，南北两政权的武力冲突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其遗憾的，这并不是国际法上所说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在同一民族内部的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冲突——是具有国内战争性质的事件。然而，这个没有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朝鲜的内部纷争，由于美国的公开干涉而使战争之性质为之一变了。这一战争，对朝鲜人民来说，已经由针对挑起内战的李承晚一派的斗争转变为反抗外国侵略者解放朝鲜南部的战争了。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对事态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就断定“北朝鲜军侵入南朝鲜是破

坏和平”，并于 27 日午后以七比一和弃权二票(埃及和印度)的多数通过了对于南朝鲜的军事援助。7 月 7 日又决定设立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美国对于朝鲜的军事干涉，根据联合国的这项决议，以“联合国警察行动”的名义付诸实施了。然而，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议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合法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并且，从联合国军的组成上看，地上部队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四七是美国和南朝鲜的部队，其他各国的出兵“只是象征性的”(麦克阿瑟语)。同时，出兵的国家也只有十六个，对于原来五十九国以后增加为六十国的全体会员国来说，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称“联合国的警察行动”，是有许多问题的。不仅如此，美国早在安理会作出上述决议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行动。杜鲁门正式向美军发出进攻朝鲜的命令，是 6 月 27 日下午安全理事会作出决议的数小时以前，而实际上美国空军早在 6 月 26 日的凌晨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就这样，联合国的旗帜被美国帝国主义用作它公然侵略朝鲜的遮羞布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武装干涉的开始，使处于崩溃前夕的李承晚政权暂时摆脱了困难处境。同时，6 月 27 日杜鲁门所发表的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声明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措施，使台湾的蒋政权也得免于崩溃；另外，美国为了镇压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援助也有了飞速的加强。并且，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急速增加及其军事化，为以公开的大规模扩军和经济军事化为重点的国内战时体制的加强，为迫使北大西洋各国实行扩军和经济军事化施加压力，为欧洲统一军的创建和西德的重新武装——把西德军编入欧洲军，以及日本警备队的建立和公然加紧复活军国主义等等，起到了绝好的杠杆作用。因此，美国的战争政策在世界规模上前进了一步，美国的经济危机也暂时摆脱了危险状态。

然而，朝鮮戰爭並沒有成為美國真正的救星。不久，各種矛盾重又擴大再生產而襲擊了美國。朝鮮戰局違反了美國當初用“閃電戰”可以取得勝利的預料而陷於長期化，“聯合國軍”並曾一度被驅逐到半島的最南端。美國侵略軍在9月登陸仁川以後，10月間曾深入到北朝鮮，由於長驅北進的結果，10月26日終於到达了中朝國境的楚山地區。但是，在乘勝前進的“聯合國軍”的面前，已經預伏下可怕的災難了。

戰局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同時，就表明了她和奮起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朝鮮人民之間有着血肉關係。在“聯合國軍”突破三八線的9月30日，又以周恩來總理的名義發出警告說，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朝鮮絕對不能置之不理。10月6日，印度總理尼赫魯也提出警告說：“美軍越過三八線將要引起中共軍的參戰”。“聯合國軍”，如上所述，並沒有理睬這些警告，仍然繼續北進，而於10月18日，由總司令麥克阿瑟向朝鮮人民軍最高統帥金日成發出了無條件投降的勸告。當此緊要關頭，在中國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伟大運動，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向朝鮮戰場進軍了。中國方面認為：美國正在從朝鮮、越南、台灣三方面向中國進攻，其中，朝鮮最關緊要，對美軍的侵略朝鮮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另一方面，暫時被迫後撤的朝鮮人民軍也在後方人民的支持和支援之下，在清川江以北的山岳地帶進行了休整和補充，完成了反攻準備。做好了準備的朝中人民軍，針對着“聯合國軍”11月24日的“聖誕節攻勢”開始總反攻了。在這次戰役中，“聯合國軍”被打得落花流水，造成了戰史上罕見的慘敗的記錄而由海陸兩路向三八線以南潰退了。美國第八軍軍長瓦克陣亡，戰局急轉直下，戰爭的主導權落到朝中人民軍的手里

了。1951年春以后，“联合国军”被迫转入大量消耗的阵地战中。6月22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中指出：“（美国）在朝鲜进行的‘有限战争’头一年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太平洋战争当时的损失。”3月12日，美国第八军军长李奇微也宣称，如果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对于“联合国军”来说，就是辉煌的胜利。

停战谈判的开始

美国在朝鲜的严重军事失败，一方面加深了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对立。特别是英国，它对于麦克阿瑟所代表的美国的好战倾向表示了越来越严重的责难和攻击。美国在1951年2月1日虽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利用机械多数通过了“谴责中共的决议”，但是英法等国在这段期间所采取的顽强的拖延政策，已经使美国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滋味。4月11日，麦克阿瑟元帅突然被撤职了。这是在朝鲜作战失败的责任和上述各种矛盾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的结果。麦克阿瑟将军的悲剧，象征着美国战争政策已经开始破产了。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了交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的建议。始终一贯争取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朝、中方面，和由于战争政策的严重破产而正在寻求“光荣的停战”的美国政府都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样，从7月10日起，在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

停战谈判的开始，对于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平统一的朝鲜人民来说，是向胜利前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意味着，站在反对立场上的美国和李承晚一派的重大失败。朝鲜人民所以能够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打倒德日两大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狠狠地打回去，把朝鲜问题引向了谈判解决的道路上，第一，是因为北朝鲜人

民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为了和平和解放祖国而团结起来的全体人民发挥了无比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是因为受到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

美国不仅未能战胜朝鲜人民，反而遭到了惨重打击这一事实，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表明了：在暴风雨般的亚洲民族革命的面前，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作为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而狂妄自大的美国，在团结起来的人民面前，实际上又是如何的软弱无力。朝鲜人民的这种英勇斗争，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巨大影响。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不仅席卷了走在运动前面的越南人民的斗争已经进入高潮的亚洲各国，同时也扩大到了中近东、北非和中部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由于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除了菲律宾和泰国以外，亚洲各国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尽管遭到美国的胁迫，还是拒绝向朝鲜派兵，并且发表了中立宣言。

如上所述，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才算暂时得以规避了它对朝鲜和远东地区的政策的破产，它的战争体制在世界规模上前进了一步。由此，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曾经发了多大的战争横财，可以由下列事实窥见一斑：以纳税后的战争利润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二百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四百八十亿美元，而在这次朝鲜战争中竟达到了五百八十亿美元之巨。然而，“用剥削其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并有系统地剥夺他们；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斯大林）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政策，反过来，更加扩大了它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它的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危机。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在朝鲜战局的演变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它的对立物——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飞

跃发展及其压倒战争势力这个事实上。

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

当北大西洋公约已经签字，“冷战”转为“热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加剧了的时候，1949年4月20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举行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把这一保卫和平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1950年3月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禁止使用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个宣言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支持，到1950年11月召开的华沙大会为止，拥护这个宣言的签名已经达到五万万人。

在“麦克阿瑟攻势”遭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失败的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记者时宣称他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然而，由于上述五亿人民的坚决反对以及受到这种压力的英法统治阶级公然反对的结果，美国使用原子弹的企图完全被制止了。这一事实和朝鲜及中国人民在军事上的胜利，证明了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制止战争势力的程度。全世界的保卫和平运动，经过1950年的华沙大会、1951年2月的柏林会议、1952年10月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同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而逐步走向高潮，“用谈判方式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呼声。

另一方面，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转折点，美国经济的军事化、公然大肆扩军及其强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重整军备、压价收购原料物资、禁止东西方贸易的高压政策，使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到达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助长了国际收支的逆差，加深了经济危机。在美国，从1951年春季以后，由于扩军而引起的危机也有所加深。因此，除美国以外的西欧各国都纷纷提出了延期扩

张軍备和扩大东西方貿易的强烈要求。1950年12月,美国总统杜魯門发布了向社会主义陣营禁运战略物資的命令。这件事,由于1951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人民中国禁运法案和同年10月巴特尔法的成立,发展为整个“自由世界”对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全面禁运,从而使东西方貿易急剧下降了。例如,西欧各国对东欧各国貿易額,按照1950年的价格計算,出口方面由1938年的二十五亿美元减为六万一千九百万美元,进口在同期內由十亿零四千五百万美元减为六亿零九百万美元了。由于經濟封鎖而受到打击的仅仅是資本主义陣营自己。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家,則由于經濟上团結一致,結成了經濟合作和互相援助的关系,反而更加促进了它們的經濟发展。

企图突破美国的經濟封鎖政策并在扩大东西方貿易方面寻求出路的西欧各国和各个落后国家的和平力量的努力,和要求进行平等互惠的貿易,以便为世界和平打下經濟基础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努力互相結合起来,于1952年4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經濟会議。尽管美国和受到它的压力的資本主义各国政府曾經进行了阻挠,但仍然有四十九个国家的四百七十一名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議(主要国家中未派代表出席的只有美国占領下的日本和西德),并且,不问其經濟制度和社会制度如何,与会者一致就有关恢复和发展經濟关系問題进行了认真的討論,其結果,达成了二亿英鎊以上的交易。同时还决定成立常設的国际貿易促进委员会,以便进一步促进东西方之間的貿易。

莫斯科經濟会議的巨大成就,恰好說明了美国战争政策的破产。这次会議所显示的扩大东西方貿易的可能性和世界經濟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使美国战争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巨大的裂痕,为两种体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这样,朝鮮战争的爆发,显然促使美国帝国主义制度本身所固

有的危机进一步发展了。

第二节 日本的重新武装

警察预备队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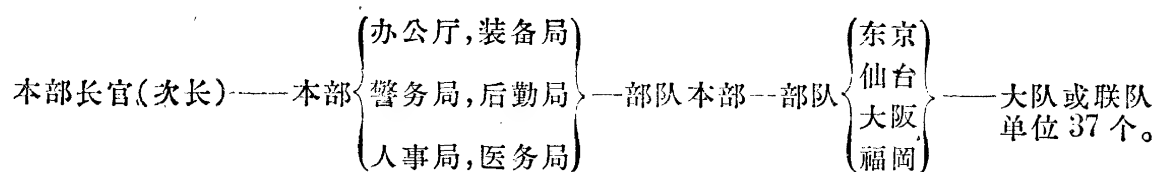
美軍和南朝鮮軍在朝鮮半島开始軍事行动两个星期以后，1950年7月8日，联合国軍总司令麦克阿瑟指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拥有七万五千人的警察预备队，并把海上保安厅的人員增加八千人。他在指令中說：“日本之所以保持平靜和沉着，沒有象邻近各国一样陷于暴力、混乱和无秩序状态，是由于編练得很好的警察的效率和日本人守法的精神。为了維持这种良好状态，不給慣常违法和扰乱和平与公安的少数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我确信，日本警察組織已經到了在維持民主主义社会公安所必需的限度內，必須扩充和加强的地步。”这样，在8月10日，日本政府不通过法律而以波茨坦政令的形式公布了警察预备队令（1950年即昭和25年第二百六十号政令），同月23日已有七千名队员首批入队。

这一政令依据麦克阿瑟的指令在第一条（关于目的）中规定：“这项政令是为了在維持我国的和平与秩序，保証公共福利所必需的限度以内，补充国家地方警察和自治体警察”而頒布的；它的任务是“在維持治安上有特別必要时”，采取行动（第三条第一款）；它的“活动应限于警察任务的范围以内”（第三条第二款）。然而，麦克阿瑟的指令和政令的条文所說的，以加强国内警察力量为目的而建立的这支预备队，在性质上，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統治工具的殖民地軍隊的本质。也就是說，由于朝鮮战争开始以后，占領日本的美軍仅仅留下三千人，其余都开赴朝鮮作战，因此警察预备队的直接目的是在国内“維持治安”。吉田茂首相在7月18日的第八次国会参議院會議上发言說：“鉴于

朝鮮問題等情况，共产軍有侵犯日本国土或扰乱治安的危險，加强警察力量，就是为了防备这种突发的事变”。这样，日本政府在宣传北朝鮮“侵略”南朝鮮的同时，又把针对所謂“共产主义的威胁”自力“保卫”日本，当作了建立警察预备队的表面理由。

然而，这支警察预备队，不仅是“保卫”日本，而且从本质上看，又是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并进而侵略朝鮮、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具。麦克阿瑟在 1950 年的新年談話中曾經強調日本国民的“自卫权”，实际上，从 1948 年开始，美軍总司令部即以利用日本的“人的資源”为目的，开始研究建立“日本軍”的問題，据說，参与美軍总部的“麦克阿瑟战史編纂室”工作的旧日本軍首脑人物們曾經研究了重建日本軍的問題。同时，韓森·鮑尔溫也公然說：“美国为了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应付局部战争，就不得不倚靠西德和日本的人的資源。因此，美国必須及早举行对日单独媾和，使日本担负起保卫自己的責任，同时提供基地，并以联合国的名义組織日本和其他外国的軍隊。”（《朝日新聞》1950 年 7 月 26 日）一切打算都是从美国的利害出发，甚至“联合国”本身也被当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8 月 19 日外务省发表的第二次外交白皮书里所說的“同联合国合作”，实际上无非是表示要“同美国合作”罢了。

在日本国内，“重新武装”的論調迅速地活跃起来，法务总裁大桥武夫 7 月 21 日在众議院外交委員會上說：“自卫权的行使是沒有限制的，所以組織志願軍也是可以的。”这句话說明，建立軍隊的問題在美国和日本統治者之間已經列入了日程。然而，或許是顾虑到輿論的反对，吉田首相却否认了这个事实。但在次年 1951 年 1 月 18 日，预备队长官增原惠吉宣布预备队将用輕机关枪装备起来，其相当于輕装备步兵的四个师兵力配置如下：



海上保安厅经过扩充以后，也拥有了排水量合计八万吨的二百艘舰艇和一万八千名人员，并设置了它的培训机关——海上保安大学。海上保安队接受了美国方面租借的武器，重点地配置在九州、北海道附近与共产主义势力范围毗邻的水域和地域。

这样，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在其表面目的的背后，实际上是根据美帝国主义的意图和需要而加强了。因此，这种加强，尽管是利用在朝鲜挑起战争的机会而迅速实行的，当然也还是具备了强烈的外国雇佣兵的性质。美国军部的直接指导，从战术理论直到队员的训练方法，可说是面面俱到，就连美国军队的用语 Camp（野营）、PX（随军零售店）也都照样搬用了。关于队员的待遇，尽管官方宣传薪水每月五千日元，退職金六万日元，并且每天供给 3,600 卡（热量）的伙食，但在实际上，到 1951 年 7 月为止，已经有相当于总人数百分之十四的一万余人退了职。据 1950 年 11 月底法务总裁在国会上宣称，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人员因为胸部疾病而被解雇了。这件事完全暴露了，这种队伍原封不动地采用了美国式的契约观念：投入募兵制军队的人们，不问其理由如何，只要不合条件就要遭到解雇。

日本国民深深怀疑，预备队是否会被派到海外去，充当美国军队的附庸。根据 1950 年 9 月《每日新闻》所作的舆论调查，赞成建立仅仅驻守国内的志愿兵的人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七，而赞成派往国外的只有百分之十四点八。为了逃避人民的反对，政府曾经宣称：“我们只是说支持联合国的和平政策，并没有说要参加战争”（7 月 15 日吉田首相在众议院会议上的答辞）。然而任何人都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支队伍是殖民地式的军队，是复活日本帝国主义

軍隊的萌芽。

政府在建立警察预备队的同时，还加强了警察力量。7月31日政府修改海关法，使海关人员携带武器；8月1日赋予铁路公安人员在铁路设施范围内的司法警察权，并使其携带手枪；9月30日又设立进出境管理厅，企图把政府所不喜欢的外国人、特别是朝鲜人，逐出国外。此外，还在8月间把1948年2月设立的特别审查局的成员增加到一千二百人，以便加强对思想的镇压。

在建立警察预备队的同时又考虑修改警察制度的吉田政府的意图，是要废除自治体的警察，使其归并于国家警察，以便在国家权力之下随心所欲地使用警察力量。1951年2月政府修改了警察法，规定在通过居民投票废除自治体警察时，可以用国家警察来代替。据此，到7月为止，全国自治体的警察已有百分之八十被编入了国家警察。麦克阿瑟于1947年曾命令日本政府改革警察制度，当时他说：“建立并维持以站在一般群众控制以外的行政长官为首长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的警察官僚制度，正如日本过去封建时代一样，将是近代极权主义独裁制的显著的特点。”（给片山首相的信件）然而，为时不久，又开始复活这种警察制度了。

“日美经济合作”

朝鲜战争的开始，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成为反共体系重要环节的地位，这使得美国的占领政策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也就是说，通过1949年道奇路线的施行和“经济九原则”的确立，以实现所谓“自立经济”为目标而前进的日本经济，由于战争的开始，更加显示了它在美国军备体系之中的附庸的地位和职能。

日本作为美军、“联合国军”的兵站基地的地位，加强了日本资本主义作为美国扩军计划一部分任务的担当者的性质。《外交政策公报》的评论（1951年6月）中曾经指出，日本“作为联合国军的兵

站基地和联合国空軍的进攻基地”“在战略上是极其有用的”；实际上，日本的地位，用不着这一指出就已經决定了。美国根据它的基本方針，在“日美經濟合作”的名义下，早已决定把日本的工业生产力——重点是軍需生产——用来加强反共体系，并且已經这样实行了。

1951年1月下旬，美国国务卿顧問杜勒斯訪問日本和麦克阿瑟进行商談的时候，据推测，曾就日本能否对西欧的軍备計劃作出貢獻一事，談到了編制生产項目表的問題。3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會議决定使日本制造軍需品，并规定了“无限制地供給原料，使日本生产輔助性軍需物資”的方針。这个方針的具体表现就是5月16日的美軍总司令部經濟科学局长麦卡特的声明。在声明中，麦卡特把生产物資分成了五种不同的等級，其中，第一类是美国政府的軍需物資，第二类是駐日美軍的軍需物資，第三类是日本警察預备队的軍需物資，第四类是换取原料所必需的对外出口物品，第五类是供应日本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同时还暗示，日本的貿易应向东南亚各国发展，以便代替处于几乎完全禁运状态的对华和对苏貿易。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使日本的工业首先生产美国政府的軍需物資；而日本人民的消費物資則被列为最后一級。并且，由于对华貿易被禁止，日本如果向美国采购原料，那么原料成本就要提高到三倍以上，而对东南亚的貿易又难免和英国发生冲突，無論从那一点来看，这都是迫使日本工业从属于美国的軍事体系的。不仅如此，日美之間的交易是以保証美国垄断資本的超額利潤为基础的。因此，給美国軍需工业加工生产的日本垄断資本，被压价收购低于生产成本，就連日本的垄断資本家也受到了打击。

由于对美国軍需工业的这种从属关系，日本垄断資本继朝鮮战争中的“特需”(軍需訂貨)景气之后，又在“日美經濟合作”的口号下，接受了許多軍需品——“新特需”的訂貨。因此，在太平洋

战争以后被关闭了的日本軍需工业又都陸續开工了。其中，生产飞机的企业有：属于旧三菱重工业的中部日本重工业公司、旧中島飞机公司的富士工业公司以及川崎机械制造公司、新明和兴业公司；生产枪炮和防弹鋼板的有：日本制鋼所、日本特殊鋼、日立制作所、新大同制鋼、神戶制鋼、长崎制鋼等企业；生产軍用車輛的企业有：东日本重工业、日立制作所、日野內燃机等企业；生产枪支、炸弹的有：日立工作母机、日平产业、日本制鋼所、神戶制鋼所、新扶桑金属等企业；生产电波計器的有：东芝电机、东芝計器等企业；生产火药的有：日本化学、日本高氯酸銨炸药等企业；生产舰船的有：川崎重工业、西日本重工业、中部日本重工业、日立造船等企业。以上这些都是作为“軍需企业”而为人們所称道了。（岡仓古志郎：《贩卖死亡的日本商人》）日本化学药品公司總經理原安三郎曾經說道：“我們在医院住了六年，住院費由美国代付了，现在两腿痊愈，可以走路了”；兴业銀行總經理川北禎一表示支持說：“日本必須积极地加强开发东南亚的具体活动，以及对于美国国防生产的协力体制。”（《东京新聞》1951年12月31日）1951年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作証說：“自由世界对于它获得許多战略物資的亚洲地区进行援助是极其必要的，尤其日本的潜在工业力量更是关键所在。……情况十分明显，必須对亚洲地区給予紧急的軍事援助；而恢复日本的主权也是极关重要的”。1951年10月22日美軍总部經濟計劃处长夏伍德法因在紐約远东商会的聚会上发表的演說中有这样一段話：“日本在东方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并成为亚洲工业中心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这个国家对世界的这一地区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上面这段話无非是露骨地表明了美国使日本为它的意图服务。

为了推行这种經濟軍事化政策，在財政方面，增加了防卫分担費和预备队經費等項的軍事开支。銀行資本一方面对于垄断資本

采取超額貸款的通貨膨脹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大大削減了对中小企业的貸款。同时，为了供应电力、海运、鋼鐵、机械等基本工业的设备資金，曾充分利用了“美援物資”处理价款和資金运用部、开发銀行以及长期信貸銀行的財政資金。另一方面，美国却在 1951 年 12 月援用出口貿易管理令禁止了日本的对华貿易。就这样，作为“特需”的交換条件，日本經濟越发成了美国經濟的附庸，由于从美元地区大量进口了高价的食物和原料（粘結炭、鉄矿石、特别是棉花），不能不造成巨額的入超。这种貿易上的逆差，只是依靠“特需”訂貨和妓女出卖色相才能勉强地得到弥补。在这中間真正得到利潤的，只限于追随美国实行經濟軍事化以攫取最大限度利潤的壟斷資本；而在壟斷資本实行軍事化的进程中遭到严重剝削的中小企业家、工人和农民中間，要求实现全面媾和和全面恢复中日貿易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了。

开 倒 車

日本政府在建立警察預备队和实行經濟軍事化的同时，还采取了被称为“开倒車”的加强反动势力的一系列措施。美国帝国主义为了使日本成为坚固的軍事基地，必須把它在五年以前所采取的旨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并使之从属于美国的“民主化”政策“向后轉”了。当然，表面上属于“向后轉”的这种现象，实际上无非是迫使日本殖民地化的美国帝国主义向日本分配了新的軍事任务而已。因为“民主化”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化，从而，所謂“向后轉”也并非意味着从民主化的方向“向后轉”。

把驅使日本人民投入太平洋战争并迫使他們陷于貧困和倒霉的軍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从公职上清洗出去的整肅令，现在不仅轉用于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領導者的头上，而且受到整肅的軍国主义者又陸續不断地开始恢复活动了。

根据整肃令，到 1948 年 5 月为止，决定被整肃的约为二十万人，但在 1949 年 2 月，重又設立了“恢复公职資格审查委员会”，对于三万二千零八十九件申請进行了审查。但是，到了 1950 年 10 月，经过总司令部的完全同意，政府公布了解除对一部分人的整肃。根据这次公布，被解除整肃的共有一万零九十人，其中，与陆海軍有关者三千零七十二人，属于右翼团体者一百零七人，属于翼賛会、翼賛壯年团者二千二百六十八人，国外“开发”机关有关者一百十四人，經濟界有关者五百三十九人，言論报国有关者二百二十一人，战时政府推荐議員四十六人，在乡軍人三千四百五十六人，武德会分子二百二十一人。

接着，于 21 日，作为甲級战犯在巢鴨監獄服刑中的重光葵受到假释而出了獄；11 月 30 日，原来的职业軍人之中有三千二百九十七人被解除了整肃。其中大部分人作为骨干陸續参加了創立不久的警察预备队。

战敗以后，占領制度即使是在表明态度的程度上，总算把战争責任者从公职上开除出去了。但由于締結和約被具体地列入日程和朝鮮战争的开始，美国統治者显然希望复活日本軍国主义了。在这个时期，解除整肃所产生的效果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首先在政界，由于解除整肃，反动势力有了显著的加强。民主党迎接了属于該党的被解除整肃者三十人，17 日原来的該党干事长地崎宇三郎也恢复党籍了。鶴見佑輔、中島弥团次、野田武夫等十二人組成了“时局悬談会”，对于民主党要求他們回到党内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但是，他們这种建立新党的工作，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以民主党为基础的方針。自由党也对于被解除整肃的人們积极展开了劝誘入党的工作，其結果，安藤正純、牧野良三、大久保留次郎、金光庸夫、平塚常次郎等人同意入党了。社会党方面，由于战争时期通过产业报国会等为軍部效力而受到整肃处分的人們都相

继恢复了公权，加强了右派的比重。政界的解除率约为申请数字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率数虽较经济界、言论界为低；但在事实上，由于这些被解除者拥有的根深蒂固的地盘，因此他们在推动重新武装，使政治走向反动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些被解除整肃者之中，原来在官厅中任职的又都回到了原来的官厅；拥有经济力量的则作为保守派的国会议员而开始了活动。

这样对政界人物解除整肃的影响已使开倒车的倾向表面化了，而对于旧军人解除整肃则产生了更加露骨的影响。旧职业军人之中，除了和美国机关勾结为美军效力者以外，在一个时期里，甚至不能公开地召开同期生会。然而，作为重新武装的第一步建立警察预备队的时候，从旧军人中间寻求了干部。一部原来的青年军官一经解除立即加入警察预备队，甚至有人公开地说道：“我将向警察预备队灌输大和魂”。这些恢复了公权的旧军人，属于陆军方面的按照毕业年份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同期生会，1952年8月以后，又相继组织了同学会的联合组织“偕行会”，并且发行了机关报《偕行》。属于海军的分子，也在1952年9月成立了“水交会”。

在预备队内部，虽然采取了文官优越制，但是掌握预备队实权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对于具有军事才能的旧军人当然要加以重视，旧军人的比重逐步增加，他们的恢复公权形成了对重新武装的推动力量。

解除整肃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1951年5月1日，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同意了日本政府拥有对一切波茨坦政令的审查修改权。据此，政府于1月6日研究讨论了整肃问题，并决定解除了对将近七万人的整肃，8日，又继续解除了对十万三千人的整肃，其中包括旧军人大约四千人。这样，到1952年4月片面对日和约生效时为止；已经有二十万零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获得解除，占被整肃者二十万二千零八十二人的绝大部分。而且，特务警察、

办理思想案件的檢察官員也全部获得解除。对于作为所謂符合备忘录^①条款者而被保留的七十三件，1951年6月16日美軍总部曾交給日本政府一份关于撤回备忘录案件的备忘录，于是，鳩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人也被解除了。同月9日，政府又修改了教職員整肃令，决定了解除教職員整肃的标准。經過这些准备工作，6月22日解除了D項(翼贊会有关者)和G項(大臣、官吏、特务警察、思想檢察官員、言論界分子、經濟界分子、推荐議員、在乡軍人会有关者)的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人的整肃，与此同时，政府还发表了解除整肃的基本方針。这样，解除整肃在召开旧金山媾和會議的前夕，对于日本建立备战体制和政治上开倒車的趋向給予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特別表现在右翼团体的陆續复活上面，继“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1947年3月)和“大和党”(1947年5月)之后，1951年5月又成立了“新日本国民同盟”，8月成立了“协和党”，还有“勤皇精誠团体会”、“大日本生产党”和“爱国社”的“民族新生运动”。及至临近和約生效的1952年2月，赤尾敏組織了“全日本反共联盟总本部”，据說，这类右翼团体共有二百七十个之多。

以往，日本的右翼运动是和軍部、官僚相勾結，并在他們的庇护之下，也只是散布一些法西斯气氛而已，沒有能够形成群众运动。战后的右翼运动，在这一点上依然如故。今天，不是仰賴軍部而是仰賴垄断資本家的資助而勉强得以維持的这些組織，虽然也发出叫嚷“高举日本国旗过五一节”，但是它們並沒有和工会組織及其他民众运动相对抗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7月間成立的以国营鉄路的独立青年同盟为中心的爱国工人运动。他們和鍋山貞亲等反共运动的头目以及社会党右派互相勾結，企图用暴

① 指1946年盟軍統帥关于整肃不适于担任公职者的备忘录。——譯者

力向工会运动进行破坏和寻衅。然而，他們的阴谋活动，由于朝鮮战争的进展而带来的加强劳动强度；由于处在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穷困之中而要求和平的工人群众的奋起，而遭到失败了。甚至在一度成为爱国工人运动的中心的国营铁路工会里，他們的阴谋活动也沒有得逞。

整肃共产党

朝鮮战争刚开始，政府即以整肃共产党的名义，从新聞、广播、通信系統下手，逐漸扩大到一切产业部門，公然对战斗的工人实行了解雇。下面还要談到，占领軍在整肃共产党中央委員和禁止《赤旗报》发行的同时，还从各种企业中整肃了共产党的基层組織，切断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以便阻止工人对战争中势必发生的物价上涨和加强劳动强度的不滿，并防止他們反对战争的活动。

1950年7月，在朝鮮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召开的日本工会总評議會(簡称“总評”)成立大会，采取了如下的态度：“虽然反对北朝鮮軍侵犯三八綫挑起战争，但鉴于处于占领下的日本的现状，‘总評’决定不参与战争”，另外还通过了这样一些綱領：“通过国际自由工联爭取工人的国际团結”和“反对日本的軍事基地化，反对重新武装，爭取日本的和平与独立”。这种情况，恐怕不能使得把总評培植起来的占领軍感到滿意。但是，参加“总評”的各工会組織的基层情况，是不允許“总評”干部的进一步右傾。

通过1949年的大规模斗争，軍事占领的眞象已經在工人面前暴露无遺，要求日本民族完全独立的思想已經深入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間。尤其是未曾遭受前年度大量整肃的企业——现在成了“总評”的主力——即煤炭、电力、化学、私营铁路、鋼鉄等巨大企业的职工中，共产党的基层組織依然坚强有力，虽然由于党内派系之爭，某些組織力量受到削弱，但一般干部的領導权也并不巩固，而

在工人中間已經有了自发的感觉，知道战争將給工人阶级带来什么后果。如果在这个事实面前，再采取肯定战争的路綫，則在总評內部，至少，在从主观上想要保护工人利益的有良心的干部和所謂“舶来民同”（和占领軍与資本家保持密切联系、企图扼杀工人利益的、大部分是由外国回来的干部）的恶劣干部之間，将要产生对立，并且很可能加速后者的沒落。因此，占领軍迫切感到，必須及早破坏共产党基层組織的活动，以阻止他們按照工人的要求把工人組織起来，提高工人的觉悟，而給朝鮮战争带来极大的障碍。然而，由于战争所带来的景气，想要采取 1949 年那样的、以营业不振为理由实行包括共产党员和各个崗位上的积极分子在內的相当数量的解雇，已經是不可能了。于是，政府便蹂躪了宪法上所规定的思想和信仰自由，蛮橫地推进了专门以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为对象的“整肃共产党”的政策。

占领軍照例采取了間接的办法。占领軍总司令部劳动科人員召集各資本家，向他們強調指出整肃“赤色分子”是經營者的責任。他們的表面工作就止于此，据說，是否实行“整肃”，那是經營者的“自由”。如果对于恐惧对立而不敢实行整肃的“不負責任的經營者”在資金、器材、訂貨各方面給予不利的差別对待，那也是美軍总司令部和政府的“自由”。如果由于“某些煽动者”的煽动而展开斗争反对整肃的工会組織受到彻底的鎮压，那也是工会組織的“自由”。对于被整肃者提出暫緩执行禁止上班的申請，或以违反宪法为理由提起取消解雇的控告，則一概不許受理。以上这些就是占领軍当局的方針。

整肃首先是从新聞广播部門开始实行的。在勒令《赤旗报》及其后继基层报刊停刊上面表现出来的压力，足以强制实行这一整肃。但是，对于共产党基层組織受到在业工人热烈支持的大企业，是否也可能同样地进行整肃，仍然还存在着問題。在这种意义

上，构成产业別工会會議的金属工会的核心——日立工会总联合会工人的解雇，就成了注目的焦点。5月15日，接到解雇五千五百五十五名职工的通告以后，日立工会总联合会即以日立地区的三个工厂为中心展开了极其坚强的斗争。由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地方官宪也对之束手无策。然而，由于斗争拖延，又得不到“总評”系统工会的任何支援，以致在财政上发生了困难的情况下，某些会员之间发生了动摇。官宪乘机于7月1日以非法进入工厂的罪名逮捕了工会副主席小林等战斗的干部，企图一举而解决这次纠纷。对此，愤怒的工人和市民自发地展开了二万人的群众性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干部，但是因为领导人遭到逮捕，缺乏适当的领导以致斗争力量逐渐减弱，于8月10日终于接受了解雇。日立工人的失败使此后的镇压非常易于实行了。和日立同样属于强有力的金属企业的工会组织——富士产业公司三鹰工厂工会，在保卫和平产业的口号下所进行的长期的反对解雇的斗争也终于失败了。

8月30日，占领军下令解散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并将全递信工会前任主席土桥一吉及其他干部加以整肃，推毁了反对“整肃共产党”斗争的核心。对于电产工会，官宪以保卫工厂免于共产党员破坏为名，把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包工头田中清玄的党羽配置在各个发电站——后来对于他们的报酬引起了非法开支的问题——并配备了手持卡宾枪、头戴钢盔的守卫人员和装上铁丝网，来威胁群众，借以实行整肃，属于民主化同盟派的主席藤田发出了特别指令对此进行了协助。接着，又从各企业中整肃了一千二百名积极分子。共产党曾力图组织反对整肃的斗争，但“民同派”的大部分人都避免给予支持，尤其是其中一部分人，更和监工勾结起来，宣传反对整肃就是反抗占领军，向群众进行威胁。而工人也认为进行反对整肃的活动有被当成同谋者而变为整肃对象的危险，

未便公开地进行反对。因而，反对解雇的斗争在事前没有开展起来，而在解雇名单发表以后，干部們也只能在一般工人默默支持下，排除以抗拒禁令非法进入車間为名企图逮捕的官方的种种干涉，进入車間，向群众宣传“整肃共产党”的阶级意义，呼吁群众起来斗争而已，并未能超过这个限度，使斗争进一步开展起来。这些被解雇者的激烈斗争，虽然使得許多积极分子遭到逮捕，但是，斗争进行得較好的地方，在短期間内以非公开的形式重新建立了党的基层組織，同时，也使工人自然产生的对于占领軍的反感和对于朝鮮战争及其带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逐步恶化的不滿明确地結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以后使总評向左轉的巨大推动力量。

通貨膨胀和加强劳动强度

和官宪强行“整肃共产党”的同时，工人的处境，在“支援联合国”的口号下，急剧恶化了。9月3日，极右翼的海員工会已經作出了积极支援“联合国軍”的决定。“支援联合国”、“生产斗争”这些口号意味着什么，可以从数字上大致加以考察。

以朝鮮战争为轉折点，所有产业部門都获得了庞大的战时特別利潤，而这种利潤的来源是：低工資、靠加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時間来提高剝削率以及由于投机居奇而造成的物价暴涨。在物价方面，1951年2月与1950年1月相比較，批发价格暴涨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生产資料为百分之五十二点八，消費資料为百分之十七点六），而名义工資仅仅上升了百分之十，并且軍需工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金融業部門上升率較高，和平工业（紡織工业，制材木制品工业、食料品工业）較低，表现了上升的不平衡，实际工資仅仅上升了百分之一二。另一方面，由于加强劳动强度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百分之十三点三（矿业）至百分之三十一（工业）；劳动時間在机器工业部門延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

伤亡事故由 1949 年的五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四件增加到六十九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件(增加百分之二十),其中,死亡(占百分之二十七)和永远丧失劳动力者(占百分之五十八)的激增说明了这种伤亡数量之大和情况之严重。这样,以牺牲工人的生活、肉体以至于生命而换取的利潤显著增加了。其收益率在 1951 年上半期全部工业部門平均是百分之十六点九六(1950 年上半年为百分之六点七七,下半年为百分之十),其中紡織业是百分之三十三,化学工业是百分之三十,造紙业是百分之二十九点八五,矿业是百分之十八,以上这些如实地显示了“特需”出口景气。从而,平均股息也由 1949 年 5 月的百分之八点七二激增为 1951 年 4 月的百分之十七点三九了。

在一切工作場所,都借口建立現場紀律而加强了基层的监督网,提高了劳动强度。在监工的指揮之下,以消防队、防卫队的名义成立了法西斯組織,普遍建立起监工的監視网,有的工厂甚至委托特审局的成員兼任劳务科的职务而配置在工厂內。入厕和洗澡的时间縮短了,禁止夜間工作人員打瞌睡等等,彻底实行了“分秒必爭”的原則。工会活动受到限制,强迫工人在胸前佩带附有照片的名牌,工人出入邻近車間也在被禁止之列。如果有人对这些表示不滿或提出抗議,就要立即被降低勤务的分数——效率工資的核定标准,同时,还有遭受恐怖和失业的危險。職員与工人,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在待遇上的差別被不适当地扩大了;使工資制度变为固定的等級制的傾向加强了。其次,为了补充生产激增所引起的人員不足,普遍地采取了雇用临时工的办法,临时工在工作上从事与正式工人大致相同的劳动,虽然在表面上采取由公司直接雇用的形式,但在事实上,他們都属于供应劳力的包工业者——“組”(把头組織),而这种作法进一步促使正式工人的劳动条件趋于恶化了。在劳动条件这样一直恶化的情况下,各个企业都获得了庞

大的利潤，但是 1950 年下半年参加工人斗争的人数则仅仅是五十一万人，除了 12 月为要求年终津贴而参加斗争的人员较多以外，每月平均不超过六万人，还达不到 1948 年每月平均数的六分之一。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了，“整肃共产党”以及继此的对于工人运动的镇压是如何凶恶，工人和工会干部多么严重地失去了斗争的信心。

文化的反动化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动文化和右翼思想又公然出头露面，甚至对于殖民地文化政策久已司空见惯的人们也感到了吃惊。然而，所谓“复古论调”和“开倒车”的这种现象，不表现日本已经恢复其自主地位，而是表现作为朝鲜战争的军事基地的日本更加严重地走向殖民地化了。1950 年 8 月，首相吉田和文部相天野通过文教审议会委员高桥诚一郎、小泉信三、和辻哲郎等人发出指示，要培养“真正的爱国心和成为国家核心的健全精神的所有者”。政府的这种意图的最初表现就是从 1950 年 9 月开始使中小学校重新唱旧时代的“国歌”并“悬挂国旗”。

与此同时，一度在人民面前成为“凡人天皇”的裕仁，又被“神化”起来了。为此目的，反动派巧妙地利用了 1951 年 6 月贞明皇太后的葬礼以及立皇太子的典礼和他的外游。1951 年 10 月，天野文相把“教育敕语”的翻版，内称“天皇是国民道德的中心”云云的“国民道德实践要领”发给了各学校校长，也是这种政策的一个表现，但由于各界的反对，这一着遭到失败了。

政府在进行上述勾当的同时，为了给反动化、开倒车扫清道路，逐步加强了对于“障碍物”的镇压。1950 年 6 月，劳伦斯的小説《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被禁止发行，译者伊藤整和出版者小山久二郎以猥亵同谋罪而被提起了公訴。在这以前，石坂洋次郎的《石中

先生行狀記》和諾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都曾成了問題，只是由于輿論的反对才免于起訴；而对于《查特利夫人的情人》一书，則不顾一切反对而强行提起公訴了。此后，政府还利用朝鮮战争的机会陸續把一些与共产党机关报毫无关联的群众性政治、文化报纸《文化时报》、《民主日本》、《自由》、《和平之声》等多种报纸都当成《赤旗报》的化身而勒令停刊了。

现在，政府把先前对共产党和工会进行的“整肃”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学校方面来了。对于学校和学术自由的镇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1950年5月，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楠原繁曾发表过一次有关全面媾和的演说，而吉田首相竟給楠原扣上了一頂“曲学阿世”的帽子。自此以后，对学校方面“整肃共产党”的矛头，不仅共产党，而且指向了一切为争取和平、独立、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当“整肃共产党”的消息传来以后，学生们在“全学联”的领导下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对运动，其結果，“整肃共产党”暂时被制止了。但是，在此以后，当局重又开始镇压学生运动，并通过对于教员工会的分裂策动等繼續进行镇压。

1950年前后，是战后日本文化最为停滞不前和迷失方向的时期。对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起过独特作用的《日本評論》、《展望》、《世界評論》、《潮流》等刊物相继停刊；反之，充滿着“中間性作品”的《文艺春秋》杂志却有了发展。在文学的领域中，当战后盛极一时的所謂“战后文学”已經絕迹、民主主义文学陷于停滞的时候，由大量的中間小說和风俗小說充斥了报刊的版面。在《小說新潮》和《大众讀物》上鮮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傾向，是和战后一直彷徨在困苦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在初步安定下来的社会里开始寻求休息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小资产阶级要把仍然存在着的苦悶消除在酒和女人所造成的难以形容的气氛之中。因此，同是以酒和女人为题材的作品，在这样傾向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象太宰治和椎名麟

三郎等人所反映的那种向现代危机冲锋，或在混乱的秩序中自我分裂的苦恼。这一时期风靡了读书界的《战舰大和号》及其他战争故事，虽不能说完全不包含批判的意向，但整个说来，还是和赞美战争一脉相通的。至于回忆录的流行，例如《朝日新闻》连载《原敬日记》，《读卖新闻》连载币原喜重郎的《回忆录》的情况，无非是反映了：人们是在怀念着法西斯主义以前的安定时期——实际上那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母体——并想从那里寻求慰藉和休息。

第三节 对日和约的签订

准备单独媾和

在战争结束未久的 1946 年 2 月 8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首次谈到对日媾和问题，他说：对日和约一年以内可以签订，而占领日本还要继续十五年。然而，这句话并未实现，以后曾经不断地出现了各种探讨性的议论，至次年 1947 年 7 月 16 日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和会的预备会议的提议。这个提议抛弃了战争期间签订的波茨坦公告和战后莫斯科协定所决定的方式，——根据四国（中、苏、美、英）外长会议达成的协议（承认否决权）并取得全体交战国的赞成，——反而为了避免苏联等国行使否决权，把参加预备会议的国家限定为构成远东委员会的十一个国家，并且把这次会议作为不同于远东委员会的另外一个会议，从而不承认四大国的否决权。因此，这一建议受到了苏联的反对，其他大国也未表示积极赞成，以致这一交涉在 11 月间便完全停止了。1948 年 5 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1949 年 5 月和 6 月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提出了关于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问题的建议，但美国政府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反应，而在默默中不断地准备着事实上的单独媾和。

对日和約問題重新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是在二年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建立反共体系的 1949 年，特别是由于同年 9 月 13 日至 17 日之間英国外相貝文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举行的会談。17 日，貝文和艾奇逊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表示两人就早日召开和会簽訂对日和約問題，已經取得一致意见，同时还表明，即使沒有苏联参加也要准备召开这一會議。接着在 11 月 1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正在伦敦和华盛顿两地分別对对日和約进行審議。4 日，国务院东北亚司长又宣称：对日本的占領政策已經进入了第三阶段，日本已經作好接受和約的准备。据同一天来自馬尼拉的美联社电作为美軍总部高級官員的意见报道：在 1950 年年初，将在东京召开一次以麦克阿瑟为主席、有苏联参加的媾和會議：条約的内容很簡單，有可能締結一項从軍事上保卫日本的协定。次日的美联社电也透露了正在起草的和約草案的内容，包括美日两国将締結一項五年至十年的軍事协定。针对美日单独媾和并締結軍事协定的动向，11 月 6 日，苏联部长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提出了包括新中国在內的四大国举行會議，实行全面媾和的方針。这个时候日本正在召开第六届临时国会，吉田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說中曾經談到“拥有自卫权”的問題。当在野党議員集中地就媾和問題提出质詢时，他便以逃避的口吻回答說：“因为这是假設的問題，无法答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11 月 11 日的參議院全体會議上却說他“贊成作为全面媾和之前提的单独讲和”。

但是，对于美国国务院准备对日媾和工作，国防部持有反对意见。据說 11 月 10 日在巴黎召开的三国外长會議，沒有把对日媾和列入議題，主要是由于这两者之間的意见对立。然而，这并不是本质上的对立，只是由于欧洲第一方針和亚洲第一方針的战略思想上的不同：一个主张以“媾和”的形式，代替占領的形式，来繼續

統治日本；另一个主张以繼續直接占領的形式来繼續进行統治，而在統治日本，使其从属于美国并成为美国的軍事基地这一点上，两者并无分歧。

1950年1月1日，麦克阿瑟在新年談話中提到新中国的成立和对日和会的延迟召开，是使日本人民陷于不安的两个問題。他还說：新宪法的规定：“無論根据任何理由，都絕對不能解释为全面否定了对于敌人发动的进攻进行自卫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談話。构成这次談話背景的是朝鮮問題；从而也是美国加紧促使日本軍事基地化問題。1月15日到达日本的以杰塞普大使为首的远东問題諮詢委員會，視察了亚洲各地，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开始重新全面地检查，并于13日視察了朝鮮的三八綫，16日在台湾会见了蔣介石。另外，參謀长联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也于31日和麦克阿瑟举行會談，并視察了远东地区。吉田首相早在23日就在国会中表示不放弃自卫权，接受了麦克阿瑟新年談話的意图。情况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朝鮮战争爆发后不久的9月9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拉斯克发表了美国远东政策十一項原則，他表示“着手解决对日媾和問題的时机，已經到来”，同月14日，杜魯門总统指令美国政府就对日媾和問題开始談判。这个事实說明，以朝鮮战争爆发所带来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美国統治階級已經迅速地开始把日本納入自己陣营以內了。

10月26日，美国国务卿顧問杜勒斯根据“对日媾和七原則”和远东委員會成員国开始了预备會談。上述原則里规定：“在由联合国实际負責的令人滿意的其他有关安全保障的协定尚未締結以前，为了維持日本領域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保障，我們將繼續担負使日本的設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軍隊之間密切合作的責任”。这段話比較含糊，真正意图是使各国承认美国在媾和后繼續在日本

駐兵。当这一問題受到苏联的指摘以后,1951年1月1日杜勒斯又宣称,作为“保障”締結对日和約免遭苏联的“阻挠”的方法,正在研究日本和参加对日战争的各国之間分別締結一連串的和約問題。(美联社电)9日,英联邦首相會議作出了早日締結“宽大”的对日和約的決議以后,紧接着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席会议也宣布国防部同意了国务院的以下见解:“归根結柢,美国从自由而友好的日本比从丧失了独立的日本可能得到更大的安全保障”,并建議总统派杜勒斯前往日本,于是,就在11月25日杜勒斯訪問了日本。杜勒斯和吉田茂会談了三次,其結果于2月2日发表談話說,双方达成了六項協議。

杜勒斯在这次談話中說:“在这次会談中,美方表示:(一)在和約締結以后,为了保卫沒有軍备的日本,日美两国将締結暫定的安全保障协定。在这方面,还可以全面考虑締結具有某种性质的地区性的以及集体的安全保障协定;(二)关于保障日本的安全問題,美方表示‘如果日本希望,美国政府可以考虑在日本国内及其周边駐扎美軍’,对此,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关于締結美軍繼續駐扎和安全保障的协定問題,尽管吉田首相不久表示,由于日本的国力不能承担,所以暫時将采取經濟合作的形式,但这种作法却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和日本統治集团的真正意图。杜勒斯在由日本归国的途中,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說:“禁止日本重新武装将会招致相反的效果,必須进行努力把日本置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其在将来拥有軍备时,可以被納入联合国范围内的集体安全保障計劃以内。”这是积极支持日本重新武装的态度。对于惧怕日本重新武装的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輿論,他說什么把日本納入太平洋公約組織,就可以防止危險。

美国接着就分別同各国开始了交涉,3月19日艾奇逊到英国,和英国政府之間就美国对日和約草案交換了意見。3月23日,

美国大使賽鮑尔向吉田报告了华盛顿方面起草和約草案的情况，以及各国，特别是英、菲、澳等国的反应。这些国家都是美国陣营中在对日問題上非常敏感的国家，实际上，1951年4月5日合众社所透露的美国的第一次草案，已經在这些国家里引起了不滿。英国惧怕日本向东南亚扩张，并且，关于解决台湾的归属問題，也曾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會議。菲律宾指責美国草案沒有明确规定日本的賠償义务，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这个草案已經超出了宽大的范围，給人以友好条約的印象。”而澳大利亚則对于使日本实行无限制的重新武装感到恐惧。这种反对，正如1950年11月9日合众社电所指出的，“构成美国的障碍之一是，各国都在担心美国是否想要允許日本彻底实行重新武装。为了平息这些反对，杜勒斯又訪問了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他說：如同在欧洲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样，美、菲、澳三国也要結成太平洋公約組織，将来把日本也吸收在內，就可以防止日本的侵略。

为了适应以上情况，日本國內的政治形势也起了变化，这就是：自由党的吉田內閣声称要实行超党派外交，1951年1月23日，吉田会见了民主党的苦米地义三。他們主张自由党和民主党进行合作，政府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并在这个基础上同美国实行“和解和信賴的媾和”。这个立場是企图同美国統治集团妥协，蒙蔽着日本人民的眼睛，把他們引入单独“媾和”——日本殖民地化的道路。

为全面媾和而斗争

为了保障日本民族的和平、独立和自由而要求全面媾和的运动，以工人阶级的运动为中心，席卷了日本国民的各个阶级。造成这一运动的动因是1950年1月7日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对于日本共产党的批評。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爭取持久和

平,爭取人民民主》批評日本共产党沒有向人民揭露美国占領軍的本质,并且采取了即使在被占領的情况下,只要取得国会中的多数,人民也可以掌握政权的和平革命論,号召日本共产党站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地化而进行斗争。这次批評,虽然在共产党内部暂时引起了混乱,但是向人民大众指出了誰是民族的敌人,使爭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有了发展的可能。2月14日締結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也向日本人民提醒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日本的軍事基地化及其雇佣兵性的重新武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以安倍能成为首的著名文化界人士所組織的和平問題談話会,在1月1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全面媾和、中立与互不侵犯、反对以任何理由向任何国家提供軍事基地”。在2月21日的反殖民地斗争日召开的青年奋起大会中央大会上,決議成立以“要求全面媾和、反对軍事基地化、反对强迫青年接受低工資制和打倒吉田內閣”为目标的“青年祖国战綫”,并立即展开了斗争。3月19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設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議通过的关于禁止使用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把日本以工会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联結起来,日本国内的和平运动到同年年底为止取得了巨大成果,一共征集了六百万人以上的签名。5月1日,排除美軍总部和“民同派”的分裂策动,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統一的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高举“爭取和平和独立”的标語。次日(2日)在东北大学发生了伊尔斯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影响,青年学生保卫学校自治、保卫学术自由的反帝和平运动蓬勃展开了。

反对单独媾和、准备战争以及軍事基地化的斗争的尖銳化,在預定6月中举行的参議院議員选举的前夕,在政党方面,有了各种各样的反映。关于共产党的情况,前面已經談过。社会党在1月举行的第五次大会上分裂为左右两派,以阶级政党为招牌的左派和主张全民政党的右派之間的爭夺领导权虽然已經表面化,但在

4月3日，为了竞选还是召开了统一大会。其次，一年以来的保守党派合并问题，也在新形势下具备了新的意义。它们的计划是把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统统合并到民主自由党以内并为此进行了工作，但由于吃过民主自由党买办政策的苦头的中小资本家阶层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仅仅把民主党的联合派并入民主自由党，并于3月1日改名为自由党。民主党的在野派，宣称自己完全是在野党，并于4月28日和国协党、新政治协议会合并，组成了国民民主党。在野党派对1951年度的预算进行了猛烈的反对；4月26日在野党外交政策协议会发表了争取和平、永久中立和全面媾和的共同声明。这些，一方面也是为了迎接选举的一种姿态，同时也反映了道奇路线所引起的严重形势。

5月30日，在东京人民广场南面举行了争取全面媾和的人民总奋起大会，有两万工人和学生参加。一年前的今天，在反对公安条例的斗争中，东京交通工会的桥本金二被警察杀害，这次大会也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中午以后，丸之内警察署的一个警察在记录大会的演说，遭到工人们的抗议。这时，美军“反谍报队”的一名军人进来横加干涉，势将引起骚动，由于纠查员的处理得当，事情暂告平息。但在闭会以后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时，美国兵无端地从游行队伍后尾的学生队伍中，逮捕了一批“嫌疑”者，并提交军事审判，判处了十年以下重劳动的刑罚。这完全是根据捏造的一种诬陷，这一点不仅参加大会的人们，就是许多市民也都看得非常清楚。为了拯救七名牺牲者而发起的签名运动，获得了人们的热烈响应，签名的人们排成了长蛇阵，这种情况确是罕见的。然而，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广播却把这件事说成是“暴行”事件而大肆宣传，并且恶意诽谤“共产党的暴力化”。这种作法，一方面是为了迎接6月4日的参议院选举的一种反动攻势；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发动侵朝战争而进行更大规模镇压的前奏。接着，政府抢在预定6月

3日召开的防止产业危机国民大会之前，宣布禁止在3日至5日期间在东京举行任何集会和游行，就在戒严状态下举行了参议院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当选五十二人，社会党三十六人，民主党九人，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七人，绿风会九人，其他十九人。和前一年的众议院选举相比较，自由党减少了三百万张选票，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仅仅减少了十万票。

然而，麦克阿瑟硬说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于6月6日发出了对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7日又发出了对《赤旗报》编辑干部十七人的整肃令。为了实现日本“民主化”的“整肃令”，现在已经完全现了原形：它不外乎是进行法西斯镇压的一种武器而已。接着，于16日又宣布禁止全国举行任何集会和游行，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凭空而发的禁令。就在这种革命势力自不待言、甚至全国人民的言论自由也横遭镇压的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朝鲜战争爆发了。

在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单独讲和的方向渐趋明确的同时，对于站在革命势力最前列的共产党的镇压，也加紧进行了。6月28日，《赤旗报》被勒令停刊；接着，共产党的所有地方机关报以及《赤旗报》的后继报纸也被禁止。7月15日，又以违反整肃令的名义下令逮捕德田球一等九人。

在这种情况下，吉田首相在从7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临时国会上谈到了被“侵略”的危险，主张和“自由国家”合作，支持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和早日签订和约，并且胡说全面媾和和永久中立都是空谈，而表示积极地支持侵朝战争。另外，在上述参议院选举中由于主张全面媾和而获得重大发展的社会党内部，右派也提出了协助“联合国”和赞成单独媾和的方针。再加上工人运动的分裂——具体地表现在7月1日与国际自由工联有联系的“总评”的成立，所有这一切，都对于以上的法西斯镇压，起了帮凶的作用。

然而，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朝鲜战争而实行的强力压制，必然地激起了工人們的新的觉醒和斗争。特别是在 1949 年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遭到军事运输所带来的劳动强度的加强，并且亲眼看到美军的横暴情况（例如，在品川检車区，一个美国兵向工作中的工人非法开枪事件即其一例）的国营铁路工会，以及由于以往缺乏工作场所斗争经验而受到严重压迫的“总同盟”系统的工会组织，首先出现了反抗的行动，这是值得注意的。

朝鲜战争开始五个月后召开的国营铁路工会的 11 月大会，否决了“协助联合国”的口号。接着，12 月 3 日召开的总同盟大会，不顾右派干部以分裂相威胁，通过了以下的宣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悬殊的现在，如果以恢复生产斗争为斗争的基础，则不仅不能达到劳资协调，反而会成为资方加重剥削的手段。因此，我们在这里宣布，结束以恢复生产为基础的斗争。”这种表现方式虽然软弱无力，但是这里宣布要结束的“恢复生产斗争”，正是从 1947 年以来“民主化”运动和反共一起提出的最主要的口号，因此上述宣言，作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的一个转折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其次，旧全日本工会会议（简称“全劳”）系统的工会组织，也以全日本汽车工会为中心，从 12 月间重新组成了“工资共同斗争委员会”，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了斗争。

构成工会组织坚决反对旧金山对日和约及媾和后工人运动很快地就恢复元气的基础、并使得一向被看作稳健派的“总同盟”也不得不发表上述宣言的是工人群众无法忍受的悲惨处境，这是不容忽视的。

进入 1951 年以后，工人积极掀起了要求全面媾和的斗争。应该说是占领军一手“培养”起来的“总评”，也反映了基层群众的要求，在 3 月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决定了争取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的和平四原则。然而，当时的

“总評”，究竟有多大决心向旧金山对日和約进行斗争呢？这一点，可以从这次大会采取了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宣言划清界綫的方針，对于朝鮮战争发生以后工人运动的低沉以及工人们在工作场所受到的压迫沒有提出积极斗争的方針等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正值媾和会議前夕，应该借以集中全体工人的意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借口占领軍和政府不許使用皇宮前广场的规定，终于放弃了在东京的庆祝“五一”节活动，并号召所属工会会员不要参加“产別”及其他中立工会所主办的“統一五一活动促进会”（在芝公园举行，动员五万人）。为了平息工人们对此表示的不满，“总評”领导机构宣布实行“总动员”并高举“保卫宪法”的旗帜参加訂于5月3日由政府举办的宪法紀念会。但实际上，参加这次紀念会的只有以领导干部为主的百人左右，他們在中途退出会场，并和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一部分人员当场被捕，次日即受到不起訴处分而获释。他們就是利用这种装腔作势的行动，分散了群众的斗争力量。

虽然有这些缺点，“总評”的和平四原則（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建立軍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仍然成了工会基层群众反对压迫的中心口号。在基层群众的支持下，从5月起通过各工会大会上的討論，使反对四原則的右派领导干部迅速地丧失了领导力量。日本教职員工会方面，在5月29日开幕的第八次定期大会上通过了“为着爭取真正的和平、自由和独立，必須以和平四原則”为工人阶级的立場，并展开广泛而坚强的和平运动，来明确地表示意志；而全日本专卖工会也在第四次大会上作出了爭取全面媾和的決議。

在6月的国营铁路工会大会上，星加、斋藤等“爱国工人运动”的主张者否认四原則的中央斗争委员会草案受到了尖銳的駁斥。同样属于“民间派”的委员岩井攻击星加說：“（这个草案）装作与政

治斗争无关地主张撤销和平原则的这种办法，在客观上等于同意多数媾和，这对我们的经济斗争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工人运动要侵犯资本家的利益，怎能设想它会不受到干涉和镇压呢？”这次大会以压倒多数反对星加案，确认了和平四原则，左派和中间派势力大大加强，国营铁路工会中的“民同派”终于瓦解了。其他各工会，除了“总评”议长武藤所领导的煤炭工会和以松岡駒吉为首的重建总同盟（参加人数仅及 1949 年的三分之一，不超过九万人）等少数以外，全都确认了四原则。8 月，美军总部劳动科长埃米斯曾强迫“总评”撤销和平四原则，并威胁说，不然的话，“‘总评’就可能分裂”；但是“总评”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在 9 月 1 日组织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群众活动，即动员了三万人举行了和平会议。埃米斯事前警告的分裂，也不过是由少数领导干部另行组织了“民主工人运动研究会”而已。上述情况可说是由于基层工人大力支持的結果。

然而，表面上已经这样蓬勃开展起来的反对单独媾和运动，没有和工人的经济要求结合起来，而成为深入到工作场所最基层的工人群众自觉的斗争。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是在没有必要对工作场所上遭到的压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地方，关于和平四原则的讨论才容易开展。“总评”领导干部中的积极分子认识到这种缺点，乃于 8 月间组织工人同志会，对国际自由工联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同时采取了组织阶级意识十分明确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来加强“总评”的方针。为了使这种同志会的组织逐步深入到基层，在各企业中结合工人日常的具体要求而展开斗争，组成所谓真正的战斗组织，曾经自我批评了“‘民同’在‘整肃共产党’时不进行积极抵抗，暂时放弃了开展工人运动的错误”（合成化学工会主席太田语），并且有必要联合那些以不公开的方式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和在其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展开共同斗争。同时，共产党的基层组

織也把同志会当成合法斗争的依据，通过合法斗争把新綱領灌輸到群众中間，和社会党人进行了共同斗争。这样，同志会对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参加反对单独媾和、保卫和平和独立的运动，并不限于工人阶级。“不要把日本变成亚洲的孤儿”的呼声，吸引了多数市民、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发展成了庞大的队伍。早在1950年1月即以社会党重建派、劳农党、共产党、“产别”系工会等組織为中心，結成了“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協議会”(簡称“全爱协”)；7月間，“总評”又联合宗教界和平运动協議会、文化界人士和政党共同組成了“促进和平国民會議”。后者在活动中也曾表现出和前者相对抗，企图把日本的保卫和平运动从国际保卫和平运动中分割开来的倾向，但是“产别”等組織却表明了和促进和平国民會議展开共同斗争的方針，以便实现从基层自下而上的統一。同时，也不应该忽視为了超越党派界限，开展全民的和平运动而参加到“和平問題談話会”和“保卫和平会”中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贡献。

此外，面临着9月間旧金山对日和会的召开，在要求世界和平与全面媾和的知识分子之間又有了新的活动。当时，在国会中吉田內閣的与党自由党占絕大多数，共产党遭受着残酷的鎮压，人民被剝夺了为和平运动而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斗争，深深地打动了怀抱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情緒的人民。《世界》杂志的和平問題专刊号(1951年10月)銷售了十余万册，这相当于这个杂志以往发行册数的数倍。

旧金山會議

对于日本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感到恐惧的美国政府，于1951年4月16日派杜勒斯第三次来到日本，进行关于締結“日美安全条約”的預备談判。当时，正是麦克阿瑟被杜魯門所罢免，美国远

东政策由于朝鮮戰場上的失利而表现了动搖的时期。杜勒斯 23 日在日美联合国协会发表的演說中說：“美国正在与其同盟各国协力，并与日本协商，努力实现迅速、公正、并受到集体力量保障的媾和，恐怕除了恐怖这个障碍以外，沒有其他克服不了的困难”。他在这里暗示共产主义势力在阻碍着媾和的实现，誹謗苏联，坚决否认全面媾和和締結互不侵犯条約的可能性。然而他所謂“恐怖”，只是意味着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怖嗎？难道不是指的对于反对单独“媾和”、爭取和平和独立的日本人民的恐怖嗎？

5 月 3 日苏联向美国提出的照会，尖銳地譴責了美国的这种立場。照会指出：“美国正在准备召开对日单独媾和會議，而根据波茨坦协定的规定，这样的談判必須和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共同召开，美国的作法是违反了上述国际协定。美国的对日和約草案无视了保証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国际义务。”另外还指摘和約草案，对于占领軍的撤退期限未作规定。对此，美国答复說：“在太平洋战争中担任主要战斗任务、并負責占领日本的美军，在对日媾和問題上居于主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关于占领軍問題，說道：“随着和約的签订，占领軍即不复存在。在那以后，将按照日本的希望，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实行集体安全保障”。另外，美国还拒絕了苏联方面“为了討論对日和約，在 6、7 月間召开苏、中、美、英四国外长會議”的建議。

美国的对日和約草案，是它无法压制日本国内和全世界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单独“媾和”的意志，因而不得不尽早地和吉田政府媾和，以便把日本变为附庸而加以控制的工具。因此，美国便一意孤行地准备了单独“媾和”。

1951 年 9 月 4 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了对日“媾和”會議。这次會議，根据美国的計劃，只是在通过所謂个别交涉的方式已經取得“自由世界”各国諒解的条約草案上，进行签字的仪式而已。正

如印度总理尼赫魯所指摘的，这次會議“并不是为了进行談判而召开的”。参加會議的有五十二个国家，其规模比凡尔赛會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意媾和會議都大，在这一点上，是最近时期未曾有的。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同日本“交战最久的对手”（野上弥生子語）并和日本有着重要关系的中国却没有被邀請，亚洲的大国印度和緬甸也沒有参加，其他各国也只是聚集一堂，在美国拟就的草案上签字盖章而已。象这种奇怪的會議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9月4日，美国总统杜魯門在致开会辞中指出，这个条約是一项“和解”的条約；日本在麦克阿瑟和李奇微的指导下已經达到了完全民主化；但是美国还没有忘記珍珠港事件，日本必須努力爭取与各国友好相处等等以后，还談到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他說：为了使最近締結的美菲互助条約同美、澳、新安全保障条約互相配合来保卫太平洋的安全，“日本建立防卫軍以后，必須与其他国家的軍隊形成有机的整体”。这样，他公然要求日本实行雇佣兵性质的重新武装。

次日，开始審議議事程序以后，苏联全权代表葛罗米柯登坛发言，要求會議邀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但是被否决了。接着，美英提出的議事程序获得通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被选为會議主席，随即举行全体會議。首先由美国代表杜勒斯、英国代表楊格就条約草案进行了說明。以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大部分是追随美、英两国的意见，反对条約草案的只有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的代表。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指出：“这个和約草案的制訂者們不遗余力地要为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廓清道路，想把日本推上侵略和軍事冒险的道路”，然后又強調媾和的原則必須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雅尔塔协定以及远东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并提出了十三点修正意见，其要点如下：（一）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滿洲”和台湾的主权；承认苏联对于庫頁島和千島的主权。

(二)日本的主权应包括琉球和小笠原群島。(三)和約簽訂后，撤退全部占領軍。(四)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和緬甸在內的有关国家的會議，討論賠償問題。(五)本条約必須經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准方能生效。(六)确立包括言論、信仰自由在內的人权保障。(七)禁止軍事性团体。(八)日本不得加入任何以同盟国为对象的軍事同盟。(九)日本的軍备应以自卫上必要的程度为限。(十)禁止日本施行上項規定以外的軍事訓練。(十一)禁止日本生产原子武器和細菌武器。(十二)不得限制日本的和平工业与对外貿易以及海运。(十三)宗谷海峽、根室海峽的日方沿岸以及輕津海峽和对馬海峽应予以非軍事化。苏联代表要求討論以上建議，但被否決了。

在各国代表发言之中独具异采的是在全体會議第二天埃及代表的发言。他从自己国家同样被英軍占領的立場出发，就美軍在“媾和”以后仍然无限期地駐扎在日本一事，提出了警告。

9月7日夜間，作为第四十九个发言人而登上讲坛的日本代表吉田茂，宣讀了写在卷紙上的讲稿，他說：“这里提出的和約草案，并不包括懲罰条款和报复条款，对于我国国民亦未施加永久的限制，它将完全恢复日本的主权、自由与平等地位，并作为自由、平等之一員迎接日本进入国际社会。这个和平条約不是一項复仇的条約而是一項“和解与信賴”的文件，日本全权代表欣然接受这一公正寬大的和平条約。”最后，葛罗米柯代表要求对苏联的修正案进行投票表決，但也未被采納，美英两国事先安排好的會議进程即此宣告結束。

这样，就在9月8日举行了“对日和約”的簽字仪式，各国代表按A、B、C順序进行簽字，最后由吉田首相及其他日本代表簽字。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代表那天沒有出席。接着，在第六軍司令部的軍士集会室，由艾奇逊和吉田茂簽訂了“美日安全条約”，

并发表了艾奇逊和吉田的换文。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程序进行的。美国报刊謳歌了“美英外交的胜利”。

“和約”的内容

“对日和約”并不具备和約的条件，这是一目了然的。第一，沒有使日本結束和苏联、中国的战争状态，沒有恢复和平，只是使日本决定性地从属于“自由世界”；第二，由于美軍的繼續占領而不能恢复日本的主权；第三，从軍事上保障日本的“安全”，是违反日本的宪法，这样，絲毫不能阻止日本采取侵略行动。最后，这项条約也沒有完全解决賠償和領土問題。同时，这一“和約”还是与“美日安全条約”密切联系着的。“和約”第六条规定：“各盟国所有占領軍，应于本条約生效后尽速撤离日本，无論如何，其撤离不得迟于条約生效后九十日之期。但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外国武装部队依照或由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与日本业已締結或将締結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在日本領土上駐扎或留駐。”^① 根据这项规定，为使美軍占領日本合法化，締結了“美日安全条約”。印度政府在关于对日和約草案的致美国政府备忘录中，曾主张删去这项但书，这是非常正确的。

凡是安全条約，一般都是规定締約国双方互相保障安全。然而，这一条約並沒有规定美国对于保障日本安全的任何义务，只是规定日本承认美国軍隊有权駐扎日本的一种片面性的条約。同时，这个条約还规定駐在日本的美軍可以用来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騷乱”^②，这說明駐日美軍具有警察的性质。

① 《国际条約集(1950—1952)》，世界知識社 1959 年版，第 337 頁。——編者

② 同上书，第 394 頁。——編者

历史家举出这一“安全”条约和“日韓保护条约”(1904年)、“中日共同防敌协定”(1918年)、“日滿議定书”(1932年)相类似之点而揭露了它的殖民地性质(井上清、小此木眞三郎、鈴木正四著《日本现代史》),确实,这一条约把日本的命运完全交给美国了。

10月26日,日本众议院批准了这项“和约”。在这两天以前,社会党围绕这个问题内部发生分裂:右派表示赞成;左派表示反对。在社会党的这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是支持左派的主张,但右派唆使其所控制的独立青年同盟和当地的暴力团出来捣乱,使大会陷于分裂。众议院的表决结果是:投赞成票的有自由党、民主党、右派社会党及其他三百零七票;反对的有左派社会党、共产党、劳农党及其他四十七票;弃权 and 缺席者共有一百人。接着,在28日参议院也批准了这一条约。

12月,杜勒斯第四次访问日本,使吉田同意和台湾的蒋介石亡命政权媾和,这就完全堵塞了和中国媾和的道路。次年,1952年1月2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访问日本,经过和国务大臣岡崎胜男进行密谈,于2月28日签订并发表了“美日行政协定”。关于这次交涉的被隐秘起来没有公布,实际上是日本完全接受了美国的原案。这个协定的重要内容是具体地规定了日本军事基地化的具体内容,非常重要,但吉田政府硬说这个“协定”只是规定着执行“美日安全条约”的一些细节,不需要国会的批准。

这个协定规定:“日本同意允许美国使用为实现安全条约第一条所规定的必要的设施及地域”^①,而允许美国可以在日本国内任何地方设置军事基地;日本必须分担美国驻军的费用;对于利用航空、交通、通信和一切公共设施,美军享有优先权;美国军人、军队中文职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享有治外法权等等,即承认美军

①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452页。——编者

享有广泛的特权。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军人、军队中文职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私人用物品免征进口税，并享有其他许多经济上的特权，这就侵犯了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另外，日本政府为了保护美国驻军的利益和安全，还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指示有关机构制定保守军事机密的法令。这样，行政协定就建立了一种制度，使美国在“和约”签订以后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骑在日本的头上。

展望——为了结束战争

经过上述情形，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大致告一段落。然而，这种局面是在苏联、中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即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反对声中，以及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谴责声中出现的。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所期待于和约的是，阻止侵略战争的再度发生和维持和平。然而，旧金山和约却破坏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则，给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开辟道路，并带来了新的战争危机。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为了保卫日本的和平、独立与民主，就不能不进行反对单独对日和约、美日安全条约和美日行政协定的激烈的斗争。

战争还没有被结束，为了结束战争，还有待于日本人民力量在未来的斗争成果。人民的力量恰好从这个时期起摆脱了停滞状态重新高涨起来了。从1951年下半年到今天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民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签订“和约”一个月以后的10月，日本共产党发表了新纲领，其中规定日本当前的革命是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为了争取解放，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结成统一战线，进行斗争。工人运动，从两个条约签订到年底这一期间，在各个产业部门中斗争尖锐化了。

同时，农民、渔民也为了反对美军和警察预备队征用土地充作基地和演习场地而起来斗争了。

1952年，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进入了新的阶段。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扩充到十二万人。吉田首相一方面在训话中说：“成立保安厅的目的在于建设新的国军，”而另一方面，在国会中又不得不玩弄诡辩说：“拥有自卫武装并不违宪”，这是因为反对重整军备和保卫和平宪法的舆论已经高涨起来了。通过所谓五一事件，向美国和日本统治者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的工人阶级，在春季斗争中，以总评为中心动员了四百万人，举行了反对“防止破坏法案”和反对恶劣修改三项劳动法案的巨大斗争。4月12日举行了第一次罢工，同月18日又举行了第二次罢工。这种情况表明，工人运动已经从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的飞跃发展。在工人运动的鼓舞下，又掀起了知识界和学生反对“防止破坏行动法案”的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在伊丹、内滩等地，农民和渔民还同工人、市民联合起来，猛烈地展开了反对美日军警接收基地的运动。人民的这种奋起斗争受到了国际和平力量日益壮大的鼓舞。第一，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碰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由世界”各国间相互对立的表面化。美军轰炸水丰发电站受到英国和印度的责难，就是明证。第二，在法国和意大利人民反对李奇微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民主力量的壮大。第三，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和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都表现了和平力量的坚强团结。这种形势，在1953年到1954年之间已经完全成熟了。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解放政策”，但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苏联、中国的和平政策，终于在7月间实现了朝鲜停战。根据布达佩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而展开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运动，促成了柏林会议，产生了日内瓦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战争势力已经陷于孤立了。

当然，国际形势的这种演变，并没有在日本的国内形势上同样地反映出来。正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在节节败退，就更加提高了日本在亚洲的战略价值，吉田政府加紧推行了对美从属化和对内法西斯化的政策。美国强迫日本接受“美日安全条约”，日本解除对反动势力的整肃使其恢复公职，就是这种情况的集中表现。对此，日本人民展开了反对内滩、妙义、浅间等处军事基地化的斗争，要求政府救济风水灾害及其善后恢复的斗争，要求对歉收采取对策的斗争，要求同苏、中两国调整邦交并进行贸易的运动等极其广泛而多方面的斗争。

现在，日本正站在是否彻底清算 1931 年以来二十年間充满着战争、法西斯主义和饥饿的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将复活军国主义，给美国充当雇佣兵并成为新的侵略战争的根据地呢；还是将由保卫和平、民主与自由的日本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阻止这种趋向呢？这在目前还无法作出的太平洋战争史的结束语，只能由今天和明天的日本人民去作了。

編 后 記

太平洋战争史最后一篇——第五卷叙述了由战败到締結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約这段时期的历史。我們所以这样結束这部书，是因为考虑到，实现媾和的具体形式，就是战争結果的集中表现。战败以后已經九年了。回顾起来，好象是轉瞬之間，也好象是一段富于波折变化的长久历程。今天，作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民所遭受的无比深重的苦难的清算結果摆在我們面前的，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們对此应该怎样表示态度，应该采取如何行动呢？全体編輯人和执笔人願抱定更大的决心与讀者共同努力，以便解决这一課題。

当本书出版之际，对于各方面所給与的鼓励和批評，表示深深感謝。为报答各方的厚意，今后将以本书的已有成果为基础，把我們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最后，謹向对于本书的刊行一貫給予帮助的《东洋經濟新报》社出版局各位先生、特别是小谷崇先生，表示謝忱。

本卷的执笔人如下：

政治：远山茂树、大島太郎、川村善二郎、柚正夫、原田胜正；

經濟：宇佐美誠次郎、田代正夫、松岡磐木；

文化：松島荣一、伊豆利彦、草部典一、紅野敏郎、島田福子；

中国、朝鮮、东南亚：野原四郎、胜部元、小島晋治、中川信夫、
中村义；

国际关系：江口朴郎、相田重夫、吉田輝夫、斋藤孝。

附录(一) 年表

(1945年9月——1951年9月)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5 (昭和二十二年) 十 年	9•10 麦克阿瑟公布管理日本的方针。决定撤消宫内省，成立禁卫府。	9•4 由金九担任主席的大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	9•11 在伦敦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到10月2日)。
	9•11 盟军总部下令逮捕东条以次三十八名战犯。东条自杀未遂。	9•6 朝鲜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在汉城开会。	9•19 英首相艾德礼允许印度独立。
	9•20 按照波茨坦公告公布施行紧急命令。	9•9 日本在对华降表上签字。爪哇不流血革命成功，苏加诺就任总统。	9•22 美国政府发表日本投降后的对日方针。
	9•21 盟军总部公布新闻条例。	10•10 国共举行会谈，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9•25 世界工联成立大会在巴黎开幕(到10月3日)。
	9•26 三木清死于狱中。		10•15 法国枪决赖伐尔。
	10•4 盟军总部下令废除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特务警察、立即释放政治犯、准许自由批判天皇制。	10•12 国民党军开始由汉口向北平空运。	10•21 法国选举制宪议会。
	10•5 东久邇内阁总辞职。全日本海员工会举行成立大会。	10•24 李承晚等组成大韩独立促成协议会。	10•24 联合国正式成立。
	10•8 夕张煤矿朝鲜籍矿工罢工。	10•28 中国在十一个省内发生国共冲突。	11•15 美、英、加就管理原子能发表共同声明。
	10•9 币原内阁成立。	11•8 苏联红军开始由中国东北撤退。	11•20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讯战犯。
		11•27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为调停国共冲突，任命马歇尔为特使①。	11•21 法国组成以戴高乐为首的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三党联合内阁。
			11•29 南斯拉夫决定实行

① 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页),美国总统派马歇尔来华是在1945年12月20日。——编者

1945	<p>10•10 德田、志賀等发表《告人民书》。政治犯約三千名获释，召开欢迎自由战士出獄人民大会。召开成立全国工会悬談会（后改称日本工会总同盟）。</p> <p>10•11 盟軍总部下令实行五大改革：解放妇女，赋予工人以团结权，教育的自由化，使人民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及經濟的民主化。</p> <p>10•24 《讀卖新聞》社員工要求战犯领导干部退出报社和管理业务。（此后，陸續成立各个工会，并采用管理业务的战术。）</p> <p>10•31 盟軍总部下令立即整肅教員中的軍国主义分子。</p> <p>11• 2 盟軍总部下令冻结并分劈財閥资产。</p> <p>11• 9 日本自由党举行成立大会，由鳩山一郎担任总裁。</p> <p>11•15 鮑萊发表日本賠償政策。</p> <p>11•16 日本进步党举行成立大会。</p> <p>11•20 盟軍总部下令冻结皇室财产及撤消生鮮食品的配售和統</p>	<p>11•27 国共恢复和談，中共建議无条件停战。</p>	<p>共和制。</p> <p>12•10 意大利成立以加斯貝利（天主教民主党）为首的联合內閣。</p> <p>11•16 在莫斯科召开苏美英三国外长會議。</p> <p>11•27 布里敦森林（国际通貨）协定签字。</p> <p>11•28 莫斯科三国外长會議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p>
------	--	--------------------------------	--

（昭和二十年）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5			制。						
(昭和二十二年)	11•22		内閣會議決定第一次“土地改革”草案(地主拥有土地面积提高至五町步)。						
	11•25		盟軍總部下令实行凍結战時賠償費、廢除軍人撫恤金等財政改革措施。						
	12• 6		盟軍指令逮捕木戶、近卫等九人。						
	12• 8		國務相松本发表天皇統治权不变等修改宪法的四项原則。						
			召开追究战犯人民大会。						
	12• 9		盟軍總部下令解放农民并提出“土地改革”方案。						
	12•11		盟軍總部下令限制属于財閥系統的三百三十六家公司的资产及其活动。京成電車公司发生爭議，职工断然实行管理业务。《讀卖新聞》社爭議获得解决，职工获得組織工会和参加經營的权利。						
	12•12		日本农民协会筹备委員會宣告成立，反对“土地改革”方案。						

1945 (昭和二十年)	<p>12•15 盟軍总部下令使国家和神道分离。新选举法成立。</p> <p>12•16 近卫文麿自杀。</p> <p>12•21 盟軍总部宣布关于日本民主化的基本指令已全部公布。</p> <p>12•22 公布工会法（翌年3月1日施行）。</p>		
1946 (昭和二十一年)	<p>1•1 日皇发表关于否定“神格”的声明。</p> <p>1•4 盟軍总部下令整肃軍国主义分子，解散极端国家主义团体。</p> <p>1•17 日本工会总同盟举行成立大会。</p> <p>1•26 举行欢迎野坂参三回国大会。</p> <p>2•1 内务、司法、商工、厚生四相发表共同声明对劳资爭議将以違法論处。</p> <p>2•9 日本农民协会举行成立大会。</p> <p>2•16 公布金融紧急措施令，翌日施行。</p> <p>2•26 远东委员会成立。</p> <p>3•1 工会法开始施行。</p> <p>3•3 公布施行物价統制令，废除旧日元。</p> <p>3•6 政府发表宪法修正草案，麦克阿瑟表示支持。</p> <p>3•17 全日本政府机关职工会聯絡協議会成立。</p>	<p>1•7 周恩来、张群、馬歇爾三人委员会开始会谈。</p> <p>1•10 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p> <p>1•16 苏美就实现朝鮮独立問題举行第一次会谈。</p> <p>2•6 在朝鮮成立苏美联合委员会。</p> <p>2•19 朝鮮北部成立人民委员会。</p> <p>2•25 中国国共双方签订整編军队协定。</p> <p>2•27 苏蒙締結互助条約。</p> <p>3•6 越、法河内协定签字。</p> <p>3 中旬，在东北，国共两軍冲突激烈化。</p> <p>4•19 越、法举行預备会谈。</p> <p>4•28 罗哈斯当选菲律宾总统。</p> <p>5•1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p> <p>5•5 英、印于西姆拉举行圓桌会议（12日</p>	<p>1•10 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开幕（到2月14日）。</p> <p>1•12 美国对希腊提供貸款。</p> <p>1•19 美国对土耳其提供貸款。</p> <p>1•21 美国全国鋼鐵工人举行罢工（到2月18日）。</p> <p>1•29 法国成立以古安为首的三党联合內閣。</p> <p>2•1 匈牙利废除君主制。</p> <p>2•8 联合国决定拒絕西班牙参加。</p> <p>2•9 苏联发表第四个五年計劃。</p> <p>2•17 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締結借款协定。</p> <p>2•18 英国实行英格兰銀行国有化（接着于4月17日通过煤矿等国有化方案）。</p> <p>2•20 苏联宣布千島、庫頁島为苏联領土。</p> <p>3•5 丘吉尔在富尔顿发</p>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6	<p>4• 5 召开第一次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p> <p>4• 7 召开打倒币原内閣人民大会，警察向游行示威群众开枪。</p> <p>4•10 举行大选，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p> <p>4•17 政府发表新宪法草案。</p> <p>4•22 币原内閣实行总辞职。</p> <p>4•23 币原首相要求自由党和社会党参加内閣。币原喜重郎就任进步党总裁。</p> <p>5• 1 举行第十七届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全国参加者达二百万人）。</p> <p>5•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p> <p>5• 4 盟军总部下令整肃自由党总裁鳩山。</p> <p>5•12 东京世田谷区居民举行要求米粮大会，向皇城示威游行。</p> <p>5•14 吉田茂同意就任自由党总裁。</p> <p>5•15 在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会议上，美国</p>	<p>决裂)。</p> <p>5•22 苏军宣布已全部撤出中国东北。</p> <p>6• 7 国共三人委员会签署东北区半月停战协定。①</p> <p>7• 2 蒋介石同周恩来会谈，国共调处五人委员会成立。</p> <p>7• 4 菲律宾共和国宣布独立。</p> <p>7• 6 尼赫鲁当选为印度国民会议主席。在巴黎召开法越会议。</p> <p>7• 7 中共要求美军撤退。</p> <p>7•11 司徒雷登被任命美国驻华大使。</p> <p>7•29 中共军与美军在安平发生冲突。</p> <p>8• 2 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p> <p>8•10 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共同声明，說調停国共冲突无望。</p> <p>8•17 在加尔各答，伊斯兰教徒同印度教徒发生冲突。</p> <p>8•18 美国政府声明暫不撤退驻华美军。</p>	<p>表的演說中用“铁幕”一詞。</p> <p>4•25 苏美英法四国在巴黎召开外长会议，討論对意大利等五个軸心国和約問題。</p> <p>5• 5 法国人民投票否决新宪法草案。</p> <p>6• 2 法国选举第二届宪法议会，人民共和党成为第一大党。</p> <p>6•17 意大利废除君主制，宣布实行共和制。</p> <p>6•24 法国成立以皮杜尔为首的三党联合内閣。</p> <p>6•30 美国在比基尼島試驗原子弹。</p> <p>7• 2 意大利成立加斯貝利内閣。</p> <p>7•29 在巴黎召开对意大利等五个前軸心国和会(到10月15日)。</p> <p>8•21 美国就运输机被击落事件向南斯拉夫提出最后通牒。</p> <p>9• 1 希腊恢复君主制。</p> <p>9•12 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发表演說，主張美苏友好。</p>

① 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18頁)，“1946年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成立”。——編者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6	7•14	国营铁路当局宣布解雇职工十二万七千人，爭議开始。	12•18	越南人民掀起民族解放斗争。		
	7•16	经济团体联合会成立。	12•23	英政府发表马来亚联邦方案。		
	7•19	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产别)成立。	12•25	中国伪国民大会通过“新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		
(昭	7•24	新宪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召开反对苛捐杂税与解雇工农大会(在人民广场)。				
和	9•9	海员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决定罢工。				
二	9•14	“产别”所属各工会举行支持国营铁路工人斗争的罢工，结果取得胜利，运输相宣布取消解雇。				
十	9•17	新闻、通信、广播工会宣布罢工。				
一	9•20	劳动关系调整法案成立(27日公布,10月13日施行)。海员工会掀起斗争，取得胜利。				
年	10•6	政府为对付罢工，开办国营广播事业。				
	10•8	公布复兴金融公库法(29日施行)。				
	10•11	议会通过第二次“土地改革”方案。				

1946 (昭和二十一年)	<p>10•18 公布战时补偿特别措施法、企业及金融机关重建调整法(30日施行)。</p> <p>10•21 公布第二次“土地改革”法。</p> <p>11• 1 主食配售量由二合一勺增至二合五勺。</p> <p>11• 3 麦克阿瑟就公布新宪法发表声明。公布日本国宪法。</p> <p>11•13 鮑萊大使发表关于赔偿的最后报告书。</p> <p>11•17 召开确保生活权、打倒吉田反动内閣国民大会。</p> <p>11•24 政府决定实行重点生产方式。劳动基准法成立。</p> <p>11•30 文部省决定实行并公布六三三制。</p>		
1947 (昭和二十二年)	<p>1• 1 麦克阿瑟强调日本国民应勒紧裤带忍受穷困。吉田首相称工运领导人为“不逞之徒”。</p> <p>1• 9 全国政府机关工会扩大共同斗争委员会决定由2月1日起举行大罢工。</p> <p>1•15 成立拥有四百万会员的全国工会共同</p>	<p>1• 3 法国就越南局势发表强硬声明。</p> <p>1•13 英緬会谈开始。</p> <p>1•18 中共拒绝国民党关于恢复和谈的建議。①越南战事激烈化。</p> <p>1•22 印度制宪议会通过独立宣言草案。</p> <p>1•28 英国批准关于緬甸独立的协定。</p>	<p>1• 7 美国国务卿貝尔納斯辞职，由馬歇尔元帅继任。</p> <p>1•16 法国选举总统，奥里沃尔(社会党)当选。</p> <p>1•22 法国成立以拉馬迪埃为首的各党联合内閣。</p> <p>1•28 英国承认緬甸独立。</p>

① 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32頁)，这件事发生在同月17日。——
編者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7		斗争委员会。	2•17	国民党政府为抑制物价暴涨公布经济紧急措施办法。	2•10	签订对意大利等五个前轴心国和约(在巴黎)。
(昭和二十二年)	1•20	“产别”工会主席听涛克己遇刺。			2•12	美加军事协定签字。
	1•25	复兴金融金库开业。	3• 1	国民党封闭中共驻南京等处办事处，国民党军再次开始进攻延安。	3• 4	英法同盟条约签字。
	1•28	召开打倒吉田反动内阁、突破危机国民大会，“产别”、“总同盟”两系统工人三十万人参加。	3•19	国民党军侵占延安。	3•10	苏美英法四国召开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和约问题。(到4月24日，在莫斯科)。
	1•31	盟军总部下令停止大罢工(下午二时半)。吉田内阁改组。	3•21	美菲军事援助协定签字。	3•12	杜鲁门声明援助希、土并非难共产主义(杜鲁门主义)。
	2•12	鲍莱发表日本赔偿三原则。	3•23	在新德里召开泛亚洲会议。	3•19	美国禁止出口钍。
	2•18	发表斯特赖克赔偿报告。	3•25	为保证印尼独立荷兰同印尼签署林芽椰蒂协定。	3•24	美国国务院公布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三协定内容。
	3• 1	全国工会恳谈会决定成立全国工联(产别、总同盟、日劳、国铁、全递信等)的方针。	4•17	国民党政府实行改组。	4•14	法国戴高乐宣布“法兰西共同体”。
	3•11	发布强制收购米谷的指令。	5•16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内战，再次开展和平运动。	4•15	斯大林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会谈。
	3•22	麦克阿瑟致函吉田要求统制工资、加强经济安定本部的权限(28日答复)。	5	搶米风潮波及中国各地。	5• 4	法国拉马迪埃内阁排除共产党阁员。
	3•31	民主党举行成立大会。公布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解散众议院。	6•16	联合国在上海召开亚洲远东经济会议。	5•15	美国国会通过援助希、土法案。
	4• 4	召开欢迎世界工联访日代表团国民大	7• 4	国民党政府为进攻中共宣布全国总动员。	5•29	意大利加斯贝利总理声明与共产党、社会党断绝关系。
			7•18	印度独立法案成立。	6• 5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马歇尔计划方案。
			7•19	缅甸副国务总理昂山等在武装政变中被刺杀。	6•23	美国下院通过塔夫

1947	会。	7•20 荷兰、印尼两軍再度发生冲突。	脫-哈特萊法案。
	4•5 第一次选举知事、市、鎮、村长。	8•15 印度联邦、巴基斯坦自治領宣告成立。	7•2 苏联拒絕参加馬歇尔計劃。
	4•7 公布工会基本法(9月1日施行)。	9•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开始对国民党軍总反攻。①	7•12 为討論馬歇尔計劃，西欧十六国召开欧洲經濟复兴會議(在巴黎，到7月15日)。美土軍事援助协定签字。
(昭	4•14 公布禁止垄断法(7月20日施行)。	9•16 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	7•16 美国建議召开对日媾和的預备會議。
和	4•17 公布地方自治法(5月3日施行)。	10•20 美国拒絕苏联关于由朝鮮同时撤兵的提案。	8•26 为討論对日和約，英联邦召开堪培拉(澳洲)會議。
	4•18 盟軍总部劳务科长德佛拉尔強調工人教育。	10•22 美国宣布朝鮮美苏混合委员会无限期休会。	8•30 西半球共同防卫协定签字。
	4•20 举行第一届参議院选举。	10•28 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	9•16 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二	4•25 举行众議院选举(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	11•9 泰国发生政变，鑾披汶組閣。	9•17 美国国务卿馬歇尔在联合国提議限制否决权。
十	4•29 日本經營者联盟成立。	11•24 在碧瑤召开第二届亚洲远东經濟會議。	10•5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成立。
	5•1 举行第十八届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全国参加者三百万人)。	12•2 圍繞巴力斯坦分治問題，阿拉伯、犹太武装冲突激烈化。	10•29 二十三个国家締結一般关稅貿易协定。
二	5•3 日本施行新宪法。	12•10 緬甸独立法案成立。	11•23 法国舒曼(人民共和党)內閣成立。
年	5•12 四党締結政策协定，就分配閣員名額达成協議。	12•22 国民党政府公布紧急治安維持法。	11•25 为討論对德和約問題，召开伦敦四国外长會議(于12月15日决裂)。东西德貿易协定成立。
	5•15 社会党左派(鈴木、加藤)声明与共产党划清界綫。		
	5•22 产別执委进行自我批評，将改正偏重于罢工的傾向和加		

① 据《毛澤东选集》第4卷，《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針》一文的題解(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230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同年7月至9月轉入了全国規模的进攻。——編者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7			强日常斗争。				12•14	苏联改革币制。废	
	6•1		三党联合的片山内					止粮食等定量供	
			阁成立。片山呼吁				12•22	意大利制定新宪	
			勒紧裤带忍受穷困					法，尼古拉就任总	
			生活。					统。	
	6•11		发表突破经济危机				12•23	美国伊朗军事协定	
			紧急对策纲要，主					成立。	
			张加强重点生产。				12•24	希腊人民政府在北	
	7•1		共产党发表声明，					部成立。	
			指出“片山内阁屈				12•30	华莱士开始组织第	
			服于保守势力”。					三党。罗马尼亚国	
	7•5		发表新物价体系。					王退位，实行共和	
	7•25		全国农民协会成					制。	
			立。						
	10•19		国营铁路工会召开						
			临时代表大会，全						
			面否决执行部提						
			案，“民同派”迫使						
			大会流产。						
	10•20		中央邮局职工不顾						
			上级工会方针扩大						
			大批缺勤斗争。						
	10•21		公布国家公务员法						
			(1948年7月1日施						
			行)。						
	11•19		公布农业协同组合						
			法。						
	12•8		煤矿国营法案成立						
			(20日公布)。						
	12•13		社会党左派、党内						
			非主流派发表声						
			明。						
	12•17		民法经过修改重新						
			公布。						
	12•31		撤消内务省。						

1948	<p>1. 6 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主张使日本成为保卫自由世界的堡垒。</p> <p>1.13 总同盟提倡推行工会民主化运动。</p> <p>1.19 社会党召开大会，废弃四党协定。</p> <p>1.24 决定吸收外资基本方针。</p> <p>2.10 片山内阁总辞职。</p> <p>2.11 创设地方自治体警察。</p> <p>2.13 “产别”内部“民同派”，鼓吹“排除政党控制工会”。</p> <p>3. 2 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斯特赖克报告。</p> <p>3. 7 成立国家地方警察本部、国家公安委员会。</p> <p>3.10 芦田内阁成立。</p> <p>3.15 民主自由党成立，由吉田茂担任总裁。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建立民主民族战线。</p> <p>3.19 “全递信”工会宣布罢工，3月斗争中根据工会中央指示参加罢工人数为八十六万人次。</p> <p>3.20 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莱柏来日。</p> <p>3.29 盟军总部麦卡特向全递信工会提交停</p>	<p>1. 1 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p> <p>1. 4 缅甸共和国独立。</p> <p>1.17 荷兰、印尼签署伦维尔停战协定。</p> <p>1.30 甘地被刺。</p> <p>2. 1 马来亚联邦政府成立。</p> <p>2. 6 南朝鲜全境发生总罢工。</p> <p>3.11 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反对国共合作，决定对国民党给予军事援助。</p> <p>3.29 国民党政府召开伪国民大会。</p> <p>4.19 为统一朝鲜，召开南北朝鲜协商会议。</p> <p>4.29 朝鲜人民委员会通过朝鲜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p> <p>4 中国各地继续爆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示威和罢工。</p> <p>5. 1 中共倡议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p> <p>5. 7 阿拉伯、犹太停战协定签字。</p> <p>5.10 南朝鲜举行单独大选。</p> <p>7. 4 中美经济援助双边协定签字。</p> <p>7. 7 南朝鲜议会通过新宪法。</p> <p>7.20 李承晚当选“韩国</p>	<p>1. 4 苏联要求中美英三国促进对日和约。</p> <p>2. 6 西德统一宪章成立。</p> <p>2.25 捷克2月政变，共产党组织新内阁。</p> <p>3.17 英、法、比、荷、卢森堡西欧联盟签字（布鲁塞尔）。</p> <p>3.24 五十个国家签订国际贸易宪章（于古巴首都哈瓦那）。</p> <p>3.26 美停止对苏输出武器。</p> <p>4. 1 苏联封锁柏林陆运。</p> <p>4. 6 苏芬友好条约签字。</p> <p>4.13 西欧16个国家签订欧洲经济合作机构条约（巴黎）。</p> <p>4.20 意大利大选，天主教民主党获胜。</p> <p>5.14 以色列共和国宣告独立。</p> <p>6. 1 关于处理西德问题的六国协定签字。</p> <p>6. 9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辞职，由哥特瓦尔德继任。</p> <p>6.20 美国两院通过六十一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费。西德改革币制。</p> <p>6.22 苏联改革东德币制。</p> <p>6.24 苏联切断对西柏林</p>
------	---	---	--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8	止罢工的备忘录。 4• 4 “日农”内部成立确立自主性同盟。 4•24 神戶发生朝鮮侨民学校事件（翌日兵庫地区軍政部宣布事态严重）。 5• 1 举行第十九届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設立海上保安厅。 5•17 盟軍总部哈罗德发表关于禁止“共产党支部組織”的談話。 5•19 向远东委员会提出德萊柏报告。 5•20 芦田首相宣称正在考虑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公职問題。 5•22 撤消对檜桥等一百二十九人的整肃处分。 6•11 由于貪污問題决定对国务相西尾起訴。 6•23 为保卫教育，各大专学校举行罢教（課）。 6•28 福井发生大地震，各民主团体发起救灾运动。 7• 7 福井市公布公安条例。	第一任总统”。 8•15 “大韓民国”宣布成立。 8•19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政府公布关于财政經濟紧急对策的总统令。 8•21 国民党政府公布冻结物价、工資令。 8•25 南北朝鮮开始选举出席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 9• 9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金日成就任第一任首相。 10•19 苏联紅軍开始由北朝鮮撤退。 10•30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 11•16 蔣介石請求美国給予援助。 12•10 美“韓”經濟协定成立。 12•16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北平①。 12•19 荷兰破坏伦維尔协定，苏加諾总统等被捕。	铁路运输。 6•25 美国公布征兵法。 6•28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 7•13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遇刺。 7•20 美国对美共十二名领导人起訴。 7•23 华莱士組成进步党。 7•27 法国馬里（激进党）內閣成立。 8• 2 英美法三国代表与斯大林会談，就柏林問題交換意見。 9• 5 法国成立第二次舒曼內閣。 9•11 法国成立葛义（激进社会党）內閣。 9•21 第三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9•25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裁軍与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建議。 9•29 美英法就柏林問題向联合国提出控訴。 11• 2 美国选举总统，杜魯門再度当选。 12•10 联合国大会通过世

① 据《第三次国内战争大事月表》（第 77 頁），1949 年 1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編者

1948	7.19 发生行刺共产党总书记德田未遂事件。	界人权宣言。
	7.20 政府发表稳定经济十项原则。	
	7.22 麦克阿瑟写信给芦田首相要求修改国家公务员法，包括禁止公务员争议。	
(昭	7.31 公布第二百零一号政令，盟军总部纪廉辞职。全递信工会(30日)，国营铁路工会(31日)相继罢工，政府宣布局势严重。	
和	8. 6 北海道国营铁路工会离开工作场所斗争不断扩展。	
二	8.19 为执行对争议中的东宝砧制片厂职工的临时处分，出动武装警察队一千八百名。	
十	8.23 共产党中委发表《向全世界人民呼吁书》及《党对媾和的基本方针》。	
三	9.23 苏联向远东委员会建议，许可日本无限制地扩大和平工业。	
年)	9.30 逮捕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栗栖(昭和电气公司事件)。	
	10. 7 因昭和电气公司赠贿事件，芦田内阁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8		<p>辞职。</p> <p>10• 8 社会党中执委决定开除西尾末广。</p> <p>10•19 第二次吉田内閣成立。</p> <p>11•12 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判决东条等七名絞刑。</p> <p>11•30 經過修改的国家公務員法成立（12月3日公布）。</p> <p>12• 2 工人农民党举行成立大会。</p> <p>12•11 盟軍总部劳动科长赫普勒就工資三原則的重要性与劳动爭議发出警告。</p> <p>12•18 盟軍总部发表稳定經濟九原則。</p> <p>12•20 赫普勒劝告参加年終斗争的各工会停止罢工。全国政府机关工会声明局势严重。海員工会停止罢工。</p>				
1949		<p>1•28 举行第二届众議院选举，民主自由党获得过半数議席，共产党获得三十五席。</p> <p>2• 1 美国陸軍副部长罗亚尔、公使道奇来日。</p> <p>3• 7 道奇公使提示稳定日本經濟政策（道</p>	<p>1•14 中共向国民党政府提示八項和平条件。</p> <p>1•15 美英对国民党政府請求斡旋和平予以拒絕。</p> <p>1•19 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广东。</p> <p>1•21 蔣介石辞去国民党政府总統。</p>	<p>1• 1 美国承认“韩国”。</p> <p>1• 7 美国国务卿馬歇尔辞职，艾奇逊继任。</p> <p>1•20 美国总统杜魯門提出开发落后国家計划。</p> <p>1•30 斯大林表明願与美国首脑举行会談。</p> <p>1•31 世界工联接納日本</p>		

1949	奇路綫)。	1•22 国共就和平解放北平地区达成協議。	全国工会聯絡協議会参加。
3•16	第三次吉田內閣成立。	1•31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解放北平。	4• 4 美英法意等十二个国家簽訂北大西洋公約(在華盛頓)。
4• 1	盟軍总部指令日本銀行設立对日美援物資处理資金特別賬戶。	2•22 华北人民政府迁至北平。	4•13 发表关于減緩德国賠償的英美法協定。
4• 4	公布施行团体等規正令。	3• 8 法、越巴黎協定簽字。	4•20 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開幕(在巴黎、布拉格,到25日)。
4•23	規定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的統一匯率。	3•17 苏、朝經濟文化協定簽字。	5• 5 苏美英法就解决柏林問題簽訂四国協定。欧洲理事会規章簽字。
4•26	日美就阿波丸事件达成協議。	4•13 国共和談在北京正式开始。	5•12 柏林封鎖解除。
5• 1	举行第二十届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	4•20 国民党政府拒絕中共和平条件,人民解放軍橫渡长江开始总攻,发生炮击英舰《紫石英号》事件。	5•23 西德公布宪法。
5•22	工会法修改法案、劳动关系調整法修改法案成立。	4•24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①。	5•30 东德制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
5•30	行政机关職員定額法成立(二十六万人被解雇,6月1日实施)。为反对东京都公安条例举行示威游行,桥本金二(东京交通工会会员)被杀害(5•30事件)。	5•16 朝鮮民主力量提出結成朝鮮祖国統一战綫的号召。	6• 8 美国发表由南朝鮮撤兵。
6• 1	施行公共企业劳动关系法。	5•25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②	6•29 世界工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米兰,到7月9日)。
6• 9	为反对新警察派出所制度和解雇职	6•19 中国新政治协商會議預备會議開幕。	7•19 杜魯門主張組織反共十字軍。
		6•27 美軍宣布全部撤出南朝鮮。	8•14 西德举行大选,基督教民主联盟获胜。
		7• 1 中共主張准备对日媾和。	9• 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
		7•11 蔣介石、季里諾举	9• 8 美国发表貸与南斯

① 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86页),同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编者

② 据同上书(第89頁),同月27日,人民解放軍完全解放上海。——編者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9		工，国营电车工人举行罢工。		行碧瑤会談，就中菲經濟合作、締結太平洋反共同盟发表共同声明。		拉夫二千万美元。
(昭和二十四年)	7•4	麦克阿瑟发表“日本反共堡垒”論。国营铁路第一批解雇三万七千人。	7•21	李承晚建議召开远东反共會議。	9•12	西德选出休斯(自由民主党)为总统。
	7•5	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失踪。	8•5	美国发表美华关系白皮书。	9•18	英镑贬值。
	7•13	国营铁路发表第二批解雇六万二千人。	8•23	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問題，在海牙召开圆桌會議。	9•19	法郎贬值。
	7•15	发生三鷹事件。	8•28	东北人民政府成立。	9•20	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8•17	发生松川事件。	9•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开幕。	9•25	苏联发表拥有原子武器。
	8•19	施行关于官吏政治活动的人事院規則。	9•30	政治协商會議选出毛澤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	9•29	苏联废弃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約。
	8•26	以休普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表关于改革税制的建議案。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0•2	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9•3	为实现参加国际自由工联召开第一次悬談会。	10•15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	10•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9•8	解散旅日朝鮮人联盟。	11•16	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代表會議在北京开幕。	10•28	法国皮杜尔中間路綫联合內閣成立。
	9•10	人事院发表取消全递信等政府职工工会會員公務員資格。	12•16	毛澤东主席訪問莫斯科，毛澤东同斯大林会談。	11•28	国际自由工联在伦敦成立。
	9•20	选举全国都、道、府、县土地委員(保守党派胜利)。	12•27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	11•23	苏联公布日本細菌战犯名单。
	9•28	召开全国高等学校訓导长會議，決議整肅“紅色教授”。				
	10•22	全国大学教授联合				

1949 (昭和二十四年)	<p>会声明反对肃整“紅色教授”。</p> <p>10•29 发表娄甘方案。</p> <p>11•11 吉田首相在国会答辯中表示无条約不如締結单独和約。</p> <p>11•27 众議院通过外汇及对外贸易管理法。</p> <p>12• 2 有关税制改革三法案成立。</p> <p>12• 5 由退出全国政府机关工会的各工会組成政府机关工会。</p> <p>12• 7 以波茨坦政令公布施行关于确保粮食的临时措施。</p> <p>12•10 新产別工会举行成立大会。盟軍总部指令撤消对重要物資的統制。</p>		
1950 (昭和二十五年)	<p>1•15 和平問題悬談会发表声明。</p> <p>1•18 共产党第18次扩大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批評的決議”。</p> <p>1•31 美国参謀长联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等三軍首脑来日。蜷川中小企业厅长官被撤职。</p> <p>2• 6 野坂参三发表自我批評。国会共同斗争委员会宣布准备举行总罢工。</p> <p>2•18 国会“共斗委”召开</p>	<p>1• 4 美国声明不对台灣进行軍事干涉。</p> <p>1• 5 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 <p>1•14 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p> <p>1•26 美“韓”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签字。</p> <p>2•14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签字。</p> <p>3• 1 蔣介石恢复国民党政府总統职务。</p> <p>3•27 中苏簽訂开发新疆省协定及民用航空协定。</p> <p>4•20 中苏簽訂1950年貿易协定。</p>	<p>1• 5 杜魯門声明不干涉台灣。</p> <p>1• 7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批判日本共产党野坂理論。</p> <p>1•13 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p> <p>1•31 苏联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p> <p>2• 1 苏联为追究对細菌战責任問題，要求把日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p> <p>2• 2 英国原子能科学家富克斯因間諜嫌疑被捕。</p>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50			工人总奋起大会 (在人民广场)。	5.30	南朝鲜举行大选， 李承晚惨败。		2. 6	美国对全国煤矿工 人罢工援用塔夫脱-哈特莱法。	
	2.27		“保卫和平会”成立。	6. 7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 战线扩大会议开幕。		2. 7	美英承认保大政 权。	
	3. 2		池田藏相放言“中 小企业倒闭势所难 免”。	6.10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委员与北朝鲜代表 会谈。		2. 9	美英加召开原子能 会议。	
(昭	3. 7		官房长官增田宣称 “对重要产业工人 罢工要以总罢工论 处”。	6.19	约翰逊、布莱德雷、 麦克阿瑟举行会 议。		2.21	美断绝同保加利亚 的邦交。	
和	3.11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 举行筹备大会。	6.25	美国指使李承晚伪 军侵犯三八线挑起 朝鲜战争。		2.23	英国举行大选，工 党获胜。	
二	3.14		施行新渔业法。	6.2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非法决议用武力支 援南朝鲜。		3. 1	苏联实行金本位 制。	
十	4.26		在野党外交对策协 议会发表共同声 明，主张“和平、永 久中立、全面媾 和”。	6.28	朝鲜人民军解放汉 城。		3. 4	法国码头工人举行 总罢工，反对美国 给予法国以武器援 助。	
	4.27		杜勒斯主张早日締 结对日和约。	6.29	苏联答复美国不干 与朝鲜问题。		3.11	法国禁止罢工法成 立。	
五	4.28		民主党与国民协同 党合并组成国民民 主党。	6.30	美国向南朝鲜派遣 地面部队。		3.12	苏联举行最高苏维 埃选举。	
	5. 1		举行第21届庆祝 五一劳动节活动。 共产党发表纲领草 案。	7. 4	苏联要求美军立即 撤出朝鲜。		3.15	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常设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于斯德哥尔摩 开幕(到3月19日)。	
年	5. 2		东北大学学生反对 伊尔斯讲演。	7. 7	麦克阿瑟就任“联 合国军最高统帅”。		3.20	美对欧开始武器援 助。	
	5. 4		吉田首相非难东京 大学校长南原的全 面媾和论为“曲学 阿世”。	7.24	中国外长周恩来要 求联合国制裁美国 侵台行为。		4. 6	杜勒斯就任国务院 顾问。	
	5.10		公布吸收外资法。	8. 7	“联合国军”开始反 攻。		4.11	苏联就美国飞机在 拉脱维亚上空攻击 苏联飞机事件向美 抗议。	
				8.28	美国就台湾问题发 表七项声明。		4.24	杜勒斯声明积极准 备对日媾和。	
				9.15	“联合国军”在仁				

1950 （昭和二十五年）	5•30 举行五・三〇人民大会，八人被捕。		川、群山奇袭登陆。	4•26 英联邦发表关于对日媾和的九项方针。
	6•2 警视厅禁止在5日以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9•19 美泰经济援助协定签字。		
	6•5 警视厅宣布暂时限制并禁止集会和示威游行。	9•25 “联合国军”侵占汉城。		5•9 法外长舒曼提出德法基本工业统筹方案(舒曼计划)。
	6•6 麦克阿瑟指令整肃共产党中央委员二十四人。	9•30 尼赫鲁声明反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5•15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会见斯大林。
	6•17 杜勒斯访日，随即赴朝鲜视察。	10•9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6•3 6个国家发表关于舒曼计划的共同宣言。
	6•18 约翰逊国防部长、布萊德雷参谋长联席会談主席来日，于东京举行会议。	10•17 美泰军事协定签字。		6•26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劝告朝鲜人民军撤退。
	6•21 杜勒斯抵东京与麦克阿瑟晤谈。吉田、币原一致同意采取超党派外交。	10•21 “联合国军”侵占平壤。		6•27 杜魯門命令美军援助南朝鲜。
	6•26 麦克阿瑟勒令《赤旗报》停刊。	10•25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进行抗美援朝。		7•2 法国葛义内阁成立，四日辞职。
	7•3 全日本建筑工会鹤见支部干部因阻止运输武器遭到逮捕。	11•25 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总反攻。		7•12 法国成立以普利文为首的中間路線联合内阁。
	7•5 共产党就战争危机迫近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海员工会若松支部通过决议反对日本船只参战。	12•14 联合国为“实现朝鲜停战”设立三人委员会。		8•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苏联关于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
	7•8 麦克阿瑟指令成立一支七万五千名的警察预备队，增加	12•22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拒绝与上述三人委员会进行交涉。		8•8 华莱士辞掉美国进步党党魁。
				8•19 美国二大铁路工会罢工。
				9•14 杜魯門指令就对日媾和问题开始談判。
				9•19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9•20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主張加强联合国大会并建立联合国常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50			海上保安厅人員八千名。						备軍。
	7•11		日本工会总評議會(总評)成立。				9•23		美国蒙特-尼克松反共法案成立。
	7•28		开始对新聞、通信、广播部門实行“整肃共产党”。翌日全国新聞界声明反对。				9•26		北大西洋理事会批准成立欧洲軍。
(昭	7•31		地方稅法成立。				10•11		苏联建議召开五大国和平會議。
和	8•26		对松川事件被告求刑(死刑十名,无期徒刑三名)。				10•15		杜魯門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島举行会谈。
	8•30		麦克阿瑟下令解散全国工会聯絡協議会。				11• 3		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联合国方案。
二	9•12		举行对松川事件一案第一审最終辯論,签名抗議者达四万人。				11• 8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的提案。
十	10•13		經过美軍总部同意,解除对約一万名提出申請者的整肃。				11•16		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到20日)。
五	11• 5		对私营企业职工实行“整肃共产党”,被整肃者达九千六百十一人。				11•20		苏联就对日和約原則向美国提出备忘录。
年	11•10		开始解除对旧职业軍人的整肃。				11•30		杜魯門宣称考虑在朝鮮使用原子弹。
	11•15		政府机关因实行“整肃共产党”而被整肃者达一千一百七十一人。				12• 4		杜魯門与艾德礼会谈。
	11•21		重光葵被假释出				12•16		杜魯門宣布美国面临严重局面。
							12•19		北大西洋理事会决定重新武装西德,并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欧洲統一軍最高統帅。
							12•27		美国就对日媾和問題答复苏联。

1950 (昭和二十五年)	<p>獄。</p> <p>11.24 用波茨坦政令公布重新改組電力企業。</p> <p>12. 6 政府全面停止向中國出口統制物資。</p>		
1951 (昭和二十六年)	<p>1. 1 麥克阿瑟強調對日和約與集體安全保障的關係。杜勒斯宣稱考慮締結對日單獨和約。</p> <p>1.25 杜勒斯特使來日，與吉田等會談數次。</p> <p>2. 4 《和平之聲》雜誌有關人員被捕。</p> <p>3.10 工會總評議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參加自由工聯案被否決。</p> <p>3.26 眾議院非法取消日共議員川上貫一的資格。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者達六百四十萬人。</p> <p>3.28 “總同盟”解散。</p> <p>3.30 三鷹事件宣判，除被告竹內以外均無罪。</p> <p>4.11 麥克阿瑟被免職。</p> <p>4.12 李奇微到任。</p> <p>4.13 禁止慶祝五一勞動節活動使用人民廣場。</p> <p>5. 1 第22屆慶祝五一勞動節活動，在芝公園舉行，參加者</p>	<p>1. 1 中印通商協定簽字。</p> <p>1. 4 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解放漢城。</p> <p>1.17 中國拒絕“聯合國”提出的停戰方案，提出四項條件。</p> <p>2. 1 聯合國大會通過污蔑中國的決議。</p> <p>2. 3 印度聲明停止調停朝鮮戰爭工作。</p> <p>3. 7 伊朗首相拉茲馬拉被刺。</p> <p>3.15 伊朗國民議會通過石油國有法案。</p> <p>3.30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調解克什米爾法案。</p> <p>4. 3 “聯合國軍”再度侵越三八綫。</p> <p>4. 7 由十個亞洲、阿拉伯國家成立解決朝鮮問題小組。</p> <p>4.27 美菲經濟援助雙邊協定簽字。</p> <p>4.28 摩薩台就任伊朗首相。</p> <p>4.30 中國政府下令征用英國亞細亞石油公司資產 伊朗國民</p>	<p>1. 8 杜魯門于歲首諸文中主張擴張軍備。</p> <p>1.26 法國政府宣布世界工聯總部為非法（禁止在法國境內活動）。</p> <p>2.21 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在柏林），26日發表要求五大國締結和平條約的柏林宣言。</p> <p>3. 5 四國（蘇、美、英、法）代理外長會議在巴黎舉行。</p> <p>3.10 法國第二次葛義內閣成立。</p> <p>3.30 美將對日和約草案送交十五個國家。</p> <p>4. 2 歐洲統一軍正式成立。</p> <p>4.11 “聯合國軍司令官”麥克阿瑟被罷免，李奇微中將繼任。英國建議中國參加對日和會（13日美國拒絕）。</p> <p>4.18 西歐六國簽訂舒曼計劃實施條約。</p> <p>4.22 英國比萬勞工相辭職。（翌日，威爾遜</p>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51 (昭和二十六年)	<p>一万五千人(筹委中止举行工会中央的庆祝活动)。</p> <p>5. 3 总評领导干部在紀念颁布宪法仪式上举行示威。</p> <p>6. 1 总同盟“革新”派举行重建大会,首領是松岡駒吉。</p> <p>6. 5 国鉄工会大会通过和平三原則,“民同”解散。</p> <p>6.16 盟軍总部通告日本政府撤回被整肅人員的备忘录。</p> <p>6.20 公布第一批被解除整肅者(三木武吉、石桥湛山等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名)。</p> <p>7. 3 吉田内閣实行重大改組。</p> <p>7. 4 发表解除对教职員的整肅。</p> <p>7.10 政府发表解散財閥工作已告完成,解散持股整理委员会。</p> <p>8. 6 解除对鳩山等一万三千九百零四人的整肅。</p> <p>8.18 正式决定出席“对日和会”的全权代表团名单。</p> <p>8.21 共产党第二十次中委会全体会議通过</p>	<p>議會通过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法案。</p> <p>5.18 联合国大会議决对中国禁运战略物資。</p> <p>6.19 英、伊石油会谈决裂。</p> <p>6.23 馬立克提出关于在朝鮮停战問題的建議。</p> <p>7. 1 朝鮮人民軍統帥、中国志願軍司令員同意李奇微的建議。</p> <p>7.10 在开城开始朝鮮停战談判。</p> <p>7.12 美、澳、新初步签定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約。</p> <p>8.25 印度決定不参加“对日和会”。</p> <p>8.30 美菲共同防御协定签字。</p> <p>8.31 尼赫魯建議召开亚洲和会。</p> <p>9. 1 美、澳、新正式簽訂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約。</p>	<p>、貿易相辞职。)</p> <p>4.25 美英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討論对日和約問題。</p> <p>5. 3 麦克阿瑟在參議院軍事委员会作証。</p> <p>5. 7 苏联就美国对日和約草案提出备忘录, 8 日美国表示拒絕。</p> <p>5.16 英国声明要求日本支付賠償。</p> <p>6.10 苏联建議美国召开全面对日和会。</p> <p>6.14 美英发表关于单独締結对日和約的声明。</p> <p>6.17 法国举行大选,戴高乐派成为議會中第一大党(就得票数量來說,共产党应为第一大党)。</p> <p>6.21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組織批准日本加入。</p> <p>6.26 美国股票跌落。</p> <p>7. 9 英法宣布結束对西德的战争状态。</p> <p>7.26 意大利成立第二次加斯貝利內閣。</p> <p>8. 1 苏联《真理报》刊載英外相摩里遜的文章。</p> <p>8. 6 什維尔尼克(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p>

1951 (昭和二十六年)	<p>新綱領草案，发表《关于党的統一的決議》。</p> <p>9• 1 举行和平国民大会（在靖国神社）。</p> <p>9• 4 旧金山“对日和会”开幕。对十九名共产党领导人发出拘票，全国有三百处被搜查。</p> <p>9• 8 四十九个国家在“对日和約”上签字（日本时间是9日上午2时）。日美“安全条約”签字。</p> <p>9•30 投票要求全面媾和者达四百八十万。</p>	<p>主席）向杜魯門提出关于締結五大国和平条約的建議，7日美国表示拒絕。</p> <p>8•12 苏联通知美国将参加对日和会。</p> <p>8•15 美英公布对日和約最后草案。</p> <p>9• 3 苏法簽訂新通商条約。</p> <p>9• 5 苏联在旧金山會議上提出对日和約修正案。</p>
----------------------	---	--

附录(二) 資料

对日和約^①

(1951年9月8日訂于旧金山,

自1952年4月28日生效)

各盟国及日本决定，他們此后之关系将是有主权的平等国家間之关系，在友好的結合下进行合作，以便促进他們共同的福利及維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願締結和約，借以解决一切由于他們之間存在之战争状态所引起而尚未解决的問題。

日本方面申述其志願：請求加入联合国及在一切情形下遵守联合国宪章之原則；致力于世界人权宣言的目的之实现；設法在日本国内造成安定及福利条件，一如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及第五十六条所规定，并已由投降后日本立法所創造者；并在公私貿易及商业方面，遵守国际上通行的公正慣例。

各盟国对于上节所述日本之志願表示欢迎。

因此，各盟国及日本决定締結本和平条約，为此各派签名于后之全权代表，經将其所奉全权証书提出校閱，认为妥善，議定下述条款：

第一章 和平

第 一 条

甲、日本与每一盟国間之战争状态，依照本条約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自日本与該盟国間所締結之本条約生效时起，即告終止。

乙、各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領海有完全的主权。

第二章 領土

第 二 条

甲、日本承认朝鮮之独立，并放弃对朝鮮包括济州島、巨文島及郁陵島在

① 即由美国一手包办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約，参看《国际条約集(1950—1952)》，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333—350頁。——編者

內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乙、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丙、日本放弃对千島群島及由于1905年9月5日朴資茅斯条約所获得主权之庫頁島一部分及其附近島嶼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丁、日本放弃与国际联盟委任統治制度有关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并接受1947年4月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托管制度推行于从前委任日本統治的太平洋各島嶼之措施。

戊、日本放弃对于南极地域任何部的任何权利、权利根据或利益之一切要求，不論其是由于日本国民之活动或由于其他方式而获得的。

己、日本放弃对于南威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第 三 条

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緯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諸島（包括琉球群島与大东群島）、孺妇岩島以南之南方諸島（包括小笠原群島、西之島与琉璜列島）及冲之鳥島与南鳥島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議，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議，并对此种建議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島嶼之領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領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第 四 条

甲、日本及其国民在第二条所指区域内的財產及对于此等区域之现在行政当局及居民（包括法人）的要求，包括債務之处理，以及此等行政当局及居民在日本的財產及此等行政当局与居民对日本及其国民的要求，包括債務之处理，应由日本及此等行政当局商訂特別处理办法。任一盟国或其国民在第二条所指区域内之財產，若尚未归还，应由行政当局依其现状予以归还。（本約所称“国民”一詞，包括法人在內。）

本款应受本条乙款规定之限制。

乙、日本承认，美国軍政府对日本及其国民在第二条及第三条所指任何区域内財產之处理、或根据美国軍政府指令对该財產所作处理为有效。

丙、为日本所有之連接日本与依照本条約脱离日本統治的領土間的海底电綫应平均分配。日本保留在日本之終点及与其相联电綫之一半，該脱离之領土保留其余电綫之一半及其相联之終点設備。

第三章 安全

第 五 条

甲、日本接受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定的义务，特别是左列各项义务：

（一）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二）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三）对于联合国依据宪章规定而采取之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并于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对该国家不得给予协助。

乙、各盟国确认在其对日关系上，将以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之原则为准绳。

丙、各盟国方面承认日本以一个主权国家资格，具有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提及的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

第 六 条

甲、各盟国所有占领军，应于本条约生效后尽早撤离日本，无论如何，其撤离不得迟于本条约生效后九十日之期。但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外国武装部队依照或由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与日本业已缔结或行将缔结之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或留驻。

乙、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第九条关于遣送日本军事部队回国的规定之尚未完全实施者，应实施之。

丙、所有曾供占领军使用、并于本条约生效时仍为占领军所占有尚未予补偿的日本财产，除相互协定订有其他办法外，均应于本条约生效后九十日内归还日本政府。

第四章 政治及经济条款

第 七 条

甲、各盟国在本条约对于该国及日本相互间生效后一年内，通知日本，其在战前与日本所订之双边条约，何者愿予继续有效或恢复。经此通知后之条约，除仅应予以必要之修正，俾与本条约相符外，应继续有效或恢复。经此通知后之条约，自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应视为继续有效或已恢复，并应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所有未经依照上述方法通知日本之条约，应认为业已废止。

乙、依照本条甲项所作之任何通知中，得将由通知国所负有国际关系责任之任何领土，置于某一继续实施的或恢复的条约之效力范围以外，倘愿停

止該項除外時，則自通知日本之日起，三個月以後停止之。

第 八 條

甲、日本承認盟國現在或今後為結束自 1939 年 9 月 1 日開始之戰爭狀態而締結之一切條約以及盟國為恢復和平或關於恢復和平而訂之任何其他協定之完全效力。日本並接受為結束前國際聯盟及國際常設法庭所訂之各項協定。

乙、日本放棄其作為簽字國由 1919 年 9 月 10 日聖日爾曼公約，1936 年 7 月 20 日蒙得委海峽協定，以及 1923 年 7 月 24 日洛桑土耳其和約第十六條所取得之一切權利及利益。

丙、日本放棄其由下列各協定所取得之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利益並解除由各該協定所發生之一切義務：1930 年 1 月 20 日德國與各債權國間之協定及其附件，包括 1930 年 5 月 17 日之信託協定，1930 年 1 月 20 日關於國際清算銀行之協定及國際清算銀行規程。日本將於本條約生效後六個月內將其放棄本項所稱之權利、權利根據及利益一事通知巴黎外交部。

第 九 條

日本將與願意談判之盟國迅速進行關於規定或限制公海捕魚及保護與發展公海漁業之雙邊及多邊協定之談判。

第 十 條

日本放棄在中國之一切特權與利益，包括由於 1901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簽訂之最後議定書及其所有附件、補充照會與文件所產生之一切利益與特權，並同意就日本方面而言，該議定書及其所有附件、照會與文件概行作廢。

第 十 一 條

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並將執行各該法庭所科予現被監禁於日本境內之日本國民之處刑。對此等人犯赦免、減刑與假釋之權，除由每一案件科刑之一個政府或數個政府之決定並由日本之建議外，不得行使。如該項人犯係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判決，該項權利除由參加該法庭之多數政府之決定並由日本之建議外，不得行使。

第 十 二 條

甲、日本宣布準備立即與各盟國進行締結條約或協定之談判，借以將其貿易、航業及其他商務關係置於穩固與友好的基礎上。

乙、在有關條約或協定尚未締結之前，日本將在本條約生效之時起四年

期內：

(一) 对于各盟国及其国民、貨物及船舶給与以下各項待遇：

(甲) 在关税、捐稅、限制及适用于有关进出口貨物或其他規章方面，給与最惠国待遇；

(乙) 关于船运、航行及进口貨物以及关于自然人与法人及其利益給予国民待遇。該項待遇包括关于賦課、征稅、訴訟、訂立及执行契約、财产权(有形和无形的)，参加依照日本法律所設立之法团以及一般的从事各种商业及职业的活动。

(二) 保証日本国营貿易企业之对外采购及銷售，应仅基于商务的考虑。

丙、但无论任何事項，日本所給予某一盟国之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应仅以該有关盟国关于同一事項所給予日本之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之程度为限。上文所包含之互惠原則，其涉及某一盟国任何本部以外領土之产品、船舶与法团，及在該領土內有住所之人民，及涉及某一具有联邦制度之盟国之任何一州或一省之法团及在該州或省有住所之人民者，应依照在該領土、州或省所給予日本之待遇决定之。

丁、在适用本条时，如果某項差別待遇办法系基于引用該項办法一方之商約中所通常规定之一項例外，或基于保护該方之对外財政地位或支付平衡之需要(除涉及船运及航行者外)或基于維護切要的安全利益之需要，則此等差別待遇办法，不得視為对于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有所損害。但以該項办法适合于情况，而非出以武断或不合理之方式为限。

戊、本条所规定之日本义务，不得因本条約第十四条所规定任何盟国权利之行使而有所影响。本条各項规定，亦不得了解为限制日本在本条約第十五条所承担之义务。

第十三条

甲、日本遇有任何一盟国或数盟国請求締結关于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之双边或多边协定时，应立即与該盟国举行談判。

乙、在未締結該項协定前，日本将在本条約生效之时起四年期內，給予該盟国以不低于在本条約生效时，該盟国等所行使之航空运输权利及特权之待遇，并应在經營及发展空运业务方面，給予完全平等之机会。

丙、日本在未依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約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加入該約之前，对于該公約內所适用于国际航空交通之条款，应予施行，并对于依照該公約条款作为附件规定的标准、办法及手續，亦应予以施行。

第五章 要求及財產

第十四条

甲、茲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盟国以賠償，但同时承认，如欲維持可以生存的經濟，則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賠償此种損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因此：

(一) 日本願尽速与那些願意談判而其現有領土曾被日軍占領并曾遭受日本損害的盟国进行談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撈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該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賠償各該国修复其所受損害的費用。此項办法应避免以增加的負擔加諸其他盟国。当需要制造原料时，应由各該盟国供給，借免以任何外汇上的負擔加諸日本。

(二) (甲)在受下列(乙)項各规定的限制下，每一盟国应有权扣押、扣留、清算或以其他方法处置下列一切財產、权利及利益：

(子) 属于日本及其国民者；

(丑) 属于日本或其国民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及

(寅) 属于为日本或其国民所有的或控制的团体，而該項財產在本条約生效时即受該盟国管轄者。本項所规定的財產，权利及利益应包括现在由盟国敌产管理当局封存、处理、占有或管制者，而这些財產、权利及利益在由敌产管理当局加以管制之时是属于上列(子)(丑)(寅)各目所述任何个人或团体所有或代表个人或团体保管或管理者。

(乙) 以下各目不在上列(甲)項所规定的权利之內：

(子) 在战争期內，經有关政府准許，在未經日本占領的盟国領土內居住之日本自然人之財產，但在战争期內受到限制而在本条約生效时仍受此种限制的財產，則不在此列。

(丑) 属于日本政府所有并为外交或領事目的使用的一切不动产、家具与固定設備，私人家具与設備，以及其他非投資性质的，且为执行外交与領事职务所經常必需的、日本外交及領事人員所有的私人財產；

(寅) 属于宗教团体或私人慈善机构，并純为宗教或慈善目的使用的財產；

(卯) 有关国家因在1945年9月2日以后与日本恢复貿易及財政关系而归該国管轄的財產、权利及利益，但由于违反有关盟国的法律的交易而获得者，不在此列。

(辰) 日本或其国民的债务,对于日本境内有形财产的任何权利、权利根据或利益,对于依照日本法律所组织的企业的利益,或任何有关的书面证据,但此項除外,应仅适用于日本及其国民以日本货币计算之债务。

(丙) 以上(子)目至(辰)目的例外所提及的财产应予归还, 但为保存及管理此項财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得予扣除。如任何此項财产已被清算,则应归还其清算所得之款。

(丁) 以上(子)目所规定之扣押、扣留、清算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财产的权利,应依照有关的盟国之法律行使之,该所有人应仅具有那些法律所给予他的权利。

(戊) 各盟国同意对日本商标及其文学上与艺术上的财产权利, 予以依每一盟国情形许可范围内的优惠。

乙、除本约另有规定者外,各盟国兹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盟国及其国民对由日本及其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行动而产生的其他要求,以及盟国对于占领的直接军事费用的要求。

第十五条

甲、各盟国及其国民,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之间之任何期间,所有在日本之有形及无形财产及一切权利或任何种之利益,经于日本与有关盟国间的本条约生效后九个月内提出者,日本应自请求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之,但为所有人未经胁迫或詐欺而业已自由处理者不在此列。此項财产应予归还,并免除因战争所加予之负担与费用,归还时亦不需任何费用。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或其政府在规定期间内未请求发还之财产,日本政府得自行决定处理。如此項财产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系在日本境内而不能归还或已因战争而遭损害或毁坏者,则当依不低于日本内閣于 1951 年 7 月 13 日通过的盟国财产赔偿法草案所规定的条件赔偿之。

乙、关于在战时遭受损害之工业财产权利, 日本对于盟国及其国民将继续给予不少于 1949 年 9 月 1 日生效之内閣命令第三〇九号,1950 年 1 月 28 日生效之命令第十二号及 1950 年 2 月 1 日生效之命令第九号及各該命令之所有修正所给予之利益,但以此項国民曾在规定之期限内请求此种利益者为限。

丙、(一)日本承认在 1941 年 12 月 6 日存在于日本境内有关盟国及其国民已出版或未出版之文学或艺术作品的财产权利,在该日以后继续有效,并

承认在該日以后由于日本在該日仍为締約国之任何公約或协定之效力而在日本产生的权利，或若不是因为战争而可能产生的权利，不論此类公約或协定在战争爆发时或以后曾否由日本或有关盟国以国内法予以废止或暫停其效力。

(二) 不待权利所有人申請及繳納任何費用，或履行任何其他手續，自1941年12月7日至日本与有关盟国間的本条約生效日之期間应自其权利正常繼續期間計算中减除之；此項期間，并另加六个月期間，应自一文艺作品为获得在日本之翻譯权利而必須譯成日文之期限內减除之。

第十六条

为对盟国武装部队人員在为日本战俘期間所受过分之痛苦表示賠償之願望起见，日本允将在战时中立之国家或与任何盟国作战之国家內的日本及其国民所有之资产或由其所选择的此类资产之等价物移交紅十字国际委员会，由其清理此項资产，并将所得基金，依其所认为公平之基础，分配予前战俘及其家屬。但本条約第十四条甲(二)乙(丑)至(辰)各目所述各类资产，及在本条約最初生效时不住在日本的日本自然人的资产，不在移交之列。并了解，本条关于移交之规定，不适用于现为日本金融机关所有之国际清算銀行一万九千七百七十股份。

第十七条

甲、日本政府經任一盟国之請求，对于日本捕获审檢所涉及盟国国民所有权之案件所作之判決或命令，应依国际法原則予以复核及修正，并提供此項案件記錄之全部文件抄本，包括所作判決及所頒布之命令，如該复核或修正显示必須恢复权利时，則第十五条之规定應該适用于該有关之財產。

乙、日本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任一盟国国民在日本有关盟国間的本条約生效之日起一年內之任何时期，得向日本有关当局提請复核从1941年12月7日起至本約生效之日期內所作之任何判決，而在該案任何程序中，該国民未能以原告或被告之身分为充分之陈述者，如該国民因此項判決而受損害，日本政府应設法使其能恢复在未作判決前之地位，或获得依其情形公允平衡之救济。

第十八条

甲、茲承认，由于战争状态存在前已有之义务与契約(包括有关公債者)及已取得之权利所产生，而系日本政府或其国民应付予任何一盟国政府或其国民，或系任何一盟国政府或其国民应付予日本政府或其国民的金錢債務之

偿付义务，并不因战争状态之介入而受影响。对于因为在战争状态发生前发生之财产的丧失或损害或个人的受伤或死亡而由任一盟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或由日本政府向任何盟国政府提出或再提出之要求，应就其案情予以考虑之义务；亦不得视为因战争状态之介入而受影响。本项之规定并不妨碍本约第十四条所授与之权利。

乙、日本政府承认对战前日本国家的外债及随后宣布由日本国家承担之法人组织之债务负有义务，并表示愿早日与债权人就恢复偿付债务一事进行谈判；关于其他战前的要求及债务之谈判予以鼓励；并对于由此而发生之款项的拨汇亦予以便利。

第十九条

甲、日本放弃日本及其国民对盟国及其国民因战争状态之存在所采取行动而发生的一切要求，并放弃其由于本条约生效以前任何盟国军队或当局在日本领土内之留驻，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而产生的一切要求。

乙、上述的放弃包括对因任何盟国自1939年9月1日至本约生效之日对日本船舶所采取行动而产生的任何要求，并包括因在盟国拘留下的战俘及平民所产生的任何要求与债务在内，但任何盟国自1945年9月2日以后制定的法律所特别承认的日本之要求，则不在包括之列。

丙、在相互声明放弃的条件下，日本政府代表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声明放弃其对德国国民的一切要求（包括债务在内），包括政府与政府间的要求及为战时所受损失或损害之要求在内，但下列两项要求除外：（一）与在1939年9月1日以前所订契约及所取得的权利有关的要求，及（二）由于在1945年9月2日以后德国及日本间的贸易与金融关系而产生的要求。此项放弃声明应不妨碍根据本约第十六条及二十条而采取的行动。

丁、日本承认在占领期间由于或在占领当局指令之下或由当时日本法律所授权而造成的行为与不行为的效力，而且不应采取行动使盟国的国民担负由于此等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的民事的或刑事的责任。

第二十条

日本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依照1945年柏林会议的议定书中有权处分德国在日本资产之各国所已或有可能决定的对该等资产之处分得以实施。又日本在该等资产未作最后处分之前，将负保存及管理之责。

第二十一条

虽有本约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中国仍得享有第十条及第十四条甲款二项

所规定的利益；朝鮮得享有本約第二条，第九条及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利益。

第六章 爭議之解决

第二十二條

倘本条約之任何一方认为业已发生有关本条約的解释及执行而未能提出于特別請求法庭或以其他協議方法解决的爭議时，該項爭議应在当事任何一方的請求下，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之。日本及尚非国际法院規約組成国之各盟国，在其各別批准本約时，均将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946 年 10 月 15 日之決議，向国际法院書記官长递送一概括宣言，声明对于有关具有本条所提及的性质之一切爭議，一般的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轄权，而毋須另訂特別协定。

第七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三條

甲、本条約应由包括日本在內的签字国批准，并应于日本及包括作为主要占领国的美国在內之下列国家中过半数国家，即澳大利亚、加拿大、錫兰、法国、印度尼西亚、荷兰王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大不列顛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业已交存其批准书后，对各該批准国发生效力。对于其后批准的国家，本条約即于各該国家交存其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

乙、如本約在日本交存其批准书九个月后尚未生效，任何批准国得为此目的，于日本交存批准书之日起三年內，以通知日本政府及美国政府，使本約在該国与日本間发生效力。

第二十四條

所有批准书应交存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以上述交存情况依照第二十三条甲款本条約生效之日期及依照第二十三条乙款规定所作的通知，通知所有签字国。

第二十五條

本条約所称盟国应为曾与日本作战之国家，或任何以前构成第二十三条中所指的国家的領土的一部分之国家，假如各該有关国家系已签署及批准本約者。除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外，本条約对于非本条所指盟国之任何国家，不給予任何权利、权利根据及利益；本条約之任何规定也不得有利于非本条所指盟国而废弃或損害日本之任何权利、权利根据或利益。

第二十六条

日本准备与任何签署或加入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且对日本作战而非本条约签字国之国家,或以任何以前构成第二十三条中所指的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而非本约签字国之国家订立一与本条约相同或大致相同之双边条约,但日本之此项义务,将于本约最初生效后三年届满时终止,倘日本与任何国家成立一媾和协议或战争赔偿协议,给予该国以较本条约规定更大之利益时,则此等利益应同样给予本约之缔约国。

第二十七条

本条约应存放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档案库。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应以本条约之认证副本一份送致每一签字国。

后面签署的各全权代表签字在本条约上以资证明。

1951年9月8日订于旧金山,用同等有效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以及日文写成。

签字国^①四十九国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柬埔寨、加拿大、锡兰、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堡大公国、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南非联邦、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越、日本。

未签字国 三国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

未参加国 三国

缅甸、印度、南斯拉夫。

此外,符合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国家 一国

中国。

日本政府的两个声明^②

—

关于本日签字的和约,日本政府声明如下:

① 签字国代表姓名从略。

② 参看《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50—352页。——编者

一、除本和約另有規定外，日本承認在 1939 年 9 月 1 日日本為一方而現在有效的一切多邊的国际文件的完全效力，並且聲明在本條約首次生效時，日本將恢復上述文件所產生的一切權利和義務。但若參加某一文件牽涉到一項国际組織的會員資格，而日本已在 1939 年 9 月 1 日或是日以後停止此項會員資格時，則本款的規定，應以日本恢復該項国际組織的會員資格為條件。

二、日本政府有意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期內正式加入下列各項国际協定，其期間自和約首次生效日起不超出一年：

（一）1946 年 12 月 11 日在成功湖開放簽字的修改 1912 年 1 月 23 日，1925 年 2 月 11 日，1925 年 2 月 19 日，1931 年 7 月 13 日，1931 年 11 月 27 日和 1936 年 6 月 26 日關於麻醉品的一切協定、公約和議定書的議定書；

（二）1948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開放簽字的，將 1931 年 7 月 13 日簽訂并經 1946 年 12 月 11 日在成功湖簽訂的議定書所修改的限制麻醉品製造和規定麻醉品分配的公約所未包括麻醉品置于国际管制之下的議定書；

（三）1927 年 9 月 26 日在日內瓦簽訂的關於外国法庭仲裁裁決的執行的国际公約；

（四）1928 年 12 月 14 日在日內瓦簽訂的国际經濟統計公約和議定書及 1948 年 12 月 19 日在巴黎簽訂的修改国际統計公約的議定書；

（五）1923 年 11 月 3 日在日內瓦簽訂的国际關於簡化海關手續公約和簽字議定書；

（六）1891 年 4 月 14 日在馬德里締結的關於防止假冒貨物原產地的協定以及 1911 年 6 月 2 日在華盛頓，1925 年 11 月 6 日在海牙和 1934 年 6 月 2 日在倫敦對於上述協定的修改；

（七）1929 年 10 月 12 日在華沙簽訂的統一国际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和附加議定書；

（八）1948 年 6 月 10 日在倫敦開放簽字的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九）1949 年 8 月 12 日關於保護戰爭受害者的日內瓦公約。

三、日本國政府也有意在和約首次生效後六個月內申請（甲）加入 1944 年 12 月 7 日在芝加哥開放簽字の国际民用航空公約并一俟日本成為上述公約的締約國後，接受 1944 年 12 月 17 日也在芝加哥開放簽字的關於国际航空過境運輸的協定，以及（乙）加入 1947 年 10 月 11 日在華盛頓開放簽字的世界氣象組織公約。

1951 年 9 月 8 日訂于舊金山城。①

① 簽字代表姓名從略。

关于本日签订的和约，日本政府声明如下：

日本国承认任何盟国之一所授权的委员会、代表团或其他组织在日本领土内辨认、编列、维持和管理军事坟墓、坟场和纪念建筑；日本将对上述组织之任务给予便利并将与有关盟国或盟国所授权的委员会、代表团或其他组织进行关于上述军事坟墓、坟场和纪念建筑物的谈判，以期缔结可能认为必要的一切协定。

日本期待盟国将与日本政府开始谈判，以便对于可能在盟国境内存在着，而有意保存的日本军事坟墓或坟场的维持，采取措施。^①

議 定 书^②

兹受权缔结以下协定，以作为关于和日本国恢复和平以后处理合同、时效时间及流通证券问题以及保险合同问题的准绳。

合同、时效和流通证券

甲、合同

(一) 成为(己)项中规定的敌人的某种当事者之间为其履行需要进行交涉的合同，自某一合同当事者成为敌人之时起，即认为已被解除。但第二款和第三款所举之例外，不在此列。同时，此种解除，并不妨碍本日签订的和约第十五条及第十八条的规定，也不免除合同当事者偿还已经作为预付款或定款加以接受而尚未进行补偿的金额的义务。

(二) 可以分割的，并且，在成为(己)项中规定的敌人的某种当事者之间，为履行合同中的该当部分，勿须为其履行而进行交涉的合同的一部分，并不因前款之规定而认为已经解除，相反，在不妨碍本日签订的和约中第十四条中包括之权利的情况下，继续有效。如果合同的规定不可能这样分割时，则认为该项合同整个已被解除。上述合同部分，应接受本议定书的签字国、和约中所指盟国——对于该合同或某种合同当事者拥有管辖权之国家所制定的国内法律、命令和规则的适用，并服从该合同的条款。

(三) 按照敌人相互间的合同而合法进行的交易，如系得到有关政府即本议定书之签字国及和约中所指盟国政府的许可者，不得因(甲)项之规定而认为

① 签字代表姓名从略。

② 本议定书系根据本书所载日文本(从英文本译出者)译出，因未见汉译本，无从核对，恐有缺陷。——编者

无效。

(四) 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不受上述规定的拘束，应按本議定书(丁)項及(戊)項的规定处理。

乙、时效期間

(一) 在由于对人和财产发生影响的战争状态而未能进行必要的訴訟或办理必要手續以保全自己之权利的本議定书签字国的国民，就其拥有之物提起訴訟或采取保全措施之权利的一切时效時間或限制期間，無論此等期間是从战争发生以前开始还是从战争发生后开始，應該认为，一方面在日本境内，另一方面在根据互利原則給予日本国以本款规定之利益之签字国境内，在战争繼續期間停止了进行。此等期間，从本日签字的和約开始生效之日起重新开始进行。本款规定，既适用于股息票或紅利受領証件的提示，又适用于关于为了接受对有价值証券（中签于为了偿还的抽签或因其他理由而被偿还的有价值証券）的支付的提示所规定的期間。但此等股息券或价值証券的期間，自对于股息票或价值証券的持有人可能支付其款額之日起重新开始进行。

(二) 由于在战争期間未曾采取某項行为或办理某种手續而在日本境内受到处理，致使本議定书的签字国、和約中所指盟国中之一的国民受到損害时，日本国政府必須恢复其受到損害的权利。此种恢复如果可能^①或不平衡时，日本国政府必須对有关签字国的国民，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公平而均衡的救济。

丙、流通証券

(一) 在敌人相互間，对于战前制成的流通証券，不得仅仅以在战争期間未曾在必要期間内为承兌或支付而提示証券，未向发票人或簽證人发出拒絕承兌或拒絕支付的通知或制成拒絕証书为理由；或者以在战争期間未能完成某一手續为理由，而认为該流通証券已經无效。

(二) 如果为了承兌或支付而提示流通証券的期限，向发票人或簽證人提交拒絕承兌或拒絕支付的通知的期限，或者制成拒絕証书的期限，在战争期間已經屆滿，以及必須提示証券、制成拒絕証书或通知拒絕承兌或拒絕支付的当事人，在战争期間并未采取上述行为时，必須自本日签字的和約生效之日起，給与以三个月以上的時間，以便利提示証券；通知拒絕承兌或拒絕支付，

① 疑是“不可能”之誤。——編者

或制成拒絕証书。

(三) 任何人由于在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间，接受以后成为敌人的别人之约定的结果而负有有关流通証券的债务时，尽管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后者仍继续就此項债务对前者负有补偿的责任。

丁、在当事人成为敌人以前尚未滿期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人寿保险除外）。

(一) 保险合同不能由于当事人成为敌人的事实而被解除。但这一规定須以当事人在成为敌人之日以前，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并且，保险合同締結人在該日以前已根据合同支付了为成立保险及維持合同效力所需要的全部应付之保险费为条件。

(二) 根据前款规定继续有效者以外的其他保险合同，即认为不曾存在，据此而支付的金额应予返还。

(三) 除以下有明文规定者以外，特約再保险及其他再保险合同，在从当事人成为敌人之日起，应即认为已经终止；同时，以此为基础的一切多次再保险合同，应认为即日归于取消。但与根据特約海上再保险而开始的航海保险有关的多次再保险合同，则应认为到根据再保险的条件自然终止时为止继续完全有效。

(四) 任意再保险合同，如果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并且按照例行办法支付或抵消了为成立再保险和維持其效力所必須支付的全部保险金额时，则此項再保险合同，除非另有规定外，应认为直至当事人成为敌人之日为止继续完全有效，而在該日終結。至于有关航海保险的任意再保险，则应认为直到依照再保险的条件自然終結时为止继续完全有效。此外，与根据上述(一)款规定继续有效的保险合同有关的任意再保险，应认为在原訂保险的期間滿了以前继续完全有效。

(五) 除前項以外的任意再保险合同以及由于“超额損失率”而簽訂的超额損害再保险合同和雹灾再保险（不論其为任意合同与否）等一切合同，应认为不曾存在，其依此而支付的金额必須返还。

(六) 在特約再保险及其他再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特別规定时，其保险费应按经过时期比例进行清算。

(七) 保险合同或再保险合同（包括以特約再保险为基础的多 次 再 保 险 合 同），不能担保由于某一当事人所属的某一国家或該国家之与国或同盟国交战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或請求权。

(八) 保險在戰爭期間被原保險者轉移于其他保險者或實行全額再保險時，不論這種轉移或再保險是自主進行的，抑或根據行政和立法措施進行的，均應一律認為有效，原保險者的責任于轉移或再保險之日消滅。

(九) 同一當事者雙方之間簽訂了兩個以上的特約再保險及其他再保險合同時，應由當事人雙方進行結算。為確定由此產生之結余，在進行結算中，必須把一切結余（包括雙方同意的對於未償付的損失的準備金）和根據此等合同當事人一方應付給當事人另一方的一切金額，以及依照上述各款規定中之某一條款必須返還的一切金額，計算進去。

(十) 對於因當事人雙方成為敵人而在保險費、請求權和清算賬目上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遲延問題，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須支付利息。

(十一) 本議定書中（丁）項規定並不妨礙或影響本日簽字的和約第十四條所給予之權利。

戊、人壽保險合同

保險在戰爭期間由原保險人將保險轉移于其他保險人或實行全額再保險時，如這種轉移或再保險系根據日本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之要求而進行者，則應認為有效，原保險人的責任，自轉移或再保險之日起，即歸消滅。

己、特別規定

在本議定書的適用上，自然人或法人，在彼等之間所進行之交易，根據彼等或該合同所遵照之法律、命令和規則成為違法時，則自即日起成為敵人。

最 后 条 款

本議定書向日本國和本日與日本國簽訂和約的簽字國開放簽字，就本議定書所涉及的事項，自日本和有關簽字國雙方受到和約所拘束之日起，支配日本國與在本議定書上簽字之其他各國之間的關係。

本議定書應存放于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檔案庫。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應以本議定書的認證副本送致每一簽字國。

後面簽署的各全權代表簽字在本議定書上以資證明。

1951年9月8日訂于舊金山，用同等有效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以及日本文寫成。

（簽字國代表姓名從略）

美日安全条約^①

(1951年9月8日訂于旧金山,1952年4月28日生效)

日本已于本日和盟国簽訂和約。該和約生效以后,日本将无有效工具来行使它自卫的自然权利,因为它的武装已被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遭到危险,因为不負責的軍国主义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中驅逐出去。因此,日本希望与美利坚合众国簽訂一个安全条約,并与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簽訂的和約同时生效。

和約承认作为自主国的日本有权参加集体安全的协定,同时联合国宪章承认一切国家具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为行使这种权利,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駐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

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目前願意在日本国内和周围駐扎其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同时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間接侵略的自卫責任,經常避免任何可以成为进攻的威胁或不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則以促进和平与安全的軍备扩张。

为此,两国达成協議如下:

第 一 条

在和約和本条約生效之日,由日本授与,并由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駐扎美国陆、空、海軍之权利。此种軍队得用以維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鎮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騷乱所給予的援助。

第 二 条

在第一条所述之权利被行使期間,未經美利坚合众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給予任何第三国,亦不得将基地上或与基地有关之任何权利、权力或权限、或陆、空、海軍駐防、演习或过境之权利給予任何第三国。

第 三 条

美利坚合众国之武装部队駐扎日本国内及周围的条件应由两国政府之間的行政协定决定之。

① 參看《国际条約集(1950—1952)》,第393—394頁。——編者

第 四 条

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政府一經认为已有联合国之办法或其他单独或集体安全的布置，可由联合国或其他方面圓滿維持日本地区之国际和平与安全时，本条約即应停止生效。

第 五 条

本条約应由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批准，在两国于华盛顿互换本条約之批准书以后开始生效。

下列全权代表茲于本条約签字，以昭信守。

本条約以英文及日文写成两份，1951年9月8日于旧金山城。①

① 签字代表姓名从略。

内部读物

统一书号: 11017·146

定 价: 1.20 元